

耿飏
風燄
回忆录



目 录

第一章 通往“宝山”之路	1
“宝山”在哪里?	1
我的“半边街”	15
童工生涯	27
那一声“喊子”	37
高高的洗砂台	48
身在“宝山”已识宝	58
第二章 锤子 梭镖 钢枪	68
闪光的梭镖	68
扑城,扑城!	75
巧计发传单	82
我的第一支枪	89
细流汇大海	98
第三章 崎岖井冈路	106
雾满龙冈 旗满龙冈.....	106
战争的教鞭.....	121
“飞将军自重霄入”.....	133
架起胜利的桥梁.....	142

DP99/24

东征漳州.....	149
水口之战的教训.....	157
漂亮的歼灭战.....	164
令人困惑的广昌苦战.....	173
血,总是热的!	184
第四章 长征风雷	197
告别于都河.....	197
突破三道封锁线.....	205
奔袭道州.....	218
湘江血战.....	226
强渡乌江.....	241
首夺天险娄山关.....	260
四渡赤水 再克遵义.....	273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290
雪山草地 苦难风流.....	298
路,向明天延伸	312
第五章 从陕甘宁到晋察冀	327
渡河东征.....	327
“神仙洞”里的“修炼”.....	335
援西军始末.....	346
留守“抗日大本营”.....	351
陇东的“反摩擦”斗争.....	358
奔赴抗日前线.....	365

收复张家口·····	375
第六章 从谈判桌到攻城战 ·····	381
斗争在北平军调部·····	381
四平保卫战侧记·····	389
张家口,我们一定回来! ·····	398
转战平汉路·····	410
安国夜谈兵·····	420
正太线上捷报频传·····	430
东歼青沧顽敌·····	438
保北战场再次扬威·····	444
清风店大捷·····	448
解放石家庄·····	467
第七章 鏖战长城下 建立新中国 ·····	482
兵出紫荆关·····	482
八百里路风和雪·····	491
为“王牌军”掘墓·····	503
平津西线斩“长蛇”·····	517
红旗插上太原城·····	526
踏破贺兰山阙·····	539
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	554

第一章

通往“宝山”之路

“宝山”在哪里？

此地巢云窠，
群山耸列多。
荒碑余剩史，
萧寺老维摩。

这首咏山的五言绝句，是我在读私塾的时候，从先生念诗中听到的。当时，在顽童们摇头晃脑地大念“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或者“天对地，海对风，大陆对长空”时，老先生一面吸着水烟，一面就自吟自咏起古诗来。上面这首五绝，是他老人家常常吟咏的。听得多了，我也就背熟了。起初，我只是照着音背，不懂内容，更不知是何人所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元代诗人彭显荣所作，诗中描

述的正是我的家乡——湖南醴陵北乡的景物。一九〇九年（清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子夜，我就出生在这个“岩阻岫深、路隘苔滑”的山乡。

那时，我家借住在北乡严家冲的“耿氏家祠”里。宗亲们让我们住在祠堂里的原因，是因为我家穷得地无一垅，房无一间。所以，借住祠堂带有“救济”的性质。借住的条件是：为祠堂洒扫、维修房屋和照顾香火。

在严家冲一带，耿姓是客籍。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先后建起四座祠堂。按照封建王朝“八品以下官吏及庶民不可立祠”的规定来看，这些祠堂多少记录了耿氏家族的一些中兴史。据说，醴陵北乡耿姓的始祖，是一位叫做耿添爵的先人，原籍江苏上元。他为何在明朝崇祯年间由沿海迁至深山，我们不得而知，但耿家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添爵公有兄弟八人，因为生活艰难，离开江苏，分赴四面八方求生。临行时，把家中仅存的一口大锅碎为八块，每人拿一块以为信物，相约将来凭此信物联系。后来，唯一与添爵公取得联系的，只有其弟添禄公。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生存繁衍，北乡耿家“三修其谱”，后代达一千余人。

至我的曾祖父，耿家已是几起几落。这位曾祖是读书人，中过举人。关于他勤学苦读、以砖为纸、削苕（麻杆）作笔、蘸水代墨、夜以继日地习文不辍的事迹，被当作后世楷模流传下来。我们借住的祠堂里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匾额，就是他的亲笔，据说是学的南宋学者朱熹的字体。在

匾额上面的正梁上，雕着一幅“迷鹿问津”的彩色木刻。那幅画所表示的意思是：一只梅花鹿正在向老松树咨询去水源的途径，而一只鸟却大声地召唤它应该走另一条路。使我久久担心的是：小鹿正显出彷徨不定的神态，不知它将作何选择。现在回忆起来，这幅画也许正象征着如曾祖父那样的文人，在封建社会的处境。

中过举人的曾祖父“学而优”却未“仕”，所以他去世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人。我的祖父由于家境清贫而沦落为一个游方郎中，他的弟弟则混迹于梨园，进入了旧社会蔑称为“下九流”的行列。祖父开始时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店员，天天“拉药橱”，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养不活家里人；因此，只好自己背起药箱，走街串巷，当起游方郎中；但是，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后来他中年丧偶，无力续弦，只得抛下幼子弱女，背起一根纤绳，浪迹天涯，从此再无音讯。

祖父耿之寅离家出走时，我的父亲耿楚南（学名道崇）只有八岁。他出生在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在他出世前，醴陵一带连年灾荒，《醴陵县志》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当时的“饥”和“兵警”。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四年，醴陵有“溃兵过境”，那是曾国藩的败兵残部。同治五年十二月“雨黑子，有好事者试种之，乃芽，即萎。”同治八年“九月，渌桥大火”，百姓流离失所。同治九年“夏，大饥”；十年“螟入醴”；十一年“大水，乡民掬青穗，臼以食，收成十不二三”；十二年“地震，扉尽废”；十三年“历遭兵燹，瘴气过境，饥民尽

食白泥(观音土)”。这位同治皇帝在位十三年,醴陵竟成地狱。

就在“雨黑子”那年,我的祖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过了几年,我的父亲刚刚八岁,又亲眼看到他那做了半辈子斯文郎中的父亲,在渌口码头挥手而别——他毅然脱掉长衫,背起纤绳,在“嗬哟嗬哟”的号子声中,逆流而上,将一艘硕大无朋的货船牵进中流。这个情景久久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他提前十年成熟了。

祖父留给我父亲的,仅是几本《汤头歌》《药性赋》的书本和挥手而去的勇气。于是,父亲与比自己仅仅年长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从“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的药物学中学会了认字,在东讨西乞的苦难中长成了身体,在放牛做田的劳动中认识了社会。

在父亲十二岁那年,他也走上了先辈闯荡江湖的道路。

当时,父亲的一位叔叔耿之霖,少小离家,和一个民间戏班搭上了伙。在我祖父失去音讯之后,传来了这位叔公当了戏班班头的消息。由于他行四,父亲称他为“霖四公”。

父亲决定去投靠远在江西南昌的霖四公。

旅途中,他的全部行李只有一把雨伞。

“县到县,一百八,府到府,三百五。”父亲当时的旅行知识只有这些。但是他凭两条腿终于走到了南昌府。仅靠一口地道的湘东方言和从药物学中认得的几个字,他居然在一个小旅社的阁楼上找到了霖四公。

他听说过：四叔的戏班红遍南昌，四叔的画像（戏报）贴得满街都是，四叔那里有锦衣美食，甚至还讨到了十分漂亮的堂客。……

然而，当他推开那扇破门，与坐在一堆破布里的四叔面面相觑时，泪水立即涌满了眼眶。四叔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他，悲怆地张开双手，颤抖了半天，才喊出一句：“南伢子！全完了……”

原来，霖四公带领的那个花鼓戏班正在走红时，突然厄运降临。一位提督把戏班叫到家里去唱堂会。提督那骄横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盯着美丽的旦角。堂会结束，霖四公正要带着戏班回去；那提督忽然提出要班主和旦角留下，一道喝酒。提督命手下人把霖四公灌得烂醉如泥，然后把他推出门外。霖四公酒醒后，发现自己独自躺在街上……从此，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兼女主角和台柱子。

在那个虎狼当道的社会里，厄运总是和穷人联在一起。尤其是象霖四公那样懦弱、怕事的人，逆来顺受，不敢反抗，于是厄运便更频繁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不久，失去了台柱子的戏班又受到一次打击，琴师席卷细软不辞而别。接下来，戏班解散，霖四公沦为乞丐，沿街卖唱……

我的父亲见到这种情景，只好安慰几句，然后默默地离开了那个棺材般大小的阁楼。

现在必须靠自己了。他到处去打零工，当小工，靠卖力气挣几个小钱，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他发现一位老者，每天要把一担蔬菜挑到城里，便常常去帮他挑一程。

每天帮助挑菜，感动了老者。老者问他的年龄、姓名、地址，他便老老实实地回答：“十二了。”“姓耿。”“没家。”

几天后，他接替了这位老者的差使。原来老者是臬台大人私宅的厨役。在我的父亲接任厨役后，老者升任为管家。

父亲当厨役，这是一次没有契约的卖身。东家只管饭，没有工钱。父亲每天要买够一大家子人的粮米菜肉，劈够柴禾，扫净庭院。什么杂活都得干，说打酒便打酒，说买瓜便买瓜，还要浇那些名贵的花。

最使他难熬的是老爷太太们晚间消遣时，他得捧个漱盂在牌桌旁伺候。

老管家——他的前任——借送水的机会提醒他：“莫犯困！”

他做下来了。事情拚着命干完，而且，采买的东西和银两一毫不差，甚至连扫地时拣到的主人遗落的筹码（可以凭筹领钱），也一一放回桌上的筹码盒里。不贪非分之财，坐得正，行得直——这是父亲的处世格言。

正在这时，北京的皇上把一个失宠的王爷贬职到南昌道，任抚台之职。王爷到任，臬台老爷赶紧买下一对如花似玉的民女，挑了两个清俊机灵的后生，当作见面礼送进抚台府。

这礼物中，就有我的父亲。他当时才十五岁。

值星管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虎虎势势的男孩子，将他带到了亲兵营。

他在那里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系统训练，包括武术、马术和演兵布阵。

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筛选，抚台大人挑选了一批武士，准备把他们作为礼物，送到北京的皇宫中去。因为他那抚台任期即将届满，需要唤起皇上的注意，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而且，安插“自己人”到皇宫里，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这位王爷和皇上是平辈，作为兄弟，也许他心里正打着争夺皇位的算盘。翻开清朝的历史看一看，八旗子弟们搞“窝里斗”是很出名的。

皇上赐来了兵器。我的父亲领到一副虎头双钩。

父亲打点了些银两，去看望霖四公，并向他告别。

霖四公已有六年不能沿街卖唱了。他的肺出了毛病，蜷缩在那个阁楼里。要不是有个五大三粗的侄儿每月来接济他，这个破旧小旅店的老板娘早就把他赶到赣江里去了。

叔侄两人进行了一次临别的长谈。

耿家的流浪汉们历来有“不混出个样子来不回家”的气质。这与当初祖上“碎釜为八”、四面八方闯江湖的气概一脉相承。大多数男子汉就这样流星般逸去，再没有回来。

现在，我的父亲总算吃上了“皇粮”，在霖四公看来是可以“光宗耀祖”了。

“楚南哪，该回家看看了。”

“是，四叔。”

“我——，”霖四公艰难地喘息着：“在崂山向阳坡上有一小块坡地，你让祠堂（指宗亲长辈）转记在你的名下……”

祖父辈只有我父亲这一个男丁。显然，霖四公是在按传统习惯处理他的财产继承了。

“……把我的骨殖送回去，不要断了——香火。”

“要得。”

“还有，你、你要成家。将来有了崽——把一个给我、给我做孙……”

“要得。”

“你要——”霖四公喘息得更厉害了：“对天——发、发誓。”

除了遵命发誓，没有什么别的更能安慰他了。父亲双膝跪下，郑重地保证：

“我，耿楚南，如果将来有两个儿子，一定把次子过继给四叔名下。上天有眼，决不失信。”

按照规矩，长子是不能过继的。

霖四公在“预定”了继孙后，于当天夜里去世。

霖四公的去世，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他对于到京城去做卫士，本来并不感兴趣。他宁肯到疆场上去真刀真枪地拼杀。因此，他向亲兵营的长官说：

“在下的叔父，客死在此。大人如恩准我扶柩还乡，日后如果边防上有用得着的地方，在下当应召而至，拼死相报。”

“准。”

原来，一道八百里加急快令已经送抵南昌，慈禧太后不同意接受外地武士去京，下令解散派遣人员。

抚台王爷体面地遣散了他的部下。令沿途各州县接待这些亲兵武士，并给以“上马费”的优待。

父亲舍不得那副虎头双钩。他上上下下使用了些银两，把它与霖四公的骨灰一并背回了故乡。

当父亲青衣软靠，箭袖快靴，背插虎头双钩，头戴羽翎，胸佩貉带，大步登上严家冲山嘴时，村里人都惊呼起来：

“嗨！好一个双钩大侠！”

我的祖辈、父辈中，许多人离乡背井，目的有二：一是谋生，二是想混出个名堂后衣锦还乡。但是，有的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有的贫穷潦倒，死在异乡。只有我父亲算是回乡了，可是也没有发迹，只带回了一套武士服和一副虎头双钩。然而，这些并不能当饭吃，“双钩大侠”的美称，也填不饱肚子。至于霖四公的遗产，也不过是那一小块地上的十几棵毛竹，解决不了生活问题。

当时醴陵县办团练，曾请我父亲去做教头，但是父亲实在不愿与那些鱼肉乡民的爪牙为伍，便拒绝了。他抱着“艺多养家”的信念和凭双手吃饭的志气，先后学会了木匠、铁匠、瓦匠、医术。株萍铁路施工时，他已经是个挺熟练的泥瓦匠了。

株萍铁路的责任工程师是德国人鲁道夫·麦利克。他

很快就发现，这个谈吐不凡的泥瓦匠非同一般，便让他作个助手，帮助浇铸绿江大桥的桥墩。引桥还没有竣工，我父亲已经能够看懂图纸上那些条条、块块、框框等工艺符号了。

尽管麦利克常常伸出大姆指夸奖他能干，可是父亲的境遇并不见好转。他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直到四十来岁才得以成家，过着“泥瓦匠，没住房”的生活。后来，我们兄弟四人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父亲的负担不断加重。到我五弟出生后，父亲实在无力养活他，不得不忍痛将幼子送给别人，以保其生存。

父亲自己和先辈们经历的坎坷道路，使他认识到：在如此污浊的社会里，穷人连生存都不易，更谈不上成家立业。正是这点认识，使他后来在我的舅舅、共产党员宋乔生和其他进步工人朋友的影响下，思想上有了飞跃。在晚年，他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虽然他自己因年龄关系，不能投身革命；但是他支持我们兄弟几人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九年，父亲第一次去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父亲异常感动，回到我的窑洞中对我说：“共产党的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实在太感人了。”周恩来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也接见了。肖劲光、王维舟同志等亲自安排他的生活和参观活动，还赠送他回家的路费。临行时，父亲深情地对我说：“现在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将士的风采。延安的抗日将士，是中国的脊梁。

你们参加这个革命队伍，这条路走对了。”

一九四六年，父亲以八十三岁高龄，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扶杖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临行时，他对家中亲友说：“陕北陇东，中草药资源丰富，我当力尽所能，为革命将士行医治病，了却此生为国为民的心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跋涉，不幸，由于环境恶劣，他老人家竟客歿于蜀道中。

父亲的一生，是艰辛劳苦的一生。

我是长子，因此，在兄弟姊妹中，最先感受到父母的艰辛，也最先分担起父亲肩上的重担。

我从小就参加劳动。我是在砍柴、放牛、拣稻穗、挖野菜的时光中认识了故乡的。

一道山泉逶迤流过山谷，乡亲们傍溪搭庐，沿水踏路，在长着一蔸蔸禾苗的稻田里辛勤地劳作。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故乡风情画。

我的家门正对着严家冲山口，传说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点石为门的旧地。那里石壁陡峭，古枫蔽天，犹如一扇门户，把山口内外隔离开。据说朱元璋兵败时曾到这里避难，每到夜晚，他用手一点，石门便自行关闭，于是兵匪莫入，朱元璋就可以安心睡觉。这个神话般的故事，描绘出了一幅多么静谧安宁的山乡夜景图！它寄托了人民对清平世界的深切向往。然而，石门并没有挡住祸患的侵入，千百年来的严家冲人民，并没有避免天灾兵祸的危害。

严家冲那绵亘数十里的龙形山，犹如一条绿色巨龙，盘旋在山间盆地里。九个山峰由小到大，好象龙脊，蜿蜒起伏。山上有宋朝秘阁修建的杨大异墓，其碑文大部湮灭，只有“醴陵开”三字可辨。杨大异是何许人？我至今没有查出来。但是，从前面提到的元代诗人彭显荣的诗句“荒碑余剩史”来看，可以肯定，杨大异的墓碑，记录了他的生平，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到元代时碑文已经不全，所以诗人称之为“余剩史”，意思是“只留下残缺的碑文史迹”。不过，元代的残碑剩字大概决不止是现在的“醴陵开”三字，不然也就称不上“剩史”了。“醴陵开”三字，原来的意义已难于查考，但是在我现在看来，这三字似乎象征着家乡人民渴望挣脱枷锁的呼声。

在故乡的景色、传说和古迹中，最令人神往的，是在那深山峡谷人迹罕至的地方，“有泉井，虽大旱不绝”，“有士人讲学地”、“有仙女浣衣曝鞋”……为寻找这些世外桃源，流干了多少“慈母倚门望儿归”的眼泪。而那些“黄巢在此打造军器”、“红巾兵马屯”、“拳民呼宝寨”的传奇，却说明严家冲毕竟不是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和外面的社会是紧密相联的；并且正是这些传奇故事，年复一年鼓荡着后生们涌血的胸臆……

父亲并不希望我的童年都在干活中度过，他希望我读书认字，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在我六岁那年，父亲白天外出做泥瓦匠，晚上回家干木匠活，竭力供我读了两年私塾。给

我启蒙的耿拜泉老先生是个落第穷儒，在前清覆没之前，他已是胡子一大把了，始终也没有迈过仕途上那道“童子试”的门坎，最后却做了谭嗣同的支持者。他曾试图给我取名“开维”，给我二弟取名“开新”，以“维新”抒发他暮年的壮志。耿拜泉先生不以贫富论亲疏，鼓励弟子刻苦治学，建议族中设立奖学金制度，让学生品学兼优，以图振兴国家和家乡。记得我上学后，由于成绩优秀，连续两年获得由祠堂颁发的“优学花红”。虽仅有几升稻谷，但耿拜泉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在我童年的心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在我记忆中的童年画页上，除了对故乡秀丽的山水、勤劳的乡亲、慈祥的父母和教师等美好印象外，还有着天灾兵祸、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兵匪并扰，使我的家乡陷入了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山民们朝慰官军，暮饷大王，日易三帜。壮男躲丁，少妇被掳，户主避税……乡亲们不堪其苦，纷纷外逃。一九一六年，即民国五年，父亲决定全家向常宁县水口山逃荒。

母亲曾极力反对这一决定。这个饱受苦难的农家妇女，对离乡背井有着由衷的恐惧。她出生在湘潭县淦田的一个铁匠世家。我的外婆，也是饱经忧患的贫家女儿，她自幼被卖到遥远的广州，在一个官宦人家当了半辈子使唤丫头，又被转卖于贫寒的淦田宋家，连娘家原来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的母亲宋雪梅是她的长女。当她“及笄”之年，有人曾

撵掇她与地主“王十万”(他住的地方现在叫王十万村)联姻。但是,看透了富家豪门罪恶渊藪的外婆与母亲,宁肯做布衣平民的主妇。她们看中了勤劳、耿直、心灵手巧的孤儿耿楚南。母亲是一位传统的贤妻良母,生活的艰辛使她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于神的恩赐。每当我半夜醒来,如果母亲已经停了纺车,正跪在菩萨象前祈祷的话,那一定是某项债务已经到了非还不可的时候了。

也许是由于外婆早年转辗流徙的悲惨境遇,也许是由于母亲自己安于现状的传统心理,总之,她不愿意离家逃荒。

但是我对水口山之行却抱有极大的兴趣。诚然,与其说是兴趣,勿宁说是众多的传说使我这个八岁的儿童产生了好奇。人们说,水口山的河里流着金沙,水口山的山里埋着银块,水口山甚至连石头都能换得光洋……那里简直是一座神话般的“宝山”。耿家祖祖辈辈都有人外出觅宝,可是没有一个人找到“宝山”。现在,“宝山”就在前面,为什么不去呢?

在我们的坚持下,母亲放弃了她的意见。农历二月初二,在母亲选定的黄道吉日,我们收拾了一担破衣旧絮,将粗重杂物接济了乡邻,离开祠堂,加入了官道上逃荒的行列。

于是,我带着寻找“宝山”的童话般的幻想,离开了故乡。

我的“半边街”

衡阳地区的常宁县水口山一带,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产地。早在宋朝时期,劳动人民就发现山里有“宝”。民间传说:当时有九条银牛,每天傍晚必往湘江饮水,有勇莽后生抓住其中一条银牛的尾巴,牛即遁入山壁,众人循迹挖掘,得白银盈斗。这个传说显然是虚构的,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开发矿山的初期情景。由于最初在这里发现的是银矿,所以,人们习惯地称这里为“银矿局”。

然而,当我们随着人流,踏进水口山银矿局一个叫做“老鸦坨”的山间坪地时,我心目中的“宝山”一下子不见了。

我首先看到的只是一大团灰色的、飞舞着一闪一闪颗粒的尘雾。一群只有腰间围了一块破布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觉得似乎是“鬼”),四肢着地,驮着一个个装满石块的箩筐,在烟雾里爬。在一大片散乱的石块堆中,象是骨头上的蚂蚁一般地挤满了上千个孩子,他们一边用一柄硕大的锤子狠命地敲击石块,一边发出“哇!”“哇!”的用力声。在他们的旁边,来回走动凶神恶煞般的监工,不断地用竹箴抽打那些动作稍慢的工人。矿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的人,他们的嗓子眼里发出十分可怕的哀叫声。这是些犯了“窿哈病”(铅中毒)的矿工,他们瘦骨嶙峋,发长如蓬,双目凹陷,肤色青灰,形同鬼魅,不断地有人在抽

撞中死去……这简直是座地狱。

在一个高大的铁架前，我们找到了堂舅父宋乔生。他是吊车司机。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使人们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

我实在忍不住，一见面便问道：

“银子在哪里？”

“什么？”他把一只手遮在耳朵上。

我大声喊：“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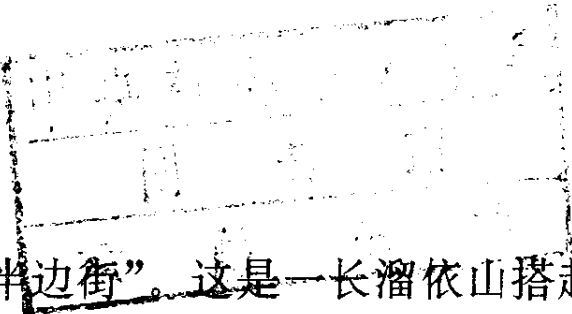
“哈哈！”舅舅放声大笑起来，一边操纵着机器上的把手，一边大声地说：“傻伢！这里没得银子，出黑铅、白铅（锌），”他看到粗大的缆绳已经把一筐石块吊到地面上，便停下机器指一指这些石块：“就是那玩艺。等你熟悉了，就知道它们是怎么变成银子的了。”

从此，我们便住在舅舅家里。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四角落地的草棚子。为了容纳我们一家五口，父亲和舅舅连夜动手，把草棚子又延长了一截，又用一块废弃的旧铁皮，搭起一个厨房。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另一个舅舅宋玉生。不久，我们又把外婆从家乡接来。勤劳惯了的母亲，为了增加一点收入，还抓了一只猪娃养着。

舅父们凑了点钱，到江边的松柏镇上买了礼物送给工头，给父亲领到了工牌。当时银矿局正由土法开采向西法开采过渡，需要增加些建筑物，父亲还是干他的本行——泥瓦

匠。



我们住的地方叫“半边街”。这是一长溜依山搭起的草棚、泥屋、石窠。它的对面就是那个乌烟瘴气的选矿场。从四面八方到水口山来挖矿混饭吃的穷人，不断地延长“半边街”的长度。这里也吸引了依靠各种各样职业谋生的人们。于是，在每隔几家住户中间，就出现了卖杂货的小店、挂小旗的酒馆、摆凉茶的石桌、煎汤药的药铺，还有吆五喝六的赌场、咿咿呀呀的戏堂、测字算命的地摊、打拳卖艺的场地，以及乞丐、无赖、小偷、土娼、黑社会的爪牙和官方派来的坐探，“街”味十足。由于选矿场那堆积如山的矸石限制了它的横向发展，所以这条“街”只有一面有房，因此，工人们便随口叫它“半边街”。

我们住在半边街时，半边街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教育。工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后代摆脱贫困，一家凑几个铜板，请了教书先生教我们这些还不能做童工的孩子学文化。我记得给我们上课的那位老先生是临武县人，叫谭龙光，清朝末年做过翰林院录事，写得一手好字。他不知何故失业，跑到水口山来教书糊口。

宋乔生舅舅看到我的书本上的名字，有些诧异，便问：“怎么？阿忠改名字了？”

我说：“我现在叫耿飏了。”

母亲插进来说：“德伢子（我的乳名叫润德）生下来就身体不好。前年，咱们淦田那个‘一掌金’到我屋里算卦，说他

五行缺火，耿拜泉先生就给他改了这个名字。”“一掌金”是母亲娘家一位姓宋的瞎子先生，由于双目失明，靠一只手掐算推理、算八字糊口，因此有这个绰号。

按照耿家“添开景运佑中帮，辅世民良大而昌，家之道在农兼学，兴养遵儒必有光”的谱系，我排在第十八代“在”辈；又因祠堂里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父亲曾依次为我们兄弟取名“在忠”、“在孝”、“在廉”、“在节”，后来有了五弟，又增加一个“在有”。意思是我家“忠孝廉节”都“有”。父亲崇尚武术，最爱看薛仁贵征东等武侠话本（小说），十分推崇古代名将的勇敢刚毅精神，所以又以“俊”字为冠，分别给我们取了“俊勇”、“俊猛”、“俊刚”、“俊强”、“俊全”的表字，意思是我们兄弟“勇猛刚强”都“全”。但我非常喜欢这个“飏”字，自从有了这个名字以后，其他“在忠”、“俊勇”等名字就再也不用了。

“好，好。”乔生舅舅风趣地说：“‘飏’字有三个‘火’，连你那个姓上的‘火’，加起来就有四把火了。‘飏’字还有‘风’，这又是风又是火的，旺得很哩！”

父亲正在摆弄几块木板，想把他们拚成一个板凳，笑着说：“乔生，你也信那一套？什么五行缺火！要是生下来就有米饭腊肉，就没得什么身体不好了，还会缺火吗！”

“什么系（是）缺佛（火）？”二弟在孝正在换牙齿，“大门”跑风：“系（是）很冷吗？”他搂住舅舅问道。

“小鬼头！”舅舅把他抱起来，拍着他的光屁股蛋儿：

“‘系’很冷啊。不光缺火，水木金火土，咱们都缺啊。”

“可不。”父亲应道：“我都半辈子了，连一担田（湖南话中的“一担田”，相当于小亩的二分地）也没混上，大旱三年，害得我卖了祖上留下的床去换谷，当了一辈子木匠，自家却没有一根椽子，现在干银矿局，却没有钱花，每天净发那些矿票，没用处。”

舅舅说：“哼！逼得紧了，非他妈再起洪秀全不可。”

“洪秀全有‘佛’吗？”二弟缠住舅舅的脖子，还在问，他最爱听舅舅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舅舅讲洪秀全，神秘得让我们晚上不敢出门，他讲石达开，能使我们悲愤流泪，他讲陈玉成、李秀成，能使我们拍手大笑，他讲红娘子，却总是使听众惊叹不已。

我对自己的名字似乎有了新的理解。我朦胧地感觉到，我需要的“火”不是命运中的“火”，而是太平天国英雄们身上的那种“火”，而这正是所有穷苦人所需要的“火”。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很晚了，玉生舅舅还没有回来吃晚饭。

有人沿着半边街跑来，急乎乎地喊：“耿大哥！宋大哥！快去看看，你们家老大出事了。”

耽心了一晚上的外婆一下子就哭出声来。父亲和乔生舅舅急急忙忙冲了出去，我接过母亲包起的一个饭团也追了上去。

可怜的大舅！他肩上压着一担沉重的矿砂，正机械地、

反反复复地沿着湘江大堤走着，就那样走啊，走啊……

父亲马上接下挑子，乔生舅舅扑上去：“大哥，怎么啦？你怎么啦？”

大舅痴痴地说：“兄弟，你，挑——，上——船。这是跳板，好长——”

他气疯了！也累垮了！终于昏倒在乔生舅舅的怀里。

父亲急忙去掐他的人中，又喊我拿冷水来敷在大舅的额上。玉生舅舅喃喃地说：“跳板……老子……跳板……”

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天不亮就到松柏火车站（从水口山已有六公里的铁路到松柏）挑起一担矿砂往松柏渡口赶。一担担沉重的矿砂，就是从那里装船，运往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瑞典。洋人把矿砂炼成白花花的铅，造成军火，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去。

每年，有三十万两纹银落进银矿局的保险箱里。水口山矿工用血汗喂肥了银矿局的老爷们。

一担矿砂，从松柏车站挑到渡口，要走好多里路，挑夫只得五个铜板。

但是，“安利英”洋行的把头，却要在渡口收三个铜板的“落地费”。

我大舅每天挑几趟。他不想被人拿走那些用血汗换来的铜板。家里人口多了，细伢嫩崽们亲亲地喊着舅舅，可他们连顿辣子都吃不上……

今天，他挑到渡口后，不放下担子，却在那里倔倔地等

着上船，任那沉重的楠竹扁担压进肉里。当把头伸过那只肮脏的手时，他坦然地说：

“我没有落地呀，你收钱无道理嘛。”

把头冷笑着走开。等最后一担矿砂上了船，他抽走了长长的“过山跳”，扬长而去。

砂上不了船，就领不到“对牌”，没有“对牌”，渡口的把头就要按“私卖矿砂”治罪，轻则罚十块大洋，重则关进矿上的地牢。

玉生舅舅出于对剥削和压迫的本能的反抗，而采取了这个“不落地”的办法。但是，他没想到把头竟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整治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血汗钱交给把头呢？为什么担子不落地要受处罚呢？为什么他们把跳板抽走呢？为什么……想呀，走呀；走呀，想呀；终于他疯了，被那张无形的剥削网缠住了、逼疯了。码头上已经收工，他还在寻找那条能够走上运砂船的窄木板。

他要去换回“对牌”，拚死也不让挑子落地，因而挑着重担来回地走，迷惘地寻找着摆脱“落地税”的出路……

那天晚上是个朔日，我第一次感到了与官方的“对立”。父亲留下看守那担矿砂，乔生舅舅背着玉生舅舅，我捧着母亲给大舅包上的饭团，走向半边街。

玉生舅舅一路上凄凄惨惨地笑一阵、哭一阵，断断续续地唱着挑东西走路时哼的一首歌谣：

十七、十八学做窿，
二十七、八逞英雄，
三十七、八咬牙过，
四十七、八背竹筒。

这就是水口山矿工的一生。

其实，能熬到背竹筒(讨米)的人并不多。在半边街，许多窿工由于铅中毒、生了窿哈病(矽肺)，干不了几年就被把头收掉工牌，一脚踢出矿山。再加上使用“牛喝水”式的无勘探开采，哪里有矿哪里挖，整个矿层支离破碎，塌方、泛水、窿火(主要是用火药爆炸矿床时引起的灾害)，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半边街上的棚户里，孤儿寡妇的哭声从来就没有断过，老鸦垠乱葬岗上的乌鸦，吃死人肉吃红了眼，大白天就飞到选矿场上空聒噪。

我十一岁那年，一场特大的冒顶事故，突然降临到水口山矿工头上。

那天，我和二弟与半边街、老鸦垠等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正在锅炉房附近拣煤渣，窿口那边突然发出一阵惊慌的呼叫声。我们抬头一看，只见一股烟尘从窿口升起来，吞没了高大的井架，选矿场周围的人们都向窿口涌去。锅炉房的喊子(汽笛)尖利地“呕—呕—”叫起来。

“窿火!”比我大两岁的顺伢子惨叫一声，扔掉小口袋就向窿口跑去。我们猛然明白了，窿内发生了塌方和水淹的重

大事故。

我拉着二弟，也跌跌撞撞地向窿口跑去。窿口的烟尘很快就升到半空，形成一个灰白色的大蘑菇。一百多名工人、堂客、童工已经把窿口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从大人的腿缝里挤进去，只见乔生舅舅正在把一个罐笼飞快地放下去。有几十个大婶大嫂，不顾人们的阻拦，哭叫着扑向窿口。

“呕—呕—”一队矿警分开人群冲到窿口，大声地吹着哨子，把人们驱离窿口。他们当中一个当官的跳到高处，喝道：

“宋乔生，把罐提上来！”

舅舅仍在放罐：“王麻子，下边有四十多条人命呐！”

“那我不管，局长有令，立即封窿！”

稍静了一下的人群，突然炸了营。女人们发出更惊慌的哭喊。王麻子朝天连开三枪：

“听着。下边的几个人眼看是没命了。水火无情，不封窿就要下贓(爆炸)，这可是几万两银子——宋乔生，你给我停下！”

“王麻子，你这个畜生！”

“拿下！”

又一队矿警赶来增援。乔生舅舅抄起一把扳手，与围上来的矿警展开搏斗。几十名工人加入了混战。

舅舅用一只脚踩住卷扬机的变速杆，一边用扳手挥开围上来的矿警，一边拼命喊：“井下的弟兄，快进罐呀！”

他想坚持到把罐笼提上来。

但是，回缆被砍断了，浓烟吞没了掉下去的缆绳。王麻子下令：

“装子弹！那个不听，打！”

他们硬是用枪托打开一条通路，派人把窿口封上了。

悲痛和愤怒化为仇恨，在工人和家属的心中滋长。这次矿山事故，不仅使我看到了矿工生活的艰险和悲惨，也使我看到了那些官老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残酷手段，从而更增加了我对官方的对立情绪。

各种反动派狼狈为奸，残酷地压榨矿工，掠夺矿山资源，使水口山矿变成了一座阴森的人间地狱。然而，哪里有压迫、有剥削，那里就有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水口山工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自发斗争。一九一七年爆发的有数千工人参加的“打红饷”斗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

按照矿局的规定，每年应从矿上的利润中提取一小部分作为“红饷”，其中三成分给职员（因为职员人少），七成分给工人，于次年元月份分发。可是，一九一七年元月，工人们没有拿到上年的“红饷”，二月、三月也没有消息，到四月下旬，工人们得知，省里（水口山矿是官办的，归省里领导）早已批下“红饷”两万块大洋，但是都给局长、师爷、监工、把头们私分了。联系到前几年矿局领导违反“工人七成、职员三成”的事，工人们憋了几年的怨恨，加上新仇，一齐并发了出来。四月二十六日晚上，两千多名工人在江村坳的山窝里举

行秘密集会。会上决定到矿局去闹“红饷”，并推举选矿工人杨益生、王芳才等四人为领头人。次日早晨，一千多名选矿工人团团围住了矿局。杨益生等四人突破矿警的戒备线，冲进局长办公室。平时盛气凌人的局长周维容，这时一反常态，满脸笑容地招呼他们坐下。开始，这个麻子局长不承认有“红饷”，经过杨益生等的揭露，并慑于外面一千多工人齐声呐喊的声威，他麻脸胀得通红，不得不承认有“红饷”，连口答允局里立即开会商量。

矿局商量后，于晚上答复工人：每人发“红饷”三百九十文。这个数目和工人应得的“红饷”相差甚远。因而，矿工们十分不满。当天夜里，工人刘远生在窿内劳动时摔死，工人们回想起矿局平日不管生产安全、不顾工人死活的种种恶劣行径，不禁怒火中烧。于是，两恨相加，怒火在全矿工人中燃烧得越来越旺。二十八日，采矿科和其他各科的工人也一齐停工。全矿四、五千工人，抬着刘远生遗体，手持钢钎、铁锤、木棍、竹杠，冲进矿局。

这时，矿警队鲍队长率领二十多名矿警赶来，鸣枪示威。工人们更加气愤，齐声喊“打”，蜂涌而上，把这些矿警打得落花流水。接着，工人们捣毁了局长、师爷们的宿舍，还把运输科一个无恶不作的把头打了一顿。

局长周麻子害怕工人斗争进一步发展，只好同意按“工七职三”的比例发“红饷”，并同意给刘远生购置棺木，妥善安葬。但是，他并不甘心失败，暗地里电告省政府和矿务总

局。六月一日，从衡阳开出一连反动武装，到水口山疯狂镇压，逮捕了王芳才等二十多名工人。周麻子还下令开除了十多名工人。杨益生在群众掩护下，逃离虎口，远去广东。王芳才后来在牢里被折磨而死。

工人的自发斗争，虽然一次一次地遭到镇压，但是，反抗的怒火在继续燃烧，斗争的力量在不断产生、流动、聚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水口山的工人斗争，从自发斗争逐渐变为有领导的斗争。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示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水口山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带来了《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入门》、《俄国革命纪实》等革命书刊，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并开展组织工作。

乔生舅舅是个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的人，每次工人斗争总是少不了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革命道理后，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家来到半边街居住的五年中，虽然我还是一个少年，却亲眼看到了工人的苦难和他们斗争时的英勇，看到了压迫者、剥削者的残暴和奸诈。特别是我和乔生舅舅朝夕相处，他的言行不断地感染着我，使我逐渐懂得了爱谁、恨谁；也可以说，我不知不觉地从他那里接受了早期的革命教育。

童工生涯

一九二二年，我已十三岁。由于四弟在节和大妹淑贞相继出世，我家已是七口之家。作为长子，我必须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了。趁过年的机会，父亲给选矿科的工头们送了礼，交了保金，替我租了一柄三磅重的敲砂锤，从此我当了敲砂童工。

水口山一带是我国的重要铅锌矿产地。早在宋朝，劳动人民就发现山里有“宝”，开始在这里挖砂炼银，淘沙找金，造窑蒸硫。后来才知道山里埋藏着丰富的黑铅、白铅（锌）、铜、铁等多种矿物。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把这里的矿山收归国有，设立“银矿局”。民国初年，当时的政府接收了银矿局后，对矿山实行了技术改造，把原先的“大开膛”式明窿掘矿，改为西法开采，产量有了改观。并且还修了一条六公里的小铁路，由水口山矿山通到湘江边的松柏镇，专运矿砂。但其选矿方法，仍然沿袭着旧的重力选矿法，即水选法。水选之前先要选砂，而这一工序，是由近千名童工完成的。

我们住在半边街时，与敲砂场相隔不远。所以我对敲砂并不陌生。每当窿口送出矿石，我们便一拥而上，用箩筐、破桶将矿石背到自己的位置上，举起敲砂锤，发出“哇！哇！”的用力声，把它敲开，剔出白色的废石和黄色的大粒硫矿石，然后通过其他工序将暗灰色的黑铅和白灰色的白铅分开，

最后运到渡口装船，运往能冶炼的地方。

童工大都营养不良，很多人患有佝偻病，一个个脑袋显得很大，肚子鼓出来，加上赤身裸体，汗流浹背，终日“哇、哇”地喊号子，此起彼伏，叫声不断，就象稻田里那些叫做“麻蝮”的青蛙一样，因此，人们就叫这些孩子为“敲砂麻蝮”。

我得每天摸黑起床，赶在上工喊子拉响之前到场领牌。如果走晚了领不到工牌，一天就没有工做了。为了赶定额，连午饭都顾不上回家吃。那时我家已经搬到枫树塘住，离敲砂场有两里多路，所以，每顿午饭都由我的二弟替我送到敲砂场。

那些从地底下开采上来的石头，经过我们的分选，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元，可是我们每月只挣一元多钱。工头、师爷们每天拿着竹箴，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觉得哪个童工不顺眼，便没头没脑地把他抽打一顿，被打的童工疼得满地翻滚，哭爹喊娘。

敲砂场无遮无盖。冬天，北风吹，砂锤震，人人手上都裂出深深的口子，疼痛难忍。夏天，烈日晒得脊梁脱皮，有时一天要挨几场大雨浇。许多孩子因中暑、感冒，奄奄一息地被大人背回去，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夏天，我已经是个“熟练工”了。每天可以提前完成定额，再帮那些体弱多病的小伙伴干一些。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敲砂小工友刘亚球突然找到我，悄

悄地说：

“耿飏，快去找你舅舅，我哥哥叫他到水泵房去。”

他的哥哥刘东生，是乔生舅舅的朋友。我问道：

“到水泵房干什么？”

“你就说，有人请他去吃豆腐。”

过了几天，刘亚球又让我告诉舅舅，到水泵房去，但是这次不是去“吃豆腐”，而是去“搓骨牌”。

每次“吃豆腐”或“搓骨牌”回来，乔生舅舅的脸上就泛着红光，好象有了什么喜事。要不就关上门和我们一家人说话。有次，他对我父亲说：

“南哥，说说矿上不合理的事。”

“不发现洋发矿票，这就不合理。”父亲说的矿票是矿局印发、仅限在局内流通的一种代用券。“饷银本来就少，再拿了矿票去买他们的货，又被刮个二、三成。”

母亲提出一个米袋说：“局里的米店，买一斗给不满八升，还掺了沙子。”

“对，”舅舅说：“这就叫剥削。”他把母亲说的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又低低地说：“上头已经来人查问了。”

“咳！有啥子用？”母亲叹口气说。

“不，这次来的人是我们工人的自家人。”

“哪个？”

“长沙来的委员哩。”

“是你们领头的？”父亲问。他已经明白舅舅经常到水泵

房去，绝不是吃饭赌博。

舅舅笑笑，没有回答，只是说：“前几天从衡阳来的那些学生伢，就是这位先生派来的。”

“要写状子？”

“差不多。”

“别忘了把敲砂场的事也写上。”我在被窝里提醒舅舅：“潘癞子天天要打好几个小工友，说他们敲的砂不干净，有好多人被扣了工钱。”

“还有。”父亲指指他的小本子：“局里不拿窿工当人，下窿费衣服，就发一条粗布，上窿当被子，下窿当帽子，洗澡当帕子。囚犯还发个号坎呢！”

“这些事那位先生都管吗？”母亲问：

“管！要让咱工人当家做主哩。”舅舅挺了挺身子回答。

“那不就是要改朝换代啦？”母亲似乎也明白起来。

“是洪秀全吗？”我的二弟突然跳起来插问，原来他一直没睡。他已长齐了牙齿，说话不再跑风了。

我对这位神秘的委员产生了兴趣。当刘亚球再让我送信时，我便盯住舅舅，闹着要跟去看看。

“那好，你在火车坪这边放哨。有人来，你就说一声：‘喂！这里有蚰蚰！’”

“那委员——什么样啊？他是谁？”我一再追问。

“就是毛润芝先生。”看来舅舅对我完全信任了。

于是，每次舅舅他们开会，我就在火车坪这边放哨，负

责监视老鸦垵方向的则是刘亚球。

那时，经常听到关于毛泽东同志来到水口山的消息，说他调查了工人生活状况。在这前后，毛泽东同志还多次指示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和湘南学联应以水口山为重点，深入工人群众，加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工人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从而理直气壮地不断提出经济斗争的要求。

由于采用了西法开采，矿山收入大增。但矿当局不但不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而变本加厉地驱使工人卖命，大肆贪污红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当时长沙的一家报纸嘲笑说：

“水口山自赵铭鼎以来，诸事废弛，积弊甚深。如：局长旅省、科长驻衡办公，……成为习惯，尤可笑者。”

赵铭鼎就是湖南省“主席”赵恒惕的弟弟。这家伙既狠毒又阴险，他当局长之后，把水口山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在矿局领取饷银，搜刮工人血汗，却从不到局办公，长期住在长沙，盖起了豪华的公馆，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于是他的部下纷纷效法，今天这个做寿，明日那个纳妾，就连师爷、把头，也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矿工们纷纷说：

“不反不行了！”

十一月的一天，乔生舅舅叫上我，到火车坪去欢迎“萍乡来的先生”。

小火车高鸣着汽笛停下来，刘亚球的哥哥刘东生，陪着

几位先生走下火车。刘东生向舅舅他们介绍说：

“这位就是蒋先云同志，这位是谢怀德同志。”

他们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委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到水口山来传授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经验，组织水口山矿的工人运动。

当天晚上，几百名工人集合在康家戏台前面的坪地上，热烈欢迎他们。乔生舅舅、我的父亲和我都参加了。欢迎会上，蒋先云发表了演说，他讲了工人们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根源；指出工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才能免受压迫和剥削。他还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团结斗争。他说：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是成立工人俱乐部；有了俱乐部，我们工人就有了靠山。他讲得通俗易懂，还不时运用比喻，如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易折断”来说明工人团结就有力量。许多工人不住地点头，有的听着听着，竟流出了眼泪。我觉得他讲的许多道理，以前都没有听到过，经他一讲，脑袋开了窍。

我父亲听了后感慨地说：“蒋先生说得对，这个世界实在不公平，象我们这些盖房的，做了一辈子砌匠，自家却造不起一口屋，这不正应了‘泥瓦匠，没住房’那句古语吗？”

水口山工人要求改变现实的情绪，本来已是一把干柴。党组织派人来到水口山，犹如在干柴上撒了火种。工人群众情绪高昂，纷纷要求成立并参加工人俱乐部。在刚刚建立的党小组的领导下，第二天就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

处。

接着，筹备处发出了成立工人俱乐部的通知和传单。传单上说：“一人的力量很小，大众的力量无穷。我们已经觉悟了，醒来了！”“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我们这个团体好好来维持，好好来进行吧！工友们来呀！快来，快快来！”

两天中，全矿三千多工人踊跃报名加入工人俱乐部。十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三千多名工人手里举着写有“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劳工神圣”的彩色纸旗，参加了在康家戏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蒋先云、谢怀德和好几位工人代表都讲了话。

工人俱乐部选出了“十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

乔生舅舅被选为“百代表”和工人纠察股的委员。

设立在老鸦埠一家旅馆里的工人俱乐部，成了全矿工人心目中的圣地。工人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就来找俱乐部。正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中所说的：“数千工友均以为久处于十八层地狱之下，必将有出头的日子了。因此，各科代表连日来部讨论，如何改良生活，如何改良待遇，遂成了最大的问题。”

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使反动派胆颤心惊。一封急电送到“旅省”的局长赵铭鼎手里，要求封闭工人俱乐部并将蒋先云等“就地正法”。密探、工贼、矿警四处钻营，造谣、恐吓、挑拨，使出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甚至溜到工人俱乐部探听消息。他们企图用这些卑劣手段来分化工人队伍，瓦解工人

斗志，摧毁刚刚诞生的工人俱乐部。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必然遭到失败。十一月二十八日，工人俱乐部发表声明指出：工人俱乐部的宗旨“乃是永远的使我们全体工友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的。”驳斥了反动派指责工人组织起来是“扰乱矿山秩序”的谬论。声明还揭露了当局挑拨工人和中下级职员关系的阴谋。声明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工人的信心和斗争意志，挫败了反动派的如意算盘。之后，蒋先云率各科总代表向矿局提出了工人的最低要求：

- (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 (二)津贴俱乐部的费用；
- (三)增加工资；
- (四)均分红饷。

矿当局对工人的要求使用了“无赖”战术。他们决定采用不予理睬的对策。俱乐部则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当局进行斗争。“一日一函，催促矿局速行答复条件。”

实际上，俱乐部并没有指望豺狼会发善心。在此期间，各种为罢工而准备的群众组织相继完善。我们这些“敲砂麻蝮”以其“人小、腿快、不引人注目”的特色，成为站岗放哨、通信联络的主力。例如，罢工时宣传用的油印机、文具纸张等，就是由童工从衡阳秘密运到水口山的。

乔生舅舅当过铁匠，这时他又重操旧业，带领工人纠察队连夜赶制梭镖。工人们为应付意外，用这些梭镖进行了应

急训练。

十二月五日，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机器全停、窿口静寂，一份《罢工宣言》发出了工人的心声：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从前一样……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改善工人的待遇和争取工人的权利，工人俱乐部还向矿局提出了“须承认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人的全权；增加工资，每年加薪一次，并发红利；每逢星期日休假一天不扣薪，因工丧命者给抚恤金，受伤者给养老金；婚姻、丧葬、病假照常给薪；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矿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二百元及俱乐部建筑部址津贴费一千元，并须判给公地三十并，如部址建筑未竣，矿局必须给公屋一座”等十八项条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北京总部及时发出了通告，要求全国各工团声援水口山这一活动。毛泽东同志直接出面与赵恒惕本人对话，为这一行动争得了法律上的承认。矿局局长赵铭鼎被迫辞职。新任局长刘世涛按照赵恒惕的旨意，采用缓兵之计，要求工人先开工抽水，以免淹窿废矿。他们甚至使用酒肉拉拢，以为韬晦之计。

当这一切都遭失败之后，反动派终于孤注一掷。赵铭鼎重新粉墨登场。十二月十八日，一个炮兵连唱着反动派军歌开进水口山。

“‘粮子’（工人叫兵为吃粮的‘粮子’）来啦！”

一时，堂客找丈夫，家长寻童工，家家都关上了门。“兵匪一家”这是旧社会中老百姓的切身经验。矿局办公楼的窗口里，又露出了那些官老爷们摸着八字胡子品茶的影子。

党组织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冷静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对这个炮兵连采取争取教育的办法。那些士兵，大都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出身，是被抓来或者稀里糊涂地被骗来当兵的；所以，当我们工人俱乐部对他们开展工作后，没有多久他们就对工人的境遇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同时，他们也感到了这次罢工是不能用武力制服的。于是，士兵们干脆来个明哲保身，纷纷私下表示：决不干涉工人行动。

罢工恢复了势头。现在，赵铭鼎、刘世涛不得不掏出他们那“图穷”之后的“匕首”了。

一张“请柬”送到了俱乐部，指名要蒋先云前往“磋商”。

消息立刻传遍了矿山。我父亲仅用三个字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鸿门宴。”

我们这些小通信员们把脚板甩得叭叭响，从各个地方把工人代表和党员们召回俱乐部。实际上，这次骨干会并没有按预定的范围进行，有闻讯赶来的工人，还夹杂着一些獐头鼠目的“癞子”。在会上，蒋先云斩钉截铁地拍案决定：

“我去！”

听到蒋先云决定去赴“鸿门宴”的消息后，在我的思想

里,交织着两个念头:一是担心,怕他去有危险;一是佩服,觉得他真英勇,就象我常听父亲讲《三国演义》时讲到的关云长“单刀赴会”一样。比较起来,还是佩服的念头占上风,于是我不觉喊出声来:“好一个‘单刀赴会’!”

那一声“喊子”

如果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激起波澜,使我对革命充满向往的话;那么,十二月十九日午后三点钟,回响在矿山上空的那一声“喊子”(即汽笛),则直接把我拉进了工人斗争的洪流,使我成为这一伟大革命运动中的一员。

这是我有着充分准备、静心聆听、焦急等待的一声喊子。这声喊子将号召全矿工人都到矿局去,做蒋先云的后盾,因为他今天要去和赵铭鼎、刘世涛等“磋商”。

乔生舅舅一直让我跟着他,带领纠察队员们,到各处通知十代表、百代表、童工、家属:

“准备好,喊子为号,直扑矿局。”

“总代表说带些柴禾、煤油,让他们看看矿工的厉害!”

谢猛子(工人们这样称呼谢怀德)在锅炉房迎上了我们:“老宋,汽笛已经派人把守好了。”

“走!到矿局去!”舅舅说。

这时,矿警队已经把老鸦垵、火车坪、枫树塘、五子垵的

四座木栅门紧紧守住。局本部前后四层大门，各配双枪、马刀、军棍。树丛里的打手，探头探脑，一派杀气腾腾。

蒋先云和刘东生来了。他们的身后，是一群雄纠纠的工人，虽然喊子还没有响，但不少工人已赶来保护总代表了。乔生舅舅迎上去：

“总代表，你真得去咯？”

蒋先云点点头，他特意穿了一件长衫，胸前飘着总代表的红绸标志，没有停步，分别用左右手拉着乔生舅舅和谢怀德，大步向局部走去。

刘东生说：“总代表知道他们的诡计，但必须走一趟，这样才能壮壮我们的威风。为了防备万一，我陪蒋先生去！”

刘亚球发现了我，挤到我身边说：“耿飏，不怕的！”

我不但不怕，反而十分勇敢。我说：“来，咱们上树，看着总代表和你哥。”

蒋先云和刘东生在矿局大门口停住，转身向工友们挥挥手，蒋先云整一整长衫的领扣，大步向岗哨林立的甬路上走去，刘东生跟在后面。

我们虽然爬到了矿局门前的大树上，可是仍然看不见他们两人到底进了那个房间。也没见赵铭鼎、刘世涛等坏头头们进局。这时才真正担心起来。突然，局里一声哨子，十几名矿警从房后边冲出来，涌进了招待室。看到样子不对，围在门口的工人立即大声呼喊起来：

“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

四层岗哨的十几名矿警赶紧关上第二道门，集中守在那里。

我真想喊一声：“再不放人，我们就拉喊子了！”

但我知道这是秘密。长期为俱乐部放哨，舅舅已经告诉我养成保守秘密的习惯。

显然，矿局正在用武力威胁我们的代表。我的心跳得厉害，只是和刘亚球使劲地摇树枝，一声一声地喊：“放出来！放出来！”

这时，我盼望的那一声喊子，响了！

“呕—呕—呕—”那声音，象是从整个地底下冲上来的，憋足了劲，直往我的心里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声喊子还在我的心里回响。

火车坪上停着的一台机车，也拉响了汽笛。三千多名工友“啊！啊！”地与喊子呼应着，洪水般蜂涌而来，一下子把矿局围成了一座孤岛。我和刘亚球从树上跳下来，汇进了这股洪流里去。第二道封锁线已经被我们冲开了。我发现父亲带着几个徒弟，手里拿着瓦刀，在人群中大喊着：“官逼民反啊！”工友们有的拿着箴片、煤油，有的手持炮锤、铁锤、梭镖，团团围住矿局。正如中国劳动组合部报道的那样：形成一个“钢铁桶子”。

“哥！”

我一回头，人缝里挤进一个小毛头，原来是弟弟在孝。他手里抱着一搭松毛柴。

我立即分一半：“哪来的？”

“四十八家。”四十八家是一个住宅区的地名。

穿月白学生衫的朱舜华老师（即张琼，是工人夜校的女教师），已经站在高处，大声地喊起了口号，工人在她的带领下，愤怒地吼叫起来：

“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全权代表！”

“放出总代表！”

“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

“延长一点钟就增加一个条件！”

“不放出我们的代表，就烧毁矿局！”

……

这时，一大队矿警，约有一百多名，奉命赶来镇压。谢怀德从怀里“刷”地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马刀，大声怒吼：

“你们来干什么？快回去，否则，我们工人不讲客气！”

大家一齐喊“滚回去！滚回去！”

矿警们吓呆了眼，连声音都变了：“兄弟不过是执行公务，就回，就回。”

乔生舅舅带领大家将木柴、竹片、松枝用力扔向局招待室，大声警告：“放人！赵胡子！你不放人，烧你个狗日的！”

大家挥舞着手里的东西，敲着洋铁桶。七八个玻璃瓶扔进去，在墙上碰得粉碎，空气里弥漫着煤油味。

在“呕—呕—呕—”的汽笛声中，在一阵阵“烧毁矿局”、“誓不复工”、“停泵淹窿”的愤怒声浪中，在“杀一个蒋先云，

还有三千个蒋先云!”“杀一个刘东生,还有三千个刘东生!”(这是蒋、刘两位面对敌人“不开工就立即正法”的威胁而发出的豪言壮语)的凛然正气下,赵铭鼎之流吓破了狗胆,乖乖地放出了蒋先云和刘东生。

我们簇拥着总代表,凯旋俱乐部。在敲砂场前的土坡上,蒋先云再次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这些官僚资本家今天不是要我们去谈判的,是想搞诡计,杀一警百的。现在放了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又想玩花招。但是,我们全体工友只要团结起来,反动派最后终要垮台!”

这天晚上,乔生舅舅匆匆地回家拿了一包饭团,对我说:

“飏伢子,明天一早到俱乐部去拿传单,你们到大渔湾、松柏,见人就给一份。”

我点点头说:“那你不睡一会?”

“不行。我们工人纠察队今晚上还要巡逻。记住,大人不复工,你们也不能敲砂!”

母亲问:“乔生,不复工,快没得米了,怎么办?”

“梅姐,坚持住。反动派比我们更着急。”

“对头!”父亲一拍大腿:“码头上压了七八十条船,赵铭鼎被人家堵被窝了。”

第二天,水口山三千工人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激起了全国各工团、法团和新闻界的声讨巨浪。

赵铭鼎、刘世涛一伙，在这次妄图杀害总代表的阴谋败露后，又妄图“失火钻床底”，先救外商亟待装船要矿砂的燃眉之急。他们指使选矿科长潘振纲火速强迫童工敲砂，以图解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潘振纲气急败坏地来到敲砂场，大声地咒骂着：“你们这些臭麻蝨，立刻开工，每人敲一担砂，敲不完我抽你们的骨头！”

他以为我们这些童工，最大的弱点是怕吓唬。他又想错了。罢工半个月以来，我们在俱乐部的训练下，已经成为坚强的小工人。面对着潘振纲的威胁，大家纷纷喊起来：

“不答应条件，就不敲砂！”

“潘癩子，潘癩子，当狗腿，流坏水。”

潘振纲恼羞成怒，拣起一根竹箴，扑头盖脸地向童工打来，边打边骂：“兔崽子！懒鬼！土匪仔！”

敲砂场上一片混乱，小伙伴们四散逃开，潘振纲得寸进尺，抓住了一个十来岁的小童工，用力把他掼在敲砂位子上：

“安伢子，今天你不给我敲砂，看我剥了你的皮！”

我和刘亚球、顺生仔他们一商量，每人抓了一把砂土，冲了上去。

“潘癩子，有能耐你去找俱乐部评理。欺负我们细伢，算什么？”

散开了的童工又围拢来，一齐喊：“没羞！没羞！”

“反了！”潘振纲又挥舞竹箴，气急败坏地逼向前来：“打死你们这些臭麻蝮！”

我捅一下身边的在孝：“去喊舅舅。”

我们和潘振纲展开了混战，向他扔沙土、臭鞋。这家伙只得跳到一个高台上，大喊：“马大个，把你们几个弟兄叫来！”

附近的几个武装矿警闻讯赶来，一见这阵势，向我们伸出了枪口。

潘振纲有了帮手，得意忘形：“政府有令，闹工潮格杀勿论！”他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哗啦哗啦地拉拉枪栓：“谁敢违抗，立刻枪毙！”

几个矿警也拉拉枪栓：“都干活去！”

场上气氛紧张起来。我们几个领头的大眼瞪小眼，急得想不出主意来。

潘振纲更上劲了：“耿家的大崽、刘家小三子、还有顺伢、牯仔，你们给我先干，老子认砂不认人。”

他话还没有说完，猛地那一声喊子又在耳边响起，我浑身的力量都聚到喉咙上了，就尖声喊起来：

“哇——”

几百个“敲砂麻蝮”同时“哇——”起来。我们这些“麻蝮”平时每天要“哇”几千遍，底气足，嗓门好，现在一起喊起来，把愤怒、鄙视、勇气都“哇”在里边了，犹如几百个“小喊子”一齐拉响。“哇”助胆，胆壮威，我们那几百个“麻蝮”嘴

巴，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大家蜂拥而上，“哇”得那些反动家伙连连后退。潘振纲声嘶力竭，暴跳如雷，但是谁也听不见他叫什么了，只有一片“哇”声，伴着几百只挥舞的小拳头，震荡在矿场上空。

在“哇”声中，工人纠察队早已闻讯赶到，那几个矿警灰溜溜地收了枪，抱头鼠窜。紧接着，乔生舅舅一个“旱地拔葱”跃上了台子。

他一把揪住潘振纲的大衣，伸手就缴了他的手枪。姓潘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乔生舅舅一脚踢下了台子。紧接着，几个工人纠察队员上来把他扭住。

“孩子们，你们胜利了！”舅舅抡起胳膊欢呼。

我们那暂停的“哇”声又爆发起来，同时大家使劲地鼓掌。掌声、“哇”声连成一片。这时，在舅舅的身后，露出了我二弟在孝那满头大汗的圆脑壳。他也喊着：

“胜利了！哇！”

这就是水口山铅锌矿工运史上著名的“一二·二一童工大捷”。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赞扬：“……罢工十余日，俱乐部日夜训练，即幼童亦变为强夫矣！”

潘振纲用手枪威逼童工，不但未得成功，反而被我们的党组织抓住了把柄。俱乐部一面要求当局惩办凶手，一面连夜起草快邮代电，利用赵恒惕颁布的“省宪”中不准私人拥有枪支的规定，向全国呼吁“铲除藐视法律之公敌”。反动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只得令潘振

纲连夜逃出水口山，亡命而去。

赵铭鼎、刘世涛见明枪不灵，又使暗箭。他们捏造了工人“损坏机器”、“暴殄矿山”的“罪行”。但是，这些勾当也遭到了俱乐部的揭露和痛斥。接着，他们又要鬼把戏。一个瘦猴跑到我家，对外婆和妈妈说：

“不过是为几个红饷，何必闹得大家脸上下不来！劝你家宋代表莫闹了。”

母亲说：“又不是他自己的事，俱乐部已经许下了，只要你们应了十八条，自然不闹罗。”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局座就请蒋先生和宋代表他们到松柏赴宴，共商息事。”他又神秘兮兮地说：“听说每人有这个数好拿呀。”他伸出手，比个“八”字。

外婆说：“那敢情好罗，可我们乔生仔未必收啊。”

“老人家劝劝他嘛。”

“你自己去说吧。”

反动派贿赂工人代表，又遭到了失败。于是，又悬赏搞暗杀，点名要蒋先云等几位工人领导的脑壳。

家里未免担起心来，只有我父亲听到消息后淡淡一笑：

“莫怕嘛！这不就是说明赵胡子他们气数尽咤？这叫‘驴子冒得法，临死踢一脚’。”

在那些日子里，工人俱乐部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圣地。在老鸦垵俱乐部那间堂屋里，挂满了全国各地工人、学生、民主革命团体发来的声援电。除此而外，还有经济上的支援。

人们谈论着：

“听说没有？连列宁都知道我们罢工了，发电报来了。”

当时曾流传列宁发电报支持水口山工人罢工的消息。

“列宁是哪个？”

“列先生比长沙的毛委员还大？”

“嘘！还有，赵胡子再犯牛劲，全国工人都要……”

“哪样？”

“‘呕—呕—呕—’明白了？”

“噢。”

赵铭鼎、刘世涛一伙终于黔驴技穷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他们被迫无条件接受工人要求。二十六日下午，十八条要求得到签字认可。

水口山矿有史以来的盛大节日到了！二十七日上午，三千多工人兴高采烈，高举“劳工神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万岁”等标语，在老鸦埠洋炮厂前集合，举行了大游行。我们把一张张油印的《上工宣言》，沿途分送给每一个工人：

“胜利了！胜利了！气也出来了！命也可以救了！我们宣布上工。”

“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但是我们这次罢工所得的代价，只算是胜利的第一次……我们还要求得第二次，第三次……”

许多工人一面游行，一面高兴地振臂呼喊：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

胜利了。我们领到了补发的工资和红饷。胜利中迎来了新春佳节。在吃年夜饭的鞭炮声中，父亲端起一碗酒：

“乔生啊！我看今年的春节，是我这半辈子最高兴的一次。来，干了这碗酒，我们有话说。”

“南哥，一起干！”

在细仔嫩崽们的欢笑中，母亲用埋怨的口气对舅舅说：“你呀，光顾了革命啦，明天，就三十一啦！”

“伢！”外婆鼻子有点酸：“你姐姐、姐夫给你看中个妹子，礼也准备了，趁过年歇工，成个家吧。”

我们明白过来：“噢！舅舅要讨堂客了！”

“小鬼头！”舅舅拍一下缠到身上的小外甥，慢而有力地说：“革命不成功，我还那么多事没做，哪能讨堂客啊！”

父亲说：“也是。有了家口，做事就不方便了。”

我想起舅舅讲的太平天国故事，站起来说：“舅舅，你自己找个红娘子，一搭革命，好吗？”

他笑了，定定地望着桌上的红烛，眼神里流动着一股光芒。

我似乎又听到了那一声“喊子”。

高高的洗砂台

在水口山罢工胜利的鼓舞下，松柏镇的砂船工人、运输工人也相继成立了工会，与反动派展开了斗争。一九二三年三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又派贺恕、唐际华、毛泽覃来到水口山，他们带来了二七大罢工之后、党要求全国工人阶级“弯弓待发”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水口山支部。五月，夏曦同志又来水口山，主持建立了水口山党团（相当于党委）。

水口山铅锌矿是当时全省财政命脉之所系。为了不使这条命脉被切断，反动当局不得不向罢工工人低头。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使“劳工神圣”形成了不可遏止的巨大洪流，也给水口山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威力。因此，矿当局作出了让步。大罢工中，工人提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兑现，广大窿工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工人夜校在新盖的两层楼校舍开课了。我们这些从来也没想过能进“洋学堂”的工人也有了上学的机会。按工人要求建起的学校，不但有新教室，还有宽阔的操场和体育设施。我记得上政治课的是校长蒋先云同志，上文化课教国语的是朱舜华同志。朱老师爱穿月白学生衫、黑裙子，她上第一课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她这样讲解“工人”两个字：

“看！这就是‘工’，它顶天立地；‘工’和‘人’加起来，就

是‘天’……”

这样讲解,虽然现在听起来有些勉强,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却使我们觉得很生动,听起来兴味盎然,比私塾老先生让我们莫名其妙地背那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好多了。

毛泽覃同志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显得文静而秀气,他与宋乔生舅舅是好朋友,常到我家作客。他特别喜欢我那活泼的二弟耿在孝,经常教他打球、跳高。大概那时我比较内向,所以毛泽覃同志有次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说:“你是个小学者,将来等革命胜利了,还要留洋、当工程师哩!我教你英文吧。”

他教给我的英文单词,除了一般的用语外,我记忆最深的是 PARTY 和 COMMUNISM(“党”和“共产主义”)。

宋乔生舅舅仍然在工人俱乐部工作。他把我父亲请去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俱乐部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使矿工在经济上摆脱了又一层剥削。

这年春天,我在机械科学习钳工。从打铁、打磨、修机器到安装电线、修锁,什么都干,什么都学。我还学会了修钟表。后来参加红军后,有的同志手表坏了,就来找我修理。记得到延安后,我还给罗迈、吴亮平等同志修过手表。经过四个月的边干边学,学习期满,我成了一名机械工人,被分配到洗砂台工作。

洗砂台,我们都管它叫七层楼。

这是水口山矿改为西法开采后增设的一套选矿流水线，用以代替工作效率低的“敲砂麻蝮”。从窿里开出的矿石，由洗砂台最高的一层进入作业，经过破碎、球磨、水选等七道工序，就变成了可供冶炼的铅砂和锌砂。

我先在第二层看“输送溜子”，把杂在矿石里的草圈子拣出来。那是窿下作业时，盖在炮眼上防钻尘反射、保护眼睛的一种稻草圈子。

后来我到第一层（最高层）管一台颚式破碎机。

母亲搞不清这个名称，一再问我：“那叫什么机呀？”

“就象‘老虎牙齿’。”我解释道。

“可得小心哟！”母亲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那时矿上工伤事故不断，所以她一再嘱咐我：“要多听你舅舅的话。”

乔生舅舅也在机械科，秘密身份是党支部副书记（当时机械科成立了党支部），公开身份是卷扬机司机手。他负责把矿石卷扬到七层楼上，喂我的“老虎牙齿”。

洗砂台工作是我使用大机器生产的开端。那时还没有对讲机什么的，七层工序，全靠我们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一环紧扣一环。

每天一早，我便爬到高高的七层楼上。那条用绞纹钢焊成的小梯子又陡又窄，九曲回肠似的。我把它当成练轻功的器械。每次往上爬时，我不是一级一级慢慢向上走，而是用脚尖弹跳，借着钢筋的张力向上蹦。开始一次弹一两级，练得久了，一次可以上四五级。

我很爱护那台破碎机，总是把它擦得油光锃亮。那块镀铜的、印满洋文的商标，在晨曦里闪闪发光。我注油，试车，调整好操纵杆的自由行程。等开工喊子一响，它便“呜哇呜哇”地运行起来。无论多么大的矿石，它几下就能“啃”得粉碎，倒真象一头猛虎。

说是机械化，其实也并不轻松。我得拉手柄、掌握进料速度、踩脚闸、输送破碎好的矿石，还要注意喷水防尘，一天下来，工作量对我这个刚刚十四岁的少年来说，确实够呛。

母亲怕我消耗力气影响长身体，每天都让我二弟在工间给我送一餐饭，以补充消耗。当时罢工胜利，父亲由于技术较好，工资也多些，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同时，这种待遇也说明，我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加餐的食物总是比正常的伙食好一些。我让二弟与我一起吃，他挺懂事，总是说声“吃不下”，就赶快走开。再说，他到洗砂台来还要做一件更有兴趣的事——练武。

七层楼的土建工程是全钢筋水泥结构，每一层的车间都十分高大宽敞，正好成了我们练武的好地方。这里机器轰鸣，高高在上，工头、矿警、密探很少到这里来。那时练武是保密的，不能让工头知道。因为统治者认为：学了武术的人心会变“野”，而变“野”就会导致推翻他们的统治。

和我在一层的康汉普师傅，是附近的康家湾人，他练武后，臂力过人。他把两块三寸厚、尺把长、约百来斤的钢板当运动器材，练习鹰爪功。下一层还有一位廖师傅，四十多岁

了，是缝衣匠出身，他的家就在我家隔壁。他在老家与财主呕气，一怒之下打了财主的管家，跑出来当了矿工。他脾气火爆，见义勇为，有股子拚命三郎的劲头，我们都管他叫廖猛子。他们两人都是我父亲的徒弟。

当然，说是“徒弟”，这仅就教学关系来讲，其实并没有正式拜过师。我父亲多才多艺，有许多人向他学木工、瓦工等手艺，也有不少人请他教武术，所以，可以称得上“徒弟”成群。

父亲也教我学武术。但是，他不教我二弟。这是因为：一则二弟年龄小，二则二弟好动活泼，性格外向，父亲怕他学武后到外面闯祸。于是，二弟便利用给我送饭的机会，找康师傅和廖师傅学武。他也常常缠着我教他。后来，在我参加红军离家后，父亲终于传给了二弟几手绝招，至今，我的故乡一带还流传着二弟在抗日游击队时，施展武术打击日伪军的故事。

父亲教给我的武术，在当时称为“国术”。他在教习“国术”之前，总是先口念一偈：“练武之道，皆为防身，振我华宗，保我国民。起！”

“国术”这一名称，把中华武术和东洋柔道、西洋拳击明显地区别开来。父亲的师傅和流派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念念不忘的“武德”中，可以体会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内涵。他常对我说：“学习国术，大的是为了保国安民，为国效力；小的是为了健身、防身，锻炼意志和毅力。切不可学武后

恃强逞能、打架斗殴，更不能以此欺凌别人。”

我牢记父亲的教诲，在家时一有空就学武，但到外面从不以武艺向人炫耀，也不与人比试，当然更不去惹事。父亲教我的主要是“四门拳”，这是南拳中的一派。他还教我学气功和使单刀。我也学会了几招点穴，但从未用来对付别人。父亲的双钩，我也试着学学，但是没有学会。我练得很刻苦。有一次，我独自在家中的桌子上练倒立，不小心摔在地上，脑袋撞击地面，竟缩到脖子里，顿时疼痛万分，头颈肿成了傻瓜。正当家里人手忙脚乱、无计可施时，父亲回来了。他把我倒吊起来，用力把我的头往下一拔，按摩了几下，再敷上他自制的特效药，很快消肿，过了几天就全愈了。

说起特效药，记得父亲曾传授给我一些偏方，如治感冒的“卧龙丹”，是用冰片、麝香、白芷等几味中药各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有一种虫，在麻油中浸泡半年，这油就可以治疔子。他还教我如何吃蝎子来减轻伤痛、强壮身体。

我从小多病，但学武术后，体格健壮了。后来，参加了红军后、特别是在长征中，环境那样艰苦，战斗那样激烈、频繁，我都挺了过来，而且身体越来越结实；在战斗中，有时与敌人肉搏，能连续杀伤多个敌人，有时徒手俘获敌人；这些显然应该归功于自幼习武。

除了练武外，洗砂台还是地下党团组织召集会议、开展活动的好场所。在这里秘密集会不用派“眼线”（即放哨）。每逢开会，乔生舅舅总是让我守在入口处，等人员到齐后，只

要用一块大铁皮把那道“九曲回肠”的入口处盖上，就万事大吉了。

在这段时期内，矿上的斗争形势开始恶化。反动派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工人俱乐部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断遭到特务和军警的袭扰。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冬，当俱乐部成立一周年时，矿当局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和破坏。当时湖南省“主席”赵恒惕派了他的心腹宾步程来任水口山矿局局长。这个家伙是个镇压工人运动的老手，一九二二年曾为赵恒惕策划杀害了黄爱和庞人铨同志。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水口山，第二天就从衡阳调来一连军队。第三天，也即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日，他一方面派该连长来俱乐部，无理要求在俱乐部驻军；一方面派兵冲击俱乐部。在此紧急关头，蒋先云和各支部负责人立即开会决定，马上举行罢工，保卫工人俱乐部。“喊子”一声长鸣，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迅速聚拢来，守卫在俱乐部门口。乔生舅舅则带着纠察队员，占据附近的山头，警惕地注视着敌人。

在工人们“俱乐部是我们的命根子”、“坚决保卫俱乐部”的口号声中，敌人的枪声响了。罪恶的枪弹夺去了选矿工人康年如年青的生命，还有几个工人也受了伤。蒋先云为了避免更大牺牲，命令撤离俱乐部，于是，敌人占领了俱乐部。

事先，蒋先云已把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党团员、俱乐部

负责人、工人积极分子等名单，交给了朱舜华同志。她在乔生舅舅的协助下，把这些文件埋藏在工人子弟学校后面的山上。

敌人到处搜查俱乐部负责人。他们在工人子弟学校抓住了朱舜华，逼迫她交出俱乐部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名单。她说：“没有别的名单，只有这一份。”敌军官把“这一份”拿来一看，却是一本子弟学校的学生名册。恼怒的敌人抡起枪托，把怀孕的朱舜华打倒在地，还在她肚子上狠狠地踩了几脚。胎儿被踩死肚内，朱舜华昏了过去。残暴的敌人觉得还不解恨，又踢了她两脚，才狞笑着离去。

乔生舅舅听到朱舜华被毒打的消息，立刻带领几个工人赶来，把她抬到我家。我母亲连忙熬了姜汤，给她灌下去。等她苏醒后，蒋先云又命令把她转移到离矿比较远的老工人家里，并请了医生抢救。

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也为了替在保卫俱乐部的斗争中牺牲的工友报仇，当天下午，蒋先云和乔生舅舅等带领工人包围了矿局。晚上，乔生舅舅在全体纠察队员会议上，部署了他和蒋先云等拟定的斗争方案。会后，他带领纠察队员把康年如的遗体抬到矿局办公室，同时，几千工人再次包围矿局。我们洗砂台的工人们，挥舞着各种工具，站在队伍的前面。

乔生舅舅代表全体工人向局长宾步程递交了“矿局出告示保护工人俱乐部，抚恤死伤工人，即日撤退军队，惩办

凶犯及统率长官,发清欠薪,全体工人增加工资一次,罢工期内照给工资”等九条条件,要他签字。宾步程慑于工人运动的威势,被迫在条款上签了字,但是,暗中向衡阳请求增派军队。

二十八日晚上,蒋先云召开各党支部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一方面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另一方面要讲究斗争策略,已经受到矿当局注意的俱乐部负责人立即离开水口山,转移到别处,水口山的工作由宋乔生负责。会后深夜,乔生舅舅派人把蒋先云安全送走。

二十九日,衡阳派了一营敌兵来到水口山。宾步程又一次露出了凶相。他下令全矿戒严,封闭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子弟学校,挨家挨户搜查并悬赏缉拿俱乐部负责人,大量开除工人,无故降低工人工资……。但是,水口山的工人们并没有被吓倒。俱乐部(已转入地下)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和暴行;同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发出传单布告,悬赏购买宾步程的脑袋。斗争坚持了几个月。一九二四年八月,反动局长宾步程不得不在重兵保护下逃离水口山。

每逢和敌人的斗争紧张时,洗砂台的会议就多起来。我也跟着忙起来。有些跑腿的事,如通知开会,会后送个口信等,乔生舅舅总是叫我去干。我很乐意干,而且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任。这样,我在洗砂台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

教育。

在工人夜校学习时，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剥削”等新名词，逐渐懂得了工人阶级要通过斗争求得解放的道理，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并产生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愿望。同时，蒋先云、谢怀德同志和乔生舅舅经常在政治上帮助我，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向组织提出了加入共青团的要求。

一九二五年二月，虽然革命处于低潮，党团组织处于地下，但是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我十六岁。按规定，等满十八岁时，共青团员可以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我正式迈进了为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而奋斗的先锋队组织，开始了我生活中新的一页。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走狗展开了浴血战。六月上旬，中共湘区委员会根据水口山工人的请求，将党的特派员彭平之等以湖南省“雪耻会”宣传员的名义派到水口山。在他们领导下，水口山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我们洗砂台就是当时开展运动的秘密联络点之一。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党组织决定：“一方面力谋整理，内赖团结，以充实救国的力量；一方面追随全国各界之后，发起罢工、募捐、讲演、示威，以表示我爱国心志之坚决一致，以唤起全国同胞为争自由而奋斗。”并组织了由彭平之任总指挥、宋乔生等任委员的罢工委员会，准备以实际行动声援“五卅”运动。

根据党的决定，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我们冲破矿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巡回演讲，和反动派展开了新的斗争。

身在“宝山”已识宝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胜利进入湖南，工农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八月二十四日，已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的蒋先云同志和朱舜华等一起从衡阳来到水口山。工人们见到阔别的亲人，都异常高兴，纷纷和他们握手、问候，并向他们讲述两年多来矿当局的暴行和工人的斗争情况。当天黄昏时分，蒋先云、朱舜华和乔生舅舅等一起到后山，把一九二三年冬朱舜华埋藏在山上老松树下的文件和党团员、工人积极分子名单挖掘出来。

蒋先云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召开各党支部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水口山特别支部。乔生舅舅被任命为特支委员。

过了三天，蒋先云告别水口山，重又踏上北伐征程。这是我们水口山工人和蒋先云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令我十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先驱和工人的贴心人，不久竟英勇牺牲在北伐的战场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接着，何叔衡同志受党的委托，来水口山传达了中共湖

南省委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水口山党组织举办了工人师范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深入周围的各个农村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一九二六年冬至次年春，水口山附近的松柏、大渔湾、麻石、洲上廖家、烟洲等地，先后成立了十几个农民协会，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在水口山地区的许多农村中得到实现。

我参加了培训班。结业后，与党员黄佐同志分配到同一个工作小组，被派到醴陵去开展农运工作。

我们一共八个人，任务是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到醴陵南乡的泗汾去，建立农会和农村基层政权。

临行前，党总支又一次召开秘密会议，安排工农斗争的各项工作。乔生舅舅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的号召。为了建立工人武装，急需武器。组织上决定我们这个组在去醴陵之前，先到东阳渡镇上，秘密接运部分枪支弹药。

东阳渡在衡阳以南，濒临湘江，离水口山约三十公里水路。反动军阀政府在那里建有一个兵工厂，专门制造和修理枪炮弹药。老百姓都管它叫枪炮局，有一个营的“粮子”（士兵）把守着。

枪炮局前身是银砂局，原与水口山银矿局属同一个系统，后来由于反动政府的军事需要，改为枪炮局。水口山党

组织派人与那里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把里面的枪支弹药秘密地接运出一部分，供水口山工人武装使用。

由于枪炮局前身与水口山的旧有关系，彼此间对人员都比较熟悉，所以秘密接头很快地就完成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走漏了消息，反动派也知道了这个计划，他们准备“守株待兔”，连同取枪的人员与兵工厂的地下组织一起破获。水口山的党组织从秘密渠道获悉了反动派的阴谋，而这一切，兵工厂的地下组织还不知道。必须尽快地改变接运计划，重新派人接头，改变联络时间、地点和接运暗号。

乔生舅舅和黄佐研究，决定派我去接头。因为我人小，不大引人注目，而且那时的团员都是秘密的，没有人知道我是骨干。同时他们还考虑到我长期为党组织站岗放哨，有了一定的经验，加上我练过武功，行动比较敏捷，安全系数更大些。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为了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请父亲协助行动。他在南昌亲兵营时，学过一些用兵布阵之法，很有计谋；在水口山的十年中，接受了革命思想，是革命的可靠的基本群众。

但是，我还得保守党的机密，不能把所有一切都告诉父亲。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告诉他，有一件事是乔生舅舅交办的，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办起。父亲也知道了我们的规矩，并不多问。他思考了一阵后，决定：立即搬家。

“兵不厌诈。”他想出这条计谋的时候，甚至还有点得

意：“先让人家知道你已经不在水口山了，就好做了。”

那时，特务横行，谁也不知道哪个人是“红”是“白”，这条计谋很有利于避开耳目。

我们立即收拾行装，并挨家挨户地向工友告别说：矿上发的“矿票”一文不值，全家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不如回家种田去。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早已有不少工人携家离开了水口山。所以父亲这一招，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矿山和工友，租了一条顺水船，从松柏镇上船，沿湘江向北驶去。

尽管如此，由于我家与宋乔生的关系，还是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就在我们开船后不久，一条架着网不打鱼的小划子，也驶出了大渔湾码头，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

母亲他们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还在埋怨走得太急，这也没带全，那也没弄好。父亲只是不动声色地把着舵，驶过衡阳，绕过衡山、石湾，一个劲地向北前进。

快到渌口的时候，那条小划子上的“渔翁”才停止了跟踪，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抽了一阵烟，掉头返航了。

在甩掉了尾巴后，当天夜里，我穿上一身乡村少年的衣服，离船上岸，沿着平坦的官道，日夜兼程向南赶了百把里路，回到了东阳渡。

兵工厂建在湘江边上，除了靠江这一面外，其余南、西、北三面都筑有高墙，厂里建有枪炮车间的主建筑，北边有几排工人宿舍，南面是一个空旷的试枪场。厂里生产和修理

“老套筒”，即当时流行的汉阳造。有一条铁路支线通进厂里，不断地有专用车皮进进出出，把战场上送修的枪炮运回厂里，又把新的运往战场。反动派就用这些武器，把中国大地搅得硝烟弥漫，民不聊生。

乔生舅舅和黄佐告诉我的仅是接头人姓名和联络暗号，除此之外的一切，如怎样找接头人（我并不认识他）、怎样行动等，组织上都让我见机行事，自己决定。

我当时虽然只有十七岁，但是一种重大的使命感促使我反复思考了行动方案。敌人显然已经有了准备，如果盲目去打听接头人，势必引起怀疑，唯一的办法是靠自己辨认。同时，我还得安排接枪的时间和地点。

我装做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在枪炮局大门口一个旅社的墙下，整整蹲了一天。发现在枪炮局门房对面，有一块粉板，写了好多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要找的那个人。我还发现，每当下班的时候，兵工厂的工人走出车间，都在这块粉板前排好队，由几个兵在他们身上搜查，以防工人藏着枪支零件或者子弹。检查完了，便在他们名字的下面划一道记号，每五下是一个“正”字，记录上班的次数。

我反复印证了两次，就把要接头的那位同志认准了。这位同志住在厂里的工人宿舍，傍晚下班后，他与几个工友到外边的酒馆来吃饭，实际是以吃酒为掩护，召集秘密会议。我仍然象个讨米的孩子一样，溜过去与他接头。

对上暗号后，他告诉我，武器弹药已经准备好，放在工

人宿舍里。这几天敌人正在搜查，戒备森严，从厂门口运不出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工人宿舍后面的墙上递出来。但是递枪的时候，必须引开东北角上的一个哨兵和厂区的游动哨。

约定好接枪的时间、暗号和交接点后，我就潜出郊外，到厂北面的一座小山上去等黄佐他们。当我找到他们把联络情况汇报后，黄佐同志很满意，决定仍然由我在接枪时设法引开敌人。

东北角是个起伏不大的制高点。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据说是枪炮局局长的母亲捐建的。站岗的哨兵就以这座小庙为立足点，向西可以监视工人宿舍北面的围墙，向南可以通视厂东南的湘江大堤。我记得站岗的士兵都是广东人，一上岗就脱掉鞋子，把一双大脚踩在小庙顶上。

第二天我围着兵工厂转了好几圈，终于有了办法。我找了一个破背篓，从西南角上的铁路道岔混进厂内，在试枪场的边上潜伏下来。试枪场尽头，是一个用沙土堆起的被弹面，每天由工人把新枪架在对面的射击台上，劈劈叭叭地试枪。由于试射大量子弹，是个危险区，所以周围没有人来往。等他们试枪完毕下班走了，我便爬过去，扒开沙土拣那些打过的子弹头。

天黑以后，对面山包上黄佐他们也开始行动，划了三根火柴给我打暗号。我便把拣到的破铅弹装进箩筐，在上面盖一些乱草和树枝，沿着湘江大堤向北运动。大堤上有许多茶籽树，我利用树丛接近土地庙时，故意弄出了响声。

哨兵扔掉烟头，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声喝问：“哪个！”

我立即伏下不动。那天晚上有点薄雾，哨兵确实看不到我。等他端着枪瞄了一会，骂骂咧咧地收起枪时，我跃出树丛，直接向江边飞跑过去。

“站住！”哨兵发现了我，一边大喊着，一边追上来，并且“砰”地开了一枪。

这时，正在附近巡逻的敌人，大概有两三个，也纷纷向这边跑来，还夹杂着哨子声。我立即扔掉背篓，背篓顺大堤向江边滚去。自己又折回树丛，向南到达围墙，施展轻功纵身翻过去，一口气跑到白天租好的一个旅社里。

敌人“缴获”了那个背篓，大概以为不过是拣破烂卖钱的孩子，所以就没有再追。

十六支“老套筒”，闪着锃亮的烤兰，连同一担子弹，就这样到了工人赤卫队手中。后来，工人赤卫队在乔生舅舅指挥下，用这些武器，打击反动的矿警和军队，夺取了更多枪支。一九二八年春天，这些武器连同水口山工人赤卫队一起，上了井冈山，被编进中央红军特务团，团长就是我的舅舅宋乔生。他还兼任红四军军械处长。

水口山工人武装编入红军之后，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重视和表扬。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水口山工人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之一和红四军骨干的组成部分。朱德同志认为：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最先

进的……（见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从那以后，我离开了水口山，同时也离开了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乔生舅舅。不过，离开后我还不断关心他的情况。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由党中央指定，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和毛科文五人组成湘赣边区前委。前委管辖边界党的特委和军委，并管理地方党。乔生舅舅成为当时边界党的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乔生舅舅在江西大庾县一个村庄中被敌人包围。他命令其余的同志先行突围，自己在后面抵挡追兵。不幸，他的头、颈、胸三处中弹，但他三仆三起，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壮烈牺牲，是革命的重大损失；但是，他的英勇行为，却为我们树立了革命榜样。毛泽东同志很赞扬他的革命精神和才能，直到全国解放后还对张琼同志（即朱舜华，解放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提到他说：“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冈山，很有功。”

水口山工人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到由党组织起来开展革命运动并拿起武器与反动派展开夺取政权的战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实践的必然。水口山工人武装加入红军以后，英勇战斗，充分发挥了在革命中的先锋队作用。现在，当初由宋乔生同志率领上井冈山的那支八百多人的优秀队伍，已经没有人还在世了；他们大都牺牲在红军初创时期的战场上，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

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水口山整整生活了十年。

这十年，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年。

十年前，我怀着童话般的憧憬，走出了那个“朱元璋点石为门”的山冲，象祖祖辈辈闯世界的人们一样，到水口山来找“宝”。但是，这个大世界所展现给我的是一副地狱般的现实。它最初给予我的是失望、鞭笞和贫穷。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由于置身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我的思想和身体一道逐渐成长起来。在半边街，在矿工的生活里，我读到了一本最直观的社会教科书；在工人俱乐部，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初步领略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一次次的罢工斗争中，我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团结产生力量的道理；在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更激起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和信心。

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离开水口山六十多年来，我时刻都在怀念它。特别令我永远难忘的是当年在水口山一起劳动和斗争的许多工人同志和革命先驱。我常常一闭眼，脑中还浮现出蒋先云、谢怀德、宋乔生、刘东生、毛泽覃、朱舜华等同志的形象，正是他们教育了我，使我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法宝——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通往“宝山”的正确道路——武装斗争的革命道

路。

水口山,这时才真正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宝山”。

第二章

锤子 梭镖 钢枪

闪光的梭镖

在完成了东洋渡接枪任务后，我们便按照原定计划，到醴陵去开展农民运动。

黄佐同志召集大家开会，研究如何走法。大家认为，全组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还是分散走，到醴陵后在南乡泗汾集合。

于是，我便和同志们告别，自己一人回到了离别十年的故乡醴陵。

由于我全家是仓促离开水口山的，事先并没有和老家的乡亲联系，所以父母亲带着弟妹们回到醴陵后，没有地方安家。幸亏父亲有一个姓郭的徒弟，也是醴陵人，在他的帮

助下，全家人就借住在距县城约二十里的石门口郭碧公祠里。父亲到石门口煤矿做工，仍是砌匠。

我一到醴陵，就先去石门口看望父母。父亲看见我平安归来，又从我喜滋滋的脸上得知乔生舅舅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十分高兴。母亲不知底细，老是问我这几天到哪里去了；我当然不能把组织的机密告诉她，就用别的话搪塞过去。

探望过父母亲，我急着就要去南乡泗汾和黄佐同志会合，母亲见我匆匆回来，又要匆匆离家，心中不大愿意。父亲对我的行动，心里已明白了几分，所以并不阻拦，他悄悄地问我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这时，我展开了思想斗争：要不要把我参加共青团的事告诉父亲？考虑到父亲是个老工人，在水口山的十年中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和支持革命，还积极参加工人斗争，特别是在东洋渡接枪事件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因此，我如果告诉他，不仅不会泄露秘密，而且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他更多的帮助。所以，我就如实告诉了他。

果然，父亲听后，慈爱的眼睛里露出了赞许的目光。接着，他对我讲了两点意见：第一，行动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第二，要找一个工作。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找一个工作，不仅可以挣几个钱，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用公开职业作掩护，避免引起反动密探的注意。同时，我进一步想到：当了工人，可以在工友中广交朋友，为开展革命工作找到一个立足点。

正好我刚刚从一份广告上看到，修筑醴陵到茶陵公路的工地上，正在招收工人。于是，我就去报了名，当了修路工人。修路工很艰苦，但是，对于我这个曾当过敲砂“麻蝇”的人来说，再苦也不在话下。

接着，我就去泗汾找黄佐他们。泗汾虽然不大，但是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找黄佐同志呢？经过反复打听，终于在农会中找到了他。

原来，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占醴陵县城后，醴陵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县农会、总工会、商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革命团体相继挂牌成立。醴陵各乡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农会。所以，黄佐同志一到泗汾，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农会工作。

他见我来了，异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我告诉他已经当了修路工人，他说：“好啊，以后你一面作工，一面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农会工作。”

我也急着要了解农会的情况。他指着进进出出的农民说：“他们都是农会会员，你看搞得多红火！”

就这样，我白天在公路工地做工，下工后就到黄佐同志那儿去，和小组的同志们一道做农会工作。

黄佐同志是我们小组的党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年龄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在水口山已当了十多年工人，很有斗争经验；而且他为人机敏、持重，作风民主，常和大家一起商谈工作。有一次，他主持支部会，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的

工作。我建议：公路上修路的工人都是穷苦人，我们如果到修路工人中去做工作，发动工人起来和农民一道斗争，力量就更大了。同志们纷纷发言，都赞成我的想法。黄佐同志高兴地说：“我也赞成，来个工农大联合！”最后，支部决议：所有党员（包括我这名共青团员）在做好农会工作的同时，都抽时间到公路工地劳动，广泛接触工人，和修路工人交朋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决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和农民一起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当时，醴陵的各个乡镇虽都已有了农会，但有些村庄中，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我们除了在南乡泗汾一带的农会中工作外，还经常到公路两侧的村庄中去发动群众、组织农会。

我们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烟、禁赌、打菩萨、破除迷信等群众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特权，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组织起来的农民扬眉吐气，经常拉着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并公开烧掉地主的地契。

对于农民的这些革命行动，各种反动派、包括国民党的右派，都暴跳如雷地加以咒骂、反对，他们疯狂指责湖南的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的这一谬论，并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妥的口号和做法，例如，上级中

有人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等口号。这些口号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反动阶级中不同情况的人。在地主阶级中，固然有很多土豪劣绅和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但是也有一部分在政治上没有劣迹，还有少数人对农民运动并不反对，个别的甚至同情革命。对此应该予以区别对待。

在推翻地主阶级政治特权的同时，我们还动员农民向神权宣战。记得当时我们号召农民打菩萨时，常常引用一套据说是毛委员编的（后来知道是孙孝山编的）顺口溜：

一尊神，
二目无光，
三餐不食，
四肢无力，
五官不整，
六亲不认，
七窍不通，
八面威风，
久（九）坐不动，
实（十）在无用。

神权和族权，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的基础。所以，农民起来反对神权，有利于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特权。同时，农民自己动手打菩萨，也破除了他们自己的迷信思

想,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那时,很多农村中的泥菩萨都被搬走打烂,庙宇和祠堂变成了学校或农会开会的地方。农民还自动撤除了家中的神龛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农民运动冲击着宗族观念和族规家法,也冲击着陈腐的夫权思想。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新思潮,象一股洪流冲刷着农村的每个角落。

我不仅宣传这一新思想,而且自己也卷入了这一新潮流。早在两年前,我母亲就在为我这个长子物色对象。后经媒人介绍,给我定下了湘潭周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共有十个女儿,第十一个才是男伢。她是老九,人称“九儿”,比我小三岁。他家孩子多,生活苦,又逢上这田荒、米贵的年景,家境更加艰涩,于是就来催促我家“收亲”。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这是包办婚姻;再则我年令尚小,要参加革命,现在根本顾不上考虑成家之事。可是,女方破例,用一乘小轿把她送到石门口的亲戚家,还送来了庚帖和照片。我母亲高兴得很,立即带着我二弟在孝前去看望。回来后,母亲命在孝把我叫回家,一个劲对我夸奖那姑娘长得如何俊、如何惹人喜欢。我则一个劲摇头,说什么也不同意。母亲一面要父亲去采购酒肉,准备办事;一面叫在孝看着我,不让我外出。这时,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念头在打架:一方面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疼爱,如果我坚决不同意,她老人家一定会十分伤心;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到,自己是共青团员,如

果我自己不能挣脱礼教的束缚，又怎能带领群众去冲击一切旧俗陋习呢？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决定先想法逃走，以后再向母亲讲明道理，并劝慰她。可是，怎么逃呢？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对在孝说：

“二弟，你想玩鸟吗？”

“要，你有鸟吗？”

“有啊。”

“在哪里？快给我。”在孝高兴得跳起来。

“在天空飞哪，用弹弓一打，不就变成你的了！”

于是，我们两人拿了弹弓出去打鸟。在孝注视着天空、树梢，在找鸟。我则观察着四周，想找条便于溜掉的路。

这时，有只麻雀躲在树梢上，我一弹弓打个正着，雀子应声跌落，但是掉在树杈上卡住了。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叫在孝爬上树去捡雀子。他高兴地往树上爬，竟忘记了母亲交给的任务；我便乘机溜走。逃婚后，我虽然因辜负了母亲的好意而觉得不安，但是解除了身上的一条锁链，又使我感到轻松。回到农会，我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情，和群众一道投入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斗争。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结果，同时它又推动农村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为了保卫和巩固农会的权力，我们还组织了农民赤卫队。

农民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也有大刀、棍棒和极

少数土枪。

我也领到了一支梭镖，一支在阳光下闪亮的梭镖。从前，父亲教我习武时，我曾舞过刀，但那是习武用的，不是真正的武器；在水口山罢工和示威时，我曾挥舞着敲砂锤，但那是工具，也不是真正的武器。此刻，我生平第一次手持武器——可以杀敌的真正的武器，我的心情激动难平。

我，一个拿过锤子的工人，现在和农民群众一起，高擎闪闪发光的梭镖，这说明工农联合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

别小看梭镖这个原始的武器，正是它标志着农民的觉醒，农民的斗争精神，农民的力量和意志，标志着农会和农民运动的存在和发展，也标志着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和反动政权的威风扫地。

我十分喜爱这支梭镖，每天骄傲地拿着它和农民赤卫队一起参加斗争。

扑 城，扑 城！

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反革命的官僚、军阀和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向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

一九二六年冬天，攸县东乡的一位农会委员长出席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在途经醴陵境内时被地主武装杀害。紧接着，一些区乡的农会、妇联，其他革命团体和学校，纷纷遭

到反动势力的攻击。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醴陵南四区农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为了破旧俗、兴教育，将档梓山小学高小班迁往云岩寺。土豪劣绅乘机煽动少数落后农民，以该校师生打了一些菩萨为由，杀害了共产党员、教师戴学林和前来营救的乡农会执委、共产党员颜启寿，并打伤了农民代表和学生多人。这就是醴陵农运史上有名的反革命流血事件——“四七惨案”。

“四七惨案”尚未平息，从上海传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庄严而痛苦的大裂变。共产党人被昨天的盟友推下血海，国共合作的前途，就这样被蒋介石一夜之间断送了。在大革命中跑到城里去的土豪劣绅，乘机而起，回乡组织“挨户团”、“清乡队”，大肆迫害革命人士。

五月二十一日，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我们在醴陵听到的消息说，长沙“血流成河，人头乱滚”。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是“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他们恨不得一天之内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发动省城附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这就是著名的“十万农军扑长沙”之举。

五月二十九日，我们那个小组由黄佐同志带领，和南乡

各村的农民赤卫队一起，汇入了醴陵县两万农军向长沙扑城的行列。农军有的乘火车，有的步行，从四面八方向长沙汇集。我和黄佐同志等一起沿铁路线向长沙走去。一路上，我扛着梭镖，心情异常振奋。和我们一起行军的农民赤卫队员，也是个·个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地阔步前进。

当我们来到长沙南面的易家湾车站附近时，安源的工人纠察队已经到达，其他各地的农民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纷纷来到，汇合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

但是，当时我们只看到我方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这有利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农军组织松散、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只有梭镖、大刀等原始武器这些不利的因素；更没有考虑到敌人的凶残、狡猾以及敌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等因素。而上述因素，在战斗一开始，就显示其作用，从而导致了农军的失败。

原来，许克祥得知农军要攻长沙，就调集重兵在易家湾实行防御。他们从火车上用机枪向农军扫射。农军虽然十分勇敢，不断冲锋，但是，原始武器终究敌不过机关枪，加上农军不懂隐蔽，直着身子向前冲，很多被机枪扫倒。于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以农军为主的队伍，就被敌人打散了。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在醴陵的几位领导人暴露了身分。如这次扑城中的农军总指挥潘疆爪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加入国民党，北伐军攻占醴陵后，他曾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负责领导全县工农运动；他依靠中共醴陵县委

各级组织，支持全县工农革命斗争，惩罚和打击了一些土豪劣绅；一九二七年春，他担任醴陵代理县长后，曾率领工人纠察队到档梓山，抓获并处决了“四七惨案”的两名肇事者。这次扑城失败后，由于他是农军总指挥，不能再留在醴陵，因此他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与罗学瓚等同志一道转移去了安源。

扑城失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由于农军总指挥是醴陵代理县长，所以敌人对醴陵革命群众的镇压更是残酷。

醴陵的反动派成立了“铲共清乡委员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工人纠察队员、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以及所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淽江中的“状元洲”上，昔日那种“一支文笔点春秋”的文人荟萃、吟诗作画的升平景象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反革命屠刀的杀，杀，杀！县城成了刑场，在这个刑场上被杀害的烈士有三千多人。（据后来的资料统计，大革命失败后，整个醴陵县遇难的烈士竟逾三万！）

一霎时，腥风血雨笼罩着醴陵。醴陵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对当时的局势还在反复地审视与争论着，而各地的党员和群众已被反动派的暴行激怒了。农军和工人队伍重新聚集起来，一次又一次地扑城，扑城！

各地一次又一次地举行暴动，象大海的波涛那样，聚

集，涌起，扑过去……然后又一次地聚集，涌起，扑过去……

那时，醴陵的四乡，很多村庄仍由革命力量所控制。革命群众就凭借这些地方准备和聚集着力量。我所在的醴陵南乡，到处建起了打造梭镖和马刀的铁匠炉，在炉火的红光和锤炼时的叮铛声中，闪亮的马刀和梭镖被一把把、一支支地制造出来，交到了武装群众的手中。

毛竹也被削尖，用火煨过后再用猪血或人尿浸过，当做长矛使用。猎枪、土枪甚至鸟枪，也都被动员起来，变成了农民武装队伍的新式武器。而威力最大的新式武器，要数“松树大炮”了。群众把山上一两尺粗的大松树，去掉枝叶，将树干锯成五六尺长，挖去树心，外面用几道铁箍箍紧，里面装上火药，再装上碗碴、石块、铁片、钉耙等，就做成了“松树大炮”。这种“炮”虽然只能打一百多米远，但是弹着面大，一打一大片，颇有杀伤力。

一九二七年七月，醴陵农民军汇集万人，从四面围攻县城。

为什么围攻县城呢？一来，因为上次进攻长沙失败后，取得了教训，知道目前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夺取大城市，所以各地革命力量分别进攻县城或集镇。二来，醴陵四乡的土豪劣绅，躲进县城，和县城内的反动派勾结起来，一方面大肆屠杀革命人民，一方面对四乡农村实行经济封锁，使农民没有盐吃，缺少布匹和日用品，因此，农民十分气愤，强烈要求打进县城，惩治这批坏蛋。

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各乡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分头集合出发。还有许多妇女，也参加了出征的行列。我扛着梭镖，夹杂在手持土枪、马刀、竹矛的农夫们和拿着镰刀的妇女们中间，向县城进军。远远望去，队伍浩浩荡荡。一片丫丫义义的简单武器中，一面鲜艳的红旗随风招展。原来，为了避免攻打长沙时失去指挥的状况重演，上级规定了“红旗为号”：红旗前指，即为进攻，红旗后倒，即为撤退。

醴陵县城虽然没有城墙，但是它北靠群山，东、南、西三面被渌江环抱，所以易守难攻。城内有反动武装“清乡队”一千多人，“挨户团”二百多人，虽说都是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但是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农军当然要好得多。敌人在各个路口都修筑了工事，还在通向城外的唯一通道渌江桥桥头堆放了沙包，架起了机枪，进行严密设防。

我们正是选择了城南的渌江大桥作为主要攻击目标。

扑城开始了。我们的新式武器——几门松树炮先后开火，发出阵阵怒吼，把渌江大桥打成一条火龙，冰雹似的霰弹群，猛烈地落在守敌的头上。

此时红旗一指，大家呐喊着冲上桥头，拥挤着向城里杀去。但是，这样密集的队形和狭窄的通路，立即被驻守的敌人用机枪封锁了。顽强的农军踏着同伴的尸体，再冲，再倒……鲜血淌满了桥面。

我们一部分同志想从大桥两侧的江面上游水冲过去，但是由于江面太宽，江水太深，加上对岸敌人火力射击，因

而也没有成功。

鉴于进攻受挫，红旗发出撤退的信号。没有经验的农军，在撤退时有些惊慌失措，许多人又被挤压踩踏，增加了伤亡。

事后，反动的县团防局头子郭天宝在给湖南军阀何键的报告中，称农民军败退时，“遗女烏(鞋子)无算。”可见当时的混乱。

扑县城失利，于是改攻乡镇。泗汾是我们的目标。当时泗汾的敌军，只有约一个排的“挨户团”，平时军纪不整，整天歪戴着帽子在大街上敲竹杠、吃白食、调戏妇女，根本没有战斗力。当我们农军挥舞着马刀、梭镖向前冲锋时，敌军吓得屁滚尿流，没有怎么交手，就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我们就占领了泗汾。

醴陵的敌人闻讯，赶紧派了两个连来，于是泗汾又被敌人夺回，等敌军撤回县城时，我们又一次攻占了泗汾。就这样，我们几次攻下泗汾，但是都不能稳固占领，终被反动派夺了回去。

那时，我们小组每天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到处找党，找到党之后就是准备扑城，然后再冲散，再找党，再准备……经过几次扑城失利，醴陵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断了。我们小组从水口山来的八位同志，有的在扑城中牺牲，有的在冲散后失去联系，最后只剩下我和黄佐同志两人。但是，我们在战斗中发现和培养

了几位新的党团员，把他们吸收到小组中来。

巧计发传单

扑城失败后，敌人发动“清乡”，把迫害革命群众的魔爪伸向农村。到处都是搜捕和屠杀。我们在南乡无法存身，就开会研究怎么办。根据大家的意见，会上作出决定：暂时分散活动，隐蔽待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秘密，发誓决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在确定了以后的联络地点后，大家就分散隐蔽。我从南乡回到了家里——石门口。

敌人的“清乡”搞得很凶，滥捕滥杀之事，石门口也日有所闻。我在家里呆了几天，觉得坐不住。再说，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家从水口山回来，而水口山的工人运动名闻遐迩，因此敌人很可能对我这个当过水口山工人的青年发生怀疑，被捕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想来想去，与其躲在家里束手被擒，不如回到组织中去，和同志们生死与共，一道斗争。于是，征得父亲同意后，我又离家回到南乡。

我刚通过联络地点找到黄佐同志，恰好其他几位同志也因躲藏不住，相继回来。大家见面后，相互讲述分散隐蔽后的经过，以及敌人的暴行。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到醴陵县城南面约三十里的深山中去。

我们隐蔽在山里。为了避免敌人发现，不能升火煮饭，事实上也没有粮食，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饮清泉；到晚上，

才到山下活动，探听消息，顺便挖几块红薯充饥。虽然环境这样险恶、生活这样艰苦，但是我们并没有垂头丧气，丧失对革命的信心。我们认为：现在的形势尽管很严峻，但反革命势力只能猖獗一时，只要我们顽强坚持斗争，一定能冲破黑暗、迎来光明。

在一次支部会上，黄佐同志要大家提建议，看看在当前不利的形势下，如何坚持斗争。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我也提议说：“我们下山去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党的主张，让农民知道党还在坚持斗争。”同志们一致认为我的建议好，这样可以长我们的志气、鼓人民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但是大家又觉得把传单、标语贴在农村，作用还不大；要是贴到县城，影响就大了。最后，会议决定：到县城去张贴。

派谁去呢？这项工作，人多了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只要去一个人就行了。我就自告奋勇，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其他几位同志也争着要去。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后来，有位同志说：“大家别争了，我看还是耿飏去吧，他年龄小，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还学过武功，胆量又大，他去最合适。”黄佐同志补充说：“对，他在东洋渡接枪中表现得很出色，胆大心细，要得！”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去县城张贴传单的任务。

当天晚上，我们用从农会带来的纸笔，写了几十份传单和标语，还写了给土豪劣绅、反动官僚的警告信。第二天清

晨，天边刚露出点白光，我就把传单、标语卷成一卷，伪装成账簿，藏在身上，准备下山。

黄佐同志拉着我的手，反复地叮嘱我注意安全。我说：“请组织上放心，大不了和敌人拚了。”他连忙摇头说：“那不行！你必须既把传单、标语贴出去，又能平安回来。只有做到这两点，才算完成任务。”

同志们也替我担着一份心。他们把身上仅有的铜板凑集起来，大约三四十个，全都给了我，并深情地嘱咐我：“飏伢子，进了县城，先去吃顿饱饭。”

望着大家因长期没有吃饱而又瘦又青的脸，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我化妆成一个到城里收账的少年，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县城。

县城已经成了狼窟虎穴。一队队贼眉鼠眼的敌军，守在入城的路口，打量着每个过路人，还随意搜身、抓人。马路两边张贴着悬赏缉拿共产党员、工会和农会干部的布告。还有一张“铲共清乡委员会”的布告表明，敌人在两天前刚刚杀害了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个姑娘与我同岁，名叫何淑娟。在被捕的时候，她把为党传送的信件嚼烂吞进肚里，经受了刑讯折磨后，在状元洲英勇就义。

烈士的行动无疑给我提供了楷模。在我经历不多的血与火的洗礼中，这是我头一次面对一个同龄人的死。她的头颅还高吊在淶江大桥的示众柱上。但是，她英勇就义的革命

精神不仅没有死，而且还给了我——一个同龄的共青团员——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摸了摸身上的传单、标语，神色自若地向入城路口走去。一面走，一面心里盘算：如果敌人要搜查，就冷不防给他一拳，加上一下扫膛腿，把他打倒，然后施展轻功，往野外跑去，等天黑后再想法混进城。正在想时，忽听得一个敌军头目喊：“喂，你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路口不许停留，快滚！”原来，他看我人小，所以没有怀疑。就这样，我混进了县城。

我进城后不久，敌保安团就开始了宵禁。巡逻队穿梭般在街上逞凶，老百姓有上街者一律格杀勿论。这么大一座县城，除了保安团那几声“净街锣”的响声外，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我躲避着巡逻的团丁，三转两转，来到县城东北角的城隍庙里。望着街上那些敌人扫来扫去的手电光和晃动着的灯笼，我想，只有等到下半夜，保安团闹腾乏了，“回窝”之后再下手。

城隍庙内的神象早在一年前就被打掉了，只留有破烂的、残缺的土座。现在一大群范丹（丐神）的弟子占据了神灵的大殿。这些叫花子也是被保安团从城中各个角落驱赶到这里来的，他们一面骂骂咧咧地咀咒着世道，一面点上一枝枝蜡烛头，清理当天的收获。

“妈妈的，短命的保安团，害得老子米都没得讨。”

“唉！天天杀人，造孽哟！”

“今天到刚开张的药店去‘讨喜’，杀千刀的老板，只给半碗剩菜。”

“……”

我正在盘算，如果等保安团到下半夜放松了巡逻，离天亮也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怀里的宣传品数量不少，一个人怎能贴到全城呢？听到这伙“丐帮”的议论后，不由得灵机一动：我何不让他们给我当个“同盟军”呢！

我想了一会，想出了一个圆满的主意。于是，我悄悄地离开城隍庙，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大踏步走了进去。

“各位发财！”我一抱拳，尽力装出斯文的样子，把叫花子们吓了一跳，一个个直楞楞地看着我。我继续讲我编好的词：“明天我们‘茂源’米号开张，掌柜的请各位赏光，前去讨喜。”

“丐帮”一听，来了精神，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是不是阳三石后面的那一家？”阳三石是醴陵城内的一个地名，在火车站附近。

“正是。”我胡乱应道。

“怪不得这两天那里油漆门面呢。”

“嘿！米店比药铺好，吃他娘的一顿！”

还有个穿破长衫的瞎子，打了一揖：“先生，在下有礼了，回贵老板，明天我们都去，保证让米店火爆兴旺也。”

“慢着，各位有没有认得字的？”我问。

这下他们傻了，都望着那位破长衫。显然，那些睁着眼

的都是“瞎子”。破长衫问：

“先生的意思是……”

“明天讨喜没得说了。今天夜里，请各位帮帮忙，把这些‘开市大吉’的帖子贴出去。”

“丐帮”有些泄气。穿长衫的瞎子倒来了兴致：

“你是想来个‘五更喜’？”

我并不知道“五更喜”是什么鬼名堂。但只好应着：“对，对，还是这位有见识。”这下，他更得意了，伸出一只长满脏指甲的手，哼哼唧唧地念了些鬼话之后，说：

“知道了。今年太岁正南，眼下正行秋令，虽然节气未过，然太阳星出辰入申，犯于卯而冲于酉，财神当移朱雀，而朱雀在寅，不犯天光。且寅者，银也，大吉，大吉！”

我飞快地换算了一下，寅时，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于是，从兜里摸出两个铜板（那是同志们让我打尖用的）递过去，连声说：“对，对！干完了当即有赏钱。”

“我去，我去！”叫花子们嚷嚷起来。

“好。”我拿出那些传单标语告诉他们：“这些大张的是‘告示’，贴到各个十字街上；这些小的是‘请帖’，拣那大户人家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不过不许偷懒，我要检查的，一个贴不到，明天讨喜莫怪敝店不肯打发！”

“要得！要得！”

“谁不仗义，让他出门撞上保安团，进门碰上挨户团！”
他们赌咒发誓地接受了我的“任务”。

穿破长衫的瞎子，看来是叫花头，还谁去哪块地盘，谁往什么区域地分了一下工。我一听，全是闹市去处。于是我把口袋里的铜板摇得哗哗响，对他们说：“各位可以动身了，不要误了时辰，赏钱我交这位先生给你们分。”

等叫花子们都走了之后，我把剩下的一部分宣传品，自己贴到县公署周围，连“保安司令”家的房山上也来了一张。然后回到城隍庙，叫花子们也陆续干完来领“赏”了。

我问了一下散发的情况，看见长衫瞎子正在按人头分钱，就离庙出城。这时天渐渐亮了，我在城外一个小吃摊上坐下来，观察动静。不多时，只见从城里出来的人，三三两两都在交谈：

“共产党大队人马进城了！”

“满城都是共产党的标语！”

连保安团的团丁们也绘声绘色地在悄悄议论：

“兄弟，睁只眼闭只眼吧。听说没有，贺龙就要来啦……”

当时，人们都以为贺龙或者叶挺的部队才是“共产军”的正规部队。

我忍住笑，勒紧“咕咕”叫的肚子，坦然回到约定汇报的地点，详细地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同志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我干得漂亮。

就这样，我们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四处寻找失去联系的上级党组织。

“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使我们大为振奋。紧接着，又传来秋收起义的消息。我们从过路的商人那里听到：毛泽东就在铜鼓、修水一带。

“找毛委员去！”黄佐同志立即派人打听去铜鼓、修水的路径。一提到毛委员，在水口山一次次斗争的胜利情景立即涌上我们的心头。尽管没有路费，没有指北针，甚至连张简单的地图也没有，我们还是晓行夜宿，朝着横满茫茫大山的东北方向出发了。

我的第一支枪

从醴陵到铜鼓约二百多里路程，但是，为了避开敌人的哨卡，我们不走大路，只拣曲曲弯弯的小路、崎岖难行的山路走，这样就增加了旅程。加上为了隐蔽，白天伏在密林深处和杂草丛生的山坳里休息，等夜幕降临了，才拨开藤条、荆棘，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所以每夜只能走三四十里，最多也不过五十多里。这样走了几夜，到达了文家市北面的一个村庄。一打听，知道文家市、铜鼓都已被敌人占领，毛委员已去浏阳。我们立刻改变行程，向浏阳赶去。刚赶到浏阳，又得知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已上井冈山了。

没有见到毛委员，我们大家心里都十分惋惜，甚至有些失望。这时，县委负责人来做我们的工作。

原来，浏阳这时仍由革命力量所掌握，工农政权“苏维

埃政府”和党的各级组织、革命团体等都很健全。中共县委已改为浏(阳)醴(陵)县委,负责浏阳和醴陵两个县的工作。

浏醴县委负责同志对黄佐同志说:“这里的斗争很激烈,很需要人,你们留在这里工作吧!”接着,黄佐同志和另几位同志都分配了工作,因为当时很多工作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也不便打听他们分到什么地方去,只是和他们握手告别。

轮到分配我的工作,县委的一位作战委员找我谈话:“耿飏同志,我们从黄佐同志那里接受了你的组织关系,你是水口山的工人,又是共青团员,参加过扑城打过仗,从今天起,交给你一个游击队,任务是打击县城附近的反动武装,保卫县委和县、乡革命政权的安全。”

“我……我怕干不好。”

“你的情况,我们都听说了,相信你一定会干得很好。”说着,他把一支驳壳枪交给我,还有一根竹筷:“这支枪不太好使,也没有退壳钩,就用这根筷子退壳。”

我双手接过枪,激动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了。虽然这支枪没有枪套和背带,枪管上的烤兰已经磨光,膛线里满是斑驳的砂眼,枪把上缠着一圈圈铁丝以免散裂,总之是一支老掉了牙的驳壳枪,而且子弹只有三发;但是,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第一支枪,是党交给我的武器,今后我将用它在党所指引的武装斗争道路上冲锋、流血、胜利、前进!

就这样,我担任了县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队长。

第二天，我的“兵”也来报到了。共有七个人。当这些头上缠着帕子，腰间插着烟管，一律打着赤脚的农民局促地站在我面前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指挥”他们了。

我第一次有了“部下”，第一次安排军务，第一次为一个整体下决心……一九二七年对我来说，真是个充满了“第一次”的开端之年哪。

过去我一直随黄佐同志行动，现在得靠我自己拿主意了。县委指示，游击队要先进行训练。但是训练啥呢？面对这些刚刚放下农具的同志，我确实确实地尝到了“万事开头难”的滋味。

队员们年纪大的已经四十出头，年龄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全是“文王”（文盲）。我就发挥自己的“优势”，读书给他们听。那时，浏醴县委油印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读到。

我边读边讲，把我在水口山工人学校和在水汾搞农运宣传所掌握的全部知识都用上了。讲完了就在一起摆谈。我发现，经过这么一启发，我的队员们觉悟提高还蛮快。

上级又发给我们两条“老套筒”，带着十发子弹。我们就练习射击瞄准，练习持枪运动。大家把武器擦得干干净净，枪口上还学着北伐军的样子，曳上一个红绒线球，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活象一朵红山茶。当然，除了这“一短两长”的现代化武器外，还免不了装备梭镖、砍刀等土武器。

县委同志对我们这个小队很满意。我乘机要求说：

“让我们出去打一仗吧，锻炼一下队伍。”

上级很快就给了答复，指定我们到文家市、王仙、上栗市一带，自己找敌人打。

第一次指挥战斗，我心里又激动，又没底。队员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就尽力做出沉着老练的样子，让大家坚定信心。其实，我也不过刚刚十八岁，说起来还是个毛孩子，心里头也直打鼓呢。

我跑到别的游击队，见人就问：

“同志哥，你有兵书吗？”

那时当然没有这种教材。幸好，在老家时我父亲讲过一些孙子兵法，其中“知己知彼”一条，我记得很深。于是，我让大家分头去侦察敌情，先摸清哪里有敌人，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什么地形。

情况很快就回来了。我选中上栗市附近的一家土豪。这家土豪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凹里，有七八个人的“团防”，除了些马刀、梭镖外，只有三支快枪。兵力、火力都与我们相仿。

我突击了一下战前练兵，选两个精壮的后生跟我学会了攀登。天黑之后，我们按照看好的地形向那个小村摸去，在那家土豪的土围子外面潜伏下来。

那天晚上土豪家不知有什么事，院子里人来人往，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总也不肯安宁。我身边有个队员不知由于天

冷还是紧张，身体抖个不停。我鼓励他说：

“莫怕！”

“晓得。”他一面说，一面连牙齿也“得得”地响起来了。

鸡叫了，土豪家里安静下来。我带领两个队员，拿着两长一短、上了顶门火的钢枪，纵身翻进围墙。其他的队员带着梭镖、砍刀，同时在外面向大门运动。按原定的计划，我们翻进围墙后，应立即打开大门，把大家放进来，然后直扑西厢房，把团丁全部堵住。可是当我们三人摸到大门口时，发现一个团丁，正抱着枪依在门上打盹呢。

这个原先没有料到的情况，使我的脑子里“轰”的一下，什么计谋呀，方案呀，统统不存在了。那两个队员大概也差不多。我们愣了一会儿，忽然不约而同地扑上去，我从背后出手，一下就用胳膊锁住了团丁的喉咙，掐得那“丧门星”（后来我们都这样称呼那个团丁）当时就背过气了。两个队员夺枪的夺枪，搜子弹的搜子弹。我一看得手，把胳膊一松，那团丁“咕咚”一声就倒在地下了。

我的心狂跳不已，打开大门就往外跑，那两个队员也跟着飞奔出来。门外的人一看，也跟着跑起来，等一口气跑出二三里地，还能听见那村里的狗子叫成了一锅粥。

这一次我们得了一枝汉阳造，二十发尖头子弹。枪是崭新的，大概那土豪刚买不久，连枪栓上的密封油还没消失呢。

迎着朝阳走回驻地的路上，队员们把那支枪你扛一阵，

我摸一下，欢喜得不得了。可我却激动不起来，心里直后悔没按原计划冲进去，把另外两支枪也夺过来。

队员们劝我：

“队长，莫恼嘛，下次再干，就有经验喽！”

我说：“对！再搞几次，争取每人一支枪。”

几天后，我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到县城东郊打了一支清乡队。我们不但夺得了两支步枪，还仔细地搜索了俘虏，把枪弹、梭镖、马刀、匕首统统缴获回来。

县委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指示我扩大队伍。后来，上级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

党代表叫李菊生，是浏阳人，比我大几岁。他很健谈，我们两人在一起十分谈得来。党代表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上级党派来的领路人，所以威望很高。

有了党代表，游击队的各项工作更加活跃起来。我们出击的次数增加，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浏醴附近外，有时还出动到铜鼓、修水一带活动。我们的队伍逐渐扩大到三十多人，分为三个班。枪也发展到二十多支。力量大了，就开始组织一些较大的战斗。

文家市北面十余里有一家姓潘的大地主，大革命时期跑到长沙，“马日事变”后又返回乡下，并带回了十几支长短枪，领头组织起挨户团，修上了土围子，仗着他在反动军阀里一个亲戚的势力，搞起了封建割据。他有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挤垮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并威胁农民补交已经罢免

了的租息。他这一带头，附近的一些土豪劣绅也妄图与他串联勾结，在我们的红色区域里扩大地盘，与共产党的力量抗衡。

浏醴县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当时浏醴地区的游击队已有四、五支。县委把我们几支游击队汇集在一起，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这个土围子。

我们仍然使用夜间突袭战术，由我带领十几个人悄悄潜入地主的庄院，控制“挨户团”的住房。那些团丁都是受骗被临时雇佣来的老百姓，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直到我们下了哨兵的枪，打开了大门，大队人马开了进来，他们还在呼呼地睡大觉。

按照预定计划，各游击分队向地主的住房、各个出口布置好了兵力，突然亮起火把，我们这个分队就破门而入，首先占领团丁的宿舍。在一阵“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穷人不打穷人！”的喊话声中，团丁们才惊醒过来。他们有的吓得缩成一团，有的赤条条地跪在地上讨饶。还有的赶紧表白：

“红军老总，我是被抓来的，没干坏事。”

队员们收缴了俘虏的枪支弹药，让他们穿上衣服到院子里集合。我最后一个往外走，觉得脚下被绊了一下，拿火把一照，原来是一个团丁，躺在地下装死。土豪劣绅到处宣传，污蔑红军个个青面獠牙，被红军抓住要挖心肝、点天灯，因此这个团丁误以为我们让他们出去集合，是要杀他们，就

装死蒙混过关。

我又好气又好笑,把这个团丁提溜出去。这时,地主的家眷、佣人、长工也都被集中起来,指导员李菊生同志正在给他们讲话。他历数了这个土豪的罪行,还没讲到一半,那老土豪就吓得尿湿了裤子,瘫倒在地了,嘴里直叫:“饶命,饶命。”

作为对反动派“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对策,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杀地主,斩劣绅,一个不留”。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那么做。对这次抓到的地主,由于他还没有血债,就没有杀他,而是罚他交出反攻倒算的财物,退还农民已经分得的地契,把他放债、出租等剥削人民的契约烧掉,警告他不许再与红色政权作对,立即解散反动武装。最后,令他交出一部分光洋、谷米、衣物,供游击队使用。

至于那些团丁、长工,我们则给予教育,讲明我们的主张和政策,一律放掉,用事实粉碎了反动派对红军的污蔑宣传。

这次行动对群众影响很大,使他们真正了解了共产党,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加我们这支穷人的队伍。

我们在那里开展了一天工作,临走,又把一张布告张贴起来。布告上写的是:

通告各乡农友 大家注意服从

自从马日事变 豪劣更加横行

我们联合起来 实行共产革命
不当敌人向导 不替敌人探信
一切反动魁首 及时报告农会
捉得敌人有赏 夺得刀枪有功
革命自有记录 谁好谁劣分明
大家同心协力 都是革命先锋
总结最后胜利 革命定能成功
切切此布

由于我们的努力,浏醴地区的红色区域很快得到了扩大并不断巩固,成为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之一,为红军主力部队的机动回旋,提供了可靠的条件。

我们游击队组建的时候,没有党员,共青团员也只有我一个。党代表李菊生同志到达后,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他到任后和我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向他提出了久久地压在心底的一个心愿:

“我想请你介绍我转党。”

由于环境的残酷,我的这个心愿一直没有机会向组织提出。李菊生同志拍拍我的肩膀:

“我同意介绍你转党。其实,你作为共青团员,只要满了十八岁就可以自动转为党员。”

我表示:一年来与党的组织经常失去联系,这是件严肃的事,还是履行正式手续为好。

他同意我的看法。不久，党代表李菊生同志向浏醴县委提出了我的申请，当即得到批准，并发给我党证。

之后，我们又发展了几名党员，建立了游击队的党支部。

那本印着斧头镰刀的党证，在我向党旗宣誓后，就一直带在身上，伴随我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每年换一次新的，但从一九三二年后就没有再换。）至今我还完好地珍藏着它。

细流汇大海

游击队的战斗实践，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而作为一名党员，更深切地感到，武装斗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我在向县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建议：游击队要主动配合红军作战。县委领导同志赞成我这个想法。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军团，从江西向湖南进军。途中，于文家市棺材岭地区向守敌发起进攻。

文家市地处湘赣交界处，是两省交通要冲。敌人为了切断我江西根据地与湖南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系，特从长沙调来戴斗垣旅驻守文家市。该旅有四个团，是湖南敌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

八月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所属红三军和红四军以奔袭的战术突然包围了文家市守敌。接着，开始强攻。

在此之前，我们游击队通过县委与红军联络。经红三军黄公略军长指示，我们埋伏在文家市东南湘赣交界处，担任向萍乡和醴陵方向警戒，阻击萍、醴开来的援敌，保卫我军侧后。

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全歼了守敌四个团，创造了红军战史上的光辉战例。我们游击队也以能够配合红军作战而感到自豪。

文家市克敌后，红一团军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立即开赴浏阳东北面的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准备攻打长沙。

关于攻打长沙之举，我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立三路线的产物。一九三〇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七月下旬，李立三同志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同志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不打南昌，率领红一军团到赣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因而红一军团免受损失。红三军团虽然一度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撤出长沙。但是，李立三同志又于八月中旬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两

个军团的会合，虽然集中了兵力，但是当时敌人已增兵长沙，守敌兵力大于我军，加上该城工事坚固，因此，在红军缺乏攻坚装备和经验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攻克长沙。所有这些情况，当时我们游击队并不知道，浏醴县委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听说要攻打长沙，高兴得很，积极要求随红军作战。

红军领导没有同意我们的要求。县委给我们布置了新的任务：一、在三天之内把战场打扫干净；二、继续在文家市警戒萍乡、醴陵方向的敌军，以保证红军攻打长沙成功；三、在当地代替红军执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四、进行休整，扩大游击队。

接受任务后，我们首先把伤员护送到后方，然后掩埋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体。

在弹痕遍地的战场上，到处都有红军勇士们浴血战斗的痕迹。我看到有的红军战士牺牲在临时挖掘的战壕里，双手还保持着持枪射击的姿势，这个为革命血洒疆场的英姿，至今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把烈士们的遗体安葬后，我率领全体游击队员在坟前鞠躬致敬。同时，我默默地立下心愿：一定要参加红军，继承烈士未竟的革命事业。

打扫完战场，我们把收集的武器全部上交，自己则补充了一些子弹。然后，一边就地休整训练，一边执行警戒任务，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原先因躲避打仗而藏起来的群众，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红一方面军从八月底围攻长沙，历时半月未克。事后听

参加这次围攻的同志讲，战斗很激烈。由于长沙外围地势平坦，攻城部队缺少掩蔽地物，给进攻增加了困难。我军组织了几次进攻，均未突破敌军阵地。缺乏攻坚装备的我军，想了许多攻城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仿效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使用的“火牛阵”，集中了一批水牛，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牛尾上绑上油棉，点燃油棉后赶向敌军阵地，以冲击敌人。但是，“火牛阵”没有学到家。原来，田单是用木棍把两头牛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一招，都是一条牛、一条牛单个往前跑，敌人一打枪，牛就改变方向乱跑，有些竟掉转头往回跑，反而冲击了自己的阵地。“火牛阵”失灵，又改用其他办法，也都没有打开突破口。

其实，攻不下长沙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上的敌强我弱。当时，红军攻城部队一共才十三个团。而敌人将原驻守永和的三个旅全部撤至长沙，加上长沙原有的一个师及杂牌武装，实际守城兵力多达三十一个团。敌军凭借密布电网地雷的城防工事抗击我军，又占了地利的便宜。

毛泽东同志根据上述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闫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觉得如果继续围而不克，于红军十分不利，因而决定撤围。

九月十三日，红军撤离长沙，向湘东和赣西南开进。红一军团重新占领了萍乡、攸县、醴陵等地。

红军每到一地，除了做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筹粮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猛烈扩大红军一百万。”地方党组织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还把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介绍到红军部队中。

浏醴县委决定我们这支游击队参加红军。县委领导派人给我送来一封给红军的介绍信（这时李菊生同志已调离我队），并告诉我关于红军从长沙向醴陵方向转移的路线，要我持信带领游击队去追赶红军。

参加红军的愿望，长期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现在，这一心愿即将变成现实，我感到无比欣慰。我立即把县委的决定告诉全体队员。大家都高兴地说：“我就盼着当红军！”“参加红军，加入正规部队，打大仗，太好了！”也有个别队员表示不愿意离开家乡，怕当了红军要到远处去打仗。对此，我们也不勉强，我就写了个信，把他介绍到别的游击队去。

清晨，我带着三十余名游击队员，从文家市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进。我们有时走大路，有时却要走崎岖的山路，走到傍晚时分，又饿又累；但是一想到马上要成为红军战士，大家仍然精神饱满，要求夜间继续行军。我看见有些队员脚上磨起了血泡，就命令大家在路边休息。这样赶了两天，终于在醴陵西北的板杉铺附近赶上了红军队伍。

我们来到红三军军部，向接待我们的同志出示了介绍信。很快，三十余名队员就被一一编到下面的部队中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分配工作，说是要等参谋长同我谈话后再分。

于是，我和一起战斗过几年的队员同志们一一告别。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是最深厚的，我们互相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放。我们深情地注视着彼此的脸，互道珍重，也互祝在新的战斗岗位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互相约定：在革命胜利后，大家到浏阳会面，共叙这段生死与共的战斗历史。可是，遗憾的是，这个约会再也无法实现。因为，这些战友几乎全都牺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由于当时战斗频繁，彼此间很少联系，所以我对许多同志牺牲的时间、地点不清楚。但是，有四位同志的牺牲情况，经我打听后得知大概，现简录于下，以寄托我对战友的哀思：

殷超，醴陵人氏，参加红军后被编入三军七师，作战勇敢，一九三一年在泰和战斗中牺牲。

谭汉仔，茶陵人氏，战斗中以勇猛著名，一九三二年在江西一次战斗中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周双才，浏阳人氏，曾任红军五十四团政治处主任，一九三三年在随川战斗中英勇牺牲。

毛守先，平江人氏，曾任红军副团长，机智勇敢，一九三四年在广昌战斗中不幸阵亡。

板杉铺和我家相距仅数里。鉴于参谋长不在军部，我等待他时闲着没事，就向军部的同志请了一天假，回家去探望父母。

自从我上次离家后不久，这里就经常遭到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的烧杀抢掠。我来到村头，只见好几处民房被敌军

烧毁，街上死气沉沉，看不见人。我匆匆来到家门口，推开房门，只见堂叔耿道丰正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屋内。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但是看上去比我似乎老得多，原本很壮实的身体，也显得消瘦虚弱。他告诉我：这一两年来，白军和还乡团经常挨家挨户搜查，对于参加革命的人，连家属也不放过，一概抓去杀害。村里乡亲们为了躲避敌人迫害，都扶老携幼到山里躲藏。我的父母弟妹现在也躲在山里。幸好我参加革命后，一直不在家乡，别人不知我的情况，遇到有人问起，就说在外做工，因此敌人对我家追查得还不太紧。我听了后，对堂叔说：“敌人是秋后的蚂蚱，蹦嗒不了几天了。总有一天要他们偿还这笔血债。”

接着，我问他：“你怎么一个人留在家里？”

他那没精打采的眼睛这时忽然亮了起来：“听说红军要来，我就从山里跑了回来，想看一看红军。”

“你想参加红军吗？”我问他。

他说：“怎么不想？我早就有这个打算，可就是找不着红军。”

“好啊，”我高兴地说：“那明天我们就一道走吧。”

我在家住了一晚，父母亲和弟妹悄悄从山里回来见了面。翌晨，我和堂叔耿道丰一起离开村子，朝着红三军驻地走去。走到一看，糟了，红军已经开拔向东走了。

于是，我们急忙向东追赶。我们赶的速度不慢，可是红军行军的速度也很快，所以，第一天没赶上，第二天仍没赶

上……每天走七、八十里山路，脚上都起了泡，一直到第五天才在江西宜春赶上了红三军。

当天晚上，红三军参谋长陈奇涵同志和副官长郭天民同志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情况。最后，陈奇涵同志说：“好啊，你是个工人党员、游击队长，我们正缺少有工作经验和作战经验的参谋，你就到九师当参谋吧。”他还叫军部一位同志给耿道丰也分配了工作，恰好也分在九师。

我按照参谋长的命令，到红九师报到，在师部当了侦察参谋。

俗话说：细流归大海。在革命武装斗争这个广阔的天地间，游击队好比涓涓细流，个人好比细流中的一滴水，现在水滴和细流统统流入了红军这个大海。从此，我在这个革命的海洋中，一方面学习游泳，锻炼和提高自己；一方面使出浑身力量，尽量发挥一滴水的作用，和千百万滴水一道，努力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第三章

崎岖井冈山

雾满龙冈 旗满龙冈

我参加红军后的第一仗是攻打吉安。

吉安，这座位于赣江西岸的名城，近年来被我江西地方武装长期围困，并曾遭到八次进攻，所以守敌邓英部的三个团，士气低落，军无斗志。

一九三〇年十月上旬，红九师从安福出发，迅速到达吉安。那时，红五军已与守敌交战，我师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激战，红军击溃敌军，占领吉安。敌残兵仓皇向南昌逃遁。吉安周围几个县城的敌地方武装“靖卫团”，闻讯后也都弃城逃窜。于是，吉安附近连成一片红区。翌日，红军和当地的赤卫军、赤卫队以及数千名群众，在吉安城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我们打下吉安时，正值蒋冯阎大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乘

机调集军队，企图“围剿”红军。因此，我军奉命从吉安回师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准备反“围剿”之战。

蒋介石向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的“命令”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被大肆宣传。因此，我们除了从上级的敌情通报中得到有关消息外，还可以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出名堂。蒋介石的阵容号称“十万甲胃，八面进剿”，方针不外是“分进合击”。这样大规模的“围剿”和反“围剿”，无论敌我双方都是首次。

那时我们还没有电讯工具，各级之间的通信联络全靠通信员的脚板子，我就嘱咐九师通信员，路上见到报纸，可以顺手“抓”回来，他们就说：

“怎么？耿参谋没有卷烟纸啦？不管。”

“去！”我正色道：“我是让敌人的新闻官给咱们当谍报员哪。”

确实，国民党的报纸对我们掌握敌情帮了不少忙。蒋介石的军事训令啦，鲁涤平的调兵动向啦，敌人各个部队某日到达某地，“士绅饷以花红”啦，等等，他们统统肆无忌惮地泄漏无遗。

不过，国民党的报纸历来是谣言连篇。他们造起谣来也是肆无忌惮。有一天，通信员小谭送信回来，进门就闷不作声，低下头一个劲地从绑腿里往外取回执。我有些纳闷，顺眼一瞅，只见小老倭眼泪汪汪的。

“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原来，他在镇子里听人家读墙上的报纸，那上面说：“共匪头子”朱德被打死了。

真叫人哭笑不得。就在小通信员进门前不久，我们九师的徐彦刚师长被黄公略军长叫去，说朱德总司令要和我们一道去看地形，还讲好晚上到我们这里来亲自炒一盆辣椒猪肚呢。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国民党报纸又“宣布”我们红三军“溃不成军”，说什么“黄公略部正遁入‘华容道’”，而他们决心“不做关云长”云云。

其实我们正在大踏步地撤退，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一直都在部队中间，在运动中寻找战机。

红军为了对付敌人“乌云压城”的“围剿”，在罗坊会议上就定下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实质就是战略退却，从白色区域退到红色区域，以求“天时、地利、人和”的决胜契机。这就是要把战区放在我们的根据地内，把战场设在红色人民的海洋中，把战机选在敌人分散、疲惫、饥饿、松懈、易生错觉和充分暴露弱点的时候，以便聚而歼之。

敌人是疲于追赶，而我们却从容不迫地后退，沿途还不断接到“相机夺取××”的命令。在樟树、抚州、乐安、永丰等富饶地区，我们还高效率地筹款集粮，补充兵力。而敌人则被他们的地方守备部队和政权机构的假情报搞得晕头转向，在一片“朱毛已陷×城”、“共产军已在×地集结”的呼救声中，狼奔豕突，连连合围扑空，士气一再衰竭。

在远离敌人后方的龙冈、小布地区，总前委选定了退却终点，进入战略反攻。

敌人的十万大军，已被我军拖成散了架的牛。敌七十七师和五十六师相距八百里，一个远在赣江之西，“隔岸观火”；一个遥驻福建建宁，进退两难。而在他们之间的八百里距离上，敌左路军与右路军分成两大路，两大路又分成七、八个散摊子。并且，真正能与我构成接触的，只有张辉瓒的十八师、谭道源的五十师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

就在敌人做着“八百里连营”的美梦时，我军三万多兵力已经集结成拳头。我们既不轻敌放松，也没有惊慌失措。总前委在慎重地选择着初战的目标。小布附近有一条小河。小河旁有一片梨园，四周是隆起的高坡。总前委派人在梨园旁搭了个台子，准备召开第一次反“围剿”的军民誓师大会。

那天是个晴朗的冬日，正在向春天回归的太阳照耀着大地，使万物充满了生机。宣传部的同志们在主席台上挂起一副对联，那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的：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就是我们“十大军事原则”的雏型。这次誓师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主席台设在低处，而部队和群众在周围的高坡上，就象现在的体育场一样。毛泽东同志讲话时，通俗易懂，

形象生动,尽管没有扩音设备,但由于会场那喇叭式的地形和他那洪亮的声音,使每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会场上一会儿欢笑,一会儿鼓掌,气氛十分热烈。

誓师大会快结束的时候,通信员小谭从红三军军部送来了“公事”(即文件):敌谭道源部正在大肆拉夫,有向小布进犯的迹象。

这个情报得到了各路侦察员的证实。谭道源部和张辉瓒部都是一万四千人左右,均为蒋介石主力,打击其中之一并歼灭之,无疑是对蒋介石来个“下马威”。

按照上级命令,我们轻装上阵,管制了灯火及一切反光物品,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夜进入伏击阵地,准备“瓮中捉鳖”。

但是,尽管接到了注意监视敌先头部队的临战通令,敌人仍然没有露头。第二天夜间再去伏击,为了防止敌人察觉,所有指挥员都不许带马。从拂晓等到天黑,仍然没有动静。

战士们纷纷向那些带着“秘密”到处跑的通信员打听:“同志哥,怎么回事?”

通信员便神秘兮兮地说:“诱敌深入就是这个样子嘛。”

其实,连我们这些干部,也不知道敌人为什么没来。后来在歼灭谭道源一部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向敌人告了密,说小布的红军布了“天罗地网”,谭吓得做了缩头乌龟,把已经接近我伏击圈的前卫调了回去,仓皇溜走

了。

小布设伏未果之后，又探得张辉瓒部向龙冈方向蠢动。二十七日，朱总司令来到我们红三军，在全军指战员大会上当面下达了作战任务。

朱总司令说：“谭道源溜了，张辉瓒来了。张辉瓒是敌前线总指挥，消灭他对整个反‘围剿’战事更有意义。总前委认为，敌人已被调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以铿锵的声音、坚定的语调宣布：“总前委决定：你们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希望同志们努力打！要初战必胜。”他扫视一下队列：“有没有信心？”

“有！”队列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

“坚决打垮张辉瓒！”人们振臂高呼。

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我是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以前，从众多的关于他的传奇式传说中，我得出了一个印象：他是一员威武而严肃的战将。现在，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时，那一对浓浓的眉毛和总是微笑的嘴唇，使我感到了他的睿智和亲切。

我旁边的通信员小谭使劲地鼓着掌，兴奋地又蹦又跳。我想起前些天他因为那张国民党报纸造朱德同志的谣而哭鼻子的事，就笑着对他说：

“看好了，朱总司令就在眼前。”

“对！我见到他了，我见到他了。”

现在，就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

这个被多次宣布已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又是一个寒星寥落的冬夜，部队偃旗息鼓，悄悄地进入预定的阵地。

那时我已调为作战参谋，正蹲在指挥所里，按徐彦刚师长的指点，把各单位的占领位置标在地图上。标完后，我舒了一口气，抬头远望，只见天已破晓，曙光初照，满山的经霜枫叶，都映上了一层红色，但是晨雾袭来，峰峦又都溶进了扑朔迷离的雾障里。这就是毛主席后来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描绘的“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冈千嶂暗”的情景。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浓雾消散，我们居高临下，伏击区的情况尽收眼底。只见敌十八师的前卫已经进了谷底，正在缓慢地向山上攀登。通信员飞快地送来通报：敌十八师（欠一个旅）正向我军阵地开来，各部依原计划实施歼灭。

红三军以七师担任正面攻击，在黄竹岭前的木坑以北和亭子岭主阵地上与敌交火。八师、九师紧接七师向龙冈东面和东北面攻击前进，会同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形成对敌包围之势。

毛泽东同志后来说，这个阵势是受太平军兵书上记载的“五瓣莲花抄尾阵”的启发，以我军“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指导原则摆成的。

红七师首先交火。当时红军的师，名曰一个师，实际上

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再加上武器装备差，因此，敌人并没有把七师放在眼里。敌指挥官大模大样地摆开指挥器材，先后展开两个团的兵力，频频发动冲锋。

“五瓣莲花抄尾阵”这个阵势，只有尽快地合拢，才能显出威力。七师吃紧，但是，总部实在派不出援兵。朱老总当即指示：凡下级要求增援，就必须派去，没有兵可以派将，多少总要派。于是总部指挥所派了一名参谋处长前去加强指挥。这位处长到了前沿，帮助七师稳定了战线。黄公略军长立即下令八、九两师尽快完成合拢。

我们九师接到命令后，徐彦刚师长十分着急。我们是以“前三角”的队形展开进攻的，但是担任正面突破的二十六团，却迟迟不能推进。师长便把我叫到面前，说：“耿猛子，你到二十六团火线上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传我的命令：立刻打进去！”

我抄起马刀就走。为什么要抄马刀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枪。当游击队长时的盒子枪已经上交了。我连跑带跳，取捷径直奔二十六团阵地。老远就听见战士们争喊：“我先上，我先上！”看来士气不低。可是到了现场一看，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什么，二十六团有两个半连正伏在一片洼地里，求战声正是这些人发出来的。而团长（姓王，江西人，后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却提着一把马刀，站在前出位置上，杀气腾腾地督战。只见上去一个战士，冲出几丈远便被敌人击中，于是又一个战士从王团长的马刀下冲出去，

再被击中。我心想：王团长这算哪门子战法？我们的战士净给敌人当活靶了！我顾不得与预备队打招呼，从斜刺里直奔王团长身边。由于我学过武术，有点轻功，所以来得有些突然，王团长错以为敌人偷袭，对我挥刀就砍。

我格开他的马刀，大声喊道：“王团长，你看我是谁？”

他从厮杀的紧张中解脱出来，吃惊地说：“啊！耿参谋，来得正好。快，你在这守着，我亲自上！”

我一把将他抓住：“别忙，这个冲法，你上去也得送死。”

二十六团团长不愧是一员猛将，但他太鲁莽了。他选择的冲击路线是一条只有一、二尺宽的小路，左侧是一个池塘，右侧是两个山丘，两丘之间，有条雨裂沟。敌人用机枪顺着沟对小路扫射，正好封锁住二丈多长的我军冲击路段。

我先传达师长命令。王团长委屈地说：“我们在这里被压了两个钟头了，已经下了坚决冲锋、不准后退的死命令，谁怯阵格杀勿论，这你都看到了。”

他的意图是冲过这个山垭口，从侧面发动攻击，完成“五瓣莲花”的合围。

我打量一下周围的地形，确实只有这一条道可走。我便让他先组织火力对付敌人，并说，这叫做“封住敌人火力，稳住自己阵脚。”

他高兴地说：“耿参谋，你很有板眼啊。”

其实我也是情急生智。俗话说得好：避雨还要找个房檐哩。我用马刀顺手削下几根树枝，猫下腰冲到山垭口，就势

滚进池塘。流弹在头顶上吱吱飞过，但是坚实的小路很好地充当了遮蔽物。我用小棍把军帽顶起来，刚探出路面，就被子弹穿了几个洞。虽然观察不到火力点，但可以判断出，敌人离这里不远，必须拔掉这颗钉子，才能使大部队通过。

我匍伏前进，沿浅水区插上一排木棍，示意王团长：尖兵排沿这排标志通过。战士们刚才看到了我的动作，增加了信心。虽然他们没有经过训练，还不会匍伏前进，但连滚带爬，倒也平安地过了封锁区。我们登上土丘，一眼就看到敌人筑在两丘间的简易工事——一道土坎，五六个敌人躲在土坎后面，用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正盯着那条小路呢。可他们没想到，我们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一阵齐射，敌人枪丢人翻。“钉子”拔掉了。早就等急了的二十六团主力，一跃而起，飞快地冲向敌人阵地，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二十七团也尾随他们进入战斗。

这时，我十二军的侧后攻击已经奏效，红四军和红三军团的部队，也从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压下来，“五瓣莲花抄尾阵”已经形成。

我一路飞奔找到指挥所，告诉师长，指挥所可以向前推进了。他说：“你通知二十五团，随指挥所推进。”

我把命令下出后，又把二十六团受阻的情况作了汇报，师长说：“看看，不懂战术，指挥蛮干，多糟糕。命令二十七团在侧面展开，叫李聚奎同志放开打。”

李聚奎团长正指挥二十七团占领制高点。敌人凭借火

力优势，收缩在几个小村里顽抗。我赶到二十七团时，我军全线已经合围成一个铁桶。天色已晚，上级发布了战场号令，以便联络和识别。

第二天拂晓，夜幕还没退去，厮杀又开始了，枪声、杀声响彻龙冈上空。李聚奎同志组织部队轮番掩护，交替冲锋，很快就从右侧冲到了正在正面猛突的二十六团前面。我正随部队混战着，李聚奎同志大喊：“耿飏同志，收拾一下左边！”我一看，敌人大约有一个排，正从斜方向过来顶牛呢。我招呼身边几个战士：“跟我来！”一阵猛扑，就冲到了敌人眼前，我连连挥刀砍倒几个敌人。敌机枪手见双方在一起肉搏，他的机枪发挥不了作用，干脆弃枪逃窜。我们的战士，似天神一般，勇不可挡。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其余的则在乱窜。敌排长跪地投降，我缴了他的手枪和子弹袋，又随队伍杀了上去。

这一整天战斗异常激烈。傍晚，我正向徐彦刚师长汇报二十七团的情况，就见一大群通信员从龙冈大路上向各自的单位飞跑，一路大喊着：“捉住张辉瓒啦！捉住张辉瓒啦！”

徐彦刚师长猛跑到路边，问几个往后送伤员的民夫：“哪里捉的？哪里捉的？”

“前头！”民夫老倌子搞不清是哪个单位捉的。

这时，毛泽东同志正从黄竹岭上健步走来。我们向他敬了礼，他笑着点头还礼，沐浴着绛红色的夕阳光辉，直向龙冈大坪走去。

这一仗，仅我们九师就俘虏敌人官兵三百多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徐彦刚师长从缴获物中拿起一把蒋介石发给其军官的“自杀剑”（蒋介石要他的部下在打败仗时用此剑自杀，效忠于他）风趣地说：“哎呀，这玩艺我们可发给谁呀？”

俘虏中绝大部分是湖南人。徐师长说：“耿猛子，都是你的老乡，你去讲讲话。”

我这个人不善言辞，徐师长一再怂恿，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好在过去在水口山读夜校，在醴陵搞农民运动，听了不少，主要的革命道理也记住了。于是我先客气地让俘虏坐下，问道：

“你们都是什么出身呀？”

有人胆怯地回答：“做田人呗？”

“你们做田，粮食都到哪里去啦？”

“交租呗。”

还有的说：“要不就不出来当粮子啦。”

那时，湖南农村把当兵吃粮叫作“当粮子”。

“你们当兵吃粮，家里人怎么办？”我紧接着这话茬问。

“还能哪样？挨饿嘛。”

讲到这里，有个大个子兵突然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一问，他是欠了地主几斗租谷，顶了五块银元的债，替人当兵的。结果老娘饿死，堂客（妻子）改嫁。

我说，做田人种的粮，被地主收去，他们不劳而获，这就

叫剥削，我们红军就是为消灭这种剥削而打仗的。替国民党当兵，打红军，就是帮了剥削者的忙。

俘虏们纷纷点头。

我又问了他们，红军战士有没有搜俘虏的腰包，是不是虐待俘虏。他们纷纷摇头。

我看他们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就顺势说：“你们谁愿意参加红军，我们欢迎。要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但是再也不要再去帮国民党压迫、剥削穷人了。”

俘虏们顿时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我一个人答不过来，师长和其他同志就帮着解答。讲话成了集体对话。

徐师长笑笑说：“好，愿当红军的，由耿参谋登记，分到各团去。回家的当场发给三块钱路费，发通行证离开。”

师长看我处理完俘虏，拍拍我肩膀，“犒劳”一支香烟，说：“耿猛子，你小子行啊，不愧是工人阶级教育出来的。”

我不知该为自己谦虚还是该为水口山的工人自豪，竟说不出话来，搔了半晌头皮，才说：“嘿嘿！我送新同志去啦。”

通过处理俘虏，使我更感到了我军政策的正确。在回来的路上，我还遇到这样一件事：

路边有一个做临时厕所用的草棚，由于战场打扫不太彻底，张辉瓒部的一个军官，战战兢兢地躲在里面，被我抓住了。

他连忙拿出一块怀表：“老总，一点小意思。”

我严肃地说：“收起来。”

他误会了，跪在地下哭起来：“老总啊！可怜我上有……”

我笑起来：“知道。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怀抱小儿，对不对？”

他更慌了，连说：“开恩开恩，没齿不忘。”

我说：“听口音你是长沙人？”

“对头，对头。”

我和和气气地说：“贵姓。在那边干什么的？”

“敝姓姜，是医官。”

当时，红军中最缺的就是医务人员和电台人员。龙冈战斗中，有的战士看到张辉瓒的师部里有几个大坛子，便骂：“国民党龟儿子，打仗还喝酒。”纷纷用大石头砸了。实际上，那是电台用的电池硫酸。所以，上级专门发了文件，要大家注意收容医务、通讯人才。

我说：“我不要你的怀表，你跟我走。”

他惊魂未定：“不是去杀我吧？”

我说：“红军优待俘虏，我先带你去见黄军长。”

“你是说黄长官？我还认识他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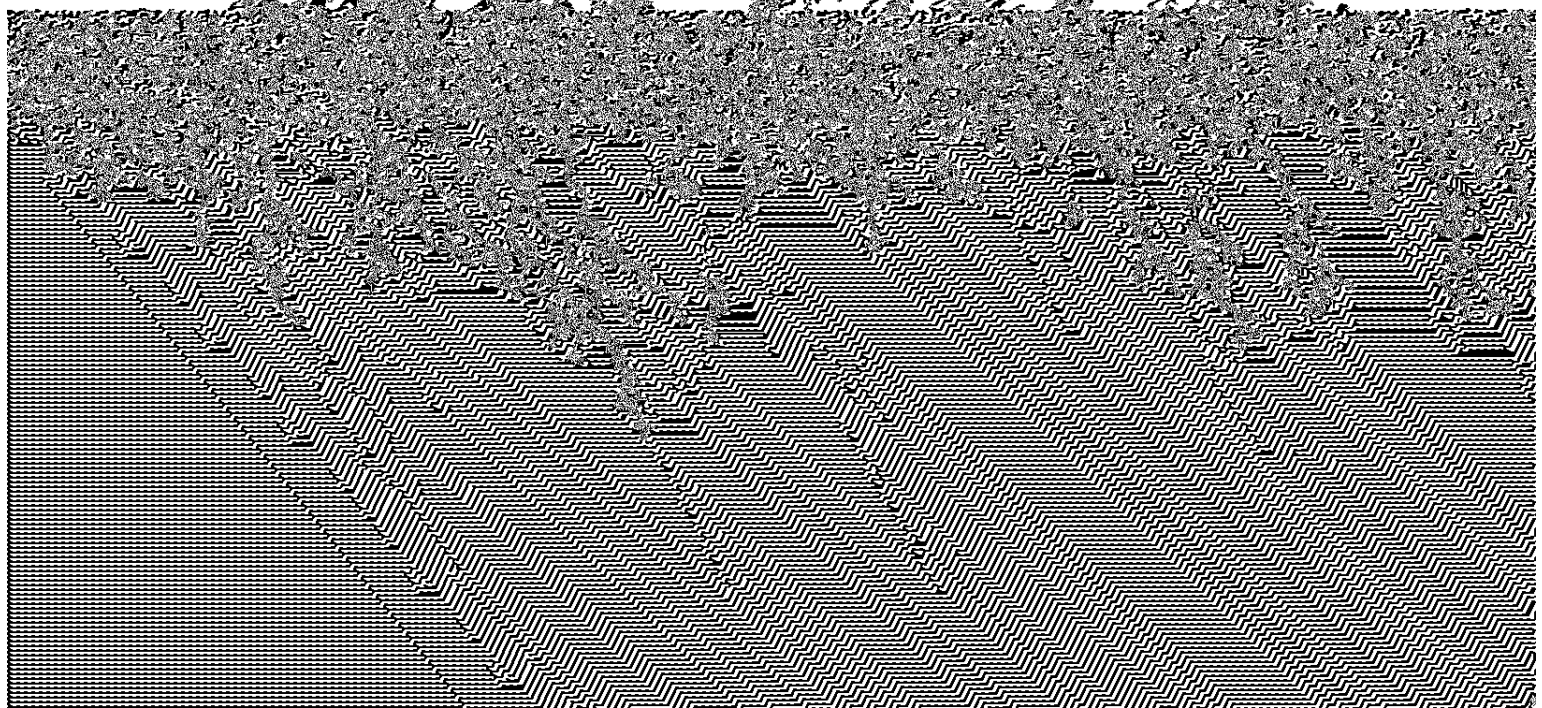
原来，敌十八师是黄公略同志的旧部，所以该师有很多军官都是他的部下。当晚我把这位姜医官送到军部，经谈话，当即被任命为红三军卫生队长。从此，我军队伍中多了

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红军的俘虏政策之所以优越，在于它具有化敌为友的功效。但是，在革命初期，也有些同志不懂得运用这种力量，处决张辉瓒就是一件不该发生的蠢事。

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交代过，张辉瓒放下武器后，愿意捐款捐枪捐医药，请求免他一死，可以不要杀。但中央宣传部个别同志仍然把他交给群众去开大会，结果被愤怒的群众一刀割下脑袋，放在门板上顺赣江漂流下去，直到南昌，用以示众。这样做对我们实际上是不利的。蒋介石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一面召集十万官兵公祭，一面命人在长沙树碑，以引起“兔死狐悲”的仇恨心理。

龙冈大捷后，我军乘胜再克谭道源部。战士们士气更高，都说：小布埋伏了两夜，冻得我们够呛（当时正是春节时候，天气很冷），这回可该杀出几身大汗来暖和暖和了。于是，红旗指处，红军势如破竹。谭部本是惊弓之鸟，所以一触即溃，把枪支弹药器材辎重，扔得满地都是，连扣发士兵的三个月军饷，都来不及带走。我们一边拣拾缴获，一边乐呵



哎呀来——
太阳出来亮堂堂，
唱起山歌喜洋洋，
哎呀，英雄好汉当红军，
同志哥，
红旗飘飘满龙冈。

.....

战争的教鞭

我们九师师长徐彦刚，是位勤于总结和思考的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鸣金，他的脑筋又动起来了。不过，这次他叫小通信员包上一包叶子烟，拉上我，到小布村外的河边上，面对面“交流”起来。

“你说，二十六团他们那一仗，为什么就不知道躲枪子呢？”

二十六团王团长已经挨过批评，我这当参谋的，也不能背后说人坏话，再加上现在我们是在闲谈，不是在“正式场合”做总结，所以我便解释道：

“他也是求胜心切，人急了难免考虑不周，再说，什么事得有个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以后他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不。以后他可能会利用地形了，但难说在别的方面不

再吃亏。”

这我承认。王团长是榨油工人出身，从小就有一膀子蛮力气，上了他的牛劲，真是谷糠里也能榨出四两油来，打起仗来，耍马刀一把好手，指挥战斗，却显得谋略不足。

师长扳着指头说：“你看，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不只是二十六团，各单位都有，还有不会走路的，不会使用识别标志的，二十五团有个连队，打起仗来尽往一块挤，自己施展不开不说，还加大了伤亡。”

我们的红军，多数是今天还在种田，明天就在战场上，师长所说的这些情况的确并不罕见。

“看来要想办法提高大家的素质，”师长继续说：“我的意见是，你来教他们，先把连排干部训一训。”

我急了：“不行不行，我懂哪样呢。”论起来，我也不过二十出头，刚刚吃了几个月的红军饭哪。

“我也知道你为难，可是战争不留情啊，逼着我们去学啊。你总算比他们多知道一些，能教多少算多少。我再跟刘政委商量一下。”

当时，各单位都抓紧战斗间隙整训部队、办教导队，以备对付蒋介石叫嚣的第二次“围剿”。红军的作战方式，也由原先单纯的凭勇敢报仇雪恨，发展为讲究技术战术，不断扩大胜利。一九三一年农历一月五日，我经刘政委和徐师长提名，被任命为九师作战科长，并奉命筹办第一期教导队。

刘英政委说：“耿飏同志啊！师党委把这事委托给你了，

现在还抽不出指导员来，你就兼起来吧。军事、政治、文化都要管，你这根教鞭还蛮重哩。”

第一期教导队就这样办起来了。全师干部战士六十多人，集中到小布村来。“开学”第一天，光是登记花名册就把我折腾了几身大汗。因为这些学员绝大部分都不认得字，连名字也不会写，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光叫“王老三”和“阿毛”的就有好几个。

我对他们说，咱们革命了，都得有名字，你们快给自己起上名字，再来登记。

师直特务连小张也来学习，他说：“队长，我有名字，还是祠堂里赏的呢，来，我写给你看。”

大家围上来，看戏法似地看这个江西小老倭写字。他满把握着毛笔，圆圆的娃娃脸憋得通红，吭哧了半天，写出一个“文”。

我说：“噢，你叫张文。”

“不。我叫文碧。”

我说：“把姓也写上。”

“嗯——嗯。”小张又是抓又是挠，怎么也写不出那个“张”来，倒把我宝贝似的一张纸“涂鸦”成大花脸了。大家一阵笑，小张更慌神了。我只好接过笔：

“弓长张还是立早章？”

“就是我爷爷张××那个张。”

我写了一个张，一个章。他高兴地说：“哎呀，就是这个。

我说我原本认识的。”

我又问：“哪个‘碧’？”

他这回不敢接笔了，用手指在手心里比划着道：“笔划好多好多，一横一竖的，对了，里面有个‘王’字，老虎头上那个‘王’字……”

我写出一个“碧”字。问他：“是这个字吗？”

“它就念‘碧’？”

我说：“这就是‘碧玉’的碧。”

“对对！”张文碧兴奋地说：“我爷爷说过，为我的名字向祠堂交钱比别人多交了二十文呐。碧玉，没错，贵重着哪。队长，你把这张纸赏我吧，反正写糟了，我得学会这三个字。”

三十多年后，已经当了省军区政委的张文碧同志有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老首长，那年你把我的名字闹错了。去年我回老家，找到我爷爷坟头上那块石碑一看，原来我叫‘张文璧’呀！”

“你讲你是‘碧玉’的‘碧’嘛。”

“璧玉，是和氏璧的那个‘璧玉’。”

“那怎么办？”我这个人挺认真，觉得对不住他似的。

他哈哈大笑：“你甭在意，还是这个‘碧’好，是革命给的名字呐。可惜那张纸我最后还是弄丢了，要不，军事博物馆拿去，可是上等文物。”

就是这些连名字也不会写的后生们，后来成了我军的

优秀将领，许多人至今还为革命事业奋斗着。

红三军的部队原为江西地方武装，骨干是象我一样的游击队员，再就是“扩红”进来的农民。可以说，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许多人连枪都不会使，只是带着一支梭镖参加战斗。因此，师长和政委给我的“指标”就是：首先完成由老百姓到军人的过渡。

军事训练中我们先搞队列。从整齐报数开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小布村那地方风景很美，教导队开训的时候，路边已经开满了鹅黄色的花朵。每天破晓，我们便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走向演兵场，有时是班排教练，有时是全队出操，五六十号人整齐的步伐和洪亮的口号，打破了山野的寂静。惊得那些宿林的山雀们“是谁？是谁？”地鸣叫。

几天后我请师首长们来验操。徐师长、刘政委看得不住夸奖。还从外单位请来一位进过讲武堂的副官，他也称赞说：“完全符合操典。”

我还兼上文化和政治课。那时这两项是合并起来学的。比如，先学“苏维埃”这几个字，会写会读之后，就可以讲俄国，讲十月革命，讲列宁的主张。我把在水口山工人夜校学的那些知识全使出来了。学员们学得也挺快，一期教导队办下来，同志们可以认几百字了。

最使我搔头的是军事课。

那时候可真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师长与我那一席交谈激发的责任感。二十六团王团长用马刀督战，让战士死

拚的情景，促使我先讲“地形地物”这一课。

第一课，简直就象幼儿园教小朋友“藏猫猫”了。

“地形地物”这个词一出现，学员们就七嘴八舌地问上了：

“什么叫地形地物呀？”

“哪里有地形地物呀？”

实话说，我也不知道它的准确定义，我就这样解释：高低不平就是地形，比方说，我们驻地这里，四周有山，中间低，象个盆，就是这里的地形。地上有桥，有坟包，有树等等，就是地物。

接着，我让学员们“消化”这些知识。带领大家到野外，识别什么是地形，什么是地物。

当讲到应用课，即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时，问题来了。

我持枪做示范，占领一座坟包，告诉他们，这就是利用地物：对面射来的枪弹打不着你，而你可以射击敌人。

“报告！”一位连长站出来说：“红军还能怕敌人的枪子吗？”

这问题就“严肃”了。因为当时，党内那种“残酷斗争”还没有完全过去。这问题就象“干革命还怕死吗？”一样，几句话很难说明白。那时人们最熟悉的军事理论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六字诀，而“打击敌人，保存自己”还未来得及提出来。

每逢遇到这些难题，我就去请教徐师长和刘政委，然后

“特约”他们来讲这些课。

我记得，我讲得最成功的，是“敌火下运动”。

“比方说，”我那时一课用得最多的就是“比方说”这三个字：“一只老鼠要出洞了；比方说，它要到对面桌子上去吃蚕豆。但是它必须防备被猫抓住，被人踩死。这样，它就得先侦察一番。它侦察的时候，总是先在洞口探出脑袋，看一下哪里是人可以够到的地方，哪里是猫可以追得上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利用，比方说，屋里的箱子、桌子、禾桶等，可以挡住人的视线，墙缝竹筒，老鼠可以过去，但猫就过不去。然后它就选择行动路线，比方说，它可以选择三个立足点，以便分段更仔细地侦察，决定是否按原计划行动。最后，它还得找好返回的路线，比方说，他可以按原路返回，但是如果原路有了危险，它就要走另外的路……”

我的这只假想的“老鼠”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东西。这一段“老鼠偷蚕豆”算是“敌火下运动”的基本原理，之后我就带领学员们去“打野外”（即演习）。我选一段比较典型的地形，在对面的小高地上假设一个火力点，让他们想法运动到那里“炸”掉它。

这种作业的评定方式也很有趣。每当有人在途中跃进姿势不对时，“后方”观战的学员就喊起来：“喂！屁股撅得太高，挨一枪了！”

那么这位“顾头不顾腚”的学员就得重新做一遍。

有时我们也搞夜间课目，做得最多的是“摸哨”。常常由

这个班担任“红军”，由那个班担任“白军”。如果“红军”行动不慎，“白军”就毫不客气地将他“反俘虏”。这样做有竞赛的因素。各班为了避免失手，就自动组织课外演练，开展小群练兵活动。

“摸哨”后来发展到“摸电台”。当时，红军很想缴获几部电台。第一次反“围剿”时，龙镇上有敌十八师的几部电台，我们的战士不知是什么东西，已经缴到手了，又统统砸坏了。为此军团部专门发了通报。于是教导队的一些后生们便到附近的红军通信学校去，向人家打听电台有那些部件组成，密码本什么样，电池液“咬手”怎么办。回来就搞模拟器材，把绳子、箱子、泡菜坛子当“电台”，设计好行动方案，把那些东西背的背，抬的抬，一古脑儿“摸”回来。

那时子弹奇缺，要求我们的红军能真正做到“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就把提高单兵射击准确性当重点课目来抓。但条件又不允许我们经常打靶，于是便想出一种简易的检验法。先把枪固定在三角架上，在“敌人”的位置上放一张白纸，学员瞄准好之后，在他的瞄准线上点一个记号。然后将枪活动一下破坏了原瞄准线，等他恢复瞄准后，在新的瞄准点上再做一个记号，接着，又第三次瞄准，做记号。如果这三个点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最好的射手可达到三点重叠），那么他的成绩便过关了。解放后我在坦克兵的训练中，看到一种“刺射瞄准”练习，与我们当初那种办法大同小异。

红军擅长打运动战，常常要夜行晓宿，在大山里大踏步前进和后退，以便调动敌人。夜间在荒山老林里行军，最怕的就是迷失方向和掉队。有时候，行军纵队中有一个人拉下了距离，与前方失去联络，他后边的人马就会跟着他走入歧途。全队迷失方向的情况就更糟糕，有时在一片深山老林里，十天半月都转不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在讲课中就讲了我们浏醴游击队在钻山林时，怎样夜间跟队，怎样摸树干、看北斗星辨别方向的经验。

尽管条件简陋，我还是尽力把教学搞得正规一些，坚持每天写教案和训练日记。教案的内容大部分是根据我的经验写成的，同时也尽力参考一些书面材料。当时的军事材料主要是从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的文件中获得，也有日本和苏联的书籍，如《阵中要务令》、《步兵操典》等。选用的战例，多数也是我们三军九师经历过的战斗。有时也讲一些历史战例，比如讲到地形与战事的关系时，就讲《三国演义》中马谡把部队布置在山顶上，结果被断绝了水源，不战自乱的战例。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京剧《失空斩》，所以听得十分明白。又如在讲夜间行军保持静谧和秘密的时候，就引用“衔枚疾走”这个成语。记住这四个字，夜行军的静秘技巧就基本上解决了。教导队结业时，我把这些教案整理成一大本，一直带在身边。

政治教育课程，主要是依据学员中存在的问题而设置的。红军中的战士，有各种各样的成份，也就带来各种各样

的问题。比如：从游击队过来的，一般来说，纪律性较差一些；俘虏兵有雇佣思想，某些俘虏军官还有军阀主义；农民出身的战士常常带有迷信和宿命论的意识色彩。还有各地来的同志生活习惯不同，处理不好就影响团结，等等。教导队学员中存在这些问题，这就为我们的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的对象。现在有一句叫做“从自己做起”的说法，那时，我们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正是这样进行的。

对于《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我们学了就照着做。教导队建立了党支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家都来做思想工作。

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伙食意见纷纷。当时从官长到士兵一律是三块钱伙食费，一块钱零用。我们也实行经济民主，由士兵委员会来管理伙食，每天轮流由一名班长和一名队员上市场购买食品。这两人称为正、副采买。伙食费没有用完，称为“伙食尾巴”，月底平均分给大家，或者会餐。

发生不满的原因是在要不要吃辣椒上。江西、湖南、四川、云南籍的同志，喜欢吃辣椒，而福建人就不吃辣椒。但是每天派出的采买，是按自己的嗜好买菜的。这就难免不对嗜好不同的人的口味，于是问题出来了。

我是士兵委员会委员，就建议士兵委员会解决。经过调查、讨论，形成了决议：每天买菜时，按辣与不辣买两种，数量以双方人数为比例。问题迎刃而解。

这件事情不大，但通过解决问题，大家对“经济民主”加

深了理解,明白了做法。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也巧,就在我们学了“官长不打士兵”、“政治民主”之后不久,我本人就被“民主”了一次。

那天是例行的集合点名。值班排长整队完毕,有一名队员却迟迟未到,经再三派人催促,他才慢慢地走来。

我问“你为什么来晚了?”

他低头不语。这使我有气,便大声喝问:“讲!为什么来晚了!”

他嘟哝了一句:“我懒得个。”

“什么?”我火了,“大家都一样嘛,为什么单单你懒得个?”

那队员顶了一句:“就是懒得个嘛。”

我更火了,顺手给了他一拳。

这事成了士兵委员会的议题,他们当晚便召集了军人大会,对我实行“弹劾”。

那滋味可不好受,士兵委员们事先显然做了准备,对“民主”程序安排得很有板眼。先是轮流念《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条文,每念一段,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就宣布“耿飏同志”犯了第几条,并由大家举手认可。

我犯的错误的“军阀主义”、“官长打士兵”和《八项注意》中“不许打人骂人”的前半部。“说话和气”一条,大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

指定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打人是不对，但是那位同志对操课偷懒，也该“民主”一下。

这下，会场上开锅了。一部分人说，他“懒得个”有什么错了？有的说：“懒得个”也是犯纪律，要处分。

士兵委员会主席是位三十岁左右的老同志，他恍然大悟，敲敲茶缸让大家肃静，站起来解释说：

“‘懒得个’是生病了，不是偷懒。他是永兴县人，讲的是家乡方言。”

原来如此，这里边有误会，因为在湖南，“懒得个”是“不愿去”，带有对某件事不屑一顾的意思。

我说：“明白了。请大家处置吧，我错了。”

大家见我态度诚恳，又加上有误会的因素，决定罚我一元钱，因为我毕竟打了人。

于是，我认罚。交一元钱——整整一个月的零花钱。

事后我与那个学员和好如初。

教导队原定半年毕业，但从三月份起，黄公略军长、徐彦刚师长就指示我加快进度。黄军长对我说：

“大战在即，争取四个月毕业，但质量不能降低。”

这是因为，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惨败后，重新拼凑二十万兵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总前委命令：各部与敌脱离接触，准备反击。

我被任命为九师参谋长。黄公略军长派一匹快马接我回师，率领部队向东固地区集结。同时，第一期教导队结业。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在“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大追杀中，多次遇到我的学员，他们说：

“参谋长！一切都用上了！”

我当然感到欣慰。

“飞将军自重霄人”

一九三一年五月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敌我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

蒋介石从其第一次“围剿”惨败，就开始了第二轮叫器，并且使用了“公祭”张辉瓒之类的手法，为他的部下打气。但是他至此仍未把我军放在眼里，仍然大言不惭地宣称“三个月内剿灭共匪”。他的拿手好戏仍然是增兵添将，人海战术。

二月，蒋介石的第一号大将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调集二十万大军“围剿”红军。鉴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他们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我总前委也在积极地决定战略方针。从四月下旬，就下令各部与敌人脱离接触，实施退却集中，并开始了政治动员，在我由教导队回到师部时，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军事准备会议，在方面军的参谋会议上，我知道了各师都利用战斗间隙展开了练兵运动，许多单位都办了教导队。在总部，我军第一部无线电台已经开始使用。有线电话已经可以通到师部，我军指挥机能已大大加强。

除了部队的准备外，我们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联合作战会议。当时，全区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十个游击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起草了关于游击战的通令，规定了十项任务。

在各种会议或各级机关里，经常出现一些颇有气派的人物。徐彦刚师长告诉我，那是“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头不小哩。听说为了是不是打第二次反“围剿”的问题，我们黄公略军长还与驻在三军的那位“代表”大吵了一通。后来在总前委扩大会上，还是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坚决打！

五月一日，我就把作战地图挂出来了，每天按敌情通报及时注记。那时搞到一张详细的作战地图很困难，缴获敌人的地图，都上交了，到我们师这一级，数量很少，所以经常应用的只是自己仿制的略图。

我们集结于东固地区。从地图上看，敌人可真是大兵压境，从西南到东北，一片黑鸦鸦的箭头，形成了长达七、八百里的“新月形”包围圈。而我们则正处于这个包围圈的正中，我们红三军的任务是向兴国以南监视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

为了把敌人从“步步为营”的堡垒里调动出来，部队处于隐蔽待机的状态中。一天下午，突然从高兴圩方向，传来了枪声，部队立刻紧张起来，各团开始轻装，准备迎击敌人。我一面通知特务连向南警戒，一面向师长政委报告。首长们决定，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部队一定不要露面。当晚，赤卫

队交来一个白军俘虏，从他口中得知，下午的枪声是兴国之敌小股部队出来抢东西，被我地方武装打回去了。

然而，久久地等待，使部队生活发生了困难。菜开始买不到了，接着，连蜡烛之类的办公用品也发生了短缺。尤其是长期“和衣而卧”，大家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这些可恶的寄生虫；越是需要安静潜伏纹丝不动的时候，它们越是咬得你躁动不安。

尽管如此，指战员们还是充满信心。因为大家知道：听毛总政委的安排没错，多等几天也没关系，没有菜吃，就上山挖笋尖，下田捉泥鳅摸田螺。当时满山遍野的刺莓也熟了。我们就尽量地吃刺莓，又解饿又解渴。

反击的一天终于等到了。我们师的反击，和一条崎岖的小路有着密切关系。我永远忘不掉那条小路。

大倍军用地图上也没有这条路，我们使用的略图上当然更没有。幸好我在龙冈大捷时，出于当参谋的癖好，从敌十八师的图囊里缴到一批地图。民国年间测绘的地图，谬误百出，重点地区我们都进行了现地侦察，重新做了注记。

我们曾经侦察到这条小路。向导说，这是猎人、药师、贩私盐的才肯走的一条秘密通道。它一直延伸到白云山的云层里。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拂晓，我们红三军奉命沿东固通中洞的大路强行军，攻击方向是富田、固陂一线。具体战场在哪里？不知道。作战目标是谁？不知道。我们只知道

在那个方向上是王金钰的敌第五路军五个师。

刘英政委说：“有敌人就有战斗，四军已经上去了，我们得加快。”

师长对我示意：“地图。”

我们就在马上展开那张看了不知多少遍的地图，我在心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用手指点着一块地方，我们现在正通过这里，前方有三个分叉，我们选择了通往中间的一条道路，因为，不久前，我们在途中遇到过朱总司令，他告诉我们：目的地是中洞。

右翼已有枪声，师长下令：“跑步！”

几个去军部联络的通信员陆续报告：“照原路线行进！”“军长半夜就被毛总政委叫去了，至今未回。”

说话间，总部的一个电话通信员迎面跑来，通知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到前面去。”

我们策马狂奔，拐过一个山嘴，一眼就看见了黄公略军长和毛总政委，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拉着一位老信子，那是兴国县的老向导。

我们滚鞍下马。毛泽东同志迎上来，示意免去礼节，并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

黄军长正在地上标地图，我拿图与他一对，正是我们侦察过的那条小路。与大路相比，它取直线切了一个半径，到达中洞南侧的谷地后，才与原定的大路平行。军长说：我们

的打击目标是公秉藩师。这个决定昨天就下达了，只有军团和军的军政首长才知道。“现在，插过去，一鼓聚歼！”

我们激动地齐声回答：是！

向毛泽东同志敬礼时，毛总政委说：“去吧，我上白云山了。”

我命令参谋人员放调整哨，设路标。同时，在地图上重新标记。师长说：“参谋长，你立即写一个命令，要隐蔽前进，不准出一点声响，谁出了差错，逐级负责，提头来见！”

“提头来见”是借用《三国演义》中的说法，也就是“军法从事”的意思。我知道，他这话是说到作到的。

我写好命令，师长政委签发了。那时也没有打字机什么的，连复写纸也没有，就由一位参谋站在路边，口头传达到团、连，那时一个团下辖四个连，没有营。

所有的首长都弃马步行。一听说要打二十八师，大家一下子把眼都瞪圆了。公秉藩这个冤家，当我们在龙冈活捉张辉瓒、击溃谭道源时，就他溜得快，让我们遗憾了半年的时间，特别是我们听说他有一部一百瓦的电台（其他敌军都是十五瓦的），我们早就眼馋了。

我们弯过一座山坡，在树林中披荆斩棘前进，居高临下，一眼就看见敌军了。好家伙，蚂蚁搬家式的，正在成行军队形夺路呢。看来，敌人一点准备没有。我不禁望一望对面的白云山。毛总政委正在那里。半山腰里，一大团白云，好象一座城堡一样，高高地耸立着。

军长传令：七师居中，八、九两师在两翼，成战斗队形散开。

公秉藩师是北方来的杂牌军，士兵们不习惯南方生活。我在侦察中，见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围在一起烤火，不是取暖而是抓疥疮，烤脚气，捉虱子。每个兵身上除了米袋之外，还带着许多面粉，那是从老乡家抢来的，一宿营下来，就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自己做面食吃。

敌后卫已经离开中洞，整整 1 个师都在我们的包围之中。

“打！”

随着军长一声令下，军部的号目（号兵班长）领着十几个司号员，把冲锋号吹得震天响，部队跃出潜伏位置，居高临下压过去。我们师部干脆随散兵线推进。我冲到排面上一看，只见一杆杆钢枪齐刷刷地伸向前方，就象突然从地上冒出来一片树林似的。枪刺闪着光，枪口喷着火，一下子就伸到敌人鼻子底下，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架起来，就成了我们的俘虏。一个军官一边往地下扔枪一边大惑不解地说：“娘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就是毛主席后来写的著名诗句中所描写的：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第一个冲击波就把敌人打乱了。公秉藩一边组织残兵败将做“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抵抗，一边向南昌发出交战后的第一份电报：

“……陷于共匪重围，速来救援……”

他也知道，等待上司驰援，无异临渴掘井，只好又向他的友邻连续发出紧急呼救信号：

“……SOS……SOS……”

但是，这些都已无济于事了。红军凌厉的攻势，使公秉藩丧失了等待援助的时间。

战斗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到处是一片“捉公秉藩啊！”“缴他的电台呀！”的呼喊，公秉藩只好换上一身士兵服装，在脸上抹一把灰土，连滚带爬地混进俘虏群里。

下午三时，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各团报来战果和消耗，全师仅伤亡十儿人。写完战斗报告，我不禁又望望白云山方向，只见那团堡状高积云已经散去，那山，越发显得挺拔了。

黄公略军长找到我们，喜孜孜地说：“耿飏，把你们特务连借给我。”

“是！军长，干什么用？”

“给毛总政委送电台！一个无线电队，一套电台设备，完

好无损!”

我们高兴极了。我对身边的作战参谋说：“去！把特务连带上，你亲自负责，一定要看管好！”

军长余兴未尽，感慨地说：“有人说我们‘钻牛角’，现在这‘牛角’钻通了！”

毛泽东同志也和朱德同志一起从白云山上下来了。毛泽东同志边走边说，他一早上白云山的时候，山上有一片白云，现在没有了。毛总政委临时让我们红三军改走小路，当时来不及通知朱老总，就在半路的一个小镇上留了个纸条。这使我们再次体会到两位领袖之间亲密无间的协作和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果断决策的雄才大智。

我们的徐师长在俘虏群里、死尸堆里，反复地寻找敌酋公秉藩。他多想亲手捉住这个老对手啊！但是在几千俘虏中，公秉藩终于混过去了，他是怕落张辉瓒的下场。这老滑头领了三块遣散费，跑掉了，真便宜了他。

第二天我们乘胜猛攻水南，王金钰带领敌四十七师的残部，向白沙逃窜。这使水南守敌一个团更加惊慌失措，没怎么打就举了白旗。逃到白沙的四十七师，被我们分割包围，一口吃掉。连同郭华宗的四十三师一部，也成了他的“陪葬品”。残敌逃回永丰，电台里一片“SOS！”的呼救声，郝梦麟急率五十四师赶来合兵。我军按毛泽东同志的计划，一路横扫过去，在中村再歼高树勋部一个旅。至此，敌第五路军已经成为覆巢，各部纷纷向北逃窜，被逐出苏区。

尔后，我们离开赣江，大踏步地反攻，先取广昌，击溃三个师，把敌第三路军打成麻婆豆腐。几天前蒋介石吹嘘的“七百里连营”新月形“围剿”，变成一堆堆破碎的乌龟壳。

五月三十日，我们打到福建的建宁，在碧绿的闽西山区饮马洗尘。至此，蒋介石二十万大军的“围剿”，连同他“三个月剿灭共匪”的梦呓，彻底破产。这位“总司令”跑到南昌，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大骂属下无能，乃至痛哭失声。其实，他们之间的责任，谁也说不清。

回想三个月前，“二十万军重入赣”时，局势何等紧张！就连我们内部，也有人吓破了胆呢。据传说是王明从上海派来的“四中全会代表团”，一再强调“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要我们跑到四川去重新建立苏区。然而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总前委，面对“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局势岿然不动，耐心等待，终于使这紧张局势烟消云散。

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战场，十五天厮杀，五战五胜，歼敌三万，缴获如山。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与后方留守处都用上了电台，部队指战员都用上了崭新的武器，还有了山炮和迫击炮，为第三次反“围剿”奠定了基础。毛主席后来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写出了当时情景：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部队休整，我和徐彦刚师长尽情地在建宁山上吃那些熟透了的刺莓。我们在战场上发了不少“洋财”——一大堆军事书藉和新版的军用地图。

架起胜利的桥梁

一九三一年是蒋介石频频向红军发动“围剿”的一年。敌人第二次“围剿”五月底惨败后，紧接着，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大军，还从英国、日本、法国等请了军事顾问，以陈诚、罗卓英、蒋鼎文、卫立煌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何应钦为前敌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向我中央根据地压来。

这时，我军积极防御、在运动中歼敌的战略战术，经过两次反“围剿”的锻炼，已经日臻成熟。第二次反“围剿”后，徐彦刚师长就带领我们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战术技术训练。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胜利在脚”、“会走路就能胜利”的口号，我们把提高部队行军能力当做重要技术来练。江西一带，河流纵横，徐彦刚师长就让我带领特务连练习在河流上架桥，以便在未来的战斗中，用一座座桥梁把进军路线连接起来，

提高通行能力。

那时架桥没有工程机械，完全靠手工操作，也就是捆扎、连接、固定等几道环节。材料一般是毛竹、树木、门板。但是具体实施起来，问题就多了。徐师长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交给我一本《工程学》，让我读几遍，照着做，还说：“多实验几遍就行了。”

我虽然读过几年私塾和工人夜校，可是读这本《工程学》还是到处碰上拦路虎，特别是那些外文的计算公式，简直比“天书”还难懂。徐师长就耐心地教给我。几天之后，我明白了个大概，再边琢磨边教给战士。当时天气炎热，对于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的战士来说，这些知识就更难懂了。一堂课下来，大家汗流浹背，还是弄不明白。我说，干脆，到野外“比着葫芦画瓢”去。边干边学，架起几座桥来，本领就学成了。

第一座桥我们完全按书本上一道例题提供的的数据，寻找了一段河床开始施工。首先要标定桥轴线，这需要制式仪器。但是那时候红军哪里有仪器啊？于是我们用子弹箱拚起来做标图板，用木匠直尺当三角尺，用腊条杆涂上颜色代替标志杆，指北针是现成的。为了使数据准确，我们在计算了河的宽度后，还专门挑了几个会游水的战士，拉一根绳子测量一下，以验证我们的计算。第一座桥是有桩的便桥，以后我们又学会了架浮桥。架浮桥的关键在于确定流速和锚驻桥身。经过个把月的训练，那本《工程学》被我翻烂了，大

家的架桥技术也提高了。于是开展架桥、拆桥的反复演习。百十米的小河，我们只要个把小时就能架起一座可供部队通行的浮桥。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山坳里的小河上练习架桥，那里地势偏僻，没有人烟。我们刚把桥架好，同志们都钻到灌木丛中乘凉，忽然从对面山路上走来一队挑夫，还有几个国民党兵押送。挑子都沉沉甸甸的，压得扁担“吱吱”响。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走到我们刚架起的桥附近时，犹犹豫豫地停下来，大概以为走错了路。因为一个小时前这里还仅是一条光秃秃的湍急的河流，怎么突然间冒出一座桥来呢？我们见他们人数不多，武器也简单，便抓紧时机，从桥上向对岸冲去。七、八个挑夫扔了担子就跑。几个国民党兵也吓蒙了，枪都来不及从背上取下来，仓皇四散逃去。我们在缴获的挑子里，发现一张礼单。原来，这些挑子里全是光洋，是一伙土豪劣绅送给国民党军队的“犒劳”。我们照数收下，只是没法给这些老爷们打收条。

学会架桥，对我们第三次反“围剿”十分有利。因为那次反“围剿”中我们用的是“拖牛”战术，以强行军、急行军和敌人周旋，仅用三万人的兵力，硬是把蒋介石三十万大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敌人的锋芒之间闪电式地穿插、迂回，就大大增强了这种“拖牛”战术的威力。如果说得更形象化些，红军以其铁脚板在河流上、山岭间架起了通向胜利的桥梁。

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中一反其在第二次“围剿”的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而采取了“长驱直入”的战略。当时，红军主力分散在闽西。蒋介石企图以三路大军齐头并进，把红军主力压到赣江边上，进行决战。敌军乘我中央苏区兵力空虚，将我苏区县城尽行抢占。毛泽东同志为我军规定了“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决定首先捣其后路。红军主力从东向西由兴国经万安，在富田打开一个缺口，再从西向东，横扫敌军的后方联络线。当我军正向富田行进时，被敌发现，于是敌从永丰县南部良村，向黄陂方向突进。等敌人急忙调整部署，转过头来寻找我们时，我们已经进入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了。

时值七月，烈日炎炎。蒋介石的三十万大军推磨似地围着苏区转了一圈，一路丢下伤兵、病号，象头笨牛一样，累得精疲力竭。而我们，已经完成千里行军，到达兴国集结。那真是象久别的亲人回到老家一样。且不说赤卫队站岗放哨，担架队整装待发，妇女们洗衣送饭，就是那些“儿童团”们，也搬出了慰问红军的“绝招”——打扇。部队一进村头，一大群儿童就个个拿着芭蕉扇围上来，为红军扇凉。徐徐凉风，把连日的溽热疲劳一扫而光。

千里回师，我们不但取得了主动，而且在调动敌人中摸清了其兵力部署。等我们在兴国舒舒服服地休整了近半个月之后，敌人才重新部署了兵力，逼近我军当面。

七月三十一日，我军开始反击。部队一律轻装，一切能发声、反光的物品都进行了无声无光处理，连白马都涂成了

黑的。为了不走漏一点消息，行军中遇到岔路，一律不设路标，由标兵代替。三万人马在夜色掩护下，衔枚疾走，象一条巨龙一样，无声无息地“游”出了敌人大军中间只有十五里的一个空隙，隐蔽在高兴圩以北蓬塘、良村的丛林里。

第一仗，我军消灭敌人一个师。这是上官云相的部队，他们全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酷暑炎热，更不习惯山地作战和夜间作战，加上被我们“拖”了一个多月，战斗力损失近三分之一，因此被我们集中兵力包了饺子。敌人来增援的一个师也中了伏击，仓皇逃遁。我军乘胜逼到黄陂，将毛炳文第八师消灭。

两仗下来，敌先头部队十九路军急忙撤退。他们已经扑进高兴圩，发觉红军已经转移后，令先头独立第九旅经老营盘向富田突击，不料陷入我军重围。战斗打响后，敌我胶着成一团，十几架敌机在战场上空乱飞，因我们与敌军短兵相接，找不到地方“下蛋”，只得胡乱将炸弹扔在附近的山沟里。等我们冲进敌指挥部，处理俘虏和缴获时，这些飞机又来了，它们竟对着俘虏群扫射，炸得俘虏血肉横飞。俘虏们大骂蒋介石残无人道，我们立即组织红色救护人员抢救。感动得流着泪的俘虏哭喊“还是红军好哇”，纷纷投入红军行列。

敌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敌军的指挥官们都连连叫苦，说“剿匪无异无期徒刑”，灰溜溜地率领残兵败将退出了苏区。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这次又给我们送来大批新式武器。我们装备了大炮、机枪，师里的指挥员还有了“勃朗宁”。

但是令我痛心的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第二天，部队遭敌空袭；我们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指挥部队隐蔽时，自己却中弹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

黄公略同志是我最熟悉的红军将领之一。红三军奔袭吉安时，我正在九师当侦察参谋。那时我刚刚参加红军，徐彦刚师长带我到军部去汇报敌情，把我介绍给黄公略军长。当他得知我是水口山的工人时，十分高兴，说：“红军就缺这样的骨干哩，又识得字，还是党员，还懂得武术，样样都用得上。”又问我是怎么到红军来的，我回答是浏醴县委介绍来的。他连说：“好，好。”接着，他又想起什么似的哈哈大笑起来，问道：“他们没捆你吧？”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解释说：“当初我也是带着介绍信找组织，可彭军长他们硬把我当奸细捆了，把一块破布塞住嘴，话都没得办法讲，只好拚命踢脚后跟，还好，他们最后从我的皮鞋后跟里撬出了广东省委的证明，才没把我坠上石头扔到塘里。”

之后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小布教导队结业时，黄军长还派一匹快马接我回部队。在我任参谋长后，与他接触就更多了。每有战斗，他都亲自组织侦察，制定计划。在阵前，他下令怎样布置兵力，如何运用战术，在我听来，就象一

堂堂军事课那样。他特别重视对敌情的掌握，强调战前侦察。自从在黄公略同志领导下打过三次反“围剿”后，我也养成了侦察、分析敌情的好习惯，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是这样。

黄公略同志名黄石，公略是他的字。他虽出身豪门，但母亲是由丫环升为妾的，因此从小就受够了白眼和羞辱。成年后靠教书糊口，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湖南讲武堂，又进黄埔深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他与彭德怀同志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六军时，他任军长，当时人们习惯把中央红军称为“朱、毛、彭、黄”的部队。国民党悬赏十万光洋要他的首级，并把他的生身母亲赶出家门，使其流离失所。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敌人又派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来作说客，诱以高官厚禄，妄图策动彭、黄“反水”。黄公略同志毫不为之动心，让彭德怀同志杀掉说客，以明心志。

黄公略同志牺牲后，红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人人都痛哭失声。直到今天，当我读到毛主席那“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时，他的音容笑貌还浮现在眼前。他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创建的业绩，将永远值得我们追怀。

黄公略军长牺牲后，红三军改由徐彦刚任军长（兼参谋长），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开始了红军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东征漳州。

东征漳州

东征漳州，是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主动出击、奇兵致胜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

一九三二年三月，彭老总从赣州撤兵。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尚未开始，前方无战事。我们红三军当时划归红五军团领导，正驻在赣南信丰一带休整。

原师长徐彦刚调任红三军军长后，我们九师暂缺师长。政委朱良才率领大家帮老乡建立政权，训练武装，开展生产。我带一部分战斗骨干“以战代训”，在苏区“扫白点”——打地主武装的“土围子”。

三月中旬，临时中央继续执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定，命令红军沿赣江北上，“赤化”沿岸，夺取南昌、九江等大城市。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左”倾行为，认为红军应以主力向赣东北、浙西、闽北、苏南等地区发展，因为那里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薄弱，易于取得胜利。当他这个意见被否定后，又提出经闽西向闽南进攻，直取龙岩、漳州的方案。这个方案受到了朱德、林彪、聂荣臻和大多数红军领导同志的赞同，并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支持。

三月十八日，由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龙岩进发。彭德怀同志亦率西路军，朝湘赣边发展。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刻准备出发。作为师参谋长，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拢部队，组织行军准备，与参谋们一起在地图上用红色箭头标出合适的行军路线。

四月二日，我们从信丰，一军团从长汀向龙岩迤迤进军。我们从罗塘附近跨入福建，经武平、高梧、上杭、白砂，挺进龙岩。敌情在沿途的侦察和上级通报中逐渐明确。这一带本是我闽西苏区，一九三〇年底被敌四十九师占领。守敌四十九师是由一些杂牌军和顽匪“升格”的，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资助，人民群众已饱受他们的蹂躏之苦。原师长叫张毅，现任师长叫张贞。民谣说：张毅改张贞，租税加二升。可见他们的劣迹。听说要歼该敌，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妇孺老幼，箪食壶浆，迎送红军，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战斗动员。

四月十四日，我们赶到龙岩附近的大池，获悉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和红四军已经打下了龙岩，歼敌四十九师一四五旅的主力二九一团和一个独立团。

龙岩是漳州大门。龙岩一破，下一步的文章就更有声色。一、五军团会合后，五军团兵分两部：军团部率十三军驻守龙岩，监视大埔方向的广东敌军，并与远方位布防的红十二军一起，保障从苏区到漳州前线的后勤补给线。红三军由军长徐彦刚同志率领，与一军团一起参加进攻作战。

红色箭头从龙岩、适中、和溪、水潮……继续向东南延伸。毛泽东同志与我们在一起行军。他头带遮凉的盔帽，骑

着一匹马，瘦削的脸上露着微笑，不时地下马与战士们共同步行。当时，中央曾先后撤消过一方面军和一军团的建制，毛泽东同志的总政委和总书记职务实际上也撤消了。在恢复一军团建制时，改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并没有从指战员心中“撤消”。现在他仍然亲率大军东征，使广大指战员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四月十六日，当部队到达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时，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组织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到敌人前沿去侦察地形，确定了进攻部署。

据侦察，敌四十九师在龙岩失守后，漳州守敌惊恐万状。我们的驻地龙山圩老乡反映，被一军团击溃的敌一四五旅旅长杨逢年，败退后曾妄图以龙山圩为阵地进行抵抗，后闻我一、五军团会合，攻势凌厉，遂全部向漳州附近的天宝山收缩。龙山圩的地主也供称，杨逢年对他们哀嚎说：“躲躲吧，顶是顶不住了。”

天宝山位于漳州西北二十公里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去处。这座大山东临九龙江的北溪，西接永丰溪（东溪）和西溪，重峦叠障，绵亘数十里，恰似一座硕大无比的石屏风，遮蔽着漳州。天宝山是四十九师经营多年的防卫阵地，遍置钢筋水泥永备工事，加上榕子岭、峰苍岭、十二岭等制高点，对敌军防守十分有利。张贞本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他亲临天宝镇茶铺炮兵阵地坐镇指挥。再加上该师全副日式装备，三八式步枪、轻重机枪、木柄手榴弹，士兵配有钢

盔、雨衣、胶鞋，在当时的装备中，可谓屈指可数。因此，他叫嚣，天宝山防线将使“共匪无法逾越”。

遗憾的是他的这种预言同国民党其他头目们经常预言的那样，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杨逢年的败逃，把失败情绪“加强”给了天宝山防线。我军的一次火力侦察，就使全线“炸窝”，军官竟换便衣，士兵呼救不迭。

针对敌人的部署，毛泽东同志决定我军兵分两路：左路为主攻方向，由红四军、红三军进攻敌人右翼；右路为助攻方向，由红十五军进攻敌人左翼。突破天宝山之后，合力直捣漳州。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布置，我与朱良才政委召开了九师作战会议，向各团区分了作战任务，作战地图上的红色箭头似无数利箭，射向天宝山一线。

由于天降大雨，我们按计划到达九龙江的支流永丰溪（即东溪）后，正值河水上涨。据向导介绍，这条河本来不大，我们又在上游，平时只有百十米宽，水浅时完全可以徒涉。但是等我们临江夜渡时，永丰溪一夜之间到了盛水期，河床满溢，河面拓宽，急流泛着泡沫奔腾而下，根本无法徒涉。

找船？没有。架桥？需要时间。扎筏？附近只有一些荔枝树、香蕉林和甘蔗田，而进攻时间，已经近在眉睫。

我与政委决定：立即轻装，泅渡。

全师大部分是南方人，基本上都会游泳。唯独我是个“旱鸭子”。这是因为我从小长于矿山，再加上母亲因我那

“五行缺火”更怕水淹的顾虑，所以错过了学游泳的机会。因此，别人用块木板就可泅渡，我却没有把握。

幸好，附近镇子上有个“洋车铺”。漳州是个侨乡，当时平板车、自行车已经很多了，修车铺买卖兴隆，挂了个旧车轮做幌子。我向老板买下了旧车轮里的内胎。虽然有几个补丁，充上气倒也不漏。我那时很瘦，有这条车胎，再找块木板，蛮可以对付。

十六日夜，全师分数批交替掩护，开始武装泅渡。我将“救生圈”套在腋下，一手扶着木板，一手举着手枪，奋力蹬水向对岸游去。正当我们师部人员到达河中心的时候，对岸的敌人发觉了我军企图，慌忙向我们射击。但由于天黑，距离又远，子弹都盲目地落进水里。我们已经游到对岸的尖兵立即奋起还击，一面大喊：“冲啊！”“抓活的！”一面向敌人方向扑去。敌人是小股沿河警戒人员，等我尖兵冲到，早就逃得没影了。

下游保林桥方向已经传来了枪声。我知道，这是佯攻牵制，以防敌人逃窜。全师渡河后，我与朱政委组织部队沿东岸向敌人逼进，一路上顺便进行了些零星战斗，以扫清我们待机地域的外围。

我们在十七日进入天宝山下的南坪展开地域，这时四军也从下游进入南坪。我刚把行军报告写好，毛泽东同志带总部人员也到了。十八日大雨如注，水雾蒙蒙，总部决定推迟一天进攻。这个推迟后来被老百姓蒙上一层传奇色彩。他

们说：红军有神人指点，在张贞四十九岁的时候，四月十九日打四十九师，占领漳州四十九天，焉有不胜之理？合该张贞气数尽啦！

十九日雨停。天拂晓，天宝山总攻开始。我军先向峰苍岭楔入，取得支撑点，全线展开、扩大战果，一举突破了敌天宝山防线。

我带师部通讯排，与部队一齐推进。敌人已经失去招架之力，失去建制的溃兵乱跑乱钻。我们只要大喊一声“不许动”，就有成片的敌人举手投降。可笑的是我们进展太快，收容队根本无法保障。由于缴得的武器太多，以至无法背得动。于是，我们将枪栓卸下，交给俘虏一根空枪，再喊一声“跟我走”，他们便紧紧跟在后边。每个战士后边都跟了一大群。

事后朱政委说：“哎呀，当时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你被敌人反包围了呢。”

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在左权军长指挥下，突破了敌榕子岭防线，攻占了南靖县城。

接着，红三、四、十五军会攻天宝山南麓的天宝镇。在我军四面包围、猛烈进攻下，敌人乱作一团。我军只用了几十分钟，就攻下天宝镇，全歼守敌。

我军留下红十五军驻守南靖和天宝镇，红三军和红四军马不停蹄，乘胜向漳州进击。我们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红四军在西边，沿九龙江向南，经茶铺直迫漳州西门；红三

军在东边，经石亭直奔漳州北门。两路大军，就像两支利箭，直射敌人心脏。

漳州虽是闽南重镇，但是没有城墙，背靠九龙江，前面是一片平地，无险可守，加上敌军主力已垮，要想靠几支直属队抵抗红军铁流，无异螳臂挡车。被红军打得胆颤心惊的张贞，看到大势已去，守也守不住，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是逃命要紧。这个平日像恶煞神似的军阀，这时溜得比谁都快，仓皇南逃到闽粤边界的诏安去了。

二十日晨，我们从北门（实际上并没有城门）进入漳州，残敌已作鸟兽散。我们与西门进城的四军会合。至此，漳州完全被我军占领。

漳州战役中，张贞的两个旅、一个独立团及部分土劣武装被歼。我军缴获枪炮弹药无数，还缴获了电讯器材一部和一座设备完全的小型兵工厂。

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缴获了两架飞机。这是两架单螺旋桨、双层帆布翼的小飞机。其中一架曾飞到龙岩侦察，被我军击坏。另一架完好无损。从军团首长到连队士兵，成群结队地涌往机场，去看看“它为什么会飞”。漳州工人还为部队做了飞行表演，当然不过是飞飞起落而已。后来在五一大游行时，我军用飞机撒传单，万头攒集，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奇观。

二十一日，在东路军总部驻地——芝山南麓的红楼，举行了各军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了第二次行动计划。第

二天,毛泽东同志又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及第二次行动》的报告,东路军投入扩大影响的工作。

我们红三军进驻漳浦。九师驻旧镇、盘陀、霞美、东山岛等地。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打土豪、分土地、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将地主劣绅的浮财分给群众和补充红军的供应。在红军的影响下,建立了工会、农会,城市和农村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我们将一部分吸收入伍,一部分组成赤卫队保卫苏区。

红军是第一次进侨乡。在开展工作中,开始有的同志划不清界限,把一般的侨属、侨眷误认为是土豪劣绅,因为他们住的是洋房,穿的是绸缎和毛料西装。为此,我们组织学习、贯彻《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获得了开明士绅及商界人士的好评,他们交口称赞红军是文明之师,捐粮捐款,赠送食盐、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

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几个战士在烧东西。上去一看,凭着毛泽覃同志在水口山教我的一点英文知识,发现这是美钞。当即制止了战士焚烧,命令全部上缴东路军总部。

漳州地处闽南,群众语言难懂。我们就号召大家学习闽南话。有一次,我与一位老大爷谈话,他说:“我们都是‘干苦郎’。”“干苦郎”是什么?我听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就是“艰苦人”亦即“穷苦人”的意思。我们学会了许多当地话,有了共同语言,军民关系更加如鱼得水。

初到漳州时,有些民风民俗我们也不懂,为此还闹了笑

话。一天，二十六团王团长约我去洗澡。当地有好几个温泉，比上澡堂还舒服。我觉得连续行军作战，确实该打扫一下卫生了，就欣然同往。谁知我们找到一处温泉，刚刚下去，从附近村子里嘻嘻哈哈走来一群妇女，看样子也是来洗澡的。我们不知所措，便在水里扑腾拍水，示意我们在此。但那些妇女似乎没有看见，来到水边，脱了衣服就下水。可把我和王团长吓坏了，我们连滚带爬上了岸，抱起衣服就跑，十分狼狈。后来我听杨成武同志说，这一带的民风比较开放，不像内地农村妇女羞于在男子面前洗澡。知道了这个风俗后，我们便告诉战士，不要随便出去洗澡。

我们在漳州的芝山红楼还照了一次相，几千红军官兵挤在一张底片上，根本无法分辨面目。这张照片被当做珍贵文物保存了下来。

我们在漳州驻扎了四十九天，完成了预定任务，于六月八日开始有计划地撤离，回师中央苏区。经过扩红，红军在那里留下一个红三团，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水口之战的教训

就在我们东路军节节胜利，攻占漳州的时候，彭老总率领的西路军却遇到重重困难。一九三二年五月中旬，蒋介石以六个师的重兵，由何应钦督战，对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的红三军团实施围攻。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陈济

棠以两个师的兵力，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有一个师窃据信丰，向于都窥进。我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巩固中央苏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向北发展，军委决定，向赣南集结兵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六月二日，我们作为东路军的先头部队，向西进发。此时酷暑溽热，行军十分吃力，部队中病号也多起来。但是一听说要去保卫苏区，大家情绪很高。

毛泽东同志仍随军行动。这时他已没有军内的职务了。前方总部已经改组，朱德同志仍为总司令，周恩来同志为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参谋长。同时，东路军番号取消，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同志兼司令。王稼祥同志兼政治部主任。我们九师也派来了新师长彭熊同志。

开进途中，我们最头疼的就是那些地主武装的“土围子”。他们一般以几十至几百人聚集，凭据坚固的工事，袭击和阻滞部队的行动。彭熊师长到职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带领部分精干的力量，沿途打这些“土围子”。这些“土围子”又刁又凶，人多了用不上，人少了打不动。我还是运用在浏醴游击队的老办法，使用“摸哨、夺门、突进”的夜袭战术，将这些“白点”一一扫除。六月十三日，一军团四军军长王良同志在侦察一个“土围子”的时候，被冷枪打中，不幸牺牲。消息传来，我们十分痛惜。四军改由周子昆同志挂印。

六月底，我们到达芥子圩。探知赣州、南康、大庾（即大余）、上犹、扬眉寺、信丰等地，敌军有十二个团的兵力，在粤

北南雄一带有六个团。据抓到的“舌头”供认，这些兵力统归敌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另外有蒋介石的五个师，何键的二个师，分别在赣州以北到湘南一线伺机进犯。

我带几个参谋，化装成商人到各地侦察，得到了不少情报。总部叫我们向南雄出击，以一、五军团和独立三师的全部力量，在敌人屁股后面造成威胁，迫使进入赣南的敌人回援，再由三军团在运动中追杀。

天气炎热，部队从漳州撤回后，一直没有休整，天天行军，再加上病号的拖累，十分疲劳。接到打击余汉谋的命令后，我们立即组织急行军，全体有马的指挥员，都把马让给了病号，下到连排帮战士扛枪行军。六月底，我们在信丰以南渡过洮江，占据乌径地区。

这时，三军团在北面的池江，与粤敌四个团遭遇。该敌遭打击后，缩回大余。方面军即令一军团插过去，夺取梅关要隘，将其一个团击溃，以图与三军团围歼由大余南逃的敌人。这个部署是正确的，但是，尔后在三军团围攻大余时，该敌凭险顽抗，并没有南窜就范。

我们五军团仍在南线寻机。七月七日，敌张枚新师到达乌径，军委即电令我们出击，董振堂总指挥即令我们向左翼包抄，由十三军正面攻击。我们立即行动，连夜向左翼挺进。当时部队连续几日奔袭，人困马乏。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摔个跟头爬起来再走。次日晨，我们到达展开地域，尚未部署，又接到命令：敌已于昨夜十二时向水口圩方向逃

窜，令我们改变任务，向水口追击；十三军则取捷径插到敌人前面，截断其退路。

我们折过去追击。下午一时，在藕过村东北端的树林里，发现了敌人的两个团。报告未完，即听藕过村西面，枪炮声大作。接着，侦察员又来报告，发现十三军与敌先头部队已经接火，隔河对射，敌人正在向村里收缩。

三时，肖劲光政委与徐彦刚军长来到我们指挥所，下令三军在十三军左翼展开突击。

该日战报纷飞。首先得知，陈济棠令其独三师和独五师增援南雄，并以一部向小梅关我一军团、大余北我三军团中间的湏水出击，以接应欲向南雄突击的四个团。继而各部连续发出交火报告。在南线，三军从敌侧后发起攻击，张枚新不敢恋战，向湏水对岸溃去。我们追至水口圩以西约五里的地方，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军团部指示，三军与十三军立即靠拢，后撤宿营，待明晨一并总攻。

方面军命令，一、三两个军团和十三军，统一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五军团与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敌第四师。

九日晨，全线打响。余汉谋急令第四师固守待援，令独三师和独二旅驰援水口圩。当时，我们三军已经包围了敌人两个团，并完成了分割。但中午时分，敌人援兵赶到，战场形势立刻起了变化。我们九师的阵地湏水南岸的高地上，三个团已全部投入战斗，阵地多次得而复失，而敌人越打越

多。在早晨打响时，我们九师包围了一股敌人，据情报说是三个连。这无异“雷公打豆腐”，不必费多大力气。接着，二十七团报告攻击得手，彭熊师长即前出，令二十六团向左翼展开，他亲率预备队二十五团在正面出手，我与朱良才政委收拾指挥所，准备跟进。我们边收拾边说，三个团收拾三个连，用不了多长时间。谁知话音未落，彭师长派人下来，说敌人不是三个连，而是三个营，命令我将直属队调上去。我们大吃一惊，急忙按他的命令，将所有人员统统投入，以期尽快解决战斗。

敌人越杀越多。八师的阵地上，战斗尤为激烈。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阵地被敌占领，我们九师的正面，一下子成了焦点，敌人的兵力，迅速增到三个团。师长这时也从火线上下来了，让我赶紧向军部求援。可是军长、政委、参谋长都已投入战斗。军团总指挥董振堂的军衣，已被炮火撕成褴褛，他干脆甩掉军衣，只穿一件白褂，亲与敌人格斗，挥大刀在敌人堆里厮杀。这时我才知道，三军所对付的敌人，其确切兵力是九个团！

这时，我们九师更加吃紧，二十七团团长沙亡了，二十六团团长沙牺牲了，二十五团团长沙殉职、政委重伤。师长彭熊，也被弹片削掉胳膊上一块皮，坐担架撤走了。我也负了伤，子弹打尽，幸有一把马刀护身，才杀回了师部。

朱良才政委抱着一支长枪，把文件电报都揣在身上，身边只有几个通信员了。他说，参谋长你快去组织战斗，代理

团长。我说：应该是兼团长。朱政委也不及分辩，连说：“对，兼团长，马上组织二十七团支撑住，同时让二十六团、二十七团收拢。”

我冒着弹雨冲向火线。这时，陈毅同志领导的独三师、独六师已经赶到，他们一看战场上的危急场面，未等命令就立即杀入重围。这才拚成对峙。

我到战场后，根本无法组织战斗，只找到五、六个战士，领他们冲杀一阵，找到了二十七团阵地。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阵地上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敌我各自鸣金，朱政委命人送来固守待援的命令。

可是我身边只有五、六个人。这样怎么“固守”，又怎么发起反攻？我便叫一个班长去寻找二十七团的人。我写一张纸条，签上我的名字，叫他到各处去喊“二十七团的在此集合”，不久，他就喊回了三十多人。我又派六个人，用同样的办法，先后找回了七、八十人。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任命了连长，加固了工事，就地露营。

那天晚上我们是弹尽粮绝。小河里的水都是红的，一股血腥气。战士们只好忍着饥渴，互相挨靠着睡下。第二天早晨互相推醒投入战斗时，有的战士发现自己竟和战友的尸体睡在一起。

我一夜没睡。因为战士们手里很多是空枪，便抽调一些人，集中枪弹，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向敌人散兵线上袭击。那天晚上很黑，我们摸到敌人前线，拣最弱处突然袭击，然后

就拣他们的弹药。敌人赶紧从附近增援，我们佯作撤离。敌人也不敢追得太远。便骂骂咧咧地返回，我们又乘机拦截其尾巴，连人带枪一起缴回。这样出击了几次，搞到不少弹药，还抓了十几名俘虏，连夜做工作，补入连队。

十九日凌晨，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毛主席直接到五军团指挥所听取战斗汇报。当即决定：一军团使用于三军方面，十二军使用于十三军方面，拂晓出击，号声为令，发动进攻。这时，陈济棠又调八个团增援。但是在我强大攻势下，很快就溃退了。只是因三军团未及时赶到，才让他溜回广东，那次未能全歼该敌雪恨，此憾至今犹存。

水口战役是我经历过的战役中，比较残酷的一次恶仗。这一仗，虽然击溃了陈济棠、余汉谋的二十个团，但是我军的损失也很大。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其原因正如毛主席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未能贯彻我们“以十当一”的战术原则，用优势兵力来对付、歼灭敌人。

水口战役之所以“兵力不集中”，在作战的具体环节上来说，是由于情报一再不准，一再误报军情。首先是一、三军团形成大余、梅关夹击后，大余之敌只是向仁化佯动了一下，便误报该敌向仁化逃跑，造成五军团直插南雄以南，以防南雄之敌南逃的盲目动作，分散了兵力，此一误。当五军团在乌径遇敌后，将其击溃于水口圩，敌人退守。但五军团误报该敌“已向南雄逃逸”，致使方面军撤消了原定由一军

团和十二军增援五军团的部署，造成敌援兵与第四师会合，五军团当面之敌越杀越多的困境，此再误。而由以上环节的波及，一军团与十二军在五军团与敌对峙二、三天后，方始赶到。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基本结束，所以未能截住残敌全歼。在具体战斗中，对当面敌军兵力估计不足，也和情报不准确有关。这些都是水口之战给我们的教训。

然而，此役击溃陈济棠主力二十个团，大伤了他的元气。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躲到广东，不敢再犯，使我们苏区的南大门地区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五军团指战员经受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战斗意志更加坚强。尤其是十三军这支宁都起义过来的部队，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可以信赖的红色劲旅。在连续行军，疾病困扰，天上烈日当头、滴雨未下，地面暑气蒸人、毒虫侵袭的情况下，红军指战员渴饮稻田水，饥食生稻米，在死人堆里度日，无一个逃离部队。

只是，我们九师的彭熊师长，从阵地上撤走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乐安、宜黄战役后，上级调李聚奎同志来任师长。紧接着，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了。

漂亮的歼灭战

第四次反“围剿”是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受王明路线排挤，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

但他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红军中仍然有着深刻影响。朱德和周恩来同志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取得了这次战役的最后胜利。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再一次组织了兵力，以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以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为左路，以余汉谋指挥的粤军为右路，以陈诚指挥的“嫡系”十二个师为中路，共五十万之众，开始了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套用一九三二年进攻我鄂豫皖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办法，以强大兵团分进合击，企图一口一口地“吃”掉我红军主力。二月十二日敌主力由北向南齐头并进。我们则猛攻南丰，以引发敌人寻我主力作战的欲望。当时，我军正在进行整编，目的是减少指挥层次，充实基层战斗力。由于反“围剿”战斗打响，使这一行动拖了一段时间。

我们猛攻南丰三日后，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以及聂荣臻、林彪等高级指挥员，看到敌人以十个师的兵力向南丰驰援，立即指挥部队隐蔽地向广昌以西转移，待机歼敌。

敌人不知虚实，向南丰进军。其中有两个师竟前出到永丰、乐安至宜黄一线，把右侧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钻进了我们设在黄陂地区的包围圈里。

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在磨罗嶂一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

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尤其是一早一晚，十几步外就难辨人影。这给我们的隐蔽行军带来了方便。但道路泥泞、山石光滑，又给行军带来许多困难。在向伏击圈展开时，已是大军云集，道路都不够用了。我便向师长李聚奎同志建议：干脆按地图上的方向，在现地平推，趟出一条路来。他便让我带尖刀连导向。我们披荆斩棘，连开带趟，在荒山上走出一条路来，按时进入伏击地大龙圩周围。

二十七日拂晓，第十师、第十一师埋伏于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七师在蛟湖附近。改编中新任军团参谋长的徐彦刚同志和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便到各处查看部署情况，之后，就到我们指挥所来坐镇。

下午一时，七师首先打响，接火的是敌五十二师。该敌虽然尚未察觉我军意图，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当时已经有了从国外引进的轻机枪，又长期在湘赣一带活动，山地作战能力也比其他敌军强些。打响后，敌人一边抵抗，一边向蛟湖、大龙圩收缩。凑巧的是，七师一开始就抓到一名俘虏，是个连长。他供称：大龙圩有敌师部和一个旅。

徐彦刚和罗瑞卿同志立即向我们面授任务，要我们直插大龙圩，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我知道徐彦刚同志的心思：第一次反“围剿”，张辉瓒让别的单位捉了，第二次反“围剿”，我们捉了敌师长，又让他跑了……他还真有点

“耿耿于怀”哩。

师长让我率二十五团向大龙圩猛插。主力从正面进攻。我们仍然“衔枚疾走”，隐蔽接敌。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淅淅沥沥的毛毛雨又下起来了。二十五团团长突然跃进到我面前，紧张地说：“参谋长，快看。”

透过雨幕，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指挥所。只见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望远镜“高瞻远瞩”呢。从旁边的马匹、护兵、提包拿图的随从来看，这胖子来头不小。二十五团团长说：

“不知是不是敌人的师长。”

我说：“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一定抓活的。你先组织火力压住他再说。”

团长便安排机枪连负责火力压制。我对机枪连长说：“你们三挺机枪封住他，之后就一边打一边冲，火力不要中断，直到抓住为止。注意，不要打死了。”

之后，我们便展开攻击。师长带领的主力也一线展开，向大龙圩猛攻。战士们已经知道那里有敌人的军官，尽管不知是不是敌人师长，还是大喊：“冲啊！抓师长啊！”敌人见势不好，保护着那个军官便撤。可是我们的机枪不分点地猛扫，打了个“梅花瓣”，敌人只好伏在地下，拚命还击。这时，从村子里冲出一股援兵，来抢这个军官。我便带部队兜过去，向村里猛压。

混战中，二十五团机枪连连长追上来报告：“参谋长，那

个军官抓住了，好胖噢！”他做了一个大肚子手势。

“什么官？”

“他说是书记。”

战斗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就派侦察参谋彭明治押送后方。聂政委听说抓到了敌人师长，十分高兴，连说：“好！好！这叫‘擒贼先擒王’呀！”

当时，看押李明的同志，用一张报纸给他做了顶高帽子。李明觉得戴高帽子太丢面子，便要求不戴高帽，换一张写上姓名、头衔的纸条贴在身上。我们同意他的要求，他连连称谢。

战斗中，我最关心的是敌人的辎重。在战前侦察中，我曾发现敌人有大批辎重。伏击开始前，聂政委一直让我们耐心等待，先不要开火。等呀，等呀，直到看到辎重队和一个护卫团进入伏击圈，他才说了一句“等的就是你！”并下令开火。这时，我冲进大龙圩的一条街上，好家伙，车辆一大溜。我们一个冲锋，押运之敌作鸟兽散，有的挑夫、车夫是被抓来的民工，一见红军上来了，大喊：“同志，这是一箱望远镜。”还有的说：“快，这是轻机关枪，往哪里送？”后来，这些战利品搬了四五天才搬完。

这一仗，有不少敌军被打得失去了建制后，溃兵向附近的山林流窜。由于连续几天的大雾小雨，高山深谷里一片混沌，树林中更是昏暗无光，不辨方向，他们等于走入“迷魂阵”，三转两转，又回到我们面前，只得缴械投降。

我们师部炊事班三个炊事员到前沿送饭，途中遇到一群五十二师的散兵。由于雾大视度不良，双方走到对面十多米才互相发现。这群敌人十分狼狈，浑身滚满了泥水。炊事员们立即放下挑子，隐蔽在树后，大喝一声：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

那些家伙在树林里迷失方向，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这声音，以为陷入我军重围，触电似地把枪扔在地上，举手投降。

我们的炊事员便命令他们站队，按口令走出二十米，然后拣起他们的枪，把俘虏押回师部。

三个“伙夫”，押回十五名俘虏。

就在我们打五十二师时，敌五十九师在北线也遭到了同样命运。这些敌人犯了一个通病：都没有侧翼警戒，大概以为我军还在信丰吧。敌人被五军团打得晕头转向，一面呼救，一面突围，终被歼灭于摩罗嶂东部山谷中。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化妆成士兵，正企图蒙混过关。但是他脸上有一个显著特点：麻子。于是全体红军到处找“麻子”。电台的同志们终于利用这个特征认出了陈时骥，他乖乖地做了俘虏。以后他加入了红军。长征途中，我在四团指挥乌江架桥时，他还出过不少力，但后来又开小差了。

陈诚一听两个师被歼，两个师长被捉，急令调整部署。改三路“分进合击”为一路“中间突破”，以前后相衔，重迭梯次，互相掩护的办法，继续向广昌进军。

但是敌人的部队在行军方面显出高度无能。三月二十一日，敌前纵已经进至新丰、甘竹一带，后面的部队却刚到黄陂圩，相距三日行程。方面军首长一见时机已到，即以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为右翼，以聂、林统一指挥红一、三军团和二十一军为左翼，将敌前纵分割包围于草台岗、东坡一线。

我们奉命在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到达黄柏岭。可是，在途中遇上了麻烦，所有的道路都被丫丫杈杈的树木封住了。原来，这是地方赤卫队为阻滞敌人而设的障碍。这些树木都是从山上砍下来，推到路上的，层层迭迭，互相压住，很难拖开。等我们赶到指定地点时，已是上午十点了。聂政委早已神色严峻地等在那里。我们几个师部领导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挨批。这时，十、十一两师已经展开攻击，聂政委狠狠地说了声：“打完再说！”便让林彪下达命令。

黄柏岭是战地制高点，虽然只有五、六百米高，但山坡陡峭，十师、十一师几次进攻，均未得手。一军团三个师长都负了伤。彭绍辉同志从我们面前抬下去时，胳膊已经打残了。

林彪是总指挥，在前沿也差点被飞机炸中，这时急得暴跳如雷。在阵地上他一再说：“一定拿下来，一定拿下来。”下午三点，他叫我和李聚奎同去，他展开一张地图说：“这样拖下去不行。现在用着你们了，你们从这个山垭口突过去。给你们两个小时，多了不给。怎么样？”

当时，在现地就可以看到那个山垭口。但是强攻不是办法。林彪见我们迟疑，便说：“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李聚奎同志见林彪不是下命令的口气，便建议采用正面佯攻牵制，从两翼偷袭背后的战术。林彪说：“可以。”他又问时间能不能缩短，因为对峙时间越长，越于我不利。我们对了个眼色，便表示尽量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林彪心里高兴，但脸上不动声色，连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师长带二十六团，我带二十七团，分左右沿山脊攻击。我左手持马刀，右手举驳壳枪，带领部队冲锋。我让战士们以前进为主，分出两个小组火力掩护。快到山顶时才往上猛扑，同时展开全部火力。我们是仰攻，这仗很不好打，幸有三个方向的攻击，敌人火力分散，伤亡不大。快到山顶时，左边枪声停了几分钟，接着又传来更猛烈的枪声和爆炸声。接着，山顶上敌人一阵乱喊，师长那边响起了冲锋号。我们便从地上跃起，先猛投一阵手榴弹，然后不顾一切地攀登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这时，师长带的二十六团也上来了。残敌投降。但二十六团几个战士还是用枪托、石块乱打。我忙喝住他们。

那几个战士气得把枪一扔，哭起来。

原来，守敌在二十六团攻到三、四十米处时，搞了假投降的把戏，等我军直起身，派人上来收缴武器时，敌人又扔集束手榴弹，炸死了我们不少同志。

敌人诚然可恨，但是现在已经当了俘虏，还是要执行政

策。我拍拍那几个战士的肩膀，安慰了几句，派人把俘虏押走。

这时，徐彦刚同志来到阵地，表扬了我们勇敢顽强。军团长林彪也上来了，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了些笑容，他说：“不到一小时，军令状没有白立。”

因为我们改变了他的部署，那次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几个都得提头来见。不过，没按指定时间到达，事后聂政委还是批评了我们一顿。并说：“战争就是这样，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要不，怎么打胜仗啊！”

表扬和批评都没有成为包袱，我们继续追击，由二十一军、二十二军策应，把东陂之敌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将陈诚的看家师、号称“未败过”的敌十一师几乎全歼，逃去的不足一个团。其中有三个团长被击毙，师长肖乾、参谋长和三十二旅旅长被击伤。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只身逃脱。敌赶来增援的九师，也被我消灭了一部分。蒋介石写了“手谕”给陈诚，哀叹“……凄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之隐疼。”

可笑的是：在俘虏的敌人中，每人身上有几条小绳。他们说：这是长官叫他们捆红军回去领赏的。不过，这些绳子连同他们自己都被我们缴获了。

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我又办了一期教导队。这次只有一个课题——学会刚刚缴获的那些新式武器。教员是俘虏，包括敌师长——有几颗麻子的陈时骥。

令人困惑的广昌苦战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把其中五十万兵力用于进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命中央军从东西北三方面向我根据地中心推进，由粤军在南面堵截，从而构成了包围圈。

毛泽东同志对付这种“围剿”的战略方针，历来是积极防御，即避其锋芒，外线作战，先打小的、弱的、孤立和分散之敌，一股一股地将其歼灭。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毛泽东同志排除在外，让他到福建去搞苏维埃建设，实际上是将他流放了，他在那里写了才溪乡调查一文。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延安“红大”给我们讲课时，分析过这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军放弃了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略，而改用单纯防御战法。他指出：单纯防御，没有不失败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一贯实行单纯防御。这是蒋介石从曾国藩那儿学来的。直到后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的失利，除了政治上的腐败及其战争的非正义性起决定作用外，从军事上说，其致命伤正是这种战法。

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藤田改编”。原来的师整编为团。我先到一师三团任了几天参谋长，又调到二师四团任团长，政委是杨成武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与杨成武同志率四团在福建建宁以北地区，开始执行“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是德国人华夫（即李德）的主张。红军大多数指挥员对此都有意见，但是当时的一军团长林彪却十分拥护，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短促突击”大唱赞歌，三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气得火冒三丈，当面痛斥李德一伙“崽卖爷田不心疼”。

“左”倾冒险主义者们一面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一面将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调来调去，到处与敌人交火，有的单位甚至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在长长的战线上守那些堡垒。那时我们一无飞机大炮，二缺枪支弹药，长期不打歼灭战，没有缴获和补给，只得依靠红军兵工厂自己造的再生子弹补充。那些子弹里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靠这样的装备，与敌人打阵地战，结果可想而知。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军团一师在三甲嶂与敌交火。敌人的飞机在不足千米长的小山头上，倾泻了几百吨的炸弹。由杨得志同志指挥的红一团最后打开了前沿肉搏。红军用刺刀、枪托、石头与敌人决战。一个团对付三个师，战斗十分艰苦、残酷。这时一军团命我们前去驰援。

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升。我令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后，遍地泥水，马都没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的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脊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两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们以一营（藤田改编后，已经是大团了，团下有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人侧翼，一师二团从另一侧也突了上去，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到援兵，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近战、肉搏的战法，才能发挥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被我们一气追击了几十里，溃不成军。

三甲嶂战斗之后，聂荣臻同志与林彪一起，曾联名向军委提出“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但军委只肯定了其原则是对的，具体上则以种种理由不予理睬。四月，敌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广昌。当时杨成武同志负伤刚刚归队，我们就接到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命令说：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使用有

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我们担任的就是这种“支点”。李德甚至亲临前线“指挥”。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下命令要靠翻译，听取战斗汇报也得用翻译，还要完全按照他那个民族的方式，在阵地上吃西餐。可真是出尽了“洋”相。广昌保卫战从四月十日打到二十八日，十八天的炮火下死守，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回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四月十六日，我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围了我的团部指挥所，当时电线已经炸断，我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撤往二线“堡垒”。由于敌人脱离了乌龟壳，我们还可以顶住。战斗中，我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队射击，敌人第一个“冲击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我正想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让部队撤下去，可

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同志牺牲在身边了，便大喊警卫员杨力：“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杨力见状大惊，背起我就跑。我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

他这一说，我才觉得右腿剧痛，小腿火烧一般地发热。便说：“你停一下，看看伤在哪里。”杨力说：“不能停，离敌人太近了。”我身材高大，杨力同志背着我很不得劲。连拖带拉，一连翻了四座山头，才听见后面有人喊：“杨力！杨力！等一下。”原来是另一位战士追了上来，他叫杨梅生，是安徽人，第二次反围剿时的俘虏兵。杨力见脱离了战场，一口气松下来，我们两个都瘫倒在山坡上。

杨梅生追上来，气喘吁吁地说：“我怎么喊你们都喊不应，只好顺着血迹追上来，快给团长上点药。”我一看，杨梅生果然从怀里摸出一黑色的小瓶，说：“这叫‘雷公助你’，万灵的。”

他俩七手八脚地撕开我的裤管，只见伤在膝盖部位，子弹“过梁”，入口不大，但出口撕去了一大块肉。杨力说：“先止血。”使用布条捆住大腿，又上了一点杨梅生的“雷公助你”。他们俩半抱半背，把我送进了红军医院。

在医院，我遇上了一个老熟人——卫生部长姜齐贤，就是我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俘虏的那位军官，他见面就喊我“耿老乡”，很快就给我处理好了伤口。经X光检查，子弹打

在中医所说的“膝眼”穴上，从骨头缝里钻了出去，奇怪的是没有伤着骨头，真是万幸。姜齐贤同志说，红军医院缺少医药，连生理盐水都困难，而且我的伤虽然没有动着骨头，但流血过多，需要大量营养，这两条都很难办。

一直跟在我身边的杨梅生说：“药我们自己有。”说着便拿出那个小瓶，告诉姜齐贤同志说，这是他在国民党军队时，一个同乡送的，让他在受伤时抹一点救急，药名叫“雷公助你”。

姜齐贤同志打开药瓶，哈哈大笑起来：“什么‘雷公助你’呀？这叫‘雷夫奴尔’，现在正缺呐！好了，这一瓶药交给我了，保证你们团长半月出院。”

雷夫奴尔是很好的清创剂。姜齐贤同志制了一大瓶蒸馏水作溶液，把布条浸在里边，处理一个伤口只剪一点点，舍不得多用。

与我一起治伤的还有三军团的一个团长，他是浏阳人，也是伤在腿上。那时我们指挥战斗一律采用“不怕死”的“立姿”，所以腿伤特别多。由于医院没有止痛药，他就用喝酒的办法止痛。酒喝醉了，就睡过去了。

我急于出院，但身体虚弱得不行。幸好，苏区政府发给我的“客籍红军”优待费，还有几块光洋，便叫杨力去买点补品。三军团那位团长便建议买条狗，因为狗肉大补。他是本省红军，没有优待费，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已经买酒止痛了。于是，我嘱咐杨力，买一只狗，再买些辣子、姜、豆豉、盐巴，

在外边做好后送来。

杨力果然把这事办得很好。他跑了二三十里买到一条狗，整条地煮熟闷透，送到我们病房里。我与那位团长吃肉喝汤，连骨头都砸碎嚼了。狗肉确实大补元气，十天后，伤口封口，我也有了力气，便拄着拐，赶回部队。

第五次反“围剿”共打了一年。其间，在七月份，我们又参加了温坊战斗。

温坊在长汀东南，又叫文坊。我军侦知敌李延年部四个师集结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圩一线，有向汀州前进的模样。

我二十四师在敌人前进方向上构筑工事，同时以佯攻牵制敌人。我们二师（藤田改编中原来的师改为团，我调任二师四团团团长）在一军团编成内赶到该地时，敌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的两个团，已经由其“堡垒”出动，进抵温坊，在我们已经占领的松毛岭一线构筑工事。

当天上午，我带少数人到敌前沿侦察，凑巧抓到一名敌人的探子。原来敌人已经侦察到我军的动向，但只知道我们是一个团，其实，红一军团部和二师师部，都在我们四团的附近。

据说，敌第八旅旅长许永相曾对他的部下吹嘘：以他们两个团对我们一个团，未免“屈就”。为此，他准备了大量炮弹，等我们“短促突击”与其接触后，其出击部队便立即撤回，而掩护部队则以猛烈火力将我军盖在阵地上，将我们置

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境地，再以炮火轰击。这也是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军吃亏最多的一种打法。许永相甚至向他的上司要求拨给他一些麻绳，以备捆俘虏之用。

敌第八旅就象敌人伸出的一只触角一样，一反过去只前进二、三里的常态，孤立地突出在我军前沿，这给我们提供了运动战的机会。我便与团政委杨成武同志研究，是否可以用运动战来消灭敌人。他同意这个主张。于是，我们两人一道去军团部，向聂荣臻政委和林彪军团长汇报。

他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有道理，便立即召集作战会议，决心不顾“全面防御”那一套，打一个好久未打的运动战。

这时，二十四师已有两个营运动到洋坊尾、马古头一线去截击敌人后路去了。军团急令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率主力负责攻击敌温坊右侧，并将一个团置于曹坊，封锁那里的团匪，打击敌人的增援。一团主力则由西向东，突击敌人正面。

作战于夜间开始，从晚九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敌人大部分被消灭，残敌固守杨背附近的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军团部便令二师五、六团配合二十四师，消灭杨背之敌，而我们四团则向温坊突击。

我立即组织侦察员混进村去摸情况，他们十分机动，在村里遇到几条电话线，统统给予剪断，并侦知敌人的兵力是两个营。我与杨成武同志立即决定：由我率一营主攻，杨政

委率二营分割，三营殿后，对敌人实施分割围歼。

我与一营先向村中间的守敌进攻。这时已是拂晓，朦胧中，见敌人正在改造居民房屋，正是立足未稳的时候。我们一阵手榴弹打过去，接着就展开短兵格斗。进展之快，使得机枪排的轻重机枪都无法使用，因为不等他们架好机枪，部队已与敌人缠到一起了。于是机枪手干脆不用机枪，一齐冲上来抓俘虏。当我们冲进敌指挥所时，敌军官正在拼命摇电话，可是他再也摇不通了。

我们乘胜扑向八角楼敌主阵地。一、三营全力攻击，仍然是近迫作战，完全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

命令是在进攻中由传令兵口述的，我们不知道友邻的情况，只顾一路向温坊杀进去。实际上在此后不久，军团部又下达了一个停止攻击的命令，但我们没有收到。

杨成武同志在激战中跃进到我的身边，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说：“团长，有点莫名其妙啊！”

我问：“怎么了？”

“好象只有我们一个团在打呀。”

我听了听，果然四周没了枪声。他们是解决了战斗还是撤出了战斗？还是敌情有了新的变化？

李英华参谋长也来询问决策，并报告说，各营连都发现了我们正在孤军突击的状况。我当机立断：“无论如何，我们打下温坊再说。”

杨成武同志赞同我的意见。并让参谋长拟个命令：“团长、政委决定：照原命令攻击。”

我一面安排通信员去上级联络，一面对杨成武同志说：“进攻速度还不够，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这时战线已推到温坊的外围。敌人利用一个葫芦埡口，堆了几条装土的布袋，凭险顽抗。

我对机枪连连长说：“把你们的神枪手全调过来！”

连长说：“天太黑，看不见敌人呀。”

我教给他：“对他的枪口打。看到没有，他一发射，那火光一闪一闪的便是枪口。”

火力组织好之后，我把“六轮子”驳壳枪一挥，大喊一声：“干部、党员跟我来！”

机枪连的神枪手们哗一下展开了火力。我带着自动跟上来的突击队冲向敌人的工事，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守敌。敌人丢下八、九具尸体，连同赶来增援的约一个连兵力，一齐溃入温坊。

我们俘敌逾千，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有三个人负了伤。至天亮，敌第八旅悉数被歼，许永相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杀一儆百”枪毙了。

三日早晨，敌第三师与第九师从堡垒里被调了出来，急忙赶来增援。八时，其先头团向温坊前进。军团即令一师断其归路，二师与二十四师从八前亭和马古头两个方向出击。

我与杨成武同志各率一个营作连续冲锋，交替前进。一

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座山头，山头上有一些半截子碉堡，是敌人尚未完工的堡垒，现在成了我们的支撑点。三营六次冲锋夺得敌人六个阵地，从而完成了“拦头”的任务，主力合拢，将敌全歼。

战士们乘胜追击十多里，把少数溃兵无一漏网地抓了回来。这时天已大亮，打扫战场时，我们得了十几匹战马，几十捆新军服，还有很多食品。我安排一个班，押着俘虏把这些东西送到军团部。聂鹤亭同志给打了个收条，写上“耿飚团长，战利品如数收到，你们打得好！”

红四团打胜仗的消息，使陈光师长十分高兴。他给我打个电话，先夸了一通勇敢、机动，还特别表扬我带头打冲锋。然后话题一转：

“你犯了错误知道不知道？”

“唔？……”

“听说你把干部、党员都带上去打冲锋，万一被打掉了，损失多大？”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诚心诚意地说：“我承认。”

“好。”陈光师长信任地说：“这次‘罚’你写篇文章，题目就叫《反对个人勇敢》，要强调集体英雄主义精神。限三天内写好。”

“遵命！”我这才松一口气，也就不那么“严肃”了。

我当天就写好交上去，师长看了很满意，派人送去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温坊战斗歼敌四千多人，俘虏二千四百多人，仅我们四团就抓了一千六百多人。那个准备发绳子给部下捆俘虏的敌第三师师长李玉堂，被蒋介石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使我们因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利而久久困惑的心情得到宽慰。然而，这个战斗的胜利，却不象以前四次反“围剿”一样，能据以扩大战果，发展成一个战役的胜利。在温坊之战后，上级仍然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突”一下，明天到那里“突”一下，不但战役上越“突”越被动，就是战术上也十分别扭，终于铸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万里长征大转移。

血，总是热的！

红军的战斗历程，是一部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然而，在这幅画卷里，也同时展示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在这条不平坦的道路上，不仅有着和敌人的残酷拚杀以及常人所难于忍受的物质上的巨大困难，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令人痛心的内部“斗争”、扩大化了的内部整肃“事件”和军事上的失误。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有位外宾曾经问我：“阁下对那时的红军，受到内外两种打击，而没有溃散，将作何解释？”

我说：“你知道‘军心’和‘爱国心’这种凝聚力吗？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血，总是热的’这种观念吗？”

是的，当几万名以农民为主要成份聚集起来的热血青年，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军事常识，大概就是“军令如山”这句古话。

而当“军令如山”的纪律性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的时候，与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的时候，便产生了巨大的召唤力，这就是军心，这就是爱国心，这就是使人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

然而，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在初创时期，一切都是幼稚的、单纯的。由于“四·一二”事件中蒋介石举起屠刀，中国共产党一夜之间被推入血海，使幼年时期的党处于更为险恶的环境，加上党缺乏经验，以及少数领导人缺乏马列主义，就导致了一系列“左”倾错误。

我记得那是一九三〇年年底，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我们九师司令部的同志们都静静地躺在又凉又硬的门板上，没有人翻身，没有人打呼噜，甚至连一声长长的叹气都没有。但我们都没有睡着。因为，我们司令部的参谋长赵昆光同志，刚刚被拉出去处决了。罪名是 AB 团。

在此之前是师部副官长，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生官，不愿做地主少爷而跑出来当红军的四川青年。肃反委员会说他是 AB 团，让他供出谁是同伙，他没有挺住那些刑具，嗫嚅着说与赵昆光同志一起买过花生“打牙祭”。这个被称为“花生会”的“反动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赵昆光同志是云南人，所以他与那个四川藉的副官长

没有“同乡会”的嫌疑。但他做了“花生会”的第二位祭刀者。赵参谋长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在司令部又是出色的“军师”。他能在浏览一遍之后，把军委那些长长的命令向部属一字不差地复诵出来。他在阵地上口述战斗命令，真有“多一字则太长，少一字则太短”的技巧。他书法极好，签在文件上的“赵”字带着“八大山人”的狂劲。徐彦刚师长很欣赏他。我对他甚至有些崇拜。我当参谋后经手的第一份战斗文书，就是他手把手教我写成的。那次是徐师长给的任务，并嘱咐我不会可以去请教参谋长。赵昆光同志热情地拿出纸、笔，一边口述，一边指导，把格式、要领，一点一滴地讲解清楚，甚至连复写四份这样的细节都交代清楚（因为有三个团，师里留一份底稿）。之后，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各种参谋业务。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壮志未酬，却饮恨九泉。

所谓 AB 团，就是“铲共团”或“反共团”（AB 是英文 ANTIBOLSHEVIK 的缩写，即“反布尔什维克”）。本来，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敌人总要想方设法，派出一些奸细、特务，钻到革命队伍里来，搞内部破坏活动；而革命队伍本身也不可能纯而又纯，总难免有少数投机分子混杂其中，一旦气候有变或形势紧张，这些人就可能干出不利于革命的事。因此，我们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对革命队伍进行整顿，这是必要的。但是，整顿中必须重实据，实事求是，不能轻信口供，更不能以流言蜚语和挟嫌诬告者的谎言作为根据。而当

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恰恰就是根据流言、诬蔑等不实之辞，大搞逼供信，把许多忠贞的革命者打成了“AB团分子”。他们这种搞扩大化、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杀戒的错误行动，严重损害了部队战斗力，尤其是红军干部，被抓、被杀的很多，搞得人人自危。

后来，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极左做法虽然有所收敛，但是极左思想的恶劣影响，却一直在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着。例如，打仗的时候，必须直着身子不断地向前冲，不许弯腰，不许掩蔽，不许停顿，不许利用地形地物来躲避迎面射来的子弹和呼啸而下的炮弹。谁要躲避子弹，就算怕死、不革命。记得当时每个连、营或团等单位，都有一名“掌旗兵”负责打红旗。掌旗兵全是百里挑一的英俊小伙，但是这种人死得最多。因为无论是他们掌着红旗在队伍最前面冲锋的时候，或是护着红旗站在高处的时候，都不许弯腰，更不许蹲下，这样，他们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所以，仅从这一点看，“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使我们无数的好战士作出了无谓的牺牲，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这种“左”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在军事指挥上，且不说王明、李德等搞的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和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等战略性的错误，就是在具体的战斗中，当时红军的战术词汇里，也只有“前进”“胜利”，不允许讲“退却”“失利”。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连什么是宏观的战斗口号、什么是实际的战斗要求都分不清。他们向几千里外战场上的红

军发出一封封的“长电”，一厢情愿地部署兵力，规定着“赤化”这里，“赤化”那里的时间。当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李德到达苏区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连哪条战壕里放几个兵，迫击炮应当架在哪条等高线上，都做了硬性规定。

藤田整编后，我曾到一军团一师三团任过一段时间参谋长。当时正是一军团奉命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方针，辗转于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死拚硬打的时期。三团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我们先打了云盖山守敌，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接到命令，让我们冲到大雄关东南某地去占领制高点，策应主力突围，并临时受二师指挥。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我发现这地方实际上是个葫芦形的隘口，如果两边的高地被占领，这个隘口就会成为一个进不来、出不去的“卡子”。我带着尖兵走到这里后，赶紧停下，派通信员请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上来一下，建议派一个营守住这个口子。黄永胜不同意，只是一个劲地下令：往前冲！我说，冲得上去便罢，倘若冲击失利，需要退回来怎么办？黄永胜说：“参谋长你想干什么？红军哪有‘退回来’的道理？我们就是要前进。”前进，前进！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时的战斗动员令里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口号。最后我只好行使参谋长的三次建议权，他才同意留一个连守口子。结果，主力前进之后，进攻受挫，死打硬拚，陷入重围。原来，和我们交手的敌人，明里是一个营暗里还埋伏着三个营。这样，在兵力上我们处于劣势。打了一阵，看看有被围歼的危

险，只好撤退。但是，退路上那个我曾建议控制的口子，因我们留下的兵力过少，被敌人抢去了大部分阵地。敌人用机枪一堵，差点使我们这个团全军复没。幸好留守的这个连英勇善战，经过拚命阻击，才接应部分人脱险。

事后，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立即把我们三人找去，一向慢言细语的陈光师长大发雷霆，指着我们的鼻子质问：“打了大败仗！你们怎么搞的？”在问明情况后，陈光师长说：“耿飏同志的建议是对的。”三天之后，我被调到四团去任团长。

红四团是在原叶挺独立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力团，在北伐中素有铁军之称。八一起义后，一直由朱德同志兼任团长。在朱德同志不再兼任团长后，由肖桃明同志代理团长，但是尚未下正式命令，他便牺牲了。牺牲的原因说来痛心。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时无论战斗员还是指挥员，在战场上一律不得弯腰，否则便算“怕死”。四团居高临下与敌人作战，肖桃明同志观察敌情时，正是因为使用了那种“不怕死”的姿势，很明显地暴露了目标，所以被敌人击中。

如果说，“左”倾机会主义对内部的危害使我们牺牲了许多好同志；那么，在对待外部友军或可以争取的朋友的关系上，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震撼蒋家王朝的“福建事变”。这本来是建立联合战线的极好时机，可是我们却采取了任其自然发展的姿态，以至错过了机会，使蒋介石从容

地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就在蒋鼎文率领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向闽西开进，准备去攻打十九路军时，我们一军团就在敌人进军的侧面山上休整。敌人在我们的枪口下毫无戒备地扬长而过。我们本来已把部队布置好了，想打它个措手不及。可是上面传下命令：不准打！我们再三报告，说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但是上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十九路军是“第三势力，比蒋介石还坏”“是迷惑人的狐狸精”。我在阵地上听到上面来的人说：“‘大军阀’打‘小军阀’啦！让他们狗咬狗去吧！”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实在是革命的一大祸害。

本来，南方各省的军阀对蒋介石都是怀有戒心的，如果我们对“福建事变”处理得当，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带的军阀们，都有可能与我军联系，共同建立一条反蒋统一战线。但我们在“福建事变”中的作法，使他们失望，我们自己则丢了威信，导致各地军阀纷纷向蒋介石靠拢。在以后的长征路上这些军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我军围追堵截，使我们吃尽了苦头。

在接二连三的反“围剿”战斗中，环境的艰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红军的指挥员和战士，大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革命的朝气。所以，尽管受到敌人的“围剿”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我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充实。

我们驻在小布的时候，苏区实行优待红军的政策，那大概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优抚政策。当时，地方苏维埃把红

军人员分为“本省红军”和“客籍红军”。本省红军指江西籍的红军，他们的家中都按规定分得一份土地，由苏维埃代耕。象我们这些由外省来的红军，即客籍红军，便发给一定数量的大洋，一般是十块钱，以贴补家用。我是湖南人，享受客籍红军待遇，但由于家乡还是白区，无法把钱捎回去。而且，部队天天忙于行军打仗，环境艰苦，这些钱我都用于照顾了伤、病员和接济贫苦老乡了。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我，人缺了盐便没有力气，我唯一的花销是经常买点盐巴，用一个小瓶装好带在身上。那时常常发生“青菜和水煮”的情况，这种时候能有点盐巴，就算是很好的享受了。一九三三年我们打完草台岗战斗，中央红军实行整编，我拿出一块钱买了两只老母鸡，煮熟后请黄甦政委一起来吃。当时什么佐料也没有，只有我的半瓶盐巴，可吃起来比吃宴席还有滋味。多少年后，我们还记得那顿只有盐巴的“白斩鸡”。

藤田改编时，我们一、三、五军团凑在一起。平时虽然互相慕名，但没有机会见面。那次各路指战员会师，气氛相当热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陈赓同志，大家都愿和他在一起。陈赓同志无论在我方还是国民党那边，都很有名气。那次我们在会后举行会餐，陈赓同志和我同桌。他见上来一盆肉，就迅速地把肉全分到我们碗里，然后把盆子藏起来，咋唬说：“喂，大师傅！我们这一桌还没有肉哪！”伙房里果然又送来一盆，这时他便似乎没注意地把“谜底”（藏起来的盆子）露了出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那次还讲了个亲身经

历的故事：“八一”起义时，他腿部负伤、撤到厦门，由于怕敌人认出他是伤兵，便躲在一个厕所里，让警卫员卢冬生去叫一客西餐来吃，结果西餐没吃成，反被店家臭骂一通。他讲这些艰难的经历时，总是带上一层喜剧色彩，充满了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

当时，我们最“红火”的文化生活是开联欢会。军、师、团都有宣传队，任务是做行军打仗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每有各部队之间的联欢，他们便成了主角。尤其是师以上的宣传队，编制上有女同志，三、五个到十来个不等，她们的节目最受欢迎。每次联欢都有领导上台，有时是清一色的指挥员登台演出。我记得有一次，一方面军的黄镇同志还是彭加仑同志，编了一个话剧，有点象现在的活报剧。大意是：蒋介石开会派兵，布置大军围剿红军，结果仗打败了，蒋介石气急败坏，把自己的头打破了。扮演蒋介石需要一个瘦高个，不知谁推荐我担任，李克农同志便来动员我上台。我说行，但剃光头我不干，他说不剃光头不象啊，我说让罗局长（即罗瑞卿）去，他的外号是“罗长子”嘛。后来罗瑞卿同志不知怎么把林彪动员上台了。

我那时拿手好戏是与胡迪同志一起演双簧。他在幕后，我在台前。胡迪同志是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台长，可算是我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开山鼻祖了。我们的节目通常是表现红军战士作战的。他在幕后发出各种战斗时的声音，我在台上表演临战中的单兵动作，我们配合默契，演得十分逼真。

但有时也出“洋相”。比如，我在台上向敌人“射击”，他在台后看到我扣“板机”却有意不发出“叭”的射击声，我只好回头看他一眼，他作手势让我捅捅“枪管”，我刚把“枪”倒过来，他却突然“叭”地让“枪”响了，于是我“自己打死了自己”，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有“传统节目”的还有肖劲光同志，他的著名表演是“高加索舞”，因为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这种舞有点“踢踏舞”的韵味，表演多了，大家都学会“劈劈叭叭”地给他拍巴掌伴奏。为了演这个节目，肖劲光同志还专门准备了一双长筒皮靴。这个舞别人是跳不来的。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刚刚由宁都起义过来的时候，实在没有节目，便让部下一个团长代劳，表演北方拳术，后来又增加一个大刀对打。我从武术角度看，打得确实不错。这种官兵同乐的文化活动，我们一直保持到长征、陕北和解放战争时期。

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每次打完胜仗，大家讲战斗中的见闻。其中有许多故事后来都写在书中。解放后，有一次过“六一”，少年儿童约我讲个红军故事，我就讲了一次打“红枪会”的经历。那是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从漳州回师江西，在途中打“土围子”。有的“土围子”带有迷信色彩和帮会性质，反动派利用它们来骚扰红军。“红枪会”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支清一色使用梭镖的帮会武装，每支梭镖上都有一簇红缨，所以叫“红枪会”。当时我是红九师参谋长，听通信员报告说有一个连被“红枪会”围住了。我赶到现场一看，红

枪会的人正在那里祭坛哩。他们点上几堆火，一个个都赤了膊，先杀一只鸡开戒，饮过鸡血酒，就把鸡毛拔下来，每人在头上帕子里插上几根。所有人的脸上都用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成鬼怪脸谱。然后，他们的“法师”便踏罡布斗，“叭呢吽”地念一通咒，他们的人似乎便“刀枪不入”了。祭坛完毕，每二十人一排，间隔十来米再上一排，列成横队向我们杀来。

连队把我叫来的意图是请示一下怎么办。因为“红枪会”里大部分是受骗的穷人，打了于心不忍，但是他们受反动派利用，不打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我们。我马上召集各班班长开会，讲明：第一，立即组织喊话，让他们明白穷人不打穷人，“刀枪不入”是鬼话；第二，组织神枪手拣首恶的歼灭，一是打破“刀枪不入”的迷信，二是惩办反动骨干；第三，万不得已时，将第一排、第二排击伤，同时大造声势，吓跑了事。

我们的喊话没起多少作用，因为“红枪会”的“神兵”们嘴里不停“呸”“呸”地发着威，根本听不见我们喊什么，只是瞪着大眼，端着红缨枪往上冲。我们十几个神枪手便打出第一排子弹，神兵里中弹的有的扔掉红缨枪，捂着伤口喊娘，有的扭头就跑，其余的原地站住，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再向第二排神兵打一排枪，彻底打破了“刀枪不入”的神话。神兵乱了营，我们便吹起冲锋号，一个冲锋，把“红枪会”赶得远远的。按照红军的俘虏政策，我们把受伤的“神兵”包扎治疗，送到他们的家里，让他们自己去做宣传，这些“土围子”

就这样被瓦解了。

象“红枪会”这种靠欺骗胁迫群众打红军的事，毕竟是极少数。在我们经过的地方，红军与人民鱼水情深，亲如一家。部队每有任务，百姓箪食壶浆，夏天无论妇孺，人手一扇，在路边为红军扇凉，冬天支起大锅，为红军送上热茶，到处都有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在漳州时，一位贫苦的老阿妈，牵着她年轻媳妇的手，一定要我们收下当红军。原来，她的儿子当了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老人家便让媳妇从军，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后来，这个女同志编到红三团去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人民群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在红军长征前夕，我带领四团驻在江西于都，团部设在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一连几天，我发现房东一家总是躲在窗后，反复地打量我。开始我并没在意，后来，这家房东开始向站岗的哨兵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家在哪里。由于我是团长，哨兵不能贸然透露，于是，房东直接找我询问了。

原来，这户人家的儿子，五年前当红军走了，一直没有音信。这位同志是新婚才三天参军的，他的父母亲、妻子，不知怎么认为我就是那位同志。于是发生了一场“认亲”的事件。

那天刘亚楼政委到我们团部来，检查我们的出发准备。房东老伯、老妈妈、大嫂进屋后，杨成武同志出面接待。我断断续续听见说，他们是从兴国搬来。过了一会儿，杨成武同

志进来，才告诉我他们是来认儿子、丈夫的。他们说的年龄、相貌都与我相似，但是姓氏、籍贯不对。刘亚楼同志便让我与他们直接见面，我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这才结束了“认亲”事件。

不久前，我在青年女作家何晓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看到，江西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奉献二十五万优秀儿女的巨大牺牲——还不包括那些无名可查以及全家杀尽无人向政府报数的烈士。后来我不知道这家房东是否寻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是，苏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将使我们永远追怀。

正是这些可歌可泣的战友和人民，使我们认定了革命的道路，并坚决地走下去。

第四章

长征风雷

告别于都河

中央红军从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越战越艰难。根据地在一天天地缩小，尽管上级一再强调“决死一战”、“奋力反攻”，战局仍然不见起色。我们死守在那些堡垒里，眼看着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涂着“青天白日”机徽的国民党飞机，肆无忌惮地在“红都”瑞金上空投弹扫射；有时，它们还扔“传单炸弹”，“劝降”书纷纷扬扬，象秋天的落叶般满天飘落，战士们气得掉泪，但只能对着飞机骂一通解恨。

昔日的根据地成了反动军队横行霸道的地方，他们大肆搜捕红军伤病员，屠杀拥护红军的群众，摧毁红色政权，苏区一片狼烟。土豪劣绅的“剿共团”、“兰衣社”等顽劣势

力,乘机四处活动,倒算人民的胜利果实。群众都到红军阵地上打听消息:红军下一步怎么办?那种担心与信任、不安与希望掺合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使我们更加焦急与困惑。

过去,红军也有失利的时候,但那时总是及时地听到上级指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困境的决策,每一项明确的指示都给指战员带来信心和力量。但这一次,一道道命令只是“死守”。结果是越守阵地越小,战士们辛辛苦苦修起来的堡垒,敌人一炮就给掀翻了。就这样被动、挨打,处处失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由军事冒险转为实行消极防御的保守主义,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根据地本来就是穷苦的边区,红军十万人马云集在这里,坐吃山空。过去外线作战筹来的粮、款用完了,只好与群众一起勒紧腰带过日子。伤病员在增加,武器弹药在消耗,却得不到补充机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经过了将近一整年的艰苦战斗,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我们奉命脱离阵地,集结于于都一带休整。当时并不知道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两万五千里艰苦绝伦的征程,但种种迹象表明,红军要有大的行动。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而重伤员和病号,则被安排到群众家里。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

但是，上级要我们做上述准备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讲明原因，甚至在下发地图时，连个简短的说明也没有。战士们在猜，连我们当团长、政委的也在猜。杨成武同志实在憋不住了，便给师政委刘亚楼同志打电话，他们俩是同乡，彼此间比较亲密，所以他想通过这个途径“套”出些端倪来。那知，刘政委在电话里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哟，年纪不大，心眼不少，叫你待命你就待命呗，打听那么多干哪样嘛！”

当时我正害疟疾。一发作就是高烧、寒战。卫生部队姜齐贤给我检查病情，抽血化验后，与陈光师长商量，建议把我交给群众养病。

我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我这当指挥员的，怎么能留在后方？于是就给姜齐贤同志打电话。我们是同乡，加上我“俘虏”过他的那层特殊关系，彼此交谈一向不用客气。我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质问他：“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嘛？”

他一听就知是因为让我离队养病的事，解释说：“耿团长，现在药品太缺乏了，我怕你吃不消，你的病太重了。”

我问：“病到什么程度？不就是打摆子吗？”

他耐心地说：“打摆子与打摆子不一样。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而发的，有的疟原虫是一天发作一次，有的是两天发作一次，有的不定时间就发作。你现在身上什么样的疟原虫都有……”

我不听这些病理讲演，打断他说：“什么疟原虫，见鬼了！我反正不能留在后方。”

之后，我趁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来检查出发准备的机会，“软缠硬磨”，一再表示我能顶得住，他们才同意了我的请求。

记得当时还发了很多鞋子，有布鞋，也有草鞋，这表明要走很多的路。由于在于都补给我们一些新同志，发放的棉衣和鞋子不够数。我就没有领衣鞋。那时总觉得要出去打几仗，而打仗总会有缴获，谁知竟是一去不回了。后来，我是靠打“税警旅”时缴获的一双胶鞋，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命令终于下达了，任务是“转移”。陈光师长交代给我的前进路线是由于都向临武、兰山一线夜行军。

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杨成武政委、李英华参谋长象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驻地的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铺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还有几位江西籍红军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乘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战士往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我团特务连一位姓谭的排长，由于眼睛被敌机炸伤，只好安置在根据地的一户赤卫队员家里。那天他也由房东阿妈扶着，在路边摸索着与战友们一一握别，并且一再要求要与我说几句话。当他摸到我的胳膊时，竟控制不住，失声哭起来。

我安慰他：“谭伢子，莫要这样嘛！我们十天半月就会回来的。”

他却预感到什么似的，呜咽着对我说：“团长，记住我是浏阳县的，你们回来如果找不到我，就到老师长徐彦刚同志那里去找我……”

我说：“怎么能找不到你呢，团里有登记嘛，你安心养伤吧。”

我又向房东阿妈拜托了一番，并让警卫员杨力同志从我的公文箱里拿出几块光洋交给她，让她设法给伤员买些药和营养品。

老阿妈也是眼含泪花，说了句“放心”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我上马出发后，不由得又望了谭排长一眼，只见他撕扯着满头绷带，似乎一定要看一下战友们，但被群众劝住了。几十年来，这个印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他与我告别的话，不幸言中，我再也没回江西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好师长徐彦刚同志，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后来也牺牲了。算起来，原红三军九师的同志，现在幸存的不过十几个人了

.....

从于都出发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是个“望”日。可见，现在大家说的长征出发日期——十月中旬，正是阴历的月半。出发时，我们二师走在全军右翼的最前面。通过出发线不久，各路大军便渐渐汇集到一条道上来了，队伍拥挤在一起，走走停停，显得有些紊乱。停的时间长了，有人便靠在路边打瞌睡。我们几个团的领导便前前后后地嘱咐各级指挥员加强指挥，以免拥挤中插到别的部队中去。

半夜时分，一位师部通信员送来命令，让我们离开军团行军序列，以最快的速度直插于都河，在那里过桥后，立即向前延伸警戒，作为师的前卫团开路前进。随命令还附来了注记好的地图：图上没标敌情，只有行军方向。这说明，前方尚未侦察。这个决定也许是临时做出的。

我们立即派出“前兵”，由通信主任潘峰带十几匹快马先行，沿途侦察警戒，以防不测。

全团从稻田、山丘中取捷径奔向于都河。离开了各路人马汇集前进的洪流，那种举着火把、长龙似地奔向渡口的热闹景象看不到了，只听得萧瑟秋夜中到处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偶尔有一声战马的嘶鸣从夜雾里传出，使这次行军更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于都河渡口已经架好一座浮桥。我们到达桥头时，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同志正在指挥战士们加固桥身。要知道这是用以通过几万人马的唯一通道啊！

军委作战部留在王耀南同志那里一个便条，大意是：勇部（“勇部”是红四团代号）到达后立即过桥，不得延误。其它人员待勇部过完后再过。

王耀南同志告诉我，这座桥晚上架起，白天拆掉，以防敌机轰炸。驻在于都河附近的一些伤员、病号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已经提前行动，涌到桥头，军委正在设法调整秩序。那些步履艰难的伤病员，一看来了主力部队，纷纷围上来打听各自的所在单位。大批苏区派出的民工，挑着、抬着一些笨重的机器、箱子、坛坛罐罐、成捆的纸张、书籍，还有火炮部件，与作战部队一道，拥挤在窄小的木桥上。那座用小船、门板、杉杆架成的浮桥，在奔腾的河面上摇摇晃晃，吱吱作响，真有“不堪负担”之感。

我在桥头观察了一会，发现这样你拥我挤，既危险，又不方便。便组织几个人，拦住那些“杂牌军”，对他们解释说：“同志哥，我们是前卫，让我们先过，好给你们开路呀！”

我也大声宣传：“大家别急，把桥让出来，部队过得快，用不了多长时间。”

同志们都自觉地停住了。一位拄着棍的老大姐（我记不清是哪位了），肩上挂了个印花包袱，灰军装洗得发白，帽上的五角星却是鲜红的，一边喘着气捶自己的腰，还一边与我开玩笑：

“耿猛子啊！我走不动呀，不让我们‘笨鸟先飞’，我可怎么追你们哪？”

我说“那你找后卫部队去呀！”

于是大家都笑了。

桥让出来了，部队成两路跑步通过。我与杨成武同志走在最后，牵着马边走边说：

“看到没有！都出动了。”

“看来，这不是一般的转移。”

过桥，上马，我们向部队前方急驰。部队很快就在溶溶的月色里，走上了崎岖的山路。派往师部报告我们行踪的通信员很快也归队了。没有新的情况传来，上级的命令只是一句话：往前走。

潘峰同志也从前面传来情报：部队进入偏僻的山区，周围没有敌情。

山路崎岖，月亮被座大山遮住了，看不清路面，不断有人摔倒。我们便下令：

“亮起火把，快速前进！”

山凹里立即出现一条蜿蜒的长龙，我借光看一下地图，发现我们快走出根据地了。“长龙”一会儿从“腰”里断了，那是通过树林；一会儿弯向天空，那是尖兵在爬山；一会儿，火把聚成一团，那肯定是遇到障碍，正在组织排除。

几个江西籍的战士悄悄地问：“团长，这是要到哪去呀？”

“转移，打敌人去呀。”我能回答这些“同志哥”的，也只有这句话。

大家不再问什么，只是走呀，走呀……

突破三道封锁线

前面所说我们不知道这次大转移的目标，是指我们师、团指挥员。其实，上级领导、特别是中央的领导，对这次战略转移是有明确目的的。据我们事后知晓，大转移的第一个目标是到湘西去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集中红军力量以反击敌人的进攻。为此，在大转移前《红色中华》第二三九期上发表了洛甫同志的《一切为了苏维埃》一文，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大转移的第二个重要目标是北上抗日。从“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及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一直在为这一目标努力着。但是国民党当局一味执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去抵御外侮，反而把枪口对准红军，使日本侵略者得以占领东三省，进而窥视华北。这样，领导人民抗日的重任便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上。为此，早在七月份，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已开赴赣东北。当然，即使中央领导，当时也不知道这次大转移竟要花一年时间，走两万五千里路程，最终到达陕北。这些，都是在大转移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决定的。

使红军指战员感到高兴的是，毛泽东同志从“流放”中回到瑞金，并与中央红军一齐踏上了征程。我们一军团历来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大家都希望见到他，尤其希望他

再来指挥我们战斗。但是他一直没有到我们中间来，因为当时李德一伙诬蔑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为了全党全军在关键时刻的团结，毛泽东同志自觉避嫌，不与一军团的同志作过多的接触。尽管如此，但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一起行军、战斗，这对我们仍是一种鼓舞。我们在新坡附近踏进白区，即接到军团让前卫部队以强行军速度前进的命令。队列里一片“跟上！”“快走！”的命令声。从来往的电报、文件中我们也逐渐明确了我军的阵容：整个“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军队，已经全部进行转移，我们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是九军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是八军团，五军团担任殿后。五个军团从前后左右象抬轿子般，掩护着第一纵队（军委纵队）和第二纵队（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开进。因此，前卫部队要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制造出一片安全地带，以便一、二纵队从容前进。由于从根据地出来的坛坛罐罐太多太杂，因此一、二纵队十分臃肿；进入五岭山区后，山险林密，小路崎岖，他们的行动更加缓慢，有时一天才走十几里路，这就为前卫和两翼的掩护部队增加了困难。

前卫团夜行晓宿，始终与中央纵队保持一天的行程。中央纵队走得慢时，我们便原地设防警戒；中央纵队跟上来了，我们就要急行军。进入白区开始发现敌情，我们便在前卫线上作扫瞄式运动。这时我的疟疾越来越重，果然应了姜齐贤那番诊断，由隔一天发作一次，发展成一日数次，有时甚至是不间断地发作。由于我们是前卫团，既没有药品，也

无法去找姜齐贤或人称“戴胡子”的医生，只好任它折腾。

十月二十二日夜间，我的疟疾又来了一次大发作。牲口是没法骑了，警卫员杨力便找一副门板，由几位同志抬着我行军。半夜，我在昏昏沉沉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同志正在指挥部队：

“往后传：熄灭火把，不准讲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担架旁走过去，我咬着牙爬起来，只见担任前锋营的一营正在往前赶去，便问：

“怎么回事？”

杨成武同志说：“要打一仗！”

我一咕噜从担架上跳下来。“疟原虫”顿时无影无踪了。有人递给我一缸子水，李英华参谋长用一顶斗笠遮住马灯，就在担架上看地图。

参谋长指着信丰附近的一处地点，说：“我们在这里。”

潘峰插上来介绍敌情：“那是余汉谋的部队，”他指点着一处一处的地方，“这些全是碉堡。王八蛋们连老乡的棺材板都抢去了。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陂，离这十五里。”

看来他侦察得挺细。

余汉谋是广东军阀，从敌情态势看，蒋介石是让他用大量乌龟壳组成一条屏障，把红军挡在这里，以便让尾追的敌人赶来包围歼灭我们。据侦察报告说，这些碉堡有的已修了几年，彼此间还有交通壕连接，有的则是用抢劫老百姓的材料赶修出来的，比较孤立和难守。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长征路上的第一道封锁线。

军团命令我们相机突击，从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我与杨成武同志略一研究，便下令调整队形，迅速接敌。很快，尖兵连有了战斗，是敌人派出的小股警戒部队与我们交火了。这些敌人想不到我们来得这样快，稍作抵抗，扭头就跑。战士们喊着“不能让他们回去送信呀！”一阵穷追，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据抓回的俘虏供认，古陂守敌是一个营，武器装备比较好，士兵都配有钢盔，穿的是清一色斜纹布夹衣。广东军阀财源充足，实力雄厚，在白军中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所以蒋介石把他们摆在第一线，再加上有乌龟壳的依托，易守难攻，因此他们自己吹嘘为“固若金汤”。

红军战士憋了几天，一听说有仗打，个个高兴得嗷嗷叫，纷纷说：“团长，你还是躺到担架上休息吧，保证让你到古陂吃上早饭。”

我说：“那可不行。这是第一仗，杀鸡也要用牛刀。”

尽管敌人只有一个营，我们还是慎重研究了战术。我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上来，对他交代任务说：“你带一个连，从右翼插进去，猛打这些刚修好的碉堡里的敌人。但是不许一下打进去，只要打得他们吃不住劲就行。”

王友才是广东人，当过海员，脑袋也蛮灵活。他眨眨眼，明白了我的意图，连说：“系(是)的啦！系的啦！”

我说：“去‘招待’你那些‘老乡’们吧！”

我们让一营负责主攻方向，任务是打增援。担任诱敌的王友才果然打得很出色。他们逼近到敌人附近只有二十米的地方，一会用广东话向他的敌人“老乡”喊话，一会儿投弹射击，大声“冲呀”“杀啊”地造声势，吓得敌人向营部连连呼救。敌人果然从那些坚固的碉堡里出动增援，等他们窜出交通壕，我们的主力便迅速冲上去，把增援的敌人围在一片开阔地里，于是更多的敌人被吸引出来，而我们则用一支迂回部队抄了他们的后路，冲进了兵力已经不多的乌龟壳里。

这时，王友才开始解决战斗，先打掉他们正面的敌人，然后从右翼迂回包抄过来，全团发起一阵猛冲，敌人就垮了。

我们果然在古陂吃上了早饭，那些完好无损的乌龟壳，成了我们拣战利品的好地方。从敌人的营部，战士们缴获了几床丝棉被，政治处决定当奖品发给作战有功人员。这时各路兄弟部队的战报也纷纷传来，我军在各个突破口上的进攻都尽如人意。信丰河畔一线的群众被反动军阀蹂躏多年，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主动出来帮我们处理俘虏，运伤员，当向导。很多人家都到碉堡上去拆回了被抢去的家具、木料，剩下的一把火烧毁，以防敌人再来利用。

我们当晚离开古陂，一个个乌龟壳已经变成一团团火焰，熊熊火光象一条火龙，映红了夜空和信丰河面。

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蒋介石没料到第一道封锁线“闪

电式”的崩溃，所以第二道封锁线上，还未来得及布兵，只是一些民团在守碉堡。余汉谋的兵力从第一道封锁线上败退后，蒋介石急令他们占领第二道封锁线。大概他觉得，依靠这伙败军有点靠不住，于是又令湘军南下，想提高一点保险系数。这两省军阀是第一次协作，尽管官场上讲的是“珠联璧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粤军是且战且退，期望湘军来打头阵；湘军是以邻为壑，把风险推给粤军。于是他们谁也不认真打，谁也不肯“出血”。等到我们突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广东接壤地区后，他们才在蒋介石的军事会议上认真交起火来。

说起来，那几天的战斗我们也被搞胡涂了。抓到敌人的尖兵，交代说前面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等发起进攻，打完后点验缴获，却发现是湘军二十六师的番号。有一次侦察到一个小村子里驻有敌军，冲进去后，敌人已望风而逃。我们也不打算久留，便安排往前追击，突然后卫报告发现敌情——敌人踏着我们的后路追上来了。我心中大惑不解，但情况紧急，不容迟疑，立即下令隐蔽待敌。结果，是敌人一个挑夫队大摇大摆地进了村子。

我们截获了这个挑夫队，询问他们是送给哪路敌军的军需品；可笑的是，连押送挑夫的军官都说不清，说只要是“剿匪”部队（指打红军的反动军队）就行。

这回我们可发了“洋财”。挑子里全是崭新的尖头子弹。

当时，我们从苏区带出的弹药是自己制造的再生弹，象

这种尖头带曳光、杀伤力大的子弹，从五次反“围剿”来已经久违了。战士们毫不客气，把民夫打发走，每人发给三块大洋让俘虏回家，把那些锃亮的尖头子弹尽力往身上带。我也装了三条子弹带的手枪弹，直到长征过了雪山还没舍得打完，在两河口第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送给八十八师郑维山同志满满一条，在当时当然是难得的礼物了。

我们把剩下的子弹派人送给师部。陈光师长回了个条子，我们得知红六团在城口以奇袭的方式打了个大胜仗；红三军团也对汝城之敌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中央纵队安然地从第二道封锁线中突围而出。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在湖南的良田到宜章之间。为了经营这道封锁线，敌人动用了二十万兵力，除了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残兵败将外，又拚凑了一些粤军、湘军赶来布防。当时粤汉铁路还没完全修通，有的地方已经铺轨通车，有的地方只是修了路基，有的地方则什么都没有，只是乱糟糟的摆着些施工器材。反动派利用修铁路的机会，把器材、机械挪作军用，修了大量碉堡。这些碉堡大部分是钢筋水泥结构，加上交通壕相连，形成交叉火力。除了后来第四道封锁线有湘江作天然障碍外，第三条封锁线是他们堡垒式防线中最坚固的一道。

蒋介石大概没有预料到第一、二道封锁线垮得那么快，因此，当我们进到粤汉线湖南境内的九峰山、嘉禾一带时，他们的兵力还在频频调动之中。这一带山险林密，很适合部

队隐蔽行军,如果我军行动迅速,完全有可能趁敌人布置未稳而突围出去。但是由于大搬家式的行动,整个红军及机关队伍长达五六十华里,以错过了机会。

十一月六日,我团已经到达麻圩坑。派出的侦察员陆续送回敌情:敌人正在紧急调动。因为他们有部分铁路可以用于运兵,同时,公路上也有一队队的汽车在穿梭往来,敌兵部署变化很快。在我们的正面,敌人布防重点是乐昌。

我们在麻圩坑时,乐昌尚未被敌占领。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曾下令前卫部队一直冲过乐昌再说。聂荣臻政委认为,敌人是乘车,而我们是步行,很可能在我们赶到乐昌时,敌人已抢先到达,即使我们前卫赶到敌人前头,但中央纵队是绝对过不去的。这样,先头部队就得占领粤汉线东北约十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北面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中央纵队通行。

为了摸清确实情况,陈光师长率领我们几个团的领导,亲自向乐昌侦察。我们骑马跑到赖田附近,看见乐昌大路上,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真是好险。我们返回时,军团部也到了麻圩坑。林彪发现了一条电话线,并且居然沿电话线找到了电话机,而且还摇通了,接电话的是赖田那边民团的一个什么师爷。由于当时还有国民党的几支嫡系部队在我们后面追赶,林彪便装做“中央军”的口气,“妈的娘的”将对方骂了一通,让师爷把他们的团长找来听电话。民团团长也不摸虚实,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他保证“坚守防务”,但是

未见到红军的影子,也不知道红军到了什么地方。林彪说你们这些民团顶屁用?还不快联络正规部队,以备阻击。民团团团长赶紧报告说,邓龙光(粤军)三个团已经占领乐昌,其中有一团人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一听敌人已经向九峰山行动,汗都下来了,因为事先军委曾令一军团控制九峰山制高点,林彪因当时乐昌还没敌情,就没有下决心执行。他急忙摔下电话,直接对陈光师长和我下令说:“快!耿飏他们那个团能跑,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上九峰山。立即出发!”

我们星夜奔袭,向九峰山主峰疾驰。沿途到处是我们的部队,先是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九军团,然后就是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熙熙攘攘在各条山间小道上拥挤着蠕动。这说明全部红军都被紧逼到这条狭长地带来了。九峰山如果拿不下来,干系非同小可!偏偏天公不作美,那天突然下起了罕见的暴风雨,从天而降的水柱象鞭子一样,直往身上抽,牲口都惊得惶惶不肯行走。我们有马的指挥员干脆弃马步行,不顾一切向九峰山前进。途中,我突然觉得一阵“激凌”,立即意识到又要打摆子了!心里想着,嘴里不知不觉竟说出声来:“现在不能来,现在不能来,等打完这一仗再说。”

在一片哗哗的雨声里,陈光师长不知怎么听见了我的声音,便把手遮在嘴上,大声对我说:“要得!”

他不知把我的自言自语听成什么了。当时风雨交加,战事火急,也没顾得上问他,后来想起来要问他时,他又不在身边,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了“千古之谜”了。

暴风雨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也给比我们略早一点到达九峰山的敌军帮了倒忙，他们是立足未稳，风雨中又不便发扬火力，加上雇佣军怕苦怕死的本性，上山后还没找好阵地就被我们赶了下去。我们的进攻方向是逆风，又是仰攻，用战士们的话说，大部分力气都用在对付老天爷上了。

一夜风雨，一场激战，全团上下都成了“水兵”，有的同志还穿着从苏区穿来的短裤，背包都轻装在麻圩坑了，被初冬的风雨一淋，冻得瑟瑟发抖。我的身上也是一阵冷一阵热的，占领了山头才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子一软就坐在了掩体里。陈光师长走过来，拿出一包用油纸裹着的旱烟，让我吸一口提提神。这时，我才发现嘴唇上起了好几个水泡，大概那是“疟原虫”的“杰作”。

等敌人避过大雨，风是风火是火地向九峰山进攻时，我们已经构筑了阵地，作好了准备，兄弟部队也已在相邻的山峰插上红旗，展开了九峰山大阻击。激战一天，掩护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了粤汉线，我们才撤出阵地，回到军团部接受新任务。

当我们还在与九峰山之敌激战的时候，九军团攻下了宜章、良田，中央纵队已经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兰山、临武一带，因而我们掉在了大队的后边。军团指挥员命令我们迅速超越中央纵队，恢复前卫位置。

这时已是冬令，风雨过后，气温骤降，再加九峰山风雨中的鏖战，很多同志受了风寒，病号一下子多起来。九峰山

一带到处是大森林，荒山里看不到一户人家，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互相搀扶着，从侧翼插向前卫位置。由于荒无人烟，我们只能在树林里露营，有时还要饿着肚子行军，历尽艰辛按时到达前卫位置——天堂圩。

在天堂圩，我请一位老中医给患病的战士们看病。这位老中医（当地人称“郎中”）十分和善，知道我们共产党的主张。他看到红军战士病成那样子还坚持行军打仗，目光中蕴含着惊讶和敬佩之情。他不但为患重感冒的同志熬了一大锅宽中理气的汤药，还为伤员敷上了接骨生肌的药膏，对有风寒腿、腰背疼的人则施以针炙。我们从他那里买了一些丸、散、膏、丹之类的成药。他见到红军买卖公平，尊敬老人，十分感动。晚上他让我住到他的家里，细细地为我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我服下。

我问：“老人家，能不能把我一下子治好？”

他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中医认为疟疾属足阳明脾经）

“可我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哪！”我诚恳地说。

老人家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我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我是“病急乱投医”，管不得许多了。

他仍然认真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可是断人香烟的罪过哟！”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来了点“豪侠风度”，拍拍胸膛说：“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谁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奉命出发，向道县奔袭。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为我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我。在这些民间医生看来，秘方比命还重，现在将药方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他的诚心。

他将我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君臣佐使作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你可仔细调理，仍可再生。”

我将药方揣入里衣，告诉他一定按他说的办。

老中医又说：“大军所到，非深山即老林，每有瘴气、风霜，易染时症，可用‘七叶灵芝草’驱之。有病可治，无病亦防。日啖一、二，无不灵验。”

“七叶灵芝草”即大蒜。原来，大蒜这种植物，只长七片叶子（以后上面长出一片新叶，下面就会谢掉一片老叶），便抽苔结蒜头，所以有“七叶灵芝草”的美称。大蒜味辛辣，有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的功能。老中医教给的这个民间验

方,后来在长征途中试用,果然灵验。

回想起来,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戎马倥偬,直到很久以后,当到达贵州黎平时,我才配齐了那付治疟秘方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园肉赋型,一剂共为九丸,九丸又分三服。我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剩下的两服,在延安又先后治愈两例。正如老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

当然,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疟疾已不算什么顽症,有了更多的灵丹妙药,那服按“以毒攻毒”原理配制的中药,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当时,我们连奎宁都没有啊。由于它毒性大,配制也怪僻,尊重老中医的意愿,我也就不公布这个药方的具体配成了。

告别老中医,我们作为前卫团继续向道县急行军。蒋介石在丢失了三道封锁线以后,又拚凑了更多的兵力在前方围堵,同时命令尾追红军的“中央军”迅速紧逼。横在我军前方的,是比那些人为的乌龟壳更加险阻的天然障碍——潇水和湘江。

奔袭道州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们在天堂圩接到了师部发来要我团奔袭道州(即道县)的电报。电报说：“敌薛岳率五师之众，向湘江集结；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推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道县、天堂圩之间。为迅速渡过潇水，占领道县，命四团经天堂圩，限明日(十八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师部的部署是：由四团攻正面，五团迂回。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离道县有一百几十里，而时间是一天。这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已到了宁远。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占领道县，则两敌有可能先期到达。即使我们先敌到达但不能占领，那也会受到三面夹击。

根据上述敌情和路程，我们必须火速行动。我和杨政委研究后决定：一面召集各级干部进行传达，并作战术上的各种布置；一面向全团战士说明任务的重要和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进行政治鼓动。

我在进行战术布置时，要求各级指挥员的行军位置伸前一级，以便在遭遇敌人时能迅速了解敌情和地形、并迅速下达决心和指挥部队进入战斗。我还要求先头营和先头连加强火力，并派出尖兵边开路边侦察边警戒，保证部队行军安全。

两小时后，一切都准备完毕，我们立即拔寨上路。

途中，我们遇上一群当地老乡，便向他们打听道县的情况。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我先给他们递上纸烟，请他们坐下，然后向他们反复讲明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打道州的红军时，就争着把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分别后，老乡们先走。不一会，一个挑担子的壮汉又专门返回来，把我拉到一边，说出一个重要情报：

“长官，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们，道县城南门就是潇水河，河上有一座浮桥，是用链绳、木板把许多船串连而成的。进城一定得从这座桥上过，你们去时一定要先抢这座浮桥。如果他们（指守城的敌人）知道你们要去，预先把桥拉了过去，你们可以在夜晚游水过去，把桥再放过来。好在河面不很宽……”

我十分感谢他，这个情况对我们太重要了。我身上别无他物，便把两块光洋送他，他说什么也不收，还神秘地说：“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我个子高，便弯下腰把耳朵凑上去，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家老弟，去年也当红军了，在贺胡子那里。”

多好的群众啊！

我将这个情报交代给先头连，要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手段，夺取浮桥和城门。

部队又走了大约五六十里，越过一个小山坡，走过一段

平地后，进入一个小市镇。战士们都已经很饿了，但时间紧迫，不能停下来做饭，只好在镇上买些点心边走边吃。这时，拥挤在道路两旁的成千群众，不断地举手招呼：“红军弟兄们，辛苦了！”老乡们还从家里端出一盆盆开水，放上大把湖南茶叶，用凳子放在路边，招呼战士们来喝。我们一面连声感谢，一面舀起茶水，边走边喝。

又走了一阵，进入一片树林。此时大约已是下午两点钟，因此决定休息一个小时。战士们有的解开饭盒准备吃饭，有的脱掉鞋袜检查自己的脚，有的躺下就睡着了，只有各连的卫生员更加忙碌起来。卫生员们象是找不到一个病人就不甘心似的，问这个“脚痛不？”问那个“能走吗？”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痛！”、“能走！”有个小通信员，才十五岁，是个共青团员，又聪明又活泼，大家都叫他“小鬼”。他细声地说：“给我点药。”卫生员说：“小鬼，脚打泡啦，我来替你擦。”说着就去扳“小鬼”的脚，一看脚板底下果然磨起了好几个水泡。指导员听说后，急忙起来对“小鬼”说：“辛苦了，同志！上药后在后面慢慢跟来罢！”“小鬼”一听着了急：“不，我还能走，保证不掉队，我坚决不走在后面。”这时，有人在旁边高喊：“学习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夺取道州！”大家也随着高呼，大家的情绪顿时激昂和沸腾起来，可是“小鬼”倒害起羞来。

部队继续前进，经过了一些村庄、树林和山坡。当离道州还有二十多里时，看见远处有人向我们飞跑过来。我用望

远镜一看，原来是一个穿军服的人，立刻命令部队隐蔽。不一会，尖兵把那人抓住了。那人逞强地喊叫：“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公事！”战士们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到哪里去？说清楚就放你。”这家伙看了看周围，似乎感到有点异样，于是不再神气了，低声问：“你们是什么队伍？”战士们骗他：“我们是中央军。”那人又问：“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们随口回答：“是呀！”他听后放下心来，便又提高了调门：“我是送命令到天堂圩去的，要那里的民团星夜开到道州去守城。”战士们不再和他多说，立刻把他押到营部。他把带的一封信拿出来，信中大意是说城里只有民团四十多人，仅三十多枝枪，前天花了一万元才请到广西军一个连，他们连行李也没有带……我们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答：“是团丁。”我们又问：“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军队吗？知道红军要来吗？”他一听口气不对，脸色马上发青，全身直打哆嗦，牙齿也咯咯打架。没有时间和他多说，当即派人把他押送到师部去，并嘱咐押解的战士路上要好好向他解释我们的政策。

这个意外的收获，使我们了解了道州的情况。我们立即将这情况向各级干部传达。大家脚底下的劲头更足了。又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已经到达道州城附近。隔着潇水河远远望见城墙上有人在行走。这时，河上的浮桥已被敌人拉过对岸，又无船只，无法马上过河。我只得命令先头营一面隔河监视城上的敌人，一面向下游派出警戒；火力队设置夜间射

击设备；担任爬城的突击部队准备云梯；其余部队进入营房休息。

潇水河发源于道县境内的江永、江华地区。这些地区都是石山丛林，离“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不远。潇水沿岸垂柳成林，柳条摇曳于碧波之上，映衬着远处的山岭，风景十分秀丽。可是，此刻的我却无心欣赏这大好风光。我站在河岸上，一面目测河的宽度，一面观察城上敌人的动静。只见惊慌的敌人在城墙上闪闪缩缩地露出几个头颅，向我们窥视。他们为了壮胆，不断地向我们打枪。我们担任警戒的战士，在掩蔽物后面，隔着四百米宽的潇水，向敌人喊话，劝他们投降。

对岸城外的老百姓一点也不害怕，成群地站在河岸上观看。

晚上，下弦月出来了，虽不算明亮，但照耀在河面上，仍反映出一片银色的光辉。我正在继续观察，并检查各部队准备情况，忽然通信员来说，政委请我回团部去。回到团部，杨政委告诉我：“师部也到了，现距道州十里宿营。”我就将当前敌情、地形及部队的战斗准备告诉了杨政委和李参谋长，接着，我们用电话把全部情况及计划报告了师政委。他指示：“五团在上游三里处架桥，你们立即开始行动，偷渡潇水，先夺浮桥，偷袭不成即强攻。”我们立即行动。参谋长发布了命令，团指挥所便移近河岸。

第一批战士开始渡河。三名战士在前面奋勇向对岸游去，其余的二十多名紧跟在后面。正当游在前面的战士到达

对岸时，忽见城上火光一闪，大概是敌人发觉了，向我们打出一个排枪。我火力队立刻还击，马上就听不到敌人的枪声。我想：糟了！刚才那一排枪是敌人逃跑的讯号。隔着河无法追击，只有干着急。这时，泳渡的战士陆续上岸，一部分隐蔽在城门口，一部分就去抢浮桥。一会儿，我听到河面上传来撑船声、铁链声。再等一会，就看到一个宽大的黑影由彼岸慢慢伸向北岸。仔细一看，原来是架桥的船只，一只紧靠一只向这边延伸过来。我们把准备好的木板铺在船上，加以固定，一座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浮桥便架好了。

担任突击的一个营首先冲过桥去，和埋伏在城门口的战士一起冲向城里。团部也紧跟着过河。这时天已黎明，城内敌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我们派出少数部队由南门沿城向北门搜索，大部队均穿城而过，出北门占领阵地和原有的碉堡，向零陵方向警戒。

我们团部驻在天主教堂。由于我们所处地形背水，所以派出两个连侦察部队，向敌伸出一日行程进行侦察；我要求他们利用沿途原有的电话线及时联络。布置完，就将这一切写成报告送往师部，同时，命令各部队在准备警戒后，进入营地附近村庄，向群众进行宣传。

一切布置妥当，东方一轮红日已经升起，我和政委、参谋长都为按时夺取了道州而高兴。这时，警卫员同志提醒我们：“首长，也应该吃点饭了！”真的，我们昨天都没吃晚饭。可是，我们刚刚摆出饭盒，还没来得及吃，忽然空中传来“轰

……轰……”的声音，接着，全团的司号员立即发出了对空警报。

我们部队的动作真快，不到二分钟，都已分散在树下、草丛里、房屋中隐蔽起来。这时，军委高射机枪连已经到达，在桥头设立了阵地。当敌机在空中忽高忽低地盘旋侦察时，我们的高射机枪便对准敌机开火，喷出一条条火龙，十分壮观。敌机大概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对空射击，立即惊惶地向东飞逃。警卫员同志指着敌机骂道：“龟孙子，清早就来捣乱，将来有一天总会收拾你的！”

我们正在清理战场，军委工兵营的王耀南同志率领部队赶到，我把守桥任务移交给他。他们立即跳进冰冷的江水检查浮桥，迎接大部队通过。

杨成武同志已经与政治处的同志打开了城内的监狱，把一大群被反动军阀关押的乡亲放出来，接着，展开打土豪劣绅、铲除暗藏特务的活动，为中央机关进驻道州做准备。下午，我看到毛泽东同志也来了，他变得又黑又瘦，头发老长，神情抑郁地与周恩来并肩走着、说着。我们知道他的处境和心情，便没有上去与他打招呼。

回到团部——天主教堂，我们将从敌军那里缴获的食品、香烟等，装了整整十担，派一个排护送，给总部送去。算是我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一点心意。

我们在攻占道州后，立即向零陵方向出动，警戒左翼方向，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与此同时，六团也在道县以南

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一线架起浮桥，掩护中央军委的后续部队越过潇水。滚滚的潇水河反而成了阻滞敌人追击部队的天然屏障，这样，红军的行动有了一定的主动地位，为进一步渡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态势。道州浮桥为千军万马争得了时间。当大队人马通过后，张云逸同志下令将它炸掉，以断敌追路。当时，敌人已紧逼道州，小股敌兵甚至冲到了总部附近，狂叫“抓朱毛！”“抓活的！”“抓住朱毛有重赏！”当周恩来同志骑着一匹灰黄色的骡子冲出指挥部时，敌人已经近在二十米左右了。幸亏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敌人没认出来，加上工兵营拚死阻击，才没遇险。

就在工兵营奉命炸掉浮桥，那几十条船全部变成一块块碎木片向下游漂去的时候，江对岸又出现了我军一支部队。这是肖新槐同志率领的一个营担任殿后，与敌人纠缠了几天，赶到渡口晚了几分钟。他们一看桥已毁掉，毅然拉起手，抱着要死一块死的决心，涉水过江……。

当我军抢占道州，接着又重新控制临武后，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今江永）方向开进；其时，白崇禧一度令其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而湘敌尚未赶到全州。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是：保住他在广西的地盘，既不许蒋系涉足，也不让“赤党”进入。这是敌人派系之间勾心斗角所致。这样，灌江、湘江一线，成了一道空虚的“走廊”。红军如乘机迅速推进，完全可以在敌人的空隙里顺利通过。

但是，我中央纵队行动较慢，那些又笨又大的辎重，完

全靠肩扛手搬，有时一天移动不了几里路。据送信的战士回来说：那架照像的大家伙（爱克斯光机），得用七八个人用手捧着，就象捧着一个瓷碗一样，小心翼翼地蠕动在行军队列里。还有政府机关大批男女老少非战斗人员，由于主力部队照顾不了他们，只能在护卫部队用生命控制出的一片安全地带行走；他们不仅走不快，而且挤成一团，根本无法调整，使护卫部队更加艰苦。

在九峰山时，我曾见到妇女队的一些同志。她们既没有牲口骑，又没有担架坐。我说：“大姐们，快走呀！”一位大姐停下来，笑着从头发上往下拧雨水，说：“哎呀！我走不动了呀，都湿透了。”我赶紧叫通信员拿件雨衣给她，她却不肯收，又拄着拐，顶风冒雨往前走去。这些女同志真是令我们又钦佩又担心。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分两路渡湘江的命令。这时，敌我态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江，已成为敌人严密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了。

湘江血战

中央军委把渡湘江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八、九军团等殿后，前后左右共同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我们一军团本来的部署是，由一师作左前锋，二师为右

前锋，同时抢占界首(左翼)和全州(右翼)。但是，当我们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一师尚滞留在潇水西岸，与五军团一道对付周浑元的尾追部队；因此，一师的部队就只有二团随一军团本部前进，一团和三团，继续留下防守。

这样，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便临时调整部署，把本来由两个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二师。林彪交代任务时说，兵贵神速，不能等，由你们四团先把左翼的界首阵地抢下来，然后再向右翼全州方向归还二师建制。他又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重新协调了两个军团的行动。决定：我们团占领界首后，将阵地移交给三军团六师，而一军团一师在完成潇水阻击后，向全州归还一军团建制。

由于我团身兼一“左”一“右”的前卫任务，受领任务后，我们便提早出发，去抢界首。部队基本上是直线行进，径取界首，有大路就走大路，没有大路就走小路，连小路也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爬山。当时敌人在沿线尚未布防，零星“民团”与我们构不成实质性战斗，因此，我们对部队的要求只有一个字：“快”。因为只有快，先敌到达并占领界首，才能造成以逸待劳的主动态势。

当我们马不停蹄来到界首东面的湘江边上，涉水过江，进入界首地区，奔上湘桂公路时，与敌人派出的尖兵仅有十里之隔。

大概敌人发现了我们这支突然“冒出来”的部队，远远地用号声与我们联络。我立即下令隐蔽。全团人员“唰”一

下就进入公路旁的丛林、路沟里，刚才那支“长龙”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与杨成武、李英华伏在一丛茶籽树后面，正研究伏击方案。远远听到三军团六师与我们联络的号声，显然他们在寻找我们的位置。我说：“且不用回答，等战斗一打响，他们就找到了。”因为我们如果回答他们，则会暴露目标。

从正面沿公路开来的是敌桂系夏威部。显然，他们从尖兵的报告和号声中，已经料到前面有了我军的部队。但是，夏威是广西军阀主力，仗着武器精良，目中无人，只是摆开了一个战斗队形，仍然沿公路向界首运动，妄图一鼓作气，抢占界首。很快，其前卫团就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

“打！”我下令。

敌人被突然的射击打乱了营，一部分兵力伏在死尸旁盲目还击，更多的是向后退却。敌人大队本来是以急行军开进的，被前卫的溃逃兵力一压，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公路及沿线的水田里，挤满了一团乱军。我便下令吹冲锋号，一是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二是告知三军团六师，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一个冲锋，敌全线溃败，丢下几百具尸体四散逃逸。这场战斗我们仅有一个排长负了点轻伤。当战士们互相评比着战利品的时候，气氛十分轻松。团部的通信员们还专门从敌人军官的提箱里缴获了几盒“白金龙”香烟交给我。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我一直只能抽点土烟过“瘾”，这下，算开了

荤。

正当我们占领了界首后打扫战场、与六师交接阵地的時候，陈光师长派骑兵通信员飞马赶到了。他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命令。

我们就站在公路上看命令，还没看到一半，杨成武同志就惊讶地说：“问题严重了。”

命令说，五团占领全州的任务未能实现，该城已被湘敌刘建绪部抢走，我们一军团改在距全州十六公里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布防，扼住湘桂公路的咽喉，阻击全州之敌。命令是军团下达的，师长在命令上附了一句：“星夜赶到。陈。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连晚饭都来不及吃，顺湘江旁的公路向北奔跑。沿途，不断见到我军护卫部队正在占领各个要点。从界首到屏山渡的六十华里地段，已被我军控制。在这段距离上，甚至有几处浅水区，完全可以涉渡，如果中央纵队采用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并比较平安地渡江。但是，这个时机被错过了。

这就使阻击部队不得不以血的代价，换取渡江的时间，从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左翼的三军团已经与桂军交火。白崇禧把他的部队共五个师先后开回灌阳、兴安、新圩一线，并叫喊要“把共军消灭于湘江之东”。在右翼，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进至全州，薛岳的四个师也调至黄沙河。在我们的背后，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和李云杰部共六个师，则从红军背

后拉网似地兜过来，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态势。

白崇禧得知红军无意入桂，只是要渡江西去，便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的正规军重新调至广西境内，只留下一些民团。看样子，他只是想“保境”，对于红军入湘，则采取观望姿态。但红军入湘，对刘建绪不利，于是，该敌就以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向我脚山铺阵地猛攻。

我们赶到觉山时，天刚蒙蒙亮。陈光师长正焦急地等待在公路上，远远地向我们挥手示意，不等我们到达面前，就跑步引导着，带我们进入公路两侧的阵地。我便命令三营向左，由李英华同志指挥；二营向右，由杨成武同志率领；一营跟我在一起，摆在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城上，布置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

战士们十分疲劳，有的刚做完工事，趴在掩体上就睡着了。我与杨成武、李英华同志吃了点炒米，便到阵地周围察看地形。

觉山是脚山铺附近一些小山的统称。这些小山包孤零零地互不相连，我们守的这个地方叫做“怀中抱子岭”，还有“美女梳头岭”、“尖峰岭”、“黄帝岭”、“米花山”等。红五团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在尖峰岭与敌人激战半天，将企图抢占脚山铺的敌人击退。

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鸦鸦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地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

弹爆炸的气浪，震得我们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残枝断叶乱飞乱舞，树干被炸中后，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劈柴。飞机倾泻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一排的炮弹把觉山阵地又重新覆盖了一遍。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

炮击一过，我们便从树枝堆里钻出来，修复工事，准备迎敌。

李英华同志爬过来，向我报告了一下伤亡情况。接着，杨成武同志带领二营跃入战位，并挨个嘱咐战士们：靠近了打。

敌人靠近了，黑鸦鸦的一大片，象蚂蚁搬家似地，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叭叭地盲目射击着。他们看看我们没有反应，便以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我扣动板机，撂倒一个敌兵，大喊一声：“打！”

各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滚下山去。稍作调整后，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这样三个回合之后，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

刘建绪孤注一掷，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溅得满山都是，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

来，我们只能在火海里激战。到晚上，敌人尸体越积越多。又一次羊群式冲锋开始后，我估计敌人这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便下令把敌人放近，一阵手榴弹猛炸之后，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把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防区。

这次出击的效果很理想。敌人因天色已黑，无法重新组织进攻，就退守全州。出击部队从树丛里、水沟里，抓了不少俘虏。这都是进攻中溜出战线的敌人士兵，准备躲过战斗后，趁黑夜逃跑的。

在审问这些散兵游勇后，我们得出一个看法：敌人在我正面投入的兵力，不是原先通报的三个团，而是起码五个团，并且，俘虏供认，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沿湘桂公路源源开来，除刘建绪部外，薛岳部也进入可以向我发起攻击的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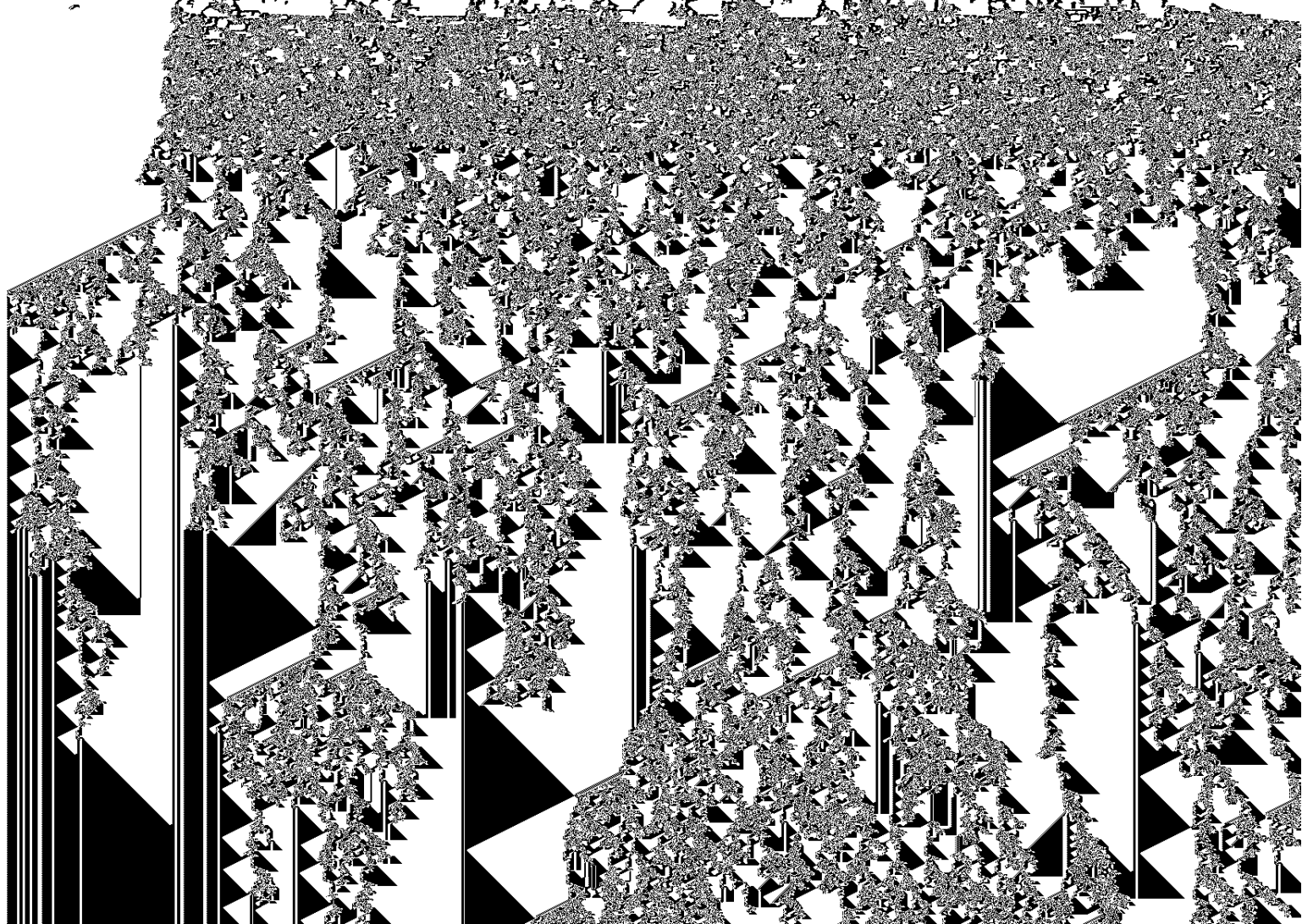
我们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师部和军团作了紧急报告。

这夜，邻近几个山头不时爆发出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这是敌我的试探性接触。这些战斗很快就停止了。这说明双方形成对峙，预示着明天将有更大的战斗。半夜时分，我的疟疾又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指挥所的地上。

师里连续发下好几个通报，告诉我们，当面之敌的确切兵力是九个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次我们阻击的实际上是整整十五个团。

天刚拂晓，敌人那边人喊马嘶，又开始了行动。我与杨成武同志对部队进行了再动员，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这时，红一师急行军赶来，在我们左侧进入阵地。看上去，部队十分疲劳，有些同志一站住就睡着了。军团长林彪和聂荣臻政委带着一部电台，指挥他们占领米花山、怀中抱子岭一线。他们的后卫还没完全进入阵地，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

三十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我们团的基本指挥所已经找不到合适位置，只能根据炮弹或炸弹落下的声音，作跳跃式移动，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枝里跳出来，向敌人猛



久，一师主动向怀中抱子岭收拢，放弃了美女梳头岭，我们二师的阵地右翼，一下子成了火线。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们右翼五团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停止了枪声——战士们全部阵亡。敌人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师的主阵地压过来。这时，守卫尖峰岭的五团，已经放弃了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到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里拚死阻击。敌人便调整了一下部署，重点攻击五团阵地尖峰岭。尖峰岭只有两个连队，由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阻击。激战中，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眼看敌人已扑上来，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忍下手。他夺过枪，实现了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就在一营阵地危急的时候，正在二营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同志见情况不妙，急率通信排从公路右侧向这边增援。当时敌我兵力相交，因此他陷入层层重围。一颗流弹击中他的

右膝盖，血流如注。敌兵一见，立即从四处围过来，疯狂地喊“抓活的”。赶来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杨成武同志只好就地用短枪还击。

幸好，这时五团的部分人员已经被压进了我们的战斗分界线里。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一见杨成武负伤，他顾不得自己正在敌人火网下突围，便组织火力拚死封锁包围杨成武的敌人。我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同志见状，也立即组织营救。他连续派出三名战士，都中弹倒下。最后，他愤怒得眼都红了，亲自滚进火网，向杨政委靠拢，把他营救到五连的同志身后。

救出杨成武同志后，刚才围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成了我们集中歼灭的目标。几挺机枪从两面一阵猛扫，肃清了这股敌人。

杨成武同志负伤后，我们团连副担架都没有，因为伤员太多。幸好团部书记匡汉谋在路上截住一副五团的担架，才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

当李英华同志向我报告杨成武同志负伤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一方面是担心政委的伤势，一方面是为我团大战之中折将而忧虑。我们两人自从藤田改编，并肩指挥战斗以来，总是配合默契，得心应手，一次次的恶仗、险仗，都被我们闯了过来。现在正是决定红军命运关头的时候，我们前卫团却突然失去了政委，这对下一步战斗是多大的损失啊。但是，现在急也无用，得赶快把政委送到后方。于是，我把骡子

和马夫以及衣服等都送给他去后方休养。

这时，陈光师长也冲到我们阵地上，指示我们且战且退，向黄帝岭收拢。师长说，退守是为了更好地拖住敌人，已经命令全师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我问：中央纵队渡江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才渡过一半。

看来，这场血战还得继续下去。

我与李英华同志把部队分成三批，交替掩护着向后收拢。这时，全团伤亡三分之一，战斗力损耗很大，每坚持一分钟，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军团指挥部也混在阵地之中了。因为前一分钟还是后方，过一会儿就成了前沿。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带着一部电台，干脆就把军委命令直接下达到靠他们近的团、营、连。他们守在译电员身边，往往我们一封来电还没全部翻译出来，他们就已经下达第二道命令了。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无一不要求我们“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一师也只留有一个怀中抱子岭了。我们两师中间，完全被敌人隔断。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更加猖獗，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拚杀。

实话说，当时的战斗情况，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因为敌人太多，几乎是十倍二十倍于我。我们四团和五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六团上来的预备队，完全失去了建制。

反正大家只有一个心思：见敌人就打！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便下令“往这边打！”“往右突！”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上，辨认出我是指挥员。大家都是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

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看样子伤得不轻，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边对敌开火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我一楞，往东边去干什么？他说是团长的命令。仔细一看，原来他是五团的，杀红眼了，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我对他说，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持，我去叫援兵。他这才认出我来。我们走后不久，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

黄帝岭终于守住了。晚上，师部令我们突围。此时一师已经撤出，我们成了孤军。师长通知我们团殿后。等我们团最后撤出黄帝岭时，我留下的一个掩护排被打散了，几天后才陆续归队。

我们撤到珠兰铺、白沙一线，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林彪与聂荣臻给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直接发给朱德同志。电报恳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半夜，朱德同志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

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凌晨三点,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保证执行命令的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封电报措词严厉又满怀期望。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

十二月一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

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为了贯彻凌晨三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经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带领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搬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拚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

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象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十二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我团的突击队堵住了敌人冲进来的缺口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把突进来的那股敌人就地歼灭。战士们硬是靠拚刺刀将来势汹汹的大批敌人杀了回去。激战中，敌人飞机又到了上空，通信排要吹防空号，我说不管他，因为敌我正在拚刺刀，敌人扔炸弹，会把他们自己的人炸死。结果敌机仍然俯冲，但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些传单，上面写了些红军如不投降、便要葬身湘江之类的鬼话。我们当然不会理睬他。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

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竟迂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员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点让他们连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我们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黄公路，才与一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向西突围。在湘江渡口大路上，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的机器零件、一擦一擦的纸张等，真是破坛烂罐。这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转移。

湘江血战，历时五天五夜，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也最大的一仗。经此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为不足四万人，有的部队被整团整营地打散，还有的未能过江。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强 渡 乌 江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要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便重新调集重兵，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布置口袋形封锁线。而我军经过湘江一场血战，战斗力损失惨重，与敌人硬拚已是弊多利少。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通道会议上，坚决主张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

支持。这期间，我们在大山里转了几天，进入贵州境内，向黎平攻击，守敌不战自退，逃往十万坪之守敌见前方下来溃兵，也得了逃跑传染病似的，干脆退往五里桥。贵州军阀的这种脓包相，坚定了中央改变原定方针的决心。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聂荣臻同志向我们传达了 this 决议。全军兵分两路，向乌江南岸逼近，一路上连打胜仗。

在我们红四团攻占黄平后，军委命令一军团一、二师分别在龙溪、江界两处准备强渡乌江。一师随军团本部，由林彪和聂荣臻政委指挥，杨得志、黎林指挥的红一团受命从龙溪强渡；我们二师则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们到达一个叫马场的小镇子，进入临战准备。马场，过去有人叫猴场，因盛产猴子而得名。这年阴历除夕，我们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辞旧迎新，整个气氛给我的感觉确实确实是“总把新桃换旧符”了。那天晚上寒风料峭，渐渐地飘起了清雪。按照红军的习惯，我们正准备开个联欢晚会，尽量改善一下伙

食，忽然师部通知我前去开会。

我记得那天警卫员杨力同志到很远的地方买来一只鸡，算是我们团部的年夜饭。我说，鸡我来杀，最好再有点红枣、桂园什么的，才有意思。于是有的同志就自告奋勇地到附近去买红枣。一会儿，各单位的饭锅里飘出了各种各样的香气，战士们不断地走来走去，准备晚会的节目，充满了过年的气氛。

接到通知，我立刻把正要开膛的鸡交给杨力，赶到了师部。天色已晚，接二连三的通知，都是让我与陈光师长在那里等。我们围了一堆火，猜测着叫我们来的意思，不知不觉，到了半夜。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上经过一番争论，决定：立即由我们团执行强渡乌江的任务。

任务是由军团长林彪亲自下达的。要求我们立即进行攻击。我坚持说要给我准备的时间。林彪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但强调说：得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

我的脑子里飞快地“反应”着，一边把敌情标在地图上，一边盘算着战斗准备和动员工作，我反复琢磨着夺江的各个步骤：一、控制渡口；二、架桥；三、扫清外围，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紧急而艰巨的任务和突然的决定，使我有点焦躁。回到团部，警卫员们都喜孜孜地围上来，一见我的样子，又都不做声了。他们各执其责，很快地就给我布置好了办公场所。

把八仙桌上的碗盘之类撤走，点好马灯。等到写完作战方案，已是下半夜了。

我们就在原先准备开晚会的篝火旁召开了动员会。记得在大家表完决心以后，我还补了一句：“打到遵义，一定补过一个新年。”

天将破晓，全团整装待发，我的心情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是啊，我们红四团是经得起战斗考验的。

通信员小白他们一齐围上来，有些委屈地说：“团长，该吃年夜饭了。”

“对头！”我一拍大腿：“还有一只鸡呢。”

他们喜孜孜地揭开桌上的箩筐，一大盆香喷喷的红枣烧鸡，飘着黄乎乎的油珠，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眼前。

通信员们倒底是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个个喜形于色，欢呼着“过年喽！”

可不，这原本是除夕的晚饭，可是直到新年早上才吃。这鸡一直在火上煨着，已经分不清那是肉、那是枣、那是汤了。

这顿年夜饭我们吃得非常高兴。

我们习惯于把敌情侦察得十分准确。这在兵书上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去组织开进和展开，自己则开始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侦察。

我们化妆成贩私盐的小商人，踏着薄雪来到江边。乌江，真是一条名不虚传的“乌龙之江”。当我们拨开被积雪压

弯了腰的竹林，来到江边上的悬崖峭壁上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飞雪茫雾和“只闻乌江流水鸣溅溅”的诗意。我当然无心去欣赏这些，一个劲地用望远镜观察，收进视野里的却只是一团团被流水翻卷成气流的云雾，根本看不到对岸的情况。向当地老乡打听，才知道即使在平时万里无云的大晴天，江面上也是浓雾弥漫，能见度很差。显然，不能等云消雾散。我们当即果断决定：火力侦察——就象打漳州时那样。

我们调了四挺机枪和十几个步枪射手，向对岸射击，敌人果然“积极配合”，立即实施还击，我们的十几个侦察小组便记下他们的火力点，大大小小的火舌准确无误地标明了敌人的火力配系情况。根据火力侦察的情况判断，敌人在渡口配备的兵力不大，很可能是一个连。

为了对敌情了解得更确实，我去拜访一位老船工，他是当地唯一经常到北岸去的活地图。当见到这位瘦而硬朗的老人时，我先敬他一支香烟，然后，和气地开始了攀谈。

没想到那老船工很通达，边接烟边说：“长官，莫客气嘛。”

我给他点上火，问：“那边好打吗？”

“啥子？”

“我们想打过江去，你看好打吗？”

“你是说打‘双枪将’？”老人笑得咳嗽起来：“没啥子嘛。”

“双枪将？”我疑惑地问。

“他们的兵除长枪外，每人还有一条烟枪，所以叫‘双枪将’。”老人撇了撇嘴说：“这些大烟鬼连长枪都端不动，人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开过来，哪有打不开的。”

我们可说是谈笑风生，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虚实。原来，敌王家烈的“双枪将”侯之担部一旅，奉命在江北“防务”。在我们正对着的江对岸渡口上，配有一个连的部队，在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庙宇里驻扎了大部队，而半山腰里的部队，最大的官是团长。这个团沿江挖了防御工事。

老船工说，渡口上游里把地处，有一条极小的傍山小道，勉强可以单人通过，与渡口大道相连，但敌人已经在那里安插了“三十来条长枪”，显然，这是一个排。

我们把敌人的旅团预备队和连、排哨都摸得一清二楚，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开始渡江。

首先给敌人造成假象：我们要在他们认为最合适因而也投入了最大防守兵力的渡口处渡江。我们一面大张旗鼓地在渡口附近设立掩护阵地，一面把大批毛竹、木料搬来搬去，还摇旗呐喊，以助声威。守敌马上全部进入战位，又是火力封锁，又是加固工事。我从望远镜中观察到，半山腰里的一个路口上，不断有敌兵来来去去，大概是他们的传令兵。可见敌人“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

佯渡之“戏”一开始，我就带着一个营转移到隐蔽处，开始赶制竹筏。

我正在再次确定渡江计划时，三连连长毛振华找来了。

这个高大精壮的后生我很熟悉，他是我们湖南老乡，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原来也是个做田的后生，受不了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农民赤卫队，曾经投到贺龙的部队，当过贺龙同志的勤务兵。这次强渡乌江，他坚决要求参加尖兵队。

尖兵队的任务是把一条缆绳拖过江去。为了缩小目标而又保证实力，我们把这支先锋队的阵容定为十五人。为了争这十五个名额中的一个，全团几乎人人抢着去，象毛振华同志这样因争不上而又不服气，急眼之际直接找团长请战的，就有二三十人。

毛振华同志急呼呼地找到我，先是气喘吁吁地使劲拍打自己的胸脯，然后几乎是喊着说出了他考虑很久的话：

“耿飏团长同志，三连连长毛振华——也就是我，一定要当先锋队！”

我说：“看看，又来了，我不是讲过了吗，这个任务不同一般……”

“好，你说，我作战怎么样。”

“确实象头猛虎。”

“战术上？”

“机灵。”

“那为什么不让我去？”

我说：“毛伢子，这可是鬼水过江，不同于地面作战。”

“什么！”毛振华大为光火，子弹袋一解，三下五除二就脱光了衣服：“来来来，当场扎两个猛子给你们看看！”

要求当尖兵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越级找到红二师师长陈光那里。当时陈光同志一直在我们团指挥所指挥战斗。每当有人去缠他，他便说：“我看你们都行。不过得先过你们团长这一关。”

最后，有二十多人进入了“预选名单”，由毛振华同志为指挥员。党委又从中精选了八名壮士，组成尖兵队，为了加强登陆后的火力，我特意为他们配上了一个年轻的机枪手。

敌人被我们的佯攻吓得手忙脚乱。不多久，他们把迫击炮也调上来了，看来侯之担是决心死守了。我把毛振华等八名勇士带到上游五百米处的一片竹林里，一路上再三向他交代要“机动，灵活，出其不意。”他也再三向我保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这使我心里非常踏实。这八个严格挑选的勇士，个个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我坚信他们能够完成任务。

来到下水地点，雪停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八个勇士脱掉上衣，腰里插上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虎虎势势地站成了一排。看着他们因寒冷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的身躯，真是又心疼，又敬佩。我吩咐端上酒来，活络活络血脉。毛振华便整好队伍，向我报告：

“红四团渡江先锋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我一挥手：“出发！”

“扑通！”“扑通！”……八位勇士下水的声音，把我的心也带进了水里。朔风凛冽，冷雨似铁，很快就打透了我的军衣。一丈、两丈……他们游过去了。我们一边登高，一边在

波涛里寻找他们的踪迹。突然，江对面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企图，向勇士们射来密集的子弹，敌人的迫击炮也开始发射。炮弹是从远方位的敌人主阵地上打来的，由于地形、夹角等等因素，炮弹都落在勇士们的身后下游处。再看渡河的同志们，已经渡过了中流，正在奋力向对岸搏击。缆绳象一张大弓一样，拖在他们的身后。

“怎么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我从紧张中缓过神来，原来是师长来了。我正要报告，忽然，看见那条拖在尖兵队身后的缆绳，被炮弹炸中，炸点掀起一股水柱，绳子在水柱上断成一个“八”形，立即落进江面，被激流卷得无影无踪。

绳子一断，刚才还奋勇向前的尖兵队在浪涛中冒了一下，“唰”地被激流卷向下游。我急忙对身旁的一营长罗有保说：“快！派人接应！”同时命令：“抬竹筏，我亲自上。”

警卫员杨力一听我要亲自强渡，立即从背包里翻出那条旧车胎，鼓起腮帮往里吹气。因为我水性不好，得有它帮助才行。这小鬼也一直吵着要参加突击队，被特务排长以“保护首长安全”制止了。这回一听我要下水，知道自己也可去了，立即开始准备。

从来不干扰下级指挥的陈光师长这时发话了。他不同意我的决定，对我说：“冷静点嘛！抽支烟，想想办法。”

我手里本来有一支烟，刚才看他们渡河，紧张得都捏成一团烟泥了。师长的提醒，使我的急躁心里得到缓解。我和

师长商量了一下，作出决定：加强佯攻，以掩护阵地上的火力压制敌人，改泅渡为筏渡，由一个组增加为三个组，以提高成功系数。

罗有保把毛振华同志他们从下游接了回来。八个人只回来七个，有个瘦瘦的福建籍战士，由于受不了冰冷的江水，在途中发生了抽筋，被湍急的江流吞噬了。这是我们强渡乌江牺牲的第一个勇士。

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又决定改白天强渡为夜间偷渡。这次，求战的人更多，侦察连连长过去当过水手，这次又来找我们软缠硬磨。我对他说：你的任务是架桥，有你施展的地方。他只好憋着劲服从。

我再次与毛振华协同，让他带上手电、火柴，到达对岸后，给我们发联络信号。我说：“等你偷渡成功后，我即派一个营强渡，你们的任务是：在强渡开始后突然发起攻击，拔掉敌人设在渡口的连哨，然后配合一营在渡口设立阵地，掩护架桥。”

夜晚，漆黑如墨，一切全都淹没在沉沉的雾气里。毛振华他们将三个竹筏一字儿排开，带上武器、弹药，整装待发。我们团的领导走上去，与他们握手道别。没有更多的嘱托，我每握一个战士的手，只是低声而有力地说一句：“好好打！”同志们也只剩有一句：“团长放心！”

毛振华率先将筏撑进激流，只听一两声划水声音，他们的身影便被黑暗和涛声吞没了。江风又起，冰冷的江水溅透

了我的胶鞋，使人油然而生出“风萧萧兮江水寒”的心境。什么叫“望眼欲穿”？什么叫“提心吊胆”？当我在乌江边上面对波涛，盼望对岸那黑暗之中一点点火星的时候，正是这种心理状态。

细雨早已把我的衣服打透，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报告：“团长，第二只竹筏在江心碰上了大石头，翻到江里，他们游回来了。”

“唔。”我应了一声。当时想的是：只要人没损失就成。

已是下半夜了，风雨小了些，对岸出现了一些火把，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从位置上判断，是那条崎岖小路的上方，也是我们偷渡分队的登陆地点。敌人要干什么？是要加强这条小路的防守，还是发现了我们的企图？那两条竹筏现在怎么样？

天亮了，从下游又走回来一群湿淋淋的战士，他们是第三只竹筏上的人。原来，他们下水后，被激流冲得偏离了方向，直向下游漂去，只好返航转回。

可是毛振华他们呢？是遇险了还是到达了？是到达后潜伏下来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我们陷入深深的猜想中。这时，部队又扎成了大量的竹筏，还找来大批门板、绳索、木料和洋油桶等渡河器材。参谋长李英华带着满身泥水，来请示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决定再放大量竹排强渡，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渡口，并让李参谋长抓紧组织架桥。

正在这时，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带着几个同志赶来了。他问了问情况之后，同意了我们的方案。指示加快速度，因为敌薛岳部三个师，正在迅速向我们合围，军委要求我们越快越好。他一再说：决不可因为我们的延误，造成全体红军背水一战的局面。

张云逸局长还带来了军委工兵营的两个连，协助我们前卫团架桥。同时，让我们及时提出困难，全军协助完成任务。这些工兵战友们我十分熟悉，他们曾在苏区各种各样的河流上架起一座座桥梁。有他们来协助架桥，无异雪中送炭。我立即布置全团以主要力量强渡，立即做好下水准备，同时向工兵阵地走去。

前来加强的是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负责人还是于都河上指挥架桥的王耀南同志。他与我一样，也是矿工出身。一九二二年在安源暴动中参加了儿童团，后来随安源工人上了井冈山，组建了我军第一个工兵连。由他来负责架桥，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趁部队备战的间隙，我带上王耀南和一营营长罗有保以及几名侦察参谋，一起到沿江去察看地形。那天恰好被我弄到一套余庆（白泥）、瓮安（雍阳）两个县的地图，我们用地图和现地对照的方法在实地侦察，对渡口上下游十华里以内的地形进行了详细注记，哪怕是一块大石头，一棵大树，只要与渡江有关，都详细记下并讨论了利用预案。

我让他们根据侦察材料搞个架桥方案，便回到渡口向

师长报告并组织部队下水。这次我们用的全是赶制的三层竹排，一层炸坏，还有两层保险。出动六十架竹排，以整整一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

这天是雪后初晴，天气出奇的冷，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闪着银色的阳光。一声令下，六十个竹排分成三个大组，以前三角队形向对岸驶去。对岸没有动静。是不是敌人想搞“半渡而击”的战术？我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只见尖兵排的三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五十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枪声。

“哒哒哒……”枪声使江心里的勇士们振奋起来，改秘密前进为呐喊突击。一时间：“加油”“拚呀！”“杀！”声，响彻晴空。

但是，对岸的子弹似乎没往江心里放，而只有几颗流弹“滋滋——”地向天上钻去。

我顾不上这些，下令：吹号！

司号班一齐站在江边上，把进军号吹得震天响。岸上的火力组，江心的竹筏上，步机枪一齐朝敌人射击。竹筏上战士们赤着膊，一齐“嗨哟、嗨哟！”地用力划水，就象赛龙舟似的，强健的肌肉上冒着热气腾腾的汗水。

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忽然发现对岸的机枪声是从崖底下传出来的，那里，正有几个矫健的身影，攀登在峭壁上。哦，怪不得子弹不往江心打，原来那不是敌人打的枪，而是毛振华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昨天夜里,毛振华等同志在进入激流后,顺水飘下五六里路,经过拚力奋斗,终于登上了北岸。他们便乘夜向敌人方向摸去。走了一会儿,听到有叮叮当当修工事的声音,便不再前进。根据情况,判断出这正是我们要占领的渡口。按照约定,现在可以向南岸发信号了。可是这里离敌人太近,真可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时有碎石土块从敌人的工事上掉下来,落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他们没有发信号。

一股浓浓的大烟香味从附近飘过来。毛振华立即派侦察班长刘品章前去侦察。没过多久,刘品章和侦察员胡德利抓回一个哨兵,从而得知二十米远处,有敌人一个碉堡,“双枪将”们正躺在被窝里吞云吐雾哩。俘虏并供认,他们一共十二个人。

“打掉他!”毛连长决定夺下这个碉堡。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堵住“窝”逮了这帮“兔子”。之后,修工事的敌人完成了任务,也迫不及待地回去过大烟瘾了,江岸上恢复了平静。天,也渐渐地亮了。毛振华他们就隐蔽在夺下的碉堡里,直到大部队抵近江岸时,才突然出击,为大部队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掩护。

敌人被脚下、江面、南岸三方面的夹击,打乱了阵脚,只得天上一枪、地下一枪地乱打。

江心的竹筏更快地前进着,激起一簇簇的浪花。尖兵已经跃上滩头,向敌阵猛攻。不多时,渡口的敌人碉堡顶上,升

起了一面红旗——强渡成功了。

登陆部队一上岸，迅速扩大战果，控制制高点，反击敌人的反扑，我们立即组织后续部队过江。原先作掩护的二营集结到江边，焦急地等待着过江的竹筏返回。尽管往回撑筏的战士们拚命前进，我还是觉得太慢，太慢……在江边来回踱步已经不能发泄我焦急的心情了，便围上我那条旧轮胎，带领战士们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大声地向他们呼喊：快！快！

突然，对岸杀声又起，枪炮声骤然增大。原来，敌人的预备队上来了。他们用“羊群战术”，把一营又压回了江边。

我返回指挥所，命令三营加强火力。然而无济无事，距离太远了。一营的同志们情况危急，我急得出了一身汗，向陈光师长大喊：“炮！我要炮！”

于是，军委炮兵营的连长赵章成同志立刻被调了上来。陈光师长问他：“还有几发炮弹？”

“五发。”

“去，听耿团长的命令。”

我也顾不上礼节了，对赵章成同志和他的指导员王东保说：“别的不用管，就打崖上那一个‘人蛋’。”

那里，敌人挤成一团向一营压。一营处于仰攻地位，十分危险。

赵章成同志原是白军炮兵的军官，炮打得很准，但他信佛，而“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因此在射击前都要念一通经，或者抱起炮弹，抚摸着说一些“执行公务，上头的命令，

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他也不用什么瞄准具，只是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另一只跪在地上，单眼吊线，把炮弹送进炮膛。

八二迫击炮一声“啪”的脆响，炮弹象只黑乌鸦似地飞向敌阵，“轰”地爆炸了。但是炸点在敌人背后，敌群仍在向一营蠕动。

我向炮兵阵地跑过去。王东保看我着急的样子，迎上来说：“团长别急，刚才只是试射。”因为对岸敌我距离太近，所以赵章成要把效力射搞得十分精确。

“啪、啪、啪！”连续三声脆响，炮弹“乱鸦投林”般飞向敌群，正好炸开在敌人中间。敌人撂下一大片死尸向后溃退，一营乘势反扑，又占领了阵地。这时，二营的增援部队也到了岸边，我的心里才松了口气。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在这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

难都能克服，难道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正在这时，刘总参谋长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架桥的情况。王耀南同志也说：“连根大绳也没有，看来难度较大。”

刘伯承同志考虑了一下，指示我们发动群众，依靠战士、老乡解决材料和技术问题，我回到团里，让各连把入伍前当过木工、篾匠、铁匠等有专长的战士挑选出来，送到工兵连去，为他们加强一些技术力量。然后又来到刘伯承同志的地方，与军团、师首长们一起，讨论渡河问题。

当时曾考虑，如果实在不能架桥，便用船渡。但是附近的船不是被国民党烧掉了，就是被拉到了对岸。而船渡肯定慢，增加了掩护部队的负担，闹不好又是第二个湘江。

战士们的意见也不断送上来。工兵连一排长李景富提出：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李景富参军前是个渔民，经常在赣江里放排子用鱼鹰打鱼。刘总参谋长对此很感兴趣，连声说：“好么！好么！耿飏同志立即组织人试验！”

我与王耀南立即组织人扎竹排。这时，有一个战士说，若把竹排都连在一起不就可以成为浮桥了吗。“太妙了！”我当胸给他一拳，高兴地说：“你怎么才说啊？快，一齐到现场去看看。”用竹排架浮桥，我想有三个要点：一是要设法使几百个竹排固定在激流中，必须有大量锚；二是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作桥轴线并辅助作业；三是解决竹排与竹排之间的联结问题。

我们向刘伯承同志报告了这个“竹排浮桥”的方案，便

组织力量开始准备。首先把战士们分成几个专业组去找材料。没有绳子,就让参军前当过篾匠的战士编竹绳。这种竹篾编成的绳子在水里越泡越结实。没有锚,便派人到瓮安、余庆去征集了十几个铁匠用的大铁砧。最大量的工作是扎竹排。幸好当地有好几片毛竹林,可以大量砍伐,同志们带上工具,到竹林里“七里咔嚓”干了起来。那天竹上的积雪都化了,竹叶子挂满了一串串晶莹的水珠,人一摇动,水珠便“哗”一下洒落下来,把大家浇成落汤鸡。砍着砍着,我的警卫员杨力突然喊起来:“同志们,砍毛竹要分清公、母,不要杀光了,留点种啊!”

经过他解释,原来这竹子有公母之分,不但不能砍光,还要公母搭配着留下,它们才会在地下伸鞭生笋,繁衍生长。

我说:“对,留好种,让它再长出竹林来,胜利以后,我们还要用它们盖高楼大厦哩。”

于是,同志们便说着:“这棵还嫩,留它长几年盖楼。”“这棵是母的,让它做竹阿妈。”还有的说:“别人怎么知道是咱红四团留下的竹林呢?干脆插个木牌作纪念吧!”大家哄笑起来,干得更欢势了。

每个竹排由两层组成。每层用五根毛竹。我们把竹子上端的叉枝削净,在两端和中间各用小钻横打一个眼,然后用小竹竿穿连起来,再用竹绳捆紧。在竹排的一端,还用火烤一下,使它翘起来,以减轻水流阻力。

我把所有的工兵分队都集合起来，投入架桥战斗。根据事先的侦察，与工兵指挥员们一起确定了浮桥的位置。最后，我们确定以两岸的两棵树作为轴线。（用树木确定桥轴线，既结实，又简便，这还是在江西苏区时，徐彦刚同志教给我的。）然后就是拉一条竹绳过去，把两棵树连起来。

我们放一只竹排过去系缆。但是这只竹排被水冲下去好远。战士们便象纤夫拉船那样，硬是把它拖了回来，这样，在河面上就有了第一条竹缆绳。拉第二根竹绳时，有了第一根作攀扶，方便多了。

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渡口上的争夺战仍在激烈进行。敌人的江防被我们撕开口子后，附近沿江防线的兵力急剧向这边集结，炮弹直往江心里落，不断有人中弹落水。江面上无遮无掩，战士们只有一边用力固定竹排，一边愤怒地喊着“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来发泄仇恨。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

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是加快速度。而妨碍进度的作业是控制竹排向下流的漂移。江水奔腾，时不我待，我们无法截流控水，便用大量投锚的办法固定桥身。这样，前面所说的十几个铁砧是不够的。战士们便抬来巨石，或用竹篓把大量碎石装在一起，做成上千斤重的石锚，竹篓下再插两根尖竹，沉入水底，让它死死地拖住门桥。

浮桥向前伸展，电台里传来军团首长的表扬电报。正在这时，竹绳又不够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绑腿带！立刻，几百

副绑腿带集中起来，递到了前面捆扎组的手中。我立即命令后勤处长，到附近去买来一些布匹，撕成条条作捆扎用。

最后几节竹排撑进轴线，一道“天堑变通途”的浮桥，在狂涛骇浪中诞生了。我立即请刘伯承、张云逸等首长前来验收。刘总参谋长到达的时候，我团的后续部队正从桥上向北岸增援，刘总长连说：“好！好！你们立了功了。”他立即用电台通知林彪和聂荣臻，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首长来到桥边。这时，江对面的敌军已经被我们赶出很远，江面上晴空白云，江水在桥一侧涌起一道翻腾的白浪花。当毛主席走上桥头那用作跳板的门板时，我的心“通通”地跳了起来。毛主席一边听刘伯承同志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这时，周恩来同志看见了我，便拉了毛主席一起走到我这里来，微笑着说：

“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

我举手敬礼，大声报告：“请首长通过。”

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首夺天险娄山关

就在我们大战乌江渡口，架设江界浮桥的同时，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在龙溪渡口也展开了激战，并

乘坐竹排渡过了乌江。三军团的前卫师(红五师)亦在岩坑抢占了阵地,架起浮桥。各路大军斩关夺隘,向遵义挺进。“双枪将”王家烈部望风披靡,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把弹药、辎重、步枪、烟枪扔得满地都是。敌“江防司令”林秀生逃跑时,连司令部的机要文件都不要了。

我们从敌人丢弃的炮兵阵地上缴获了七十多发迫击炮弹,送给了军委炮兵营。赵章成同志十分高兴,连说:这下可不用愁了。他们每人一根扁担,挑上炮弹,“吱悠吱悠”地汇进了向遵义进军的洪流里。

红二师改由六团任前卫。刘伯承同志连夜赶往前线指挥战斗。他们冒雨开进,从东、南两面兵临遵义城下。迷信乌江天险的遵义守敌,这时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先头部队时,还以为是“自己人”哩。

六团在朱水秋、王集成同志的带领下,利用俘虏诈开城门,乘夜攻占了遵义。第二天云开雨歇,老百姓开门一看,满街都是红军,便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是怎么渡过乌江的呀?”

“神人相助,有‘水马’作坐骑……”

这种“水马渡乌江”的传说被编得活龙活现。敌人的头目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也有意造这种舆论。一时间,红军有“水马”、“盔甲”的神话,成为人们的谈资。进驻遵义的一支先头部队,干脆把“第一水马司令部”的字样号在房子上。

我们是紧随六团到达遵义的。长征以来,我们一直在大

山里钻，一看到遵义那鳞次栉比的建筑，大家一阵欢呼。遵义是贵州第二名城，市面繁华，民风古朴，当大家用洪亮的声音传告拿下遵义的消息时，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休息的疲劳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进入遵义东门，我让司号员吹休息号，以便大家整理一下被战斗和泥泞搞得有些惨不忍睹的军容，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各连司务长开始筹划采买，准备在这里补充粮食、被服、药品和其他军用必需品。

背包刚刚放下，我们就被一大群学生伢、老信子围上。他们一定要看我们的“水马”和“盔甲”。我们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信，再三地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干人’（穷人）嘛，与红军是一家呀”等等。这时，杨成武同志的伤已痊愈，回到了部队。他便乘机开展宣传工作，说得他们眉开眼笑地走了。

我乘机布置宿营。在乌江南岸时，部队因为渡江没过上新年。现在，我便让各单位按照红军老传统，着手安排开联欢会、会餐等活动，以兑现我所作的“到遵义补过新年”的许诺。

我们来到刚刚设立的团部，通信主任潘峰同志正在张罗着架设电话线，通讯员正在找地方安钉子挂挎包，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突然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嗯？”我刚刚解开腰带扣，武器、图袋都没解掉，立即又

扎紧了，只是把地图抽了出来。

刘总长说：“六团实际上是智取遵义，因此，敌人有三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了。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他在我已经展开的地图上指点着说：“你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

聂政委说：“六团昨天比较疲劳，该用着你们这个主力团了。怎么样？”

说实话，板凳还没坐热，让我们立即追击敌人，这确实是没有想到的。但我与杨成武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爽快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

首长们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强调说，任务紧急，兵贵神速，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途中去吃干粮。

“是！”我们立正答道。

刘伯承同志又对战斗作了具体指示，要求我们“夺关快、伤亡少。”最后还特地嘱咐：“记住，要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与你们师部联络。我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集合号把全团又汇拢起来，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城门。这时，那些放出去采买的给养员也匆匆赶回，一面入列，一面还在议论着：“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肆角”、“×连差点买下一口肥猪”“×连买了三匹布又退掉了”等等，看来，大家对在遵义仍未过上年的事，有点“遗憾”。但是，半小时后，这点遗憾很快就没有了，全团只是踩着泥泞，向前、向

前……

从遵义到娄山关约九十里，这是通往四川的孔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看着战士们几乎是一溜小跑的劲头，我对杨成武同志说：“你看大家还是很有精神的嘛，倒是我们过虑了。”

“当然罗，这就是我们四团的精神。没有这两下子算‘铁军’吗？”杨成武同志高兴地回答。我们拍马奔驰，向队伍先头驰去。

当天下午，部队抵达板桥镇。按照预期的部署，途中估计会有遭遇战，因此，各级指挥员都提前一级行军。果然，由通信主任潘峰率领的尖兵与敌接火。敌人大约有一个排，一触即溃，向娄山关逃窜。显然，这只是敌人的一支“触角”。而他们赖以顽抗的，是娄山关天险。

据群众反映，驻守板桥镇的敌兵本来就没打算与我们交手，而是早就准备逃跑。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大娄山的层层山间丛林里，升起团团雾霭，将远近高低的山峦锁缠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形下追击，显然无益。上级决定要我们在板桥休息一夜，准备明日向娄山关攻击。

一听说休息待命，战士们也不择条件，就地一躺便呼呼睡去。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向上级呈送了宿营报告，安排潘峰同志找向导，调查敌情社情，绘制行军作战地图之后，便与杨成武同志向街上走去。

按照红军的老传统，我们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

政策，宣传红军的任务。当时，我们四团大部分是福建、江西人，讲起话来贵州人听不懂，我只好发挥湖南话的“特长”，担负起“宣传”和翻译的角色。当我们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地主老财的剥削、军阀的掠夺，说明“干人”的贫穷与痛苦是从何而来时，群众纷纷痛诉苦情。有一户五口之家，除了一位年轻妇女有条满是破洞的短裤之外，其他人只有光着身子、合盖一床破絮度日。这就是贵州军阀长期统治的“政绩”。群众一致要求“红军先生”为他们申冤报仇。当晚，这个死气沉沉的山区小镇便灯火通明，充满了欢声笑语，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

我们正在与老乡谈话，忽见潘峰同志从山坳里带回一位老猎人。据他介绍，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过去曾是通往桐梓的唯一路径，后来修通了公路，便无人再走小道。接到这个情报，我真是喜出望外。老猎人说，这条小道年久失修，路上都是乱石头，而且比公路要远十多里路。我心想，这对我们红军当然不在话下。

第二天一早，忽然得到师部要我们休整一天的命令。我和杨成武同志决定利用这一天补过新年。幸亏打土豪时还剩下一些肥猪、鸡鸭、腊肉，本来是土豪们准备过春节用的，这下成了我们的年货。于是，压抑在心底的“过年”的欲望又被引发出来，连我们团的领导们都动手准备，搞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当我们正在吃饭时，有一位拄着拐棍的老人，手里提着一包东西，说是要亲自送给团长。我出去见他。他说：“我见您的军队是这样的好，不骂人，不打人，说话个个都和和气气，象对亲戚一样，我从心里佩服，特地送来一袋云南白药，表示我和我全家的敬意。”我向他道谢，请他和我们一道吃饭；他不肯，急忙告辞而去，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吃完饭，部队继续休息，我率领侦察分队前往娄山关进行实地侦察。

娄山关的险峻真是名不虚传。它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处，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峰宛如两把利剑刺向天穹，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真是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从遵义通往桐梓城的公路，沿着山间谷地蜿蜒而上，正好经过关口。要夺娄山关，必须从正面沿公路仰攻。我分析：守敌是侯之担部的三个团，经过乌江之战，已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对付这样的惊弓之鸟，倒没有什么困难。但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如果从左边直插云霄的高山和右边刀削般的绝壁之间取道硬攻，部队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不符合刘伯承总参谋长“夺关快，伤亡少”的要求。因此，必须采取正面强攻、侧翼抄袭的战术才能奏效。但是抄袭必得有路。左面的悬崖峭壁当然无法利用，右面的高山峻岭或许可以攀登。我和参谋们在地图上审视良久，想找出老猎人提供的那条小道，以便派出一支奇兵，从侧背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当晚，这一决定传达到每个连队干部，要大家今晚研究

方案并及时上报。同时找来十几个当地居民，由我与李英华同志向他们详细了解通往桐梓的小道的情况。经过全团反复酝酿，最后我们决定：抄袭分队先沿旧有的小道向娄山关抵近，然后横翻山岭，杀上娄山关侧后。在居民的协助下，侦察队和工兵排很快就征集了竹竿、绳索、钩镰等登山工具，全团也完成了临战准备。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进行，我们又确定了各级指挥员的代理人，以备万一在战斗中伤亡，不致中断指挥。

翌日（一月八日），部队由板桥镇出发，向娄山关前进。八时许逼近山脚。一营为前锋，担任正面主攻，新营长季光顺率领全营以梯队形展开前进；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在山脚下待命。但侦察队和右侧的迂回部队则早在三小时前、天还未亮时已由李英华和潘峰率领，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攀登右侧高山，向敌后攻击。

我们刚到山脚下，关上的守敌就开始射击了。有的参谋同志不禁骂道：“见鬼！还有两千多米他们就打枪，真是吓破胆了。”

这时，通讯班已经按照指定的第一根电话线接通了通往师部的电话。我到电话机那里准备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就听电话员们在那里一个劲地说：“怪事！”我问怎么回事，电话员报告说：“我们还没摇铃哪，电话里就有人唧唧喳喳乱嚷嚷。”我拿起听筒一听，果然，电话里已经有人在通话，一方说：“共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们猛攻，听到没

有？我们顶不住了。”声音又急促又恐慌，夹杂着沙沙的射击震动声。我扬扬手，招呼杨成武同志一起来听。这时，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军座交代，你们无论如何要顶住。已经派一个师去增援你们，快到松坎了。你们千万要注意东边的那条小道，加强警戒，提防共匪利用它偷袭桐梓城。记住没有？否则军法从事！”

这明明是侯之担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原来，我们在按刘总参谋长、聂政委的指示，利用原有遵义至桐梓的电线杆第一根电线沟通联络时，无意间与敌人的线路搭在一起了。虽然事先我们剪断了通往敌方的线路，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接通了。这倒为我们截获敌人情报提供了方便。从敌人的对话中，我们不但证实了右侧确实有一条小道直达桐梓，而且还了解到敌人有好几个团仍散布在山后的公路上，正在运动之中。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想不到这条小路还真是敌人的一个空虚缺口。于是，我把这一情况通报全团，并指定专人专门窃听和记录敌人的电话。又命令侧翼抄袭部队改隐蔽前进为虚张声势地行军，造成袭击桐梓城的态势，以“兵不厌诈”的手段干扰敌人的防御决心。同时命令：正面攻击的一营暂缓出动，待布置好压倒优势的火力后，一并总攻。

一个钟头后，一切总攻的部署都按计划完成，我正要发令，谁知“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正在这时，敌人的电话铃又响了。负责监听的战士兴奋地向我们招招手，我与

杨成武同志赶紧过去。这次发话的，还是敌人军部那个家伙，但已不是刚才那种漫不经心的官腔了，而是用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喂！侯师长吗？在你们侧后，发现共匪主力，正在向桐梓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即撤退，不然就会被截断后路。我们先走了，听到没有？”另一方则用恐慌的腔调说：“听到了。我马上执行。你们得掩护兄弟一下啊。”对方不等他拉着哭腔讲完，“卡”的挂掉了电话。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通话了。

杨成武同志说：“敌人要跑。”我说：“他跑不掉——立即总攻！”

十多把军号，向娄山关吹起了进攻的冲锋号，所有轻重机枪，霎时间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勇士们一跃而起，向娄山关猛扑上去。

敌人作垂死挣扎，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后面和掩体里，守着狭窄的关口。他们用机关枪、枪榴弹、石块，向我们射击和投掷。我主力部队则利用各种地形，向敌人准确地射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回荡在娄山关的山谷里。突然，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从山顶上传来，守敌顿时炸了营。原来，是李英华和潘峰率领的侧翼抄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沿那条废弃的小道进行到敌人左翼时，从斜刺里向敌后插去，有时要越过高高的山梁，有时要潜入深深的山谷，有时还要淌过一条条山溪。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便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径来。遇到断崖陡壁时，矮的地方他们就搭人梯；

高的地方，就用竹竿绑上钩镰，钩住崖边小树，再把绳子套在树蔸上，一个一个地往上攀登。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行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左边的山头，按计划参加了总攻。当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把集束手榴弹甩在守敌头上的时候，敌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增援部队打误会了呢。

我把上述的战斗情况用电话直接报告军团。军团领导在电话中不断地鼓励我们。

夹击成功大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战士们上起刺刀，与敌人逼近格斗。残敌见我们上了关口，已经无险可守，不顾军官的恫吓，纷纷弃枪丢炮而逃。我军则如摧枯拉朽，一口气追杀下去。从娄山关分水线（最高点）上看下去，沿途到处是敌人扔掉的枪枝、弹药、烟枪、军服、臂章、棉被、雨伞、包袱、背篓和乱飞乱飘的文件。我们的战士只是拣了武器弹药，谁也不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登上娄山关。首先看到的是敌尸横陈，污血斑斑，伤兵负痛哀号，俘虏跪地求饶。有个俘虏军官发了烟瘾，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看起来似乎比死还难受。再行几步，见有茅屋数间，一座石碑矗立在路旁，上面刻有“娄山关”三字。这时，我身踞高山雄关，蓝天白云，心胸感到无比开阔，不禁想起了古人“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诗句，便要了笔墨，在石壁上写下了这两句。现在，时过五十余年，那字迹恐怕早已被风雨和流光所消蚀。

这就是载于史书的“万峰插天，中有一线”的千古雄关。

一八六〇年，太平军由此北下桐梓，西征川南，曾假托李白之名刻下了“石笋如掉笔，悬于山之巅，谁谓不平者，与之书青天”的诗句。这无疑是太平军“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抒发。七十多年后，中国工农红军再次登上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时，那种为“不平”而“书青天”的涵义早已被赋予了新的意境。从此，娄山关成为中国革命里程碑上一个永远闪光的名字。在我们第一次由南向北攻占娄山关之后不久，红军又一次由北向南二下娄山关，经过两度鏖战，雄关更加巍峨壮丽。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喻为“真如铁”的“雄关”，确实被我们红军“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王家烈在关上筑了许多工事，本想以此挡住红军。可惜他太迷信了“关”的威力，让我们一脚踏破“山门”，边打边追，当天占领了桐梓城。

桐梓是古代传说的“夜郎国”都城。那个“夜郎自大”的典故，源出于此。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渊源的缘故，久居这里的“土皇帝”王家烈也象古代夜郎国王那样学会了吹牛皮。可惜，这次他的牛皮吹破了。

进驻桐梓之后，我们才发现王家烈确实把这座小城苦心经营了一番。王家烈和侯之担都是桐梓人，所以桐梓人在贵州军阀部队里当官的特别多，因而这里的洋楼比别的城市多。遵义没有电灯，而这里却有电灯。这座两万人的山城，有宽阔的公路，有几家工厂，还有一个小发电厂，因此吸引

了贵州的军阀、商人都来这里聚集，或建上一幢小楼，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蓄妾纳婢，寻欢作乐。红军一到，他们人去楼空，正好做了我们的宿营地。

我们每个排都分了一座小楼，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问这问那，怎么也弄不明白那电灯“怎么灯头冲下”？那留声机里“怎么藏着唱戏的”？

正当战士们休息时，管理员可忙坏了。他们抓紧时间，购买布匹，准备给全团人员每人做一套衣服。

杨成武同志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发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为被白军破坏了的电厂恢复发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电厂运煤。担架连和团直机关的同志们忙了一下午，电厂点火了。大家正瞅着电灯看他怎么“着”呢，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来了，见了我们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马上出发！”

“向哪？”

“向北。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

从师长政委的神情中，我们感到这任务非同小可，于是，经过简短的动员，全团在进驻桐梓不到半天后，连电灯如何亮也没看上，就打起背包，检查完群众纪律，重新踏上了征程。

奔袭四十里，当晚宿营牛栏关。侦察队四处派出活动小组，连连抓到几个敌人的散兵。一问，原来我们插到敌人前

卫部队的序列里来了。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占了牛栏关，四个团的兵力还在稀稀拉拉地沿公路行军呢。我们便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摆开伏击阵势，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当即消灭敌人两个团，剩余之敌被我们一阵猛冲，溃不成军，一部分缩回松坎，一部分遁入山林，当土匪去了。

为了占领松坎，我们也不恋战，吃了干粮就走，一路上见敌就打，打完再走。这些敌人也怪，常常是一触即垮，这又得归功于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水马”、“盔甲”之类的神话。在途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我尖兵在夜暗中与敌人一股部队遭遇，敌人扭头就跑，边跑边喊：“红军先生，机枪扔在草垛里啦。”

一夜奔袭，拂晓赶到松坎。敌人刚刚做好早饭，还没吃一口，就被我们赶出了镇子。俘虏惊讶地说：前天你们还在娄山关，怎么一夜之间就到了？难道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啊？”

师部令我们就地警戒川西方向的敌人，并休整七天。同时，命令我到红一师报到，担任参谋长。

四渡赤水 再克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我奉命调到红一师任参谋长。命令来的有些突然，当时，我们红四团正在松坎休整，总结乌江和娄山关战斗，并负责警戒四川重庆方面来的敌

人。我们把前哨一直放到二十里外的山上，从那里可以隔江看到川南的情况。

当时还不知道遵义正在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只是按照命令在松坎警戒。连日无战事，我与杨成武同志在巡视部队之余，常常借一块向阳的土坎或背风的草垛，躺在那里晒太阳。因为他是伤口初愈，我是大病刚好，借着早春那暖洋洋的日光，恢复一下体力，迎接更大的战斗。我那一阵迷上了口琴，一躺下来，便拿出口琴吹支歌子。有一次，不知哪位同志和着我的口琴声唱了起来：

哎呀来！

炮火声呀战号声，
唱个山歌给你听，
快与敌人决死战，
红军哥呀，
一马打到抚州城。

哎呀来！

多捉师长送你们，
姐妹不必挂在心，
前次捉了陈麻子，
同志妹哟，

这次要捉“总司令”……

这是在江西时红军剧社编的一首男女声对唱，这位同志又学男又学女，唱得警卫员们都拍手叫好。

我正吹得在兴头上，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同志翻身坐起，推动我的身子，让我停下来：

“哎！我说同志哥，等革命胜利了，你最大的愿望是哪种？”

我先不回答他，“多多米米”地吹下去，逗得这个比我年轻四岁的小老弟发急了，然后才慢慢地反问：

“你说呢？”

“他们都说莫斯科不错，咱们将来要能到那里去一趟，该多好。”他又翻身躺下去。这时，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娃娃般的天真神情。而我大概也“成熟”不了多少，便接话道：

“对！咱们呀，一块去。”

“带上红四团。”杨成武同志说。

“要得要得。还是潘峰带侦察队当前兵（即尖兵）。不过，我得换换骡子，你那匹骡子蹬蹶子呢。”

“……哈哈。”温馨的春日里，回响起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只有莫斯科是个“圣地”，一有空就猜那“红场”有多大。建国后我出任大使，路过莫斯科，特意去了一趟红场。结果使我有点遗憾：原来，那红场还没咱

们天安门广场三分之一大。

当然，那时我们向往红场，主要是因为那里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地方。

我与杨成武同志在一起两年的时间，带领红四团浴血奋战，结下了很深的战斗友谊。所以当接到调我去红一师的命令后，彼此都有点恋恋不舍。那时也没什么条件搞欢送会，我们一起到连排去看望了同志们，有的同志还抹眼泪。我说，反正还在一个军团，在战场上会天天见面的。

新任团长卢子美还未到任。我向杨成武和李英华同志交待了工作和指挥器材，便上路了。考虑到杨成武同志的腿伤，我执意要把我那头比较温顺的骡子留给他。因为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政委的担子就更重了，没有顺心的脚力怎么行？

杨成武同志说什么也不肯留。他说：“你当了师参谋长，比我的担子更重，更需要。骑走，骑走！”

告别那天，杨成武同志送了一程又一程，我的警卫员杨力牵着那匹性情温顺的骡子跟在后边。直到一道高高的土坎上，我们才依依惜别，我上马挥手，直向桐梓奔去。

桐梓城已经成了红一军团的大本营，到处是大标语。红军战士在街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往日军阀豪绅住的那些小洋楼，驻满了红军机关和部队，市面上秩序井然，红军买卖公平，许多店铺正在为各部队赶制定做的干粮和服装。当时红军的纸币在这里还不流通。各单位便到毛泽民同志领

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银行”去兑换成光洋。群众连夸红军“好！好！”穿上了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行进在街上，可神气了。

我到了一师师部，向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报到，接替了原参谋长聂鹤亭的职务。我在红三军九师任参谋长时，李聚奎同志就担任过九师师长，他指挥战斗的特点我十分熟悉。熟人相见，分外亲切。中午，师部还专门杀了一口肥猪，我们用大脸盆盛肉，围在一起，吃了个痛快。

我到任的当天，军团长林彪也从遵义开完会回来了（聂政委由于脚伤未到），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李德一句话也不说，神情抑郁，怕见人似地溜到他的住处，一直没有露面。当晚，军团命令我们向川西宜宾、泸州一线进军。

从各方面汇拢来的敌情是这样的：我一方面军攻下遵义后，蒋介石既怕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活跃在那里的四方面军会合；又怕中央红军东出湖南，同战斗在那里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急令湘、鄂、川、陕四省敌军，加紧对红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的围攻，同时，调集了他的嫡系薛岳兵团和全部黔军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的主力部队，向遵义实施进逼包围。我们收到的军团通报说，薛岳指挥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八个师之众，已经尾追我军进入贵州。军委命令我们向川南急进，目的是打破敌人这种四面围攻的严重局面，北渡长江。

红一师作为右纵从桐梓出发，经箭头垭进入四川，驻在一个叫石壕村的小地方。这一路上没有大的战斗，因为敌人主力还在调动中，但沿途那些地主民团的武装十分讨厌。这一带地主武装的格局，与我们在江西见到的那些“土围子”不同。他们往往利用山上的巨大溶洞做据点，纠集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大部分是顽匪），骚扰和袭击我们。这些可恶的家伙“狡兔三窟”，十分难缠。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行军，我便派出几个侦察小组，配以工兵，沿途在前方一定范围内专打这些匪洞。只要把他们面向我们行军路径的洞口炸塌，这些地方民团也就没什么大威胁了。

从石壕出发后，陆续与敌人主力接触，但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一月二十四日，我们抵达土城镇。黔军刘翰吾部队已占领了一些高地，一见红军到达，跑得比兔子还快，窜回赤水县城去了。

刘翰吾从土城逃回赤水，大造“赤匪大兵压境，无力阻挡”的舆论，以掩盖其败绩。这种惊恐的情绪，使敌人慌忙调大军堵截。川军章安平旅急急从先市过赤水河，沿公路迎头杀来。敌十三旅达凤冈部，进入赤水县城，与逃往那里的“双枪将”侯之担残部，联手布防，其一个团沿赤水河逆流而上，做前卫阻击状。

二十五日，我红一师到达旺隆场，决定按军委命令，拿下赤水县城。作为参谋长，我便带领侦察队前出，了解赤水敌情。我们化装成一些找活干的老百姓，在一个小镇子上打

尖。这时，恰好敌人的镇长在抓挑夫，要把一捆捆的谷草挑到赤水县城去给刚刚开到县城的川军做铺草用。他看见了我们，就想抓我们。我一看苗头不对，就派一名侦察队员去和他周旋，其余的人，乘着乱烘烘的情景，迅速偷偷离开。过了一会，那名侦察队员也溜回来了。

我向李聚奎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觉得可以利用“送干草”为掩护，把一支尖兵派进城去，待攻城时做个内应。当天晚上，我们在旺隆场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红三团做前卫并派出尖兵入城。

我连夜与他们商定了作战方案。选两个排的兵力，将枪支藏在草捆里，化装成挑夫。前卫营尾随其后相隔约半里路光景跟进，第二天拂晓行动。

哪知，第二天当我们按计划行动后，化妆成挑夫的尖兵，与两股敌人遭遇，敌人在盘问中，发现这些“挑夫”的口音不对，说的是“江西式贵州话”，便发生怀疑。前卫营一见不妙，立即先敌开火，一场遭遇战就这样打响了。

红三团与敌人交火时，师部主力尚在行军中。敌抢先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先与三团形成对峙，接着，敌人设在左侧的堡垒也展开火力，把我们压制在狭窄的正面上，不能展开作战。李聚奎同志命令设法解除敌钳制，我当即率能攻善战的红一团占领黄皮洞高地，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局势稍有缓和。但这时，敌人右卫第二团又增援上来，在羊蹄山、平桥附近与我军接触，旋即抢占鸡公山，控制了右翼。

尽管是一场遭遇战，且形势于我不利，但红军将士异常勇敢。已经交火的部队，拚死扩大防线；尚未展开的部队，在指挥员的率领下，快速机动，克服一切困难占领有利地形，投入战斗。尽管敌人又有几个团相继赶来参战，并增配了炮兵，仍然不能前进一步，双方形成对峙。

就在我们大战黄皮洞的同时，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也已抵达土城。他们与温水开来的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第六团（均为川军）在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也打成了对峙。是日，整个土城地区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这场恶战整整打了一天。

这股川军是初出巢穴，锐气正炽，敌人的旅、团长等都上阵督战，因此比较难啃。但是他们同其他敌军一样，深知与我军作战，时间拖长了于自己不利，都急于尽快取胜，便频频向后方呼叫援兵。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刘湘所调集的三十多个团的兵力，便从四面八方围来。

激战中，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鉴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援兵将至，原定占赤水、向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注定受阻，久战对我不利。于是，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一军团二师返回元厚集结，我们红一师做后卫，在旺隆至元厚间阻击敌人。我与红二团一起，坚持到第二天黄昏才撤出战斗。

我与谭政主任（一师政治部主任）处理好伤员时，已是

二十八日晚上，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林彪在电话里说，你去当个调整哨，过河要快，但不能乱。

赤水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乌蒙山（云南镇雄），河面时宽时窄，流速时缓时疾，是川、黔、滇交界处的一条重要水道。为了解决背水迎敌的困境，必须迅速架起一座要渡几万兵马的浮桥。工兵分队的同志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一夜之间，架成了两座浮桥。

我们的渡河地点在猿猴渡口（即元厚场），仍然是军委工兵营长王耀南同志在指挥架桥。我赶到现场后，用七只盐船搭成的浮桥已经架好。这些船是伪区长范小赖拉的民船，准备接应川军用的，现在成了我们的渡河工具。我站在桥头，命令先到达的部队过河，告诉他们不要拥挤，不要在桥上走齐步。就这样送走一支，再接一支，整整过了一夜。

为了防止这些船再被敌人利用，我们向船主付了钱，把船炸毁，以断敌追路。

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李聚奎、黄甦、谭政和我到他那里去。由于我未能去，毛主席便给我写了一封信带回。毛主席那天向我们师的领导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据李聚奎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委领导问题，并说，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还讲了我们应该采取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

毛主席在给我捎来的信中，表扬了我和原四团同志们在道州、乌江几次架桥的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我听到这些消息和接到毛主席的信，自然十分高兴。

我军一渡赤水后，把川军远远地甩在后面。我红一师派三团围着赤水河打转转，掩护我军主力行动。红三团曾多次陷入敌人重围，队伍被打散又聚起来，与主力失掉联系，又根据兄弟部队用过的路标找回来，在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的带领下，于二月十五日归建。二月二十日，红军二渡赤水，彻底摆脱了川军，使蒋介石包围红军的美梦破灭。

二渡赤水前，李聚奎师长让我给部队作一个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我就趁在云南镇州短期休整的机会，召集全师军人大会。那时还没有秘书起草报告的条件，我便画了一张很大的地图，画好之后走到一百多步的地方试试是否看得见，就以这张图做辅助，讲了敌人四十万大军从东南、西南、正北三个方向向我军紧逼的情况。由于敌我双方用红黑颜色做了区别，因此大家听得、看得都十分明白。我说：“为了突破这个包围圈，我军暂不向西了，要在贵州、云南、四川边界上实施战略机动，与蒋介石捉上一阵子迷藏再说。”我最后特别说明“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我们在古蔺二渡赤水以后，红一师的行动路线大体上是磨家山——二郎滩——水口寺——太平渡——黄泥坡——范家田——圆水罐——稜坎上——观音石——岔水——施家坟——团山堡——金堂寺，然后一头扎进桐梓县

境，占领高桥镇。

这是一段“弯弯绕”式的奇特行军，有的同志说：“哎呀，我都转迷糊了。”我说：“那就说明蒋介石更迷糊了。”过去那总是追在屁股后面的枪炮声不见了，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整几天了。因为，那个振奋人心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没来得及向部队传达哩。黄甦政委和我开玩笑说：“你这当参谋长的，可得给咱找个好地方开会哟。”我说：“要得嘛，没别的，大地主四合院，拣最好的作会场，警戒放出去二十里，保证会议开得舒服、安全。”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营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遵义会议决议，每人发一张《告红军指战员书》。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我一直保存在身边。

中央军委审时度势，纵观全局，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要“向北流窜”的错觉，挥戈东南，给比较薄弱的黔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再克遵义，重入贵州。

毛主席这一着，真是一手绝妙好棋。

当时，敌人的各路大军，几乎全部被我们引到了川滇黔边界，我四方面军也在长江以北积极配合。敌人断定，我中央红军必向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无疑。当我们红一团突然掉头攻击桐梓城的时候，城里只有两个连的守敌。这些被我军打怕了的“双枪兵”立即向娄山关逃去。二十五日拂晓，我军重占桐梓，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役打响了。各路红军沿公路向南急进。这一带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地形很

熟悉，人民记忆犹新，甚至连向导都是告别不久的熟人，一听说红军又回来了，纷纷打问各部队番号，自动前来引路。同时有许多伤员也伤愈归队。

红三军团由北向南，再次攻占娄山关。这次行动是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敌人急令其中央军向遵义驰援，但远水不解近渴，王家烈只好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部队刘鹤鸣的第六团守娄山关。三军团从左中右三面围攻娄山关。战斗中，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也出了大力。

娄山关一破，遵义无险可守。我军续攻遵义。二十八日，一、三军团会攻遵义，我随师部进至鸭溪。二十九日下午六时，从五里堡方向传来军号声，我们仔细一听，是军团部用号音命令“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的通知。

我们立即纵马赶到五里堡，来到军团长林彪的住处。他住的是一所木板房，房间很宽大。林彪有个习惯，喜欢在他住的地方挂地图，这天他的房间里整整一面墙壁都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由于我们当时的地图全靠缴获敌人的，有些地方的地图没有，左权参谋长和几个参谋就在白纸上画简图。

一见这阵势，我们知道有大仗打了。正在忙着的左权同志还向我借地图用，以便补充他们空缺的那些地方。我说，我手里也没有这些地方的图，等打完仗有了缴获一定给你送来。

那天是临时作战会议，但军团部准备得蛮充分。林彪给

我们下达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然后就是到现场区分任务。军团司令部弄了些洋学生的服装，让我们都穿戴起来，有的背着书包、提着网袋，还有的拿着画夹子，化妆成一群外出野游的学生。林彪说，不准带警卫员，不准牵马，我们“探险”去。

我们到遵义外围踏勘了道路，沿途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间或也有一两个“溜号”的兵痞，躺在路边抽大烟。从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我们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林彪最后决定：二师向南追，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我让他给一个具体范围。林彪说，可以追出一百里。

当晚，遵义外围大追击开始了。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

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做停住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猪猡似的。我们

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揪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打火了，一下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原来，这股敌人半夜曾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抢了老百姓一些红苕煮饭吃，刚点上火，被另一股溃兵咋唬：“红军来了！”吓得拔腿就跑，结果饭也没吃成，被那些咋唬的敌人把红苕吃光了。他们逃到这里以后，又刚刚把抢来的洋芋、红苕煮上，我们就赶到了，他还以为又是来“诈”饭吃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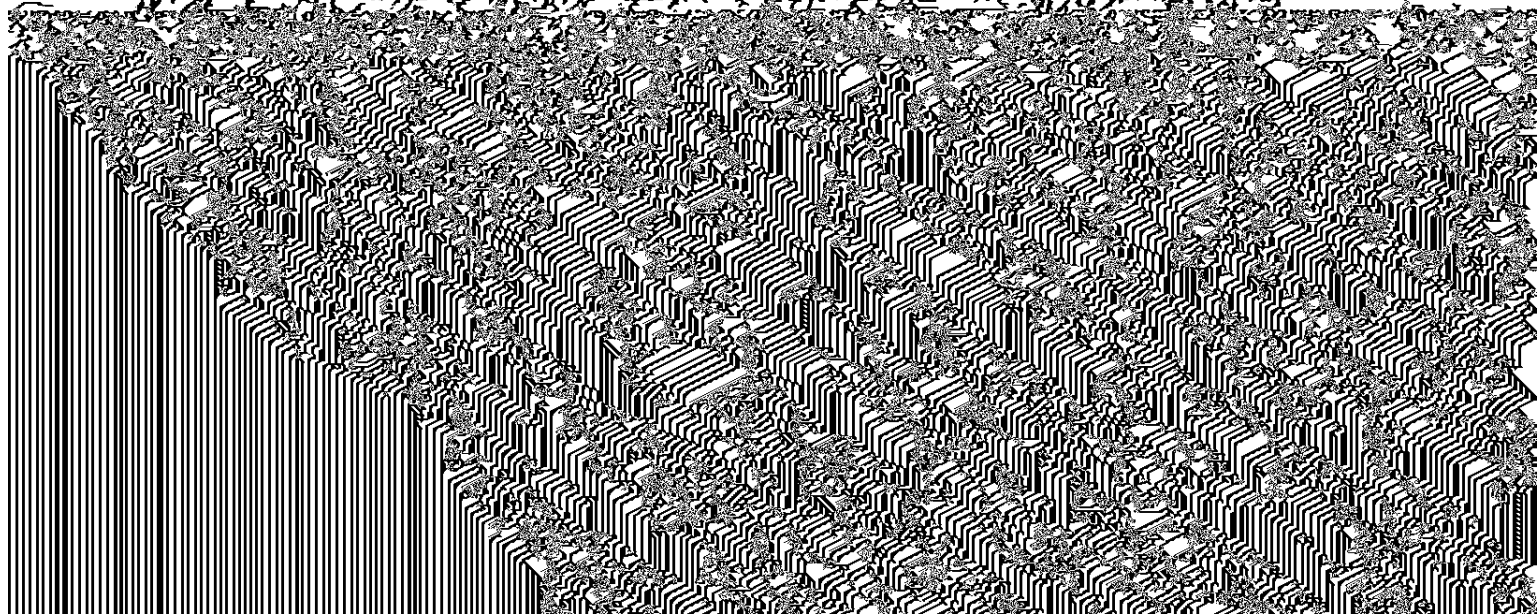
果然，在庙后边的坟地里，有几锅煮着的红苕、洋芋，已经发出甜甜的香气，我们把俘虏整顿好，太阳也出来了。我们拿了点自己吃，其余的吩咐俘虏们吃了赶路。他们一窝蜂似地涌上来，抢了个一干二净。那个“副师长”看着他手下的狼狈相，有些难堪地对我说：“妈拉巴子，真不象话。”

我说：“那怪谁呀，是你们自己把士兵搞成这个样子的么。”

在遵义，我们用了三四天时间，才把俘虏处理完。那些被俘的敌军军官，看到我们这些红军指挥员（唯一的标志是身上挂一个盛地图的皮包），往往拿出怀表、金笔什么的，以求免杀。我们总是严辞拒绝，并申明俘虏政策。这些敌军在明白了之后，很多人加入了红军的队伍。说也怪，同样一个人，在白军里是草包，经过我们一番教育，并十分信任地发给他一枝枪，他便成了红军中的勇士。

在追击中，三团还缴获敌人一辆载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的汽车。这些地图比几百枝枪还珍贵。团参谋长彭明治派人给师部送来，我从中挑出几套，其余的，交给左权参谋长了。

三月二日，我们回到遵义城。近两个月来，我们围着这座城市转了几圈，但这次是我第一次进城住下。第二天上午，军委召集附近部队团以上干部，在一所中学的礼堂里召开祝捷大会。中午，还搞了胜利大会餐。我们就蹲在地上，围着几大盆菜，嘻嘻哈哈地吃起来。最活跃的是陈赓同志，他像当年在江西苏区会餐时一样，一会儿当客气的主人，向大家让菜，说：“吃呀，吃呀，大家辛苦了。”一会儿又当“挑刺”的客，说：“怎么搞的，我们还没吃饱嘛，再加点菜呀。”他



闻趣事。这个说：就像赶鸭子一样。那个说，比赶绵羊还容易。宣传队还编了快板，歌颂胜利，鼓舞斗志。

红一方面军再克遵义后，得到了较好的补充和休整。当时已是春天，正是“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季节，我的疟疾已经完全康复。部队由于连打胜仗，士气高昂。三月十日，我军主动放弃遵义，向西北迎击来犯的周浑元部。

本来，据各路侦察员报告，周浑元部有向我进攻的企图，我军想乘机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但周浑元与红军作战日久，深知轻举妄动的后果，只是虚晃一枪，便缩在仁怀（即茅台）至鲁班场一线，呼叫南线的薛岳部前来合围。我军即灵活地改变战略，于十六日攻占仁怀。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我军攻占茅台后，薛岳纵队已尾随而来，频频派飞机轰炸我军阵地，并且与周浑元部形成会攻之势。我军即撤出茅台，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开向古蔺。敌人判断我军仍是向北与二、六军团会合，下令周、薛两敌紧追不舍。不意我军突然调头，向东突转，于三月二十一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利用前几天走过的浮桥四渡赤水，然后向南挺进，在遵义到茅台间直插乌江边的刀靶水渡口。我红一师三团冒着大雨乘竹筏过江，将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击溃，掩护工兵连架

起浮桥，全军再次渡过乌江，前锋直逼贵阳。

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剿匪”。红军连日扑朔迷离的行动，搅得他坐立不安。他曾对红军的去向作过种种判断，唯独没想到红军会向贵阳逼进。当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城郊时，蒋介石吓得失魂落魄，急令滇军“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保驾，同时让贵阳警备司令部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听用，准备逃命。

红军四渡赤水，变被动为主动，直至兵临贵阳城下，将蒋介石吓成惊弓之鸟，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转折。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那样，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后来，在向昆明方向进军的路上，我拣到一张报纸，看到那个“土皇帝”王家烈，已被蒋介石“严惩不贷”了。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我与李聚奎师长率领红一师从贵阳、龙里间通过贵阳城郊。当时，蒋介石调来“保驾”的滇军已经到达贵阳和龙里。贵阳和龙里间只有六七十里之隔，有公路相连，中间只有约三十华里的一个狭窄的口子可供我军通过。因此，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起来了。

在公路旁的一个小镇子上，我们遇到了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他对我们讲，敌人到了七个师，如果从两面

夹击我们，情况就不妙了。现在中央纵队尚未通过，你们就归我指挥，在这里守住，无论哪方面来的敌人，都要坚决打回去。

我们一直坚守到中央纵队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才撤出阵地，按原计划赶到全军的左翼前卫归建。部队掉头向西，渡过北盘江，大踏步进入云南境内，攻占了曲靖县城。

云南守敌由于被蒋介石东调入黔，所以境内空虚，只有一些团防部队保着昆明空城，于是军阀龙云急调各地武装部队来昆明助守，但我军却在昆明西北虚晃一枪，掉头向北，直插金沙江边。

金沙江居长江上游，由宜宾溯江而上，流经川、滇边的一段，古称泸水（川西怒江亦称泸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泸水附近。这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十分险要。红一师从元谋出发，我率红一团为前卫，急行军去抢龙街渡口。渡口是抢到了，但渡船都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们决定架桥。

由于水流太急，桥架到中流，就被冲得七零八落，根据在乌江架桥的经验，必须设法拉一条缆绳连接两岸，做中轴线用，才能使桥身稳定。于是一团团团长杨得志同志把他的骡子赶下水，想让它把一根铁丝拉过去。但是江水太急，骡子游到中流，也被冲了下去，幸好那匹牲口是杨得志同志用熟的坐骑，被冲下去后划了个半圆又游了回来，才没有丢失。

这个办法不行，只好再找器材，用大量的石锚固定桥

身,但进度十分慢。这时军团来了电话,让我们立即赶到皎平渡去过江。

我们连夜出发,向一百二十里外的皎平渡赶去。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而是从一条条穿流在山峦中的小溪上踩着滑溜溜的石头淌过去的,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一到皎平渡,邓小平、刘伯承同志就指挥我们立即过江。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在对岸的一个洞子里,一直了望部队过河,等我们赶到时,已是全军最后一支部队了。

渡过金沙江后,前方没有大的敌情,尾追之敌也被甩开七天的路程。等他们打听到我军行踪,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已遁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大山,追敌只好“望江兴叹”。后来红军剧社编了一个话剧,描写敌人几十万大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到金沙江畔时,不过拣到几只烂草鞋。这样形容他们的“战果”,真是恰如其份。

我们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南山区。我随红一团走前卫,于五月十七日攻占了德昌,绕过西昌,进到泸沽。军委决定由红一团加强工兵和通讯分队,组成北上先遣队。先遣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聂荣臻同志任政委,为全体红军做战略侦察和开辟通路。

川西南一带是彝汉杂居的地区。先遣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末夏初。气候转热,地气上升,天空终日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由于当地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大部分同志还未来得及换装,部队中病号增加,有的同志突然发病,喘息一阵

后就牺牲了。开始，大家以为是中暑，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呼吸了“瘴气”所致。这里所谓的“瘴气”，实际上是地面上多年积存的落叶、枯草、动物尸体等腐烂物发酵出来的沼气。这个地方大多是四面环山的深谷，高山阻挡了风的流动，沼气便在山谷中越来越浓地弥漫着，等它超过了一定的浓度，人呼吸了“瘴气”便会中毒。这时我记起了在走出江西苏区时老中医教给我的民间验方——“七叶灵芝草”可以驱除瘴气，便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这个验方果然有效。

不仅是瘴气，水里也有毒。《三国演义》记叙诸葛亮“五月渡泸”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马岱见水浅大半不下筏，裸衣而过，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马岱大惊，连夜回告孔明，孔明唤向导土人问之。

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泸水，日间甚热，毒气正发，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饮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时，须待夜静水冷，毒气不起，饱食渡之，方可无事。

孔明令扎起竹筏，半夜渡水，果然无事。

这是因为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把腐植质里的有毒物质也冲下来溶解在水里。喝了这种水，会使人声音嘶哑，甚至失声，并伴有腹泻、肠胃绞痛等症状。我想起在我们湖南老家，每逢有人要出远门时，总是要让他带上一包家乡的黄土，在外地遇上“水土不服”情况时，就放一点在水里，佐以生姜、辣椒、大蒜、豆豉，煮开后饮下。这个土方说不上有

多少道理,但确实管用。我们便组织大家找些辣椒、山葱、大蒜等煮开服用,以解除水里的毒质。这个方法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占领了冕宁县城。守敌早已望风而逃。但监狱里关押了许多彝族人,他们中有许多是首领,是被国民党政府当做人质关在这里的。这些人并不了解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而是把汉人统统视为敌人。由于语言不通,也无法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我们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大部分人怒气冲冲一哄而散,回到各自的部落里去了。只有少数人被请了来,刘伯承、聂荣臻同志还摆了酒宴与他们洽谈,请了通司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民族政策,气氛才见缓和。第二天,刘伯承同志又按照当地风俗,与彝族的“咕基”部落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在一个海子边饮了鸡血酒。举行这个结拜仪式时,我也在场。刘伯承同志是四川人,过去曾在川西工作过,懂得当地民俗,对彝族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他在结拜仪式上的表现,使小叶丹十分佩服。结拜后,我们送给小叶丹一面锦旗,还有一些武器和光洋。小叶丹也按他们的最高规格,送了两个彝族女青年参加红军。

当时我们先遣队仍然为前卫,我还担任侦察尖兵队的指挥,便问刘伯承同志怎么通过彝族区。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用彝民方言谈了一阵,小叶丹便解下自己的佩刀,让我们拿着。原来这是一把木刀。之后,遇有彝民阻挡时,我们便

出示木刀为凭，果然畅通无阻。

但是小叶丹的信物也不是万灵的。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咕基”部落。后来我们走到另外一个部落时，又遭到了彝民的伏击。那天我们正沿一条傍山小河向前侦察，天近傍晚，我身边的警卫员杨力突然纵马跃上高坡，大声喝问：“什么人？出来！”说着便拔出信号枪向对面山坡上的灌木丛射了一发。灌木丛中立刻惊慌地窜出几个黑影，向我们放箭，差点把我射中，由于他们没见过信号弹，以为遇到妖魔，放了几箭后便远远地逃走了。

我们把射来的箭拣回去交给指挥部，经辨认那上面的记号，知道是“倮洪族”部落的，这个部落历代与“咕基”部落有仇，两家正在“打冤家”。因此，红军与“咕基”家结拜，引起他们的敌视。当时有些零散的红军人员，被彝民拦住，剥光了衣服，只是由于我们的指战员坚决执行民族政策，才没造成大的冲突。

通过彝民区后，我们奉命去抢安顺场，为大部队通过大渡河开路。时值天降大雨，部队在大雨中一天一夜行军一百四十多里，占领了安顺场附近的马鞍山。渡口守敌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样快。杨得志、黎林同志率领部队猛扑过去，消灭了守敌一个营，并夺得两条船。这两条船是对岸守敌派过来搬家的，其他的船都被敌人拉走了。

红一团立即组织渡河，动员了船夫，组织了十七名勇士在炮兵和掩护火力的支援下，强渡过去，占领了滩头阵地，

掩护先遣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

我是同杨得志同志一起过河的。由于船小，骡马等辎重都留在原地，后来从泸定桥上走了过去。

我们乘船到达大渡河中间时，轰轰的流水声震耳欲聋，连对岸激烈的枪炮声都被盖住了。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最凶险的河流，流速每秒四米，河中礁石交错，浪花很快就将衣服湿透了。要不是那些熟悉水性又了解河流状况的老船工，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靠两条船渡过河去。

五月二十七日，我师二、三团也过了河。李聚奎同志告诉我，毛泽东和林彪已经到了渡口，鉴于几万大军接踵而至，仅靠两条小船渡河，势必旷日持久，不利于摆脱后面的追兵，因此，决定迅速夺取上游的泸定桥。他让我组织部队强行军，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进发。

我们仍由刘、聂率领，同时还有干部团前来加强，向北赶往泸定桥。西岸由林彪指挥，以二师四团为前锋。两岸齐头并进，二百四十里路程限两天赶到。

我们基本上是边走边打，因为东岸守敌虽然被击溃了，并没走远，不时发生遭遇战。这些敌人沿途布置了火力，准备隔河向二师的部队射击，我们就沿途扫清他们。一天晚上，师部竟与敌人宿营到一个小村子里了，于是发生一场混战，我们抓了不少俘虏。审问后知道敌人也在打泸定桥的主意，妄想让“朱毛作第二个石达开”。我们干脆放弃休息，连夜向泸定桥赶去。是夜两岸火把通明，有我们的，也有敌人

的。越往上游走，河面越窄，天亮时我发现我们的位置正与对岸的二师四团走在一条平行线上。他们的队列里有我十分熟悉的身影。四团的同志们也发现了我，纷纷喊话，打手势，我也向他们扬起手，表示快走，看谁走得快。

我们不但互相鼓舞，还互相侦察报告敌情。因为从互相不同的角度，可以发现对面前方阻击的敌人，每当发现了前方敌人，双方就用手势，用号音互相告知，互相用火力支援，歼灭敌人后，又不顾一切地向前急驰。

二十九日晨，四团在王开湘、杨成武同志的率领下，占领泸定铁索桥西岸。他们面对敌人放下的熊熊大火和九根光溜溜的铁索，组织了英雄突击队，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

于此同时，东岸我师的部队也在大雨中攻占了泸定城，将守敌二十八团向天全方向击溃。至此，两岸夹击夺取泸定铁索桥的计划得到了完全实现。

刘伯承司令走上四团夺取的泸定桥后，心中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在铺好的门板上连踩三脚，悲喜交集地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精力，现在我们胜利了！”

四十四年后，聂荣臻同志回忆当时两支英雄部队飞夺泸定桥的情形，写下了“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见分晓”的诗篇，准确地写出了当年红军过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和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主要过程。读这首诗，当

年那军情急如星火，两岸勇士争先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雪山草地 苦难风流

在长征途中，我每天记日记，记了厚厚一大本，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斯诺借去用，辗转丢失了。现在仅能回忆起其中一篇，还是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作为作文作业补记的。

雪 山 草 地

川藏边的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常常于六月雪、七月冰(雹)。一年四季都是冬。属高寒山区，再加高山反应、氧气稀薄、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过往行人易染消化不良、拉肚子、头昏眼花、胸闷气短、脸上脱皮、嘴唇干裂、头脸浮肿、四肢无力。

草地有腐臭味。泥潭很深，自几米到十几米。普遍罩着浓雾。水草区域是大片沼泽、淤泥、黑水。

.....

我是与红一团一起走过大雪山的。那天我与杨得志、黎林同志插在前卫营中间行进。军团通知我们必须在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之间通过夹金山。上山之前，军团长林彪解除了一道不许吃辣椒的禁令，准许部队可以吃辣椒，以使身体温暖。

我自幼当矿工、练武术，体质还算不错。因此在通过大雪山时，没有遇上多大的不适。倒是我那匹骡子费了我们好

大劲,因为山上风大、路滑,骡子直打跌。我让杨力同志协助牵马的战士拣没有雪的地方走,谁知那些地方更滑。原来,那些看来乌黑的石头上,大风把雪吹光了,却结着一层坚硬的冰壳,人马一踏上去,无不“四仰八叉”地重重摔倒。看到这种情形,队列里便轰然大笑。快到山顶时,再有这种场面,大家便笑不出来了。因为空气稀薄,心脏只是狂跳,象要从喉咙里窜出来一般,腿也直打颤。我们借助拐棍,不时地往嘴里放几颗盐巴,人抓住马,马靠着人,连推带拉,才登上了山顶。

下山时我们干脆坐“滑梯”,当天翻过夹金山,进入藏民游牧区。

开始,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到了牧区,吃肉没问题。可是由于藏民受敌人的反动宣传,不仅把牛羊都赶走了,而且把粮食也埋藏起来,居民全部跑光。我们只好挖地里的豌豆苗充饥。为了不损坏群众纪律,在地头上放几块钱,作为赔偿。

在两河口,我们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会师那天,正值大雨滂沱,部队冒雨举行了欢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仪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欢迎大会,并举行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

两师相会,真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相遇一样,大家奔走相告,兴高彩烈。我们与三十军八十八师驻在一个村子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同志还设宴招待了我们红一师的领导们。

礼尚往来，我们尽管无法设宴，还是尽量搞了些礼物。郑维山同志说他缺手枪子弹，我当即把一条子弹带送给他，有三百多发，郑维山同志连说“礼重了！礼重了！”十分高兴地收下。那时他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管理部队，却显得坚决果断，严格有方。

在两河口会师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失骡得马”的事。

就在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到陕川边建立根据地、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我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

这匹骡子可是我的“宝贝”。它从不失蹄，一般情况下很有点“忠厚老实”的品格。杨成武同志腿部负伤后，我把它换给杨成武同志骑；行军路上有的小鬼病了，它便是病号的“担架”；有时，收容队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用它驮着，它便“忍辱负重”，忠实地走在行军队列中。但是只要有战斗，它便换了一付样子，瞪眼竖耳，尾巴一蹶便往敌群中冲击。它熟悉了我们的各种信号，无论空袭、突围，都显出战马特有的机警与敏捷，真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

现在，这匹骡子连同我专门给它订做的一套鞍具，一起失踪了。我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后来，一想各部队的骡马众多，可能是牲口“恋群”混在一起了，反正在哪个兄弟部队都是为革命而使用它，因此，就决定不再找寻。

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我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去。

翻过几座山，我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这些马群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

当时，内地一些商人，到藏民区做生意，据说一小把“洋火”、一撮盐巴，就可换一匹好马。有的商人换到马以后，一时无法带走，便寄养在卖主家里，由人家代养。有时，这些商人几年不归，马群里寄养的马产下小马，小马又下了小马，将来也如数归还买主。我们看到的这几群马，就是多年没人认领的寄养马群。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一匹匹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我看中了一匹“儿马”，决定征用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很不好靠近，我们也没有什么套马工具，只能徒手穷追。我追的那匹马遍体雪白，四个蹄子是黑色的，很像《三国》里说的那匹“的卢”马。我抓住它的尾巴，那马由于负痛，后半部下沉，我便飞身骑上去，但是这种光溜溜的“骡马”无抓无挽，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甩了下来，于是我也上了倔脾气，再追，再上。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后来成了我的绝招，在陕北体育运动会上多次为部队表演过。

折腾了一天，我已滚成泥人了，那匹马也被我治服了。由于这是匹领头马，所以当我们把它骑回驻地时，后面跟来一大溜，有十几匹。

我们把这些马配上鞍子后，正巧朱总司令要到四方面军去。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我说：“总司令，这小

骡子能骑呀？”

朱德同志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我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到我们那么多好马，朱总司令高兴的摸摸这匹，拍拍那匹，把我拉到一边：

“耿飏，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我说完全可以。朱德同志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们有马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同志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一再要我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我们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我只剩那匹白马了。

此后不久，我们到达黑水。为了准备过草地的粮食，我率一个营到芦花方向筹粮。

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布置了些反动武装，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藏民便组织了武装袭击我们。在筹粮的途中，我们遇到红六团一个十三四岁的小鬼。原来他们一个连到芦花筹粮，被藏民包围。藏民说，只要红军丢一枝枪出来，便放他们过去。这个连照样做了，谁知，等藏民一哄而上，冲到红军面前来抢这支枪时，土司安排在里面的亲信便乘乱向我军射击。我们的战士被迫还击，结果发生混战，一个连

除这名小鬼侥幸逃脱外,全部牺牲。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惕。于是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我们到达芦花,藏民果然从四面山上向我们打冷枪,并集体发出哇哇的叫声向我们示威。由于一时找不到通司,我们只好占领一座房子,先做好自卫准备。

我们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房顶都用一袋袋的砂土垒成工事。四面八方的藏民开始向我们围拢,时而发出哇哇的叫声向我们集团冲锋,但当冲到我们阵地前不远时,害怕我们射击,又突然惊恐地撤回去。在这时,其中几个为首的就暴露了。因为进攻时他们缩在后面,手舞足蹈地鼓动人们冲锋,后撤时他们又跑在前头,所以暴露了他们作为指挥者的身份。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考虑到他们手中的枪支不多,我向部队做了严格的交待:一般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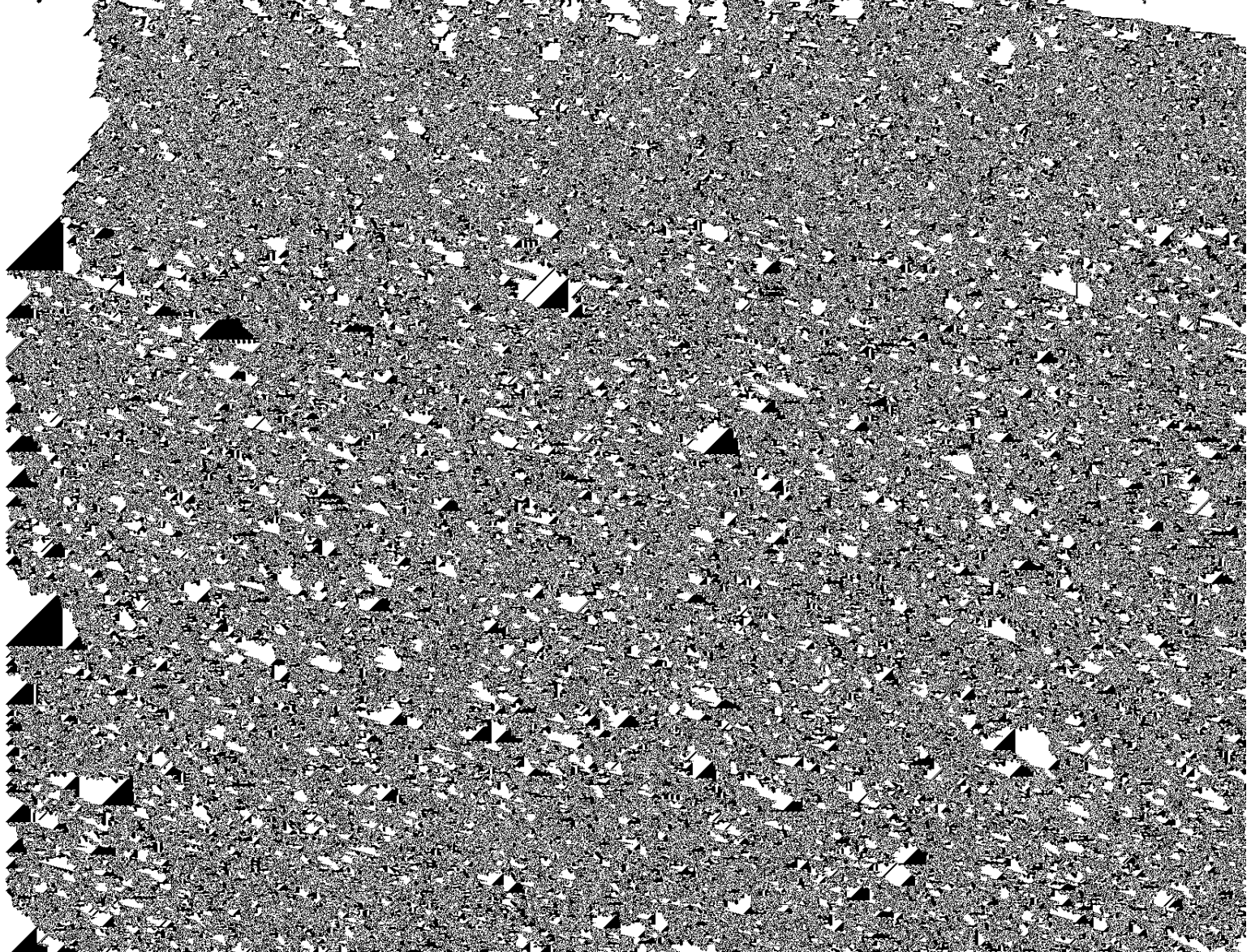
入夜,我们这种“空枪”战术已经不灵,而藏民越聚越多。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无法判断他们的距离,我便试着用望远镜观察。从此我才知道,即使没有“红外线”夜视装置,普通望远镜在星光下观察,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朦胧的星光中,收进望远镜视野里的是一团黑的和灰白的景物。颜色比天空要深得多的黑色影子,便是一百米

处的人影，他们被凸透镜放得很大，一耸一耸地向我们爬来。从挥手指挥的动作上判断，那几个指挥者现在是在队伍的前面，大概是由于在夜暗中行动，他们以为红军看不到的缘故吧。

我灵机一动，叫通信员向司号班长要来一支信号枪和几发信号弹。等藏民离我们的工事还有三四十米时向空中“嘭”地打出一发。

信号弹划出一道明亮的圆弧，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象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一样，把大地照得透亮。藏民们先是一楞，接着发出惊恐的叫喊，扭头就跑。我们便让战士向无人处投几颗手榴弹，发出“轰轰”的爆



我们是作为右路军通过水草地的。一师沿着二师留下的路标前进，从毛儿盖出发，走了几个小时，便钻进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森林里不见日光，就象走进一顶硕大无朋的帐篷一样。走出这片丛林地带，茫茫无际的水草地就呈现在面前。

六百里草地，那种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是世上少有的。红军过草地的艰难困苦，许多老同志都曾描述过。一汪汪的黑水、泥潭，一丛丛的杂草、枯叶，没有可做标志的地形地物，只是一望无际的水汪、草丛、泥潭。草地上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臭气，腐草沉积，在泥潭上覆盖着，发出“扑、扑”的叹息。天气一日多变，狂风、浓雾、暴雨、雪粒、烈日、冰雹，轮番向我们袭击。虽说是走在平地上，却比爬山还累。不知什么时候，脚下的腐草便会突然冒出一个泥坑来，这时就得赶紧卧倒，从泥坑上面滚过去，稍一怠慢，就会陷下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有的同志想去救人，结果会一起被泥浆吞没。

在水草地里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我的干粮带里装的是青稞面，刚进草地就被一场大雨浇成了面糊糊，再经太阳一晒，结成了一团团又黑又硬的坨坨。后来就连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本来，我们在芦花、黑水筹集了一些食物，可是在毛儿盖，由于张国焘对红军的去向出尔反尔，一会儿同意向北，一会儿坚持往西，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就把所有筹集的食物，吃得一干二净。

草地绝粮，我的警卫员杨力同志又病了。他开始还扶着马走，突然一阵晕眩，就倒下了。由于连续的行军，再加上气候恶劣、吃不上饭，同志们身体虚弱到极点。许多同志就那样走着，走着，慢慢地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杨力同志的病很重，只有一点微弱的呼吸，牙关紧闭，面色苍白，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现在有一口热汤就能救他的命，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轻轻地呼唤他：“小杨！坚持住，我们快走出去了。”

同志们就地找了些枯草，用钢盔烧了点热水，给杨力同志灌下去，他才苏醒过来。我让大家把他扶到我那匹马上。他坚决不肯，要求留下等收容队。我说那怎么行？收容队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收容能力了，唯一能做到的是掩盖烈士的遗体。

幸亏我那匹马还比较健壮，它四个蹄子又大又圆，不容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了不少力。草地绝粮时，我几次想忍痛把它杀掉，但同志们坚决拦下了。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许多同志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发现一种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茎叶，后边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吃了草根后，衰弱的胃无法消化这样粗纤维的东西，疼得满头大汗。

我唯一能帮助他的，就是把仅存的几盒香烟拿一盒给他。当时断烟的还有红一团政委黎林同志。他身体不好，一条腿一跛一跛的。我本想把不多的香烟节约着“发”给他们，坚持到走出草地。可是这几个“老枪”实在忍不住，很快就把我的烟拿光了。之后便抽树叶、干草，直到班佑才有了补充。

晚上，各单位只能找一块稍干一点的高地，点起篝火过夜。不知谁把脚伸到篝火旁，睡熟后把皮鞋烤糊了。皮鞋在泥水里泡了几天，皮子都软化走硝，被火一烤，散发出牛皮的焦糊味，于是发现这东西是可以吃的。这样我们就开始吃皮鞋、皮带、马鞍子上的皮部件等。这些东西要在水里煮六、七个小时，煮成胶冻状，才能吞下去。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粘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象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杨力的病很快就好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从此，这片亘古无人通行的沼泽写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许多革命先烈，永远留在了草地上，使我们永远追怀着他们的业绩。

九月中旬，我们到达班佑，按原定计划，应该向巴西与左路军会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这一会师计划未能实现。张国焘顽固地拒绝党的教育、批评和等待，下令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离开右路军，回师南下，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后来我到四军任参谋长时，警卫员胡大芳同志告诉我：他们是三过草地，吃尽了苦头。

右路军到达哈达铺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在一纵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

九月底，我们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座万余人口的城池，消灭了鲁大昌部。部队在这里休整，我带一个侦察队向六盘山方向侦察。

这一带是真正的“黄土高坡”，几乎连棵树木都没有，在路上只要有行人或车辆，便会扬起阵阵黄土。我们为数不多的几匹马跑起来更是烟尘翻卷，噎得人喘不过气来，走不多远，便“风尘仆仆”了，连鼻孔、耳朵、眼里都塞满了黄土。但是这里的民风淳朴，人民对红军十分友好。当地人吃的大锅饼，直径足有五十公分，三指来厚，外酥里软，又香又甜，吃后特别充饥，这使我们这些刚刚从草地走出来的红军将士大饱口福。

连日没有侦察到敌情，晚上，我们便在渭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宿营。到了陕北，大家心情轻松，扯到那条传说中姜太公钓过鱼的渭河时，不由得开玩笑说：就这么一条小河呀？看来姜太公也钓不到多大的鱼。其实，当年姜太公钓鱼是在渭河中下游河面宽阔的地方。话题自然又回到我们在水草地用枪通条钓粘鱼的情形，大家对红军整整一年的万里长征又是一番回忆，在秋高气爽的甘南九月里，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在哈达铺时我们借宿在一户农民家里，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向房东说明要买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仔细地从墙上起下了那块巴掌大的消息。

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有甚用？”我说：“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

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

十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一齐骑马来到通渭我们大队部。杨得志同志拉上我去见中央领导，一见面，大家纷纷问好，都说“瘦

了,瘦了!”杨得志同志把我拉到一边,说:“老耿,怎么招待他们呀?”

我说:“你汇报工作,我来安排招待。”

通渭城内有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我找到老板,让他给办两桌价值十块光洋的酒席。

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但又告诉我,这里比较贫瘠,恐怕办不好。当时,一块钱可以买五只鸡或一头羊呐。

我说:“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解得,解得。”老板保证说。

由于人比较多,本来安排了两桌;到吃饭时,毛泽东同志连说:“合兵!合兵!”当时把会师叫做合兵。于是我们将两桌合在一起。大家连连碰碗,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起酒来。

酒有两坛,碗又大,毛泽东同志兴致很高,和我们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干了一次,微微有些醉了。于是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同志一见有西瓜吃,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同志尝一口。

张闻天同志咬了一口,连叫“太辣!”

毛泽东同志哈哈大笑:“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大家都被这句话逗笑了。

.....

当晚，中央领导们就宿在我们驻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长们住的地方。

过半夜了，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走出住处，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一动不动地抬头望着夜空中那璀璨的繁星。

过了好久，巡逻的哨兵向这边走来。毛泽东同志一回头，发现了我，并且一下就认了出来，便说：“那不是耿飏吗？”

我走过去向他敬礼，问道：“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呀？”

毛泽东同志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走，咱们走远点。”

我们边抽烟边遛达。毛主席说：“你怎么没休息呀？”

我说：“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我悄悄地对他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四个连哪。”

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他用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划了个大圆圈：“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我静静地听着，久久地回味着这句话：

“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第二天，我们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向六盘山进发了。

在那里，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六盘山》。

路，向明天延伸

如果说，一年前红军从江西苏区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要进行长达一年的艰难奋战的话；那末，当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并得到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红军指战员都明确地感觉到：长征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开始与红一大队一起走前卫，向六盘山方向进发。我仍然负责带一支侦察队作尖兵，为主力开路。在西(安)兰(州)公路上，我们捕获了几名白军侦察兵。开始，这些白军佯称自己是“红军”。问他们的番号、驻地和指挥员姓名时，他们胡诌一通，还声明他们是“当地红军”。

我说：“算了，你们别装了，哪有满口湖南话的‘当地红军’哟”！

他们不得不承认是毛炳文的部下。第一次反“围剿”时，我们捉了张辉瓒，击溃谭道源，毛炳文见事不好，溜之大吉。后来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激战中，他的第八师被我们痛歼。现在他又追到陕北，真是冤家路窄。

敌人大概也知道与我们作战凶多吉少，所以只是截击了几次，都被我们打散。这些俘虏经过教育后，都参加了红

军。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是我们醴陵人。由于我与大队长杨得志同志都是醴陵人，所以他们纷纷来认“老乡”。

在青石嘴，我们侦察到一个毛炳文部骑兵团。这个骑兵团大概赶了好远的路，在村子里宿营；敌人一点戒备都没有，马匹都松了肚带，卸下鞍具，有的在打滚，有的在溜腿。我们一个冲锋进去，敌人顿时蒙了，少数反应快的骑上骡马逃窜，大部分连人带马当了俘虏。我们用缴获的马匹和装备，成立了第一个骑兵连。

毛主席对我说：“你们总结一下打骑兵的经验。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指敌骑兵）了。听说陕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哩。”

我说：“在草地上我们遇到过藏民上层势力的骑兵。乍一看，他们倏忽而来，倏忽而去，速度非常之快。但只要两三个人背靠背围成一圈，专门射击他的坐骑，他就难于施展其伎俩了。我们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

毛泽东同志听得很有兴趣，笑着说：“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打了几次骑兵，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开始主动出击。那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纠缠我们一个多月了；当地老乡都称他们为“马大胡子”，据说剽悍得很。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把这条“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一、二纵队便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三个骑兵团彻底击溃，连

他们的马术教官也俘虏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吴旗镇。吴旗镇原名吴起镇，是为纪念战国名将吴起而定名的。我们先打了一仗，把追在后面的骑兵彻底打退，不让他们跟进我根据地。

当挂在一个窑洞门口的那块“苏维埃”的牌子映入眼帘的时候，队列里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啊！到家了，到家了！……”

陕北老乡围上来，尽管我们还听不懂那些“打哪哒来呀？”“做甚去呀？”的方言，不熟悉那些“山羊绵羊白花花，哥哥来到妹妹家”的民歌；但是一声声“同志”，叫得人人热泪盈眶，一碗碗枣花茶，喝得大家眉开眼笑。

久违了，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住进了老乡的窑洞里，感到是那么温暖和舒适。房东大娘“娃呀、娃呀”地呼唤着，慈祥地看看这个、问问那个，真如慈母一般。

我是穿着一双胶鞋走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山山水水，三百六十七天炮火硝烟，那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时值深秋，胶鞋穿上去又硬又凉。房东大娘不知怎么量去了鞋样，第三天早晨，一双千层底、青布帮、底子上纳着红五星的“踢死牛”的老山鞋就摆在了我的炕前。

我感激不尽，便走到房东住的窑洞里去道谢。只见那位大娘正组织了五、六个妇女，围在一起赶做军鞋哩。老大娘

边赶做边鼓动：“加油哇！娃们还要赶路哪！”

是啊，万里长征走完了，但革命的路还长着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党中央正在部署新的战斗任务，让会师后的各路红军，打一场“开门红”的歼灭战。

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我们去看地形。我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的团以上指挥员先在张村驿会合，然后骑马到一座山上去观察战场。山脚下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我们展开地图，知道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镇就是直罗镇。

根据毛主席的部署，左权同志带着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转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大家现地标图，明确了战斗任务，各路指挥员举着望远镜，都不约而同地对直罗镇东边的一个小寨子多看了几眼。这个小寨子，有点象江西苏区的“土围子”，有可能被敌人利用。于是决定：战前派部队拆毁它。

部队里那些老兵，一看我们的行动，知道有大仗打了，真是磨拳擦掌，枕戈待旦。待机地域的各部驻地，不时飞出一阵阵《会师歌》：

南北红军大会合，
同心协力来救国。
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

一个万里长征打遍全中国……

当时，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向关内推进，蚕食华北；而是孤注一掷，投入大量兵力向红军“围剿”。中央红军一到陕北，敌六十七军、五十七军便向富（麟）县一带合围，意欲在葫芦河与洛河之间与我军决战。

当时正值十一月中旬，陕北已近寒冬，河流结冰，天空飘起清雪。从江西苏区一直为我作警卫员的杨力同志，这时已是副连长了，却一直还穿着一身夹衣。尽管当地人民作出了大力支援，部队中仍有部分同志还没换上冬装，个别的甚至还穿着短褂。我设法给杨力搞了两块毡，小得可怜，只能一前一后，当作背心。杨力见我有些过意不去，便说：

“参谋长，你莫费心了。等打完五十七军，我们肯定能换装了。”

五十七军属东北军。士兵都装备有棉衣棉鞋、狗皮帽子，军官还有皮大衣。杨力的话，使我感到了红军官兵敢打必胜的决心。

敌先头部队五十七军（董英斌部）一〇九师，果然如期进入直罗镇。他们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沿结了冰的洛河开进我军为他掘好的坟墓。这个师的师长姓牛，所以部队中响起一片“捉牛”的呼声。

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展开总攻。一军团由北向南，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把敌人包围在直罗镇三面环山、一边临水的

山谷里。

战斗在拂晓打响。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我告诉他敌人毫无准备，已经被打乱了营。他又问东北军与南方军阀的部队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由于我正在组织战斗，还没来得及归纳总结，便告诉他：

“特点就是——这些敌人在投降时，知道先用白毛巾向我们摆几下。南方的敌人很少有这样做的，跪地投降而已。”

左权参谋长笑起来：“好嘛，这说明东北军比南方敌军规范些，知道使用国际通用的信号。”

敌人的地面指挥体系被打乱，但天空飞来六架飞机助战，进行垂死挣扎。敌师长牛元峰躲进镇东北那座破寨子里，死守待援。我们于当天中午解决了谷地上的敌人。晚上又去攻那座土寨子。这座土寨事先已被我十五军团拆毁，残敌仓惶加以修复，在里面呼叫附近的敌一〇六师前来营救。这时已不可能有援兵来。牛元峰只好向黑水寺方向逃跑，但终于还是被活捉了。

直罗镇全歼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五千三百多名被俘，缴获各种枪枝、小炮、电台四千余件，子弹二十二万多发。大批被服落到我们手中。毛泽东同志在一方面军干部大会上对这次战斗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行了一个奠基

礼。”

敌一〇九师覆没于直罗镇后，红一军团又冒雪奔袭太白镇，将敌一〇六师一个团歼灭，其残余兵力仓惶逃遁。一〇六师是敌人第二梯队，他们一逃跑，其他各部一发不可收拾，纷纷向合水一线退却。同时，敌东路军也放弃郿县（今富县）。蒋介石发动的对陕北第三次“围剿”宣告破产。

但是，敌一一〇师仍然占据甘泉。甘泉是延安南大门，为延（安）西（安）公路上的咽喉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回到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德怀同志留在前方，指挥各部箝制敌人。接着，我们奉命围攻甘泉。

我与杨得志同志组织部队向甘泉进发，部队由于新胜，士气很高，行军十分活跃。当时我与杨得志同志都换了新的坐骑，他是一匹白马，我是一匹青马，那马膘肥体壮，真象唐三彩的瓷马一样，背阔鬃长，臀部浑圆。陈赓同志便鼓动我们赛马。那时我们正当二十多岁，对这类活动很有兴趣，于是拍马奔驰，杨得志同志渐渐冲到了前头，引得部队阵阵喝彩。哪知正在兴头上，马前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一只野兔，白马受惊，急停躲避，将杨得志同志抛下马来，他当时竟昏了过去。

我急出了一身汗，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警卫人员赶上来，将他抬到马上，走出二十多里路，他才缓过劲来。以后杨得志同志再也不骑那匹马了。前年我们两人还谈起当年那

次“赛马历险记”，为年轻时的鲁莽而慨叹。

甘泉县城是一个傍山大镇，城墙虽是用黄土夯成的，但十分结实，有一半在山上，有一半在河边，确实易守难攻。我们周密侦察后，决定从靠山的那面爆破，炸开缺口冲进去。担任爆破的仍然是长征路上担任架桥的王耀南同志。

王耀南同志报给我一个爆破方案，计划用挖地道的办法，向城墙底部打一条隧道，到达城墙后，开出药室，然后装上炸药引爆。这个办法在没有石头的黄土高原上，无疑是个减少伤亡、隐蔽接敌的好方案，但计算隧道长度，在当时却是一大难题，工兵营找了一些小“诸葛亮”，反复核实，最后报给我一张图纸，我问是否准确，他们说，不但计算无误，还利用夜暗实地丈量了长度，万无一失。

于是工兵开始作业，我便亲率突击队准备攻城。几天后，隧道挖成，借了老乡一口棺材，装满炸药放在隧道尽头的药室里，突击队同时运动至出击地域，只等一声巨响，突袭入城。

那天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月黑风高之夜。我伏在突击队的前沿，等各路人马报告就位后，用电话向王耀南下令：“起爆！”

一千斤 TNT 炸药的威力，真有山崩地裂之势，爆烟窜起几十米，把守敌的城墙严严实实地捂了起来。不等土块、断枝落完，我们率突击队向炸点扑去，哪知到达预定的突破口时，我们才大吃一惊——城墙根本未被炸开，倒是在离城

墙几米远的山坡上，掀开一个大洞。原来，问题出在我最担心的计算上：山坡是斜的，隧道是直的，按数学上的三角原理，正是一个标准的“勾、股、弦”，而搞计算的同志仅仅按水平距离算出了隧道长度，没有把三角关系考虑在内，因此，炸点与城墙误差甚远。

爆破失败，但我们突击队已兵临城下，因此，我们下令在城墙上挖洞，重新组织直接爆破。守敌开始被巨大的爆炸声吓蒙了，这下已缓过劲来，紧急组织增援。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城上守敌的射击死角，于是他们便丢手榴弹。由于距离太近，从城墙上扔下的手榴弹直接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便抓住弹体“回敬”回去。尽管如此，还是有几枚在附近炸开了，我只觉耳边“嗡”一声，一块弹片在耳朵下边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滋出老高。

这样，临时爆破无法实施，加上我已负伤，突击队的营长便组织掩护撤退，后续部队见我们没有得手，亦停止了攻击。

脖子上的伤口不能象四肢上的伤口那样捆扎止血，幸亏我有随身携带的云南白药，还是在长征路上的一位好心的老信子送的，便敷上一些，果然十分灵验。

陈赓、罗瑞卿、杨得志等同志纷纷来看我的伤势，他们都十分着急。陈赓同志说：“哎呀，我们离军团部这么远，姜齐贤同志又没随一纵行动，这可怎么办哪？”我说：“不必大惊小怪，离掉脑袋还远着哪，我还可以骑马呢！”

正说着,彭德怀同志闻讯赶来,一看伤的位置,大叫“不好,只用点白药凑合可不行。”他立即叫警卫参谋要通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的电话,请徐海东同志让戴部长火速赶来。

当时,徐海东同志病得很厉害,中央领导同志把红军最好的医生,即卫生部长“戴胡子”派给他了。徐海东同志一听我负了伤,立即把自己的骡子给戴胡子骑,让他星夜奔驰二百多里,赶到甘泉前线。

戴胡子一见面就责备我:

“耿飏你不要命了?伤到这程度还骑马到处跑!”

我说:“戴胡子你别大惊小怪。我的伤我知道,不过削了块肉去,没伤着骨头。”

他说:“伤了骨头你早完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部位?这是‘危险三角区’,紧挨着大动脉,周围全是淋巴腺,你住院吧。”

打下—〇九师,卫生部也缴获颇丰。戴部长大大方方地用生理盐水为我清创,还打了消炎针,绷带也是崭新的,再不是江西苏区时那副“小家子”气了。

我说:“你老兄怎么阔绰起来了?”

他吓吃一笑:“我的参谋长,不瞒你说,给你用的全是兽医药品,一〇九师的兽医营被我们抄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可别把我治死了。”

他说:“放心。起码比在江西时用茶叶水洗伤口保险得多。”

红军医院住在甘泉附近。戴胡子每天清早都到结了冰的洛河边去冲澡。当时寒风凛冽，一般人穿棉衣都觉得冷，而他却脱得赤条条的，把冰水一盆盆地往身上浇。这种冬浴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冲完澡他的身上皮肤潮红，热气腾腾。我也想学习这种锻炼身体的办法。戴部长说：“那可不行，得从小坚持。你想健身可以练练武术嘛。”

戴部长让我注意伤口，不要多动，以免扯破动脉或者引起感染。但是我闲不住，还是经常到甘泉前线去看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因此，对甘泉基本上实行围而不打。这时，中央把贺晋年同志的八十一师加强给我们。守城的东北军在铁桶似的合围中断了粮草，只能靠空中接济。每逢敌运输机临空，战士们使用步、机枪射击，使它不能按理想的航线飞行，只得把食品胡乱扔下来，其中一半以上落在城外，我们就一拥而上，用早已备好的三角钩抓住食品包，连同还没落地的降落伞一块拖回来。由于降落伞仍有张力，几百斤的空投物资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轻巧地取回。敌人空投的食品大部分是烙饼，每个十几斤，一袋十个，每个降落伞上吊着二至三袋。

当时彭德怀同志很忙，既要指挥作战，又要通过渠道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触，做统一战线工作。在我养伤期间的一天中午，他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驻地，进门就喊：“耿飏，快

搞饭来吃！饿死喽！”我说：“你这个老总哟，总是突然袭击，现在上哪给你搞饭嘛。”彭德怀同志说，什么都行，能填肚子就行咯。我到伙房一看，只有一块腊肉，正巧我养伤时，用小木棍串了一串大蒜养在水碗里，放在窗台上让它生芽，原意是增添一些房内生气，现在已有五寸长了，倒也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便统统剪了下来，给彭总炒了一盘腊肉蒜苗。彭总一见，连呼好的好的，抓起缴获的烙饼，大口吃起来，看那样子，他确实饿坏了。

彭德怀同志当时正与东北讲武堂的高福源谈判，让他去做张学良的工作，联合抗日，一致对外。后来这个高福源果然起了很好的作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这位抗日志士被蒋介石杀害了。

彭老总为了让我安心养伤，把他的一个警卫员派到我处，连同我原来的警卫员和公务员，共三人“看”着我，并嘱咐他们：“看好你们的参谋长，别让他乱跑。”我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养伤，乘此机会，我让通信员把我的文件包拿来，以便整理一下文件和笔记、杂物。

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我还坚持了天天记日记。翻着那本厚厚的日记，一路上的山山水水又浮现在眼前。

日记上记载着我们先后攻占的几十个城镇，跨过的十多个省区，建立的数百个苏维埃政府，上千名支援过红军的

各族人民。一年中，打仗的时间仅有月余，休整的时间六七十天，其余的二百六十多天，我们一直是行军，这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二万五千里远征啊！

长征使我这个不会游水的“旱鸭子”，不得不在枪林弹雨中渡过一条条湍急的河流。有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河、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河、洛河……以及它们数不清的支流。为了夺取那些险要的关隘，我们还翻过了五岭山、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这些山中大大小小的山峰上，都留下了红军的一串串足迹……

使我久久注视的还有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

这是毛振华烈士，强渡乌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满了青春活力。他老是念念不忘，在“八一”起义后，丢失了一把为贺龙同志保管的小勺，总是担心“胜利后见到贺军长该怎么说呢？”……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这是黄甦同志。他是省港罢工的纠察队长，广州起义的敢死队长。在藤田改编时，我们曾吃过一次只有盐巴的“白斩鸡”。在草地绝粮的时候，我们猎到了一只黄羊，可他又偏偏是个不吃羊肉的人，当时我只能拿出最后几支烟让他压压饿。他看我抱歉的样子，开朗地说：“参谋长你不用遗憾，等到了根据地，你尽管请我吃鸡、吃鱼、吃肉，我会有请必到

的。”我说：“黄政委，讲定了，到时可别不来哟！”哈达铺改编时我们分手，他到四团去代理政委。直罗镇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知。由于杨成武同志（改编后任团长）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他可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代“英才”和“精华”。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就在他已经担负起指挥一个团的重任时，被敌机打中，我军又一颗将星溘然殒落……；

这个总是以马为背景的是我的马夫老谢。福建建宁人，长着北方人般的络腮胡子，憨厚得象个庄稼汉。在两河口，我那匹骡子走失后，他难过得三天没吃下饭，只是一再吧着旱烟袋生自己的闷气，想一阵，捶着自己的脑袋骂一句：“该死哟！”在水草地上，他把能找到的食用草都喂了马，自己吃棉絮……他在走出草地后的白龙江栈道上，为了哄马过山，失足掉进了深渊……；

哦！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长年累月的篾匠生涯使他的背有些佝偻，人们爱喊他“醴陵驼子”。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战

友们只能把一个电话线的木拐埋在他的坟头，算是墓碑吧！

.....

一九三六年，我在“红大”学习，莫文骅同志曾对我说，让我们写一本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书吧！我说，应该写，我有日记和照片为素材。他对这些宝贵的资料赞叹不已。由于斯诺正在延安访问，陆定一同志把这些照片和资料借去供他参考，可惜辗转丢失了。只有那架老式照像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我补记了直罗镇战斗的日记。明天，将有新的征途在等待着我们的。

第五章

从陕甘宁到晋察冀

渡河东征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之后，接下来便是下一步的巩固发展问题。陕北人民勤劳俭朴，那块地方面积也不算小，但物产不丰，养活几万红军确有困难。再说，红军要北上抗日，也不能老蹲在温暖的窑洞里。因此，直罗镇战役后，红军指战员都在议论着一个话题：下一步怎么办？

当时，对这个问题说法纷纭。有人主张往西发展，到宁夏去扩充力量，那里远离敌人，比较安全；有人主张往北，占据内蒙以便取得苏联援助；还有的要往南进军，与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但往西往北都是戈壁沙漠的不毛之地，不

适宜秣马励兵，而且师出无名。往南也不行，甘南一带虽然有过几片根据地，但也很贫瘠，而且靠近敌人西安大本营。再说，当时我党正通过各种渠道做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不宜和他们发生军事冲突。

这时，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于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军事行动上，把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苏区、以发展求巩固作为重要任务。

打通抗日路线，意味着穿越山西。而要到山西就得首先渡过黄河。有人担心过河之后回不来。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把渡口掌握在我们手里，没有回不来的道理。

瓦窑堡会议决定东征后，部队开始做思想技术上的准备。首先恢复了一军团三个师的建制，并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率出征。一军团的一、二、四师为右路军，由彭德怀同志指挥；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为左路军，由徐海东、刘志丹同志指挥，待命渡河。

当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好利索，听说整编东征，立即找戴胡子要求出院。他仔细察看了伤口，坚决不同意，一再强调危险期未过，并拿出书来给我上解剖课。我说：“知道，又是大动脉淋巴腺，我注意就是了。”

他熟知我的脾气，知道硬留不住，于是炖了一大盆羊肉，还从附近小饭铺里订了一些馒头，让我吃了赶路。我说：

“早知这样，我宁愿天天‘出院’。”

他却高兴不起来，认真地嘱咐：“保重啊，那地方可是危险三角区！……”他真是个好心肠。

恢复后的红一师由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师下面辖一团、十三团，全师约三千余人。

我与杨成武、杨得志、谭政同志是老搭档。陈赓同志也是老熟人，他一见面就开玩笑说：“看看，参谋长怎么把‘绑腿’打在脖子上呀？有趣有趣。怎么样？不影响找对象吧？”没等大家笑完，他又接着说：“参谋长，我告诉你个秘方，陕北的土炕，烧得热乎乎的，舒筋活血，保你伤口愈合快。”

我被他感动了，也来了句幽默的：“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那‘反动派’嘛。最近没闹‘独立性’吧？”

陈赓同志曾遭敌逮捕，受尽酷刑，腿伤一直没治好。他却乐哈哈地把那条伤腿称为“反动派”，把伤口发作称为“闹独立”。现在天寒地冻，看他那一跛一跛的样子，我们都替他担心，而他却满不在乎。当时，他的夫人刘根英同志还被敌人关在监狱里，周恩来同志正在设法营救。陈赓同志只有在谈到她时，才摘下眼镜，揉一揉发酸的鼻子，说：“我可真想她呀，快一点出来吧。”这位能征善战的大将也是个充满感情的人哪。

渡河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我与副师长杨得志同志分头到对岸去侦察敌情，寻找渡河器材。当时黄河坚冰三

尺,从冰上就可走到对岸,进入山西。为了测量冰的厚度,我们砸开一个冰窟窿,看它能不能负担千军万马。冰一砸开,附近的大鱼就游过来呼吸新鲜空气,被我们抓住几条。奇怪的是,当地群众竟不知道鱼是可以吃的,起码我们借驻的那个村子是这样。当我们借用老乡的炊具做红烧鱼吃的时候,房东一家都来围着看稀罕。我们便盛一些给他们尝尝,他们才知道黄河大鲤鱼味道是这样鲜美。

由于天气突然变暖,黄河开始解冻,原先踏冰过河的方案不行了,决定改为船渡。陈赓同志说:“你这个黄河呀,差点让我们再演一遍唐三藏过通天河哩。”我们把能用的船、羊皮筏子都搜集起来,仍然不能满足大量部队渡河的需要。于是请教当地老乡,按照老乡的指点,自己动手制造羊皮筏子。其实,羊皮筏子制作十分简单:把绵羊杀死后,仔细地剥成皮筒子,吹上气,然后扎紧不使外逸。这样,每六个羊皮扎一个筏子,可以乘坐一个班的兵力。羊皮筏子不怕磕碰,划起来也容易,因此,不用请当地船工。

经过周密侦察和策划,我们把渡口定在沟口附近,于二月二十日晚八点开始向对岸进发。

我是坐第一批筏子过河的。开始是偷渡。这夜天黑如墨,羊皮筏子一下水,就被往下游流去的冰块碰得直打转。驶进中流时,又打转又颠簸,一下子抛上浪尖,一下子又跌进波谷,那种氛围和感觉,真象后来《黄河大合唱》里唱的那样:黄河在咆哮!我们一面奋力划水,一面“嗬哟,嗬哟!”地

叫着号子，在波峰浪谷和巨大的浮冰中渡过了黄河。

我们登陆不久，敌人就发现了我军企图，于是，一片敲锣打钟报警声伴着枪声响成一片。已过河的小部分部队就开始火力掩护，敌人河防部队刚打了几枪就被压住了。接着，偷渡改为强渡，信号弹照亮了河面，船工与战士们一齐放开喉咙“嗨哟！嗨哟！”地奋力划水，号子声和着黄河的涛声，响彻在黄土高原的夜空。

渡河成功后，我们占领了三交镇，发出了“东进抗日通令”。当时的山西被阎锡山把持着，他既与蒋介石有矛盾，又不抗日，只是一心当他的“土皇帝”。由于山西铁路全是美国制式的窄轨，所以山西成了阎锡山与外地不相往来的独立“王国”。对于红军进入山西，他就更不甘心了。当他的河防被突破后，急调外号“满天飞”的晋军独二旅前来堵截，这个“满天飞”号称“走到哪里哪里就打胜仗”，是阎锡山八万军队中的王牌。我们先把他们的旅部和一支先头部队击溃，然后冒着大雪将另一个团包围在关上村，连夜展开决战。

“满天飞”确实比较顽固。阎锡山有自己的兵工厂，所以他们打起仗来不吝惜弹药，把防御正面上打成一片火网。当时正值“倒春寒”，白毛风刮得紧，气温奇冷，有的战士被冻伤，有的耳朵冻僵，一抹真能掉下来。我们正面进攻没有得手，便改为侧翼包抄，由一团和十三团从两面对攻，终于冲进村子，把“满天飞”打成“遍地滚”了。关上村在一条大川里，残敌试图突围，几次都被我们居高临下用手榴弹打了回

去。聪明些的老兵油子便扔了枪，趁着大雪往沟壑洞穴里乱钻，直到第二天上午，还不断有漏网之鱼被打扫战场的部队从角角落落里驱赶出来。敌旅长只身逃回，被阎锡山撤职查办。“满天飞”就此寿终正寝。

关上村大捷，使部队情绪更加高涨。全军继续向同蒲路进发，在兑九峪与敌人再次交火，歼敌两个团。由于战前情报不准，敌人越打越多，原来敌人不是通报的五个团，而是三个师加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之众。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尽管没能全歼敌人，我们师的几位领导还是满高兴地边撤边议论说：“一天‘吃’两个团，够本了！”

两战皆捷，阎锡山如丧考妣，我们佯称要攻太原，使他更加惊恐，只得老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援。我左路十五军团曾攻占晋祠，离太原只有几十里路，阎锡山忙令各部向北集中，晋南成了空虚之地。我们右路军即调兵南下，兵发汾河流域，一举攻占介休。

介休是《东周列国志》上所记载的名士介之推的故乡。介之推帮助晋侯有功，但他不愿做官，到深山里隐居起来，晋侯便下令纵火烧山，以为这样就可把介之推“逼”出来。结果这位倔强的介之推宁死不肯出山，被烧成灰烬。介之推的死期恰恰是清明节前一天，所以人们又用“寒食节”来纪念他——在这一天不动烟火，只吃生冷食物。并把这块地方定名为介休，意即介之推“休息”之地。介休既然有悠久的历史，也就不乏巨商大贾，普通人家的生活也比陕北的富户好

些,是个筹粮扩军的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大做群众工作,部队得到了很好的补充。之后,部队从介休沿同蒲路南下,一直打到候马,阎锡山吓得躲在太原城里不敢出来。

这时,早就想染指山西的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求救电报,乘机将大批“中央军”调往山西:一路由潼关向北,一路由娘子关向西,共二十万大军。根据敌情这一重大变化,党中央决定将抗日先锋军撤回河西。

我们一师负责回师部队的殿后,在吉县,敌二十五师冒冒失失地追了上来,成了众敌的“出头鸟”。陈赓同志说:“耿飚同志你带一个团把二十五师这个出头鸟收拾了。”还嘱咐我说:“你注意他们的师长,这是个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家伙,只知道往前冲,你去打赢他!”我率队迎击敌人,把两个营放在正面埋伏,两个营兜屁股进攻,先把他们打乱了,然后预先埋伏的两个营奇兵突起,把敌二十五师一个团一口吃掉。那一仗我亲率战士拼刺刀,歼敌八百多名,余者落荒而逃。

被俘的敌军官交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抢占黄河渡口,把我军堵在河东。我气愤地申斥他道:

“你们百万大军再加上湘江、乌江、娄山关、腊子口,都没能奈何我们,一条黄河算得了什么!”

俘虏垂头丧气地说:“师座这个人,糊涂啊。”

敌人师长叫关麟徵。战前,他的幕僚们劝他不可孤军突出当“出头鸟”。而他却急于抢头功,抢先突击,结果被我们

狠狠打了一记耳光。

陈赓师长笑着说：“这是关麟徵第二次挨我的耳光了。”

陈赓同志所说的第一次耳光是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和关某还是同班同学哩。当时关麟徵就有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毛病。有一次站队，陈赓同志故意做个鬼脸，逗得关麟徵忍不住笑出声来，被教官听见了，走过来不由分说，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打了个“哑巴吃黄连”。这时陈赓同志已经挺胸收腹，目不斜视，一副黄埔军人的规范样子。教官不知就里，还训示关麟徵说：“你看陈赓，动作多标准。今后就照他的样子做。”

陈赓同志解释说：“我当时是想治治他的骄气，骄兵必败嘛，那样日后怎么领兵打仗。关麟徵事后对我说：‘好你个姓陈的，咱们走着瞧。’果然他恶习未改。这次大概听说我在这个师，他小子来‘君子报仇’来了，这个仇算起来十一年了。”

原红一师的老同志都记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它不仅可笑，其中还蕴含着不少道理。

我们掩护大部队安全渡过黄河后，蒋介石的二十万大军才赶到河东，远远地向我们发炮。黄河，已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天险了。

东征七十五天，歼敌万余，扩红四千，筹集到大量军需，带回延安用了几年。更有意义的是：抗日先锋军在山西大片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力量开始发展壮大了。

“神仙洞”里的“修炼”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

红一师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的有杨成武、谭政和我。我们走后不久，杨得志同志调到红二师任师长。陈赓同志率一师参加了西征。在向“红大”报到的路上，我们都感到在戎马倥偬中，组织上抽出我们学习深造，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学习！

“红大”设在小巧玲珑的环山城镇瓦窑堡。中央调林彪来任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政委。从第二期开始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由罗瑞卿同志任教育长。后来又改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红大”第一期分三个科。我们这些师以上干部在第一科，科长是我的老上级陈光同志，政委是罗荣桓同志。

瓦窑堡是党中央驻地，毛主席等领导同志都驻在这里。六月二十一日，敌人突然袭击瓦窑堡，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县（即今志丹县）。“红大”亦随中央迁往保安。

在去保安的路上，我们在途中休息，罗荣桓同志提议照张像留做纪念，于是我就为大家拍了一张“红大学员在歌唱”的照片，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上用的那张。画面下方背着伞打拍子的是彭加伦同志，同志们都喊他“加

伦将军”。照这张照片时，我用了三角架和延时快门，所以画面里也有我本人。

保安在古代属边陲要塞，北面就是万里长城。从残留的城廓痕迹来看，过去的规模还是不小的。由于时间的湮没，近代已不怎么出名了。只有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还被保留着，显出当年的一些繁华来。

我们就以这些山洞为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野狼吃过的兽骨，人走进去，扑面乱飞出一群蝙蝠。“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清理好卫生，自制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嗨！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就缺一张兽皮喽！”

毛主席来看我们的“最高学府”后，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我们参的是马列主义之“禅”，悟的是中国革命之“道”。

刘伯承同志在三大主力会师后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一起在石桌上下围棋，聊天。他讲起四川方言来，逗得大家直笑，自己却作古正经，这就更增加了“笑”的效果。有一次他对大家说：

“你们这些‘神仙’，天天吃素，全打光棍，可别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哟！有机会得考虑找老婆了。”

的确，当时我们全是男“神仙”，戎马倥偬，哪有机会找对象呀？大家都有个想法，先把革命事业搞成功了再说。刘伯承同志提起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乘机与他开玩笑，便嚷嚷着：

“讲讲你自己的恋爱史吧。”

“恋爱史嘛，得由你自己去搞起，听别人的哪格有意思？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找对象主要有三点：第一要找人，第二要活人，这第三嘛得是个女的嘛！”

他讲一句，大家笑一阵。而他却仍然认真地说：

“我讲得有道理嘛，信不信由你了。”

“红大”除一科外，还有二、三科，培养初级指挥员。

“红大”的老师很多，毛主席、洛甫（张闻天）、林彪、李德、凯丰、吴亮平、秦邦宪、杨尚昆、李维汉等，都给我们讲过课。周恩来同志以形势报告的形式，负责给我们上时事政策课。

陕北的碾米工具很落后，我们吃的小米带着许多没碾尽的糠，主要佐餐菜蔬就是咸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条件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主要的困难是没有文具，用的纸都是废纸的背面。蒋介石常常派飞机到保安撒传单，我们就把这些传单捡回来，用它的反面印讲义，记笔记。有时候，部队里的战士们拣到这些东西，也知道收集后送来。

蒋介石的传单千篇一律，无非是反动宣传，多数是吹些“×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牛皮。但有时也有例外。

那天，我们正在“洞”里讨论刚听过的课程，罗瑞卿同志神秘秘地来了，一进门就说：

“快来看哟！你们的‘身价’又提高了。”

我们接过他手里一叠花花绿绿的纸一看，又是反共传单，不过不是惯常的反动口号，而是一张“赏格”。上面写着：凡捉到共产党干部者，无论死活，按职务大小各赏给若干大洋。

有个同志还认真地算了一下，仅我们“红大”一科，全体“脑壳”加起来，竟值好几百万元。有个同志便说：“罗局长，你给老蒋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预支出来，我们先买些纸、笔也好哇。”

罗瑞卿同志也笑着说：“对！我就告诉他，脑壳我先保管着，就怕龟儿子付不起呀。”

后来张爱萍、宋裕等同志还编了个小戏，内容就是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要他那份“赏钱”。过去我们常演这种有蒋介石的戏。几乎每次找演员，都要找到我的头上。因为我是个瘦高个。不过我很少答应，一般是由罗瑞卿同志扮演，他也是个瘦高个。这次演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他当然要自己演自己了。于是我演蒋介石，宋裕演宋美龄。有一段台词大概是这样的：

罗：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以下的情节是,罗瑞卿说:“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一分没发出来,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台下早笑得前仰后合,肚子都疼了。有人干脆跳上台(其实也是平地),把电话夺过来问道:“喂,你把钱都弄哪里去啦?”

观众们跟着起哄:“彻底交待呀!”“还欠我好几十万哪!”……

剧本里根本没规定这些情节,我只好现编一句:“我都抽大烟啦。”然后装死完事。

“红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是很活跃的。《大路歌》、《毕业歌》我们经常唱。我们还在门前开辟出篮球场、网球场。朱老总从四方面军回来后,经常到“红大”来打篮球。尽管他是总司令,同志们照样对他“关门”、“盖帽”、争夺;他总是乐呵呵地,无论输赢都那么开心。

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直到现在都令我思恋不已。

能到“红大”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惜时间。我虽然上过私塾、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但是“啃”那些高深的战役学、经济学、国际问题等,显得十分吃力。只有起早贪黑,多消化一点是一点。每天傍晚,

“红大”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有一本苏联《伏龙芝学院战术讲义》，大家都争着借阅，一致感到这本书对我们有用，我就用十多天时间，全部用蜡纸缮刻，油印了几十份分给大家。这本油印书至今我还保留在身边。

前面说过，我有一批长征中积累下来的日记和照片。有一次我与莫文骅、杨成武同志谈起长征，大家觉得应该把这次艰苦卓绝的行动系统地整理出来，总结出经验教训，指导革命实践。我们把这个想法向杨尚昆同志汇报了，中央便派陆定一同志协助他，组织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校长林彪见有那么多原始资料，多次向我要，我没舍得给，后来由陆定一同志转借给斯诺。

解放后斯诺重访我国，我正好回国述职，见到斯诺，便向他问及这些资料现在何处。他说，那年他离开延安，由丁玲陪他去西安，他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丁玲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丁玲同志也找不到那些资料的下落了。我们一科学员们在“红大”写的回忆录，由中央加以整理，编成《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先在延安油印，一九五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们在“红大”学习期间，中央红军进行西征。不久，又传来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十一月中旬，我军取得了双城堡大捷，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但我未能参加上。

三大主力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也调进“红

大”学习。其中有许世友同志。他是河南新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来参加长征。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猖獗时，他率领一支刚组建的骑兵师，杀开一条血路，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愿望。据说他是少林寺和尚出身，有一身传奇式的武功，因此，他一到“红大”，许多人便要求他“露一手”看看，许世友同志都笑咪咪地拒绝了。

一天，我和他在操场上散步，谈起各自的经历，他知道我少年时也学过武术，便来了兴趣，褂子一甩，要和我“以武会友”。

在周围的人一听，纷纷围来观看。我说：“南拳北腿，咱俩不一定打得起来。再说，谁打了谁也不合适，还是你自己来一套吧。”

许世友果然打了一套拳，“少林”味十足，真有力可扛鼎之势。那种所向披靡的风格，与他直爽、粗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浑成一体。

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到四军去任参谋长。

周副主席是用商讨的口气说的，我也就坦诚相见，讲了我的想法。我说：“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约见我。那天是个冬天的晴日，阳光很好，我们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

席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我说：“你讲的是淅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他说：“对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坦白地说：“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以劝说的口气说：“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我知道是非去不可了，便问：“请示主席，叫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同志说：“去当参谋长。”

我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来，看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对他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毛主席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他们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我明白了，便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请示怎样开展工作。

毛泽东同志说：“送你两句话：开始跟着走，然后赶上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右手在胸前做了个一推、再一推

的手势。

我说：“那我就按主席的指示办。”

十二月八日，罗荣桓同志把一大叠有关毕业手续的表格办妥交给我，几位老同学还搞了点肉，算是送行。

四军陈再道军长派了一个通信班来接我，其中担任我的警卫的，是十七岁的江西小老倭胡大方同志。

我们即刻上路，军部远在盐池一带。我们沿途经过的，都是红军驻地。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到达定边。第二天吃过早饭刚上路，就见定边街上的红军一下子拥到街上，人们个个喜形于色，大喊大叫：

“蒋介石被捉起来了！”

“在临潼捉的！”

“东北军张学良！”

“西北军杨虎城！”

“……”

我简直被闹愣了。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主力红军都回根据地休整，前方无战争。蒋介石飞到西北督战，这倒是早有消息，但是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变，确实出乎意料之外。

我跳下马来，想找一个同志问问清楚，可他们那里还顾得上？只是狂奔呼喊“捉住了！”“连裤子都没穿！”“新华社广播了！”就飞快地向别人报信去了。

随行的通信班也顾不上我了。他们冲进人群里，一个一

个地拉住那些同志哥询问。后来，胡大方跑回来，报告说：

“千真万确。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好啊！我也跳起来，喊起来。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以来，欠下中国人民多少血债呀？我不禁想起，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十万农军攻长沙，多少人饮弹身亡；醴陵状元洲上，革命者血流成河，淶江桥头示众柱上那个十八岁女共产党员的头颅；江西苏区无数被烧杀殆尽的村庄……在长征途中，我们每到一地，总要从监狱里放出一批革命志士，他们受尽酷刑，惨不忍睹……还有我们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军长王良……几万名倒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友……以及我被子弹洞穿的膝盖，弹片削过的脖颈，还有那些无耻的“赏格”传单：“×个月内剿灭共匪”的诅咒……蒋介石啊！你终于有这一天了！

那天，我们策马狂奔，到达盐池四军驻地，陈再道、王宏坤同志一见面就问：“知道了吗？”

“知道了。”

“快！开个会，给中央发电报。”

当夜，红军各驻地灯火通明，谁也顾不上那五天才发一根蜡烛的规定了，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是：怎么处置这个独夫民贼？

人们在气头上呼喊着：

“审判他！”

“绞死他！”

“千刀万剐!”

“交给人民开斗争大会……”

尤其是那些随我们一起生活的警卫员们，个个都很年轻，平时乐呵呵地似乎一点愁事没有。现在听到这个喜讯，反而个个痛哭失声，他们挤在我们的窑洞里，一个个血红着眼，哭喊着：

“杀了他！首长们，你们帮我给毛主席写信，一定杀了他，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给咱全中国老百姓报仇啊！”

有的同志还说：“一定要杀！除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谁说不杀蒋‘该死’，我就和他拼命！”

而毛主席与周副主席恰恰决定：从抗日大局出发，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接到张、杨二位将军“兵谏”蒋介石的电报后，党中央英明果断地作出了借此机会促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决策。听说为了让周副主席赶赴西安，“红大”的学员们在门前的操场上修飞机场。由于保安地形的限制，张学良、杨虎城派来接周恩来同志的飞机曾两次飞到保安，但都无法降落。后来周恩来同志改为骑马到延安转到西安。

此时，南京政府已是一片混乱：亲日派开始谋划夺权，反共顽固派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进步人士不知如何是好。在西安，张、杨两位将军骑虎难下，日夜盼望我党前去协助善后。何应钦派重兵直逼潼关，叫嚷要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

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很快就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在蒋介石接受了八项条件后，劝张、杨两位将军将他释放了。这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援西军始末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是，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以“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为幌子，将重兵集结潼关，阴谋扩大内战规模，以便于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十二月十六日，我们四军由陕北的定边、盐池地区出发南下，先进至庆阳城外的石舍，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然后又进至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淳化地区布防，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犯。鉴于我军已有准备，何应钦未敢轻举妄动。

我们按照党中央发布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地方工作的初步指示》，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和友军工作。对我军历来的工作形式，也作了适当调整，以适应新区群众和友军的要求。例如：过去红军通过打土豪来补充物资，现在改为募捐、购买。我也很快熟悉了这支部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这使我更加深了毛主席对我说的“开始跟着走，然后赶上前去”这个指示的理解。

当时，陈再道同志任军长，王宏坤同志任政治委员，他

们两个配合密切，作战经验丰富。由于出身贫寒，两人都不识字。我便每天教他们学习文化。那时也没有什么学习条件，我就找一块木板，早上写上四五个字，教他们认、读、写，到晚上写一遍，算是考试通过。这样细水长流，几个月后，他们也认得了几百个字，文化大有提高。

在四军和三十一军布防西安的日子里，我们始终惦记着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其他部队——西路军。他们走后，我们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每当我们军部的几个领导同志谈到西路军时，便互相宽慰说：“不会出问题的，三次过草地时这支部队都没拖垮，何况现在已经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西安事变后形势朝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呢？”实际上，当我们在猜测他们的处境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已开始压上了心头。

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我们得知了西路军失利的确切消息。这使我们心急如焚。这是我军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该部队中有我熟悉的一些老战友，如原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原红三军九师政委朱良才，原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曹里怀同志等……我们恨不得立即赶上前去，帮助他们脱离险境。但鞭长莫及，从地图上看，他们远在永昌、古浪一带，有千里之遥，再说，在党中央尚未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前，也不是可以轻举妄动的。

警卫员胡大方悄悄地问：“参谋长，西路军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是对这个小鬼简单地说：“敌人兵力多，又是条件不好的祁连山区，一时的失利也是难免的。”

十七岁的胡大方心情沉重得象个五十岁的老人，叹口气说：“唉，他们不该走得那么远啊。”

我安慰他说：“开始他们打得还是蛮顺利的嘛。大概是对马家骑兵缺少经验。”

党中央为解西路军之危，决定立即成立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任政治部副主任。我们四军、三十一军和二十八军都参加了援西军，从三原、淳化出发，日夜兼程，急如星火，马不停蹄地向西急进。

三月天气，江南早该飞絮扬花了，可是西北高原仍然冰封雪飘，茫茫原野上，路险沟横，人迹罕至。我与陈再道同志只是催促部队快走，再快走。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在呼喊：“同志们，坚持住，我们来了！”

三月中旬，我们到达甘肃东部的镇原，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

我打开地图一看，援西军离西路军还有大部分路程没有走，为什么突然停下来？是他们自己打开了新局面？还是别的部队已经接上了他们？或者如早就传闻的那样，新疆方面接应了他们？

就在援西军上上下下都在猜测的时候，一封电报宣布

了西路军严酷的结局：兵败祁连山，全军覆没。

刘伯承同志亲自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这份使我终生难忘的电报。原来，西路军在古浪一仗，损失惨重，之后一直转战于永昌、山丹、高台等地，最后在倪家营子被敌人包围，他们苦战四十天，直到弹尽粮绝，悲壮失败……

电报还没念完，会场上就发出一片抽泣呜咽的声音。刘伯承同志念到最后，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哽咽起来。有的同志竟至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西路军失败，援西军停止西援，就在镇原屯兵待命。我们四军住在屯子镇一带。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当前要做几件事：一是稳定部队，教育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看到全国大好形势，努力扩军练兵，为西路军的同志们报仇；二是积极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征集粮草物资。

同时，我带领一部分人员，分散出去，撒开一个大“网”，寻找和接应西路军失散的战友们。

我派出几百名侦察员，带上药品、粮食、衣服，向西搜索，又在沿途设立了几十个收容站，并向当地老乡逐村宣传：遇到找红军的人，应该向什么地方引导。我自己也亲自牵了几匹马，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们。

四月初，西路军撤出的同志陆陆续续进入宁夏、陇东境内。他们见到我们，无不失声痛哭。据这些同志讲，西路军兵败时，分成东西两路撤出。一路由李先念同志率领，向新疆方向突围。一路向东潜行，沿途遭到敌人不断袭击，已经

被打散，互相间失去了联系。

这些回来的同志，大部分衣服烂褛，蓬头垢面，饥肠辘辘。伤员就更惨了。有的伤了腿的同志，靠两只手和一条腿爬回来，真是一路血水，千里眼泪啊。

一个刚下了点小雨的日子，我带了三个骑兵，在王家洼子一带侦察，发现了一个穿长袍的“商人”，腋下夹了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走近一看，原来是徐向前同志。他见到骑马的军人，立即向小巷子里躲去。我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

他一楞，慢慢回过头来，我赶忙摘下帽子，让他看清我的面貌。

徐向前同志认出了我，叫了声：“耿飏！”眼泪就下来了。

我们赶紧下马上前，安慰他几句，让出一匹马给他骑，护送到屯子镇，安排他洗澡、吃饭。徐帅个子高大，别人的衣服穿不上，我就让胡大方把我的衣服送给他，并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刘伯承同志。

刘伯承同志在电话里指示：“要绝对保证徐总指挥的安全，派专人护送他到镇原来，我这里立即派骑兵前去迎接。”

几天后，我又找到了李聚奎同志。自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后，他就调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任参谋长，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他瘦了，穿件油渍麻花的破羊皮，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夹着一条棍子，背着一个空布袋，头发又长又脏，乍一看，似乎是个要饭的。

他确实是沿途讨饭走回来的。我们留他住了几天。他告诉我，朱良才同志本来是与他一起转移的，但在途中被敌人搜捕失踪了。他自己身上分文不名，就是靠一个指北针，千里跋涉走回来的。

李聚奎同志在西进途中，改任九军参谋长。他对我们详细讲述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九军在古浪失利，伤亡过半；五军于高台失守，全军殉难；倪家营子大血战；在石窝，仅剩千把人，又兵分两处，散落到祁连山区……

李聚奎同志穿回来的那件羊皮筒子，满身破洞，虱子滚成蛋，我们让他洗澡换衣时，仍然得穿我的衣服，因为他也是个个头高大的人。

之后，我们又陆续接应了几百名西路军的战友，一直在镇原驻扎到“七七事变”。

留守“抗日大本营”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比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它的前身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所开辟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直罗镇一仗，把中国革命放在西北的任务，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这里便成了党中央所在地。

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的

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抗日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当时，我在四军任参谋长。西安事变后，一直在收拢部队，进行军政训练，准备开出去与日寇作战。开始，部分同志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还有些议论，经过学习整顿，大家认识得到提高；尤其是“七七事变”的发生，使我们感到了国家危亡迫在眉睫，恨不得一步杀到抗战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但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全体红军焦急万分。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征。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七月十五日，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平津抗战将士，敦促国民党立即定下抗战决心。“八一”建军节，我军例行的运动大会改名为抗战动员运动会，在升旗仪式上，我第一次经历了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共同升起的场面。当时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共赴国难！

在运动会上，我见到了老首长聂荣臻同志，便向他打听我军的打算，要求回一方面军工作。聂荣臻同志笑呵呵地说：“莫着急嘛，仗有你打的。”我说：“快点打，我憋不住了。”聂老总大笑起来：“怪不得人家叫你耿猛子嘛。”他告诉我，中央正要开一个会，无论蒋介石怎么阻挠，我们抗战到底的

决心毫不动摇。

那天，我们在宝塔山下谈了很久。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我们红军走过的路程比“唐僧取经”还要曲折，在血与火中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苦苦奋斗了六年，为的就是杀上抗日前线。现在到了“弹上膛，刀出鞘，弯弓盘马射大雕”的时刻了。

聂荣臻同志所说的中央会议即洛川会议。由于“八一三”上海沦陷，南京政府终于答应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洛川会议决定了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以及抗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

八月二十五日，改编后的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以“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的气概，宣誓就职。九月六日，原援西军的部队在石桥镇冒雨列队，誓师抗日出征。由四军、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和第十五军骑兵团等，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各直属队。我所在的三八五旅由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我任参谋长。三八六旅由原红一师师长陈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李聚奎任参谋长。

在誓师大会上，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张浩代表党中央

及军委颁发了红军十年纪念章。刘伯承师长带领全体将士庄严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老兄弟，
奸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
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
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誓师后我们按新编制展开军政训练，待命出征。在那些日子里，我最难忘的是让我们换上国民党的帽徽和军服这件事。

在换发国民革命军军装之前，八路军总部已经对此下了通知，但是当我们拿到那个“青天白日”的帽花时，心里还是十分别扭。许多从国民党军队来的同志最反感。我们旅部有个参谋，是第二次反“围剿”后，由俘虏参加我军的。让他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他怎么也想不通。他写了个纸条，把帽徽包在里面交给我。那纸上写道，当初我参加红军时，已经发过誓，今生今世再戴这种“狗牙帽花”，天地不容，现在再让我戴它，宁肯打游击去。这位同志原是红一师的，与我很熟，干工作从来没二话，现在让他改个帽徽，倒成了大问题。我反复说明了必要性，他才别别扭扭地缀在帽子上。其实，我的心里也是难以接受的。参加红军八年来，这种帽

徽始终是我们的敌对标志。我亲眼见过多少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在参加红军前把它从帽子上揪下来，用脚踩，用石头砸，往上面吐唾沫……尤其是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路上，有多少红军将士，牺牲在涂着这个标志的飞机轰炸之下。现在，革命来革命去，我们也要把这个“青天白日”戴在头上，真是十分别扭。

我的警卫员胡大方，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哭着跳着不肯戴国民党帽徽，一定要把红五星戴在新军帽上。我就对他讲：帽花换了，名称改了，但我们的本质没有变。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还给他讲了关于这种帽徽的一次经历。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我们在遵义战役的一次夜战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与我们在夜暗中遭遇，当时伸手不见五指，开枪怕误伤自己人，我就大喊一声“摸帽子！”大家心领神会，手持马刀，抓住一个人就往帽子上摸，凡是圆牌的肯定是敌人，结果一个连很快就被我们收拾了。现在我们用它标志抗日阵营，同样是为了区别那些日寇、汉奸，这也是战争需要啊。

但是，十月初来了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〇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心理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为此我找过刘伯承、徐向前二位同志，他们耐心地与我谈了话，讲明了留守革命抗日大本营的重要性。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

在平型关大捷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十月中旬，我们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栒邑。在旅部召开的一次研究布防的会议上，我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三八五旅的防区，这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东接延安、洛川，西连固原、平凉，南近长武、灵台，北靠定边、环县，毗连内蒙、宁夏、甘肃和陕西四省，军事上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毛主席把我们摆在这里，是精心安排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完成党中央的重托。

陕甘宁边区共有二十三个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没有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用军事包围、政治打击、经济封锁等卑劣手段，妄图削弱、扼杀并伺机直接发动武装进攻来消灭这块抗日根据地。

边区留守部队总共不过九千余人，任务是很重的。由于国民党当局不给这些留守部队的指挥机关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因此，我中央军委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同年十二月，把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留守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他是被南京方面委任的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除了在八路军正式编制内的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外，又将其它留守部队的杂乱番号实行了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

这些部队是：

警备一团 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
警备二团 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
警备三团 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
警备四团 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后为罗志敏)；
警备五团 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
警备六团 团长王兆湘、政委张达志；
警备七团 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
警备八团 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
七七〇团 团长张才干、政委肖元礼；
绥德警备区 司令员陈奇涵、政委毕占云。

另外，还有一个酃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留守兵团的任务是：固守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东面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严阵以待对付周围国民党二十余个师的包围；打击边区内几十股土匪的袭扰；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积蓄干部；保证边区政府和军民的生活供应。

在留守兵团成立后的会餐上，毛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曾流露过不愿意留守、愿到前线去打仗的心思，便对我说：“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

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毛主席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这次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信心。

我们三八五旅旅部驻在庆阳的田家城。刚到庆阳时，住宿十分困难。时值隆冬，长期打扰群众不是办法，所以首先要解决营房问题。我和王维舟同志（这时他已升为旅长兼政委，我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并参谋长）共同踏勘了地形，按照陕甘宁一带的习惯，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挖窑洞。我们沿着古城墙，从山崖、塬边等地方挖出一百一十九孔窑洞，解决了部队住宿问题。然后，按照“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和“首长负责，官兵动手，参战、训练、生产三结合”的原则，兴办工厂，垦荒种粮，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在边区扎下根来。

陇东的“反摩擦”斗争

国民党对日军节节退让，导致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沦陷区人民对日寇的打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相持阶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二月，蒋介石又密颁《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

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开始了更加猖狂的反共反人民活动。十二月,阎锡山制造“十二月兵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陇东事件。

两次陇东事件,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的。早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就曾袭击我庆阳县的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之后,国民党甘肃省西峰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粮草供应,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摩擦越演越烈。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我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一名指导员和二名通讯员,竟被国民党保安队捕去关押,接着,又有十名我方人员在镇原县遭到绑架。我方当即向西峰公署,并电兰州向国民党甘肃省省长朱绍良提出抗议,但是这个朱绍良是个搞摩擦的专家,对我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亲率一部兵力,将国民党镇原县太平镇区的一名官员和警察队长连夜抓获,作为警告措施。次日,朱绍良便密电一六五师,令其派兵占领镇原县城。我驻镇原的第七七〇团第三营不得不闭城自卫。此时,肖劲光司令员急电蒋介石和朱绍良,要求停止进攻,由双方派人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可是,国民党顽固派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先后两次进城,均被我第七七〇团第三营击溃。五月初,他们只得撤兵,同意以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既然下定了“摩擦”的决心，就决不肯善罢甘休。年底，第二次陇东事件又被他们挑起。十二月十日夜，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突然袭击我驻守宁县的二营。因我军并无防备，被迫撤出宁县。十二月十六日，九十七师又突然袭击了我驻守镇原的三营，三营亦撤出该城。一九四〇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侵入我环县洪德区。赵老五是宁夏甜水堡一带的惯匪，当时我方曾致电马鸿逵要求干预。马鸿逵先是推说他不知此事，继而又承认赵老五是第八战区委派的“游击司令”。但这位“游击司令”实在不给国民党争面子，他们在洪德区肆无忌惮地劫掠群众，糟蹋妇女，人民恨之入骨。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抗日大本营，我们于二月十六日出动进剿，至三、四月份将其巢穴全部摧毁，只有赵老五只身脱逃。

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顽固派在这里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杀人掠地事件，与当时日军频繁进犯河防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与关中、绥德等地的反共摩擦也是密切配合的。同时，国民党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诸多流血事件，如平江惨案、确山事件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此期间，肖劲光司令员曾到陇东三八五旅，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我陪他到驿马关七七〇团驻地，直接与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谈判。开始，我们从抗日大局出发，想尽量避

免大的冲突，但是国民党的这些内战内行的家伙们却是得寸进尺，迫使我们不得不给予有节制的回击。除了在军事上不给他们便宜可占外，更主要的是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战，通过报纸、电台宣传，并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通电，呼吁团结，谴责摩擦，使全国各阶层人士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干了些什么，有效地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对我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妄图困死、饿死我边区军民；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间，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起，国民党便完全撕毁了两党达成的协议，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破坏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边区的吃饭、穿衣、医药、日用品都成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到肖劲光同志那里去，见他在石头上磨几片刮脸刀片。我说：“肖司令，这都磨得没有钢口了，怎么还能用呀？”他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这还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都用了十来年了，现在没处买，凑合用呗。”我看他捏着那又小又薄的刀片在石头上磨，实在费劲，便给他用铁皮做了一个专用夹子，那样磨起来就方便多了。肖司令高兴地说：“很好，这样，还能对付用个两、三年。”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〇年冬天，三五九旅和三八五旅奉命屯田开荒。我们三八五旅去的地方叫大

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大山里，那里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我与王维舟同志踏勘了地形，只见荒草丛生、杂树攀援的山间塬上，依稀可辨认阡陌的痕迹、房庐的残垣。向当地群众打听，原来这地方在过去曾是“塞上谷仓”，甚至还可找到清朝时稻田的痕迹。这里水源不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改造成生产基地。

我们派三个营进山开荒。没有房住就挖窑洞，没有工具就放火烧荒。最棘手的是深山丛林里，野兽特别多，尤其是猛兽。它们不但糟蹋庄稼，还咬伤人畜，成了我们开荒种地的大敌。王维舟同志让我采取措施，我便组织了打猎活动，把战士们每三人分成一组，背上用红纸做个标记，以免误伤，到树林中去打活靶。一个月下来，我们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我们把兽皮剥下来，送到西安去卖钱。兽肉当然是我们战士的美餐了。我那是第一次吃老虎肉，与牛肉差不多。我们还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看到老虎也很感兴趣。毛主席对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老总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力气呢。我们还把虎骨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泡酒治风湿。

比较难打的是豹子。这种动物动作敏捷，一有动静就往树上爬，甚至会跳上树去，所以不易打准。我便出了个主意：抓个兔子，把手榴弹塞在兔子的肚子里，或者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即

被炸死。捉狼更有意思：我是钳工出身，就画一张图，设计上夹齿、弹簧，以羊肉为饵，野狼咬上，弹簧蹦起，夹齿勒往脖子，万无一失。

我们利用大凤川、小凤川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种出了陕北稀有的大米，除了自给自足外，将大部分交给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

在大生产的同时，我边区军民组织起一个野战兵团，坚决回击国民党的进犯。至一九四二年初，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一九四一年夏，毛主席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准备开“七大”。我们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一个研究班，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研究班第一期毕业后，又筹办第二期，准备在飞机场建房，培训团以下干部。上级通知我当研究班的主任。后来中央办党校，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我在宝塔山下共度过了三年学习生活，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

在党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规定课程外，我还自学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尉繚子、淮南子、李靖等所著的《七子兵略》、李筌的《太白阴经》、《伏龙芝军事学》等。我在延安图书馆见到了日本人所写《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一书，便花了将近四十个小时，抄刻油印，装订成十几本小册子，分赠战友。我的学习笔记连

同一些照片，在我于一九四四年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都存放庆阳我的岳父家中，可惜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时，被胡宗南、马步芳军队全部烧毁。只有《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油印本和《七子兵略》等书，随身携带，因而得以保存至今。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我的爱人赵兰香同志也进了延安大学学习。当时生活仍然困难。我们便在党校宿舍门前的一块空地上种菜，自己动手纺棉花、织袜子。赵兰香很快就成了纺线能手，一个星期天就能纺四两多线。我自己拚凑了一架织袜机，一个小时能织好几双。我们就靠这些工作，自己保证自己的生活。记得我们住的地方老鼠特别多，我便造个夹子打老鼠，那些老鼠又肥又大，埋到门前的菜地里是很好的肥料，所以我种的白菜每菹都有二十多斤，我们把这些菜交给伙房里，改善大家的生活。

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延安整风进入了一次党的历史大讨论。同志们对建党以来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七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时，边区军民与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斗争。到一九四四年秋，我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奔赴抗日前线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我国，其中一位名叫德穆克的先生，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我，要求会面。由于我正有其他活动，德穆克的要求未能如愿；临行前，他托人转来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飏。”

他是谁？为什么这样称呼我？

翻开第一页，一张四十多年前我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展现在眼前。我立即想起来了：这就是一九四四年九月，由我从延安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

当时，我在延安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贺龙同志曾考虑把我调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长，在此之前，李井泉、谭政二位同志已经与我打了招呼。他们说：“老耿，到我们这里来吧！咱们再在一起干一番事业。”我与他们是老相识，他们的劝说多少有点老关系的味道，以为此事必成无疑。

我对他们说，我个人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当然，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在后方蹲久了，我向往前线，向往枪林弹雨的战场生活。

我瞅个机会，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毛主席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便约上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与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我和曹里怀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两人讨论了几条意见，一直没有机会向毛主席反映，这次毛主席召见，真是天赐良机。

我们赶到毛主席驻地，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主席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飏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我赶紧拿出我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截子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拿出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突然，他想起什么似地抬头望着我：

“耿飏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噢，是到抗大去的事。这样吧，你直接去找贺胡子谈一下。”

我说：“我怕谈崩了。”

“你这个同志哟！”毛泽东同志爽朗地笑起来：“胡子是个随和人呀，莫怕嘛。我先打个电话给他。”

第二天我便和曹里怀一起去见了贺龙同志。他在我军中名气很大，但由于他在“八一”起义后，一直在二方面军工作，因此我对他了解不多。这次一见面，果然是位和蔼可亲

的老首长。刚一见面，他就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我贺胡子同志关系糟糕呀，害得老乡来找我，得由毛主席保驾啦！”

我有些尴尬，赶忙解释：“贺老总，我不是……”

“坐嘛坐嘛。”贺龙同志释然地笑起来，亲手给我递上香烟，而他自己却抽烟斗。

我们与贺龙同志无拘无束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非常愉快。贺龙同志说：“说实话，我是真想把你‘挖’过来，你想上前线，我何尝不想哪？我尊重你的意愿。”

他留下我们吃午饭，特意嘱咐伙房多放点辣子，并一再抱歉说：“没得什么好吃的。”还说：“听说你炖狗肉很有板眼，啥时候见识一下哟？”

我说：“一定，一定！”由于心情高兴，我便把“罈子闷狗肉”的办法说了一遍。贺龙同志听完，认真地说：“对头，这和打仗一样的嘛，火候到了，没有不打胜仗的。你上了前线，就这样干！”

我不但畅谈了意见，还受到了鼓励，对上前线充满了信心。

我的心思，不知怎么让聂荣臻同志知道了。他正在延安开会。聂司令员便把我叫去，让我到晋察冀去。

我一直在一方面军工作，聂司令员是我的老上级了，现在要我到他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去，我当然愿意。聂司令员说：“你先当一段副参谋长吧，熟悉一下情况，由你来管全区

的作战工作。”

一九四四年九月，陕北的秋梨熟了。我接到正式通知，告别了延安，向晋察冀赶去。

行前，周恩来同志交代了一项任务：顺便把一个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周副主席详细交代了这个观察组的背景，并解释说：

“本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架飞机，但是涞源（晋察冀军区驻地）那边的机场不保险，所以改为骑马。这些美国人对我们还了解，你要团结他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说：“副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周副主席便陪我到叶剑英同志那里去领人。这个美军观察组一共十一人，由马振武、韩叙、董越千同志当翻译。

我们到了叶剑英同志驻地，还没等翻译介绍，观察组一个身着制服、佩戴上尉军衔的胖子便冲我迈出一步，“啪”地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将军阁下，很高兴见到你。”

韩叙同志介绍说：“这是盟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

德穆克小时候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美国军队，被派到延安之前，他们先“观察”了蒋介石在大后方的军队。据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看一看正在前方抗战的八路军究竟有多大力量，二是利用这个机会搞些情报。他们带有电台，随时可与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联络。为了表示友好，德穆克特意赠给叶

剑英同志三部电台，还送了一部给晋察冀军区。

我们寒暄之后，德穆克向他的部下歪了一下头，另一个美国人便拿着三支卡宾枪走过来，看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

德穆克嘟噜了一句美国话。韩叙同志翻译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是送给你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将军阁下。”

“谢谢！”面对这些烤兰锃亮的卡宾枪，我当然“不介意”。我的警卫员胡大方同志喜得合不拢嘴，过来抱起了枪。

周副主席笑着给我使个眼色，我赶紧握住德穆克的手，再次道谢。

美军观察组是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延安的又一批外国客人。去晋察冀的是其中一个分组，到达晋察冀后，他们还将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到晋绥、冀中、察哈尔三个地区去。他们的总“头儿”是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史迪威将军的部下。在后来美方发表“赫尔利声明”之前，我方和美军观察组还是精诚合作的。

然而这些美国人架子大得要命。一上路，他们就要开了大少爷脾气。当时，为了保证安全，上级派了一个警卫排随行。这些美国人把警卫当作他们的勤务兵，一会儿埋怨这里照顾不好，一会儿指责那里照顾不周，而且一定要吃西餐。本来，我以为他们既然是军人，又是从印缅战区过来的，骑马不会成问题，而且很多美国人本来就是善于骑马的。不料

这些大少爷连从那边上马都不知道，一上路，就接二连三地从马背上掉下来好几个。于是他们便撒野，暴躁地抽打牲口。我就通过翻译告诉他们：在这里骑马不比美国西部大草原，沟沟坎坎多，得悠着点儿骑。

但是这些美人国傲得很，我们善意的劝说，反而使他们更加气急败坏，一个个挥着拳头朝我大声嚷嚷。

我问韩叙：“盟军讲什么？”

“他们说：‘抗议给我们使用这样的马，将军阁下。’”

我憋了一肚子气，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帮他们学骑马，给他们示范，以便让他们尽快适应在黄土高原上骑马。两天后，他们的骑术大有长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亲切地拍拍马脖子，吻一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太散漫。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甚至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样“变”小的等等，都成了他们的问题，一天到晚围着我“将军阁下”地问个不停。

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长征路上我与杨成武同志率红四团向道州强行军时，一个团的人马疏散隐蔽，只要几十秒时间；从解除空袭到恢复行军，也不过分把钟。可是这些美国人却不行，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营，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

策马乱窜，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哪里听得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用个把钟头才能收拢。有的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失去骑手的空马跑得四面八方都是。警卫排的战士们还得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我犯起愁来，照这样下去怎样通过敌占区？怎样突破封锁线？

战士们也有意见，都气呼呼地不答理他们，美国人很敏感，对我的态度大惑不解。德穆克上尉便小心翼翼地来问我：

“将军阁下……”

我正窝着火，便冒出一句：“什么‘将军阁下’，别叫了！”

德穆克惊愕地瞪大了蓝眼睛，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楞住了。

我仍不理他，只管催马前进。德穆克也不做声了，安静地跟在行列里。途中休息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叽哩咕噜地开了一阵会，其中一个便大声喊我的警卫员胡大方：

“胡！你过来。”

胡大方同志是个很活泼的小鬼，他心灵手巧，把马匹打扮得又干净、又漂亮。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喜欢他。这次把他叫去，是为了询问我发火的原因。

小胡通过翻译告诉他们：

“你们太稀拉！”

“噢！”

“不能向我们的人耍态度！”

“噢！”

小胡每说一句，他们就恍然大悟地“噢”一声。德穆克又问到所说的“什么将军阁下，不要叫了”的原因。

胡大方知道他误会这个称呼出了问题，但又不便实说是因为他们太散漫而引起我发火，便飞快地找出一个理由：

“一般来说，我们八路军是不这样称呼的。”

这小鬼还真有点“外交头脑”。美国人顿开茅塞，纷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同志？”

“首长？”

“先生？”

胡大方笑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叫他‘领导’好了。”

美国人大惑不解。翻译告诉他们：这个词的意思是：带领、引导。这倒很适合我对他们的责任。

当晚在黄河边宿营，军区发来电报告诉我们：陈正湘、曾美同志已经带个营来接应我们了。

由于马上要进入敌占区，我把美军观察组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讲注意事项。我的讲话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打断。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安全通过敌占区？万一和敌人

遭遇了怎么办？我们只有一个排，有能力掩护他们吗？

我一一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最后让他们换上便衣。谁知这一下乱了套，他们穿上陕北老乡的服装，你看我，我看你，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又打滚又蹦跳，直喊上帝。

在米脂，韩先楚同志设宴款待了我们，组织观察组参观了战士们发明的“土迫击炮”即抛射炸药包，观摩了游击队的军事训练。我把美军赠送的卡宾枪送给韩先楚同志一支，他高兴极了，如获至宝地收下。还有两支，后来送给了陈正湘、曾美同志。

过了黄河，我们便开始夜行晓宿。敌占区的各级游击队和抗日政权早已接到通知，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安排好食宿条件，在日寇岗楼林立、路沟纵横的封锁线上，开辟出一条条安全“走廊”。每当我们潜伏在出发线上等待游击队通知的时刻，在夜色里不时传来埋伏在敌伪内部的“关系”用暗语报告“平安无事”的时候，或者在日寇装甲巡逻车探照灯的“盲区”里闪电式地跃过铁路的时候，这些美国人总是又担心又激动，在他们的脸上、眼中和动作中充满了冒险的神情。

德穆克问我：“领导，耿。（他们一直用着这个可笑的称呼）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

我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便对他说：

“无所畏惧。”

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我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这便是四十多年后已经做了夏威夷亚洲问题顾问的德穆克写在影集扉页上的赠言的缘由。

有几次我们遭日伪军袭击，我叮嘱美军观察组，一定不要乱，部队掩护时，你们跟我冲，不要怕，放心走就行。他们果然很听话。看来，刚启程时我对他们发那次火还是有用的。

十一月初，陈正湘、曾美同志率领的一个营接上了我们。考虑到德穆克他们吃苦性差一些，我们便弄了几辆牛车让他们坐。十一月十三日，我们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的城南庄及其附近村庄。美军观察组按原计划活动，他们要求去看看抗日军民挖的地道，要求了解八路军的抗日战绩，我们都一一做了安排。

十二月二十五日，按照西方习惯，晋察冀军区设宴为盟军人员过圣诞节。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真心实意地感谢我们，连说“八路军，顶好。”

元旦过后，他们便分成三个小组，到各根据地“观察”去了。陪同他们的除了翻译之外，还有新华社记者高粮同志。

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共呆了半年多，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才离开。临走时他们把自用的七、八支卡宾枪留下。我把这些枪都分给战友，当时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同志正要到

冀东去工作，我便给了他一支以防身。

收 复 张 家 口

由于聂司令员在延安开会，中央决定由程子华同志代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同志是山西人，很早就参加了“倒阎(锡山)”的学生运动，后来投笔从戎，考入黄埔武汉分校，参加过广州起义，是红军中著名的将领。也许由于他是山西人的缘故吧，他特别爱谈关云长，但并不崇拜他，他所崇拜的是戚继光，因为戚继光是打倭寇的。

我到达晋察冀后，任军区副参谋长，和程子华同志一起主持军区工作。毛泽东同志让我们注意做城市工作，我又兼了军区联络部部长和司令部情报处长，向保定、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地派出侦察、情报人员。当时，晋察冀各部门都派出了地下工作者，分别由潘自力(城工部)、许建国(社会部)、刘仁(联络地下党员)负责。他们的任务是发动工人运动，搜集日伪情报，瓦解敌军士气，为反攻做准备。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已被我抗日军民的战斗烈火烧得走投无路。一九四五年二月，军区制定了扩大解放区的战略方案，发动春季攻势，各分区先后光复了任丘、河间、新镇、饶阳、安平、武强、深泽、灵丘等县城，威逼北平，并重新掌握了紫荆关要隘。

一九四五年四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决定仍以向北发展为主，于六月六日展开夏季攻势。这次进攻共消灭日伪军一万多名，解放区扩大到八十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二千五百万。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毛主席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军委要我们迅速占领张家口，打通去东北的通道。

张家口是塞上重镇，日寇以此为中心，苦心经营了防御工事，屯集了大批粮食和军火。为了保守这些工事的秘密，日本兽兵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民工。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等同志都在延安，他们得知苏蒙联军正向张北进军，立即给程子华同志和我发来一封电报，让我们相机夺取张家口。

当时，按照朱总司令八月十日的命令，驻张家口的日军已经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仅仅过了一夜，敌参谋长即变卦，声言他们奉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虽然我方再三警告，他们仍然不听，妄图依托工事，苟延残喘。

人民的胜利果实，绝不能让反动派摘去。鉴于国民党部队正沿河套和平绥线用骑兵和铁路运输向张家口逼近，八月十七日，我们电令平北军分区派部队向张家口急驰。平北军分区的四十团和十四团迅速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察

北骑兵支队亦在多伦多与苏蒙联军会师。我到各部队去看望了战士们，见他们为了抢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前面赶到张家口，一路飞奔、日夜兼程，脚上打了一层又一层的血泡。在待机地域，我见到了分手多年的杨力同志，他已经担任了营长职务。

杨力同志一直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警卫员，我们共同反“围剿”，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算是患难与共。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我留他在军区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我问他：

“杨伢子，小鬼子投降了，有什么打算？”

“我还能干什么？将革命进行到底呗！”

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已经学会了使用大炮，今后，我计划学会开飞机，开军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要得。”我被他的话激动起来，半开玩笑地说：“你倒是海陆空全想搞一番啊。”

全国解放后，杨力同志的志愿果然实现了，他曾驾机飞上蓝天，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高级指挥员——北海舰队司令员。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二十日拂晓，我在军区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命令。部队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占领了日本领事馆，突破清水河铁桥防线。日军扔下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大批军需，狼狈逃窜。我军立即控制全城，派出早已安排好的干部接管各部门的事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张家口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宣告这座塞上重镇回到人民手中。

拿下张家口，我华北根据地与东北根据地之间就有了重要支撑点。这一仗共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缴获步枪一万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山炮五门，弹药库和物资库七十多座，骡马数以万计。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和市长等，也当了俘虏。

我带领机关工作人员，认真清理了那些仓库，造册登记，准备向部队补给。当时夏季已过，东北天气冷得早，我军前往东北工作的同志，路过张家口时都来找我要棉衣，这些仓库帮了我的大忙。

也许是受杨力同志那番话的鼓舞吧，我把一九三二年在福建漳州学会的开汽车的技术又用上了，经常自己开车外出办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察冀军区继续巩固胜利。电报说：

程耿：

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得的胜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郭刘向北平前进之部队和陈仿仁、罗元芳向大同前进之部队除各留一部破坏铁路交通外，主力应迅速沿平绥路向张家口集结，以张家口为基点扫除张家口四周之敌并巩固张家口，力求

集结两万人于张家口附近。

这个电令为我们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指明了当前任务。此时形势紧张，蒋介石同样在命令他的部队加紧进犯。他们在晋察冀及周围地区，集中了四万三千多人，主要是蒋、傅（作义）、阎（锡山）的兵力，也有收编的大批伪军，甚至还有日军。蒋介石妄图以他的北平行辕为中心，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我解放区实施东、西夹击，切断我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九月二日，军委在发给程耿的电报中又称：

傅作义部之第三、第三十五两步兵军一骑兵军三万八千人，马占山部五千余人正在向归绥运动中，共约四万三千人。估计傅、马两部除留归绥、集宁、丰镇、大同站线外，还可能集中四至五个主力师（二万五千至三万人）进攻张垣。傅先头部队于廿六日有乘我主力尚未集中继续东进夺我张垣之势。我必须巩固张垣已得胜利，为着争取时间集结主力，对傅取诱敌深入，至适当时机歼灭该部。

九月九日，我们开着汽车，到灵丘去迎接从延安飞回晋察冀的聂荣臻司令员。他是乘一架美国 C—46 型飞机到达的。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刘澜涛、肖克、罗瑞卿、黄永胜等，

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也随同前来。

我与聂司令员、罗副政委等驱车回到张家口,住在宣化路原日本蒙疆派遣军的司令部院落里。现在该处已成为我们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一路上,从延安来的同志纷纷对我说:“我们在延安听到你们解放张家口的广播,真是高兴得‘不亦乐乎’了。”

我抓紧时间给他们汇报工作。看来,下一步该大家忙个“不亦乐乎”了。

第六章

从谈判桌到攻城战

斗争在北平军调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八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内战的阴影却已经悄悄逼近。

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我党我军：

一手是武的。他在美国帮助下，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西南地区急急忙忙地运到东北和沿海地区，抢占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暗中命令已投降的日伪军抗拒我军受降和接管城市；甚至派遣军队进攻我解放区军民。

另一手是文的。他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搞重庆谈判，除了迫于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以及国际上的朋友反对国民党战争政策而外，还怀着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是，以假谈判掩护真备战、真进攻。就在重庆谈判的同时，他加紧军事部署，秘密颁发了大量《剿匪手本》，发出“剿共”密令，命令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发动进攻，制造军事冲突。

另一是，阴谋把毛主席扣留在重庆，妄图使我党我军群龙无首，任其宰割。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党中央确定了我们的方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一方面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挑衅；一方面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同意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当时，我们许多同志，还有国统区的民主人士，都担心蒋介石下毒手，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劝他勿去重庆。但是毛主席胸有成竹。他对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大解放区的领导同志说：我去谈我的，你们打你们的。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你们要狠狠反击，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狠，取得的胜利越大，我在重庆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预见，证明了党中央“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

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到处碰得头破血流。一九四五年九月，山西的闫锡山集中十三个师进攻我晋冀鲁豫军区的上党根据地，遭到我根据地军民迎头痛击；十月，我们发动反攻，歼灭了敌军三万五千人。同时，绥远的傅作义侵占了我归绥、卓资山、丰镇、集宁等地后，企图向张家口进犯。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对傅作义部队进行反击。在聂荣臻、贺龙同志统一指挥下，我军经过几次激战，共歼敌一万二千多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地区。在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也都被粉碎了。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于十月十日签订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并不得不让毛主席回到延安。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派遣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以“特使”名义“调处”中国内战问题。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我党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签定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还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根据协议，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执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人组成）领导。

军调部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三方各派一名委员组成。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同志，国民党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

一月十一日，军区领导通知我：马上去北平，参加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工作。当时，我除了担任军区副参谋长外，还兼任野战军参谋长的职务。（打绥远时，中央要华北地区

组织野战军，聂司令员命我到大同附近组织野战军司令部，并兼任参谋长。)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其他准备，只是扼要地移交了参谋部的工作，就匆忙乘飞机，于当天就赶到北平。

我刚走进北京饭店，向秘书长李克农同志报到，他就交给我一个任务：参加十二日举行的三方参谋长会议。当时我方代表团还没有参谋长，我的职务是副参谋长，所以由我参加参谋长会议。

十二日上午，我从住地北京饭店，驱车前去开会。会址在协和医院。该医院原来的病房，这时都改作军调部的办公室。

这是军调部正式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会议开始前，先定座位。美方参谋长赫斯克是会议主席，坐在会议桌中间。他安排我坐在左边，叫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坐在右边。为什么这样安排呢？也许是他按照美国的习惯，认为右边比左边要高贵一些；也许是他参照一些外国议会的传统，让左派坐左边，右派坐右边。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对此我并不计较。

但是，对于会议上的辩论，我寸步不让。

由于是第一次会议，所以国共双方都没有提出具体问题讨论。谈判和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政治原则上。蔡文治一开始就吹嘘国民党如何为争取和平而努力，对中共如何“宽大”，并反咬一口，污蔑我党我军进攻国民党军队，破坏和

平。他言词激烈，甚至谩骂我们为“共匪”。

我当然不客气，也骂他们为“蒋匪”。我一方面表明我党我军反对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诚意；一方面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发动和扩大内战的阴谋。我还指出，国民党不是真心诚意地来谈判和平，而是想从谈判桌上捞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美方的赫斯克假装居间调停，实际上是帮着国民党说话。

这次会议就这样在火药味很浓的唇枪舌剑中结束了。

当走出会场时，我和蔡文治彼此脸红脖子粗，都是气呼呼的。可是，不打不相识，这次交手却为几十年后我们两人间的交往打下了基础。一九八〇年六月，我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美国时，居住在美国的蔡文治伉俪盛情邀请我和赵兰香到他们家中作客。回国后，我向叶剑英同志转达了蔡文治先生的问候，并建议叶帅邀请蔡文治先生来华访问。后来，蔡文治夫妇几次回国访问和开会（黄埔同学会），也来我家作客。“相逢一笑泯恩仇”，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决不能阻止炎黄子孙间现在的友好交往。

十三日，叶剑英同志从重庆飞到北平。我向他汇报了谈判情况。同时，我建议尽快派参谋长来。因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虽然我和蔡文治的军衔都是少将（蔡文治后来提为中将；我军干部本无军衔，因要参加军调部工作，所以中央军委特别任命了一批同志为将校），但是从职务上看，赫

斯克和蔡文治都是参谋长,而我是副参谋长,因此,我方如能及早派参谋长参加会议,将有利于工作和斗争。

叶剑英同志告诉我,中央已任命罗瑞卿为参谋长。他要我马上和美方联系,请美方派飞机到承德去接罗瑞卿同志。我经过联系后,于次日上午十一时乘美机到达承德。下午四时从承德起飞,不到一个小时就返回北平。除了罗瑞卿同志和我外,同机到北平的还有李聚奎同志,他是到军调部来参加我方召开的各解放区参谋长会议的。

罗瑞卿同志来后,我在军调部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交通问题上。因为,我还兼着我方代表团的交通处长。而交通问题,是我们和国民党方面斗争的重点之一。国民党想通过对铁路、公路等交通线的控制,加快运军队、运武器到东北和沿海地区,增强军事力量,以便扩大内战。我们就在会议上揭露其阴谋,想方设法阻止或迟滞国民党军队利用交通干线进攻解放区。我作为交通处长,就要多方收集有关资料 and 情况,提供给叶剑英同志参考。当然,代表团本身的交通问题,如和美方联系飞机等,也由我负责解决。

后来,军调部派出了一些交通小组到各地去解决交通问题。记得派到热河、北平的小组中,我方代表是陈伯钧同志;派到枣庄去的我方代表是黄镇同志。

除了会议桌上的斗争外,我们还要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

我方代表团人员住在北京饭店一层和二层的一部分房

间，国民党代表团住二层一部分和三层一部分，美方人员住在三层。为了监视我方人员，国民党派特务密布在饭店门口和一层、二层的走道内。连我们的汽车司机也大都由特务充任。

有一次，李克农同志叫我去办一件事：把化学家陈景昆先生（在延安边区政府工作，家住北平）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儿接出来，作为我的女儿送到张家口，转去延安。我从北京饭店偷偷地溜出去，不料还是给特务盯上了。我在街上走了几圈，看看后面的尾巴还在，就走到东安市场，从西门进，往人丛里一钻，由北门出，总算摆脱了特务追踪。把陈家小女孩接出来后，就住在我的房间里，对外称是我的女儿，第二天把她送到张家口去。

特务大概也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我每次出门，身后总有两个特务盯着。而当时我出外活动特别多。因为，我在晋察冀军区兼任联络部长，抗战期间曾向北平、天津、保定等地派遣过四、五十位同志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失去了联系，所以，我到北平后就要去找他们。另外，华北局、城工部等兄弟单位也托我联络派出的同志。我频繁外出，更引起了特务对我的关注。而我行动时也特别小心，每次总要在马路上、胡同里兜上几圈、十几圈，直到确信用掉了尾巴，才去进行联系。

不仅如此，甚至我出去散步、看电影，也有特务跟着。有一次，我到电影院买票时，看见两个特务在我身后几步远的

地方等着。我就多买了两张票，送给他们并说：“别在外面等着，来，一起进去看电影。”他们被我这个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一面接过电影票连声道谢，一面喃喃地说：“我们是奉命行事，嘿嘿，例行公事。”

时间久了，许多特务的面孔，我都熟悉，甚至有的特务住在哪里，我也知道。有一次，我发现经常在北京饭店内监视我们的一个特务，有好几天不露面了，一问别的特务，说是在家打摆子(发疟疾)呢。我就上街卖了点奎宁，到他住处——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所小房子——去看他。这个特务十分感动地说：“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有人管我，你们共产党倒来照顾我。”

于是，我和他就交谈起来。他把特务内部的情况，包括对我们代表团领导同志钉梢的分工情况，也告诉了我。例如，谁负责监视李克农，谁负责指挥特务司机等等。

我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那末，对叶剑英呢？”

他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不仅是派人监视了。”

我一听话中有因，就套他一下：“这我知道，你们还用别的方法。”

“啊，你们也知道！”他显得有点惊奇。接着，他又解释说：“不过，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翠明庄方面的事另外有人负责。再说，像这种安装、窃听的技术，我也不懂。”

原来，国民党专门给叶剑英同志拨了栋房子，作为住处。这栋房子叫翠明庄，在东华门拐角处。

我把特务所说在翠明庄装有窃听器的消息，告诉了李克农同志。他开始有点不相信，说特务怎会透露如此机密的情况，别是假的吧！后来，我们到翠明庄去检查，果然找到了窃听器。李克农对我说：“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接着，我们把窃听器按原样放好；然后把国民党代表找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挖出窃听器。国民党代表脸红耳赤，十分尴尬。

后来，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为叶剑英同志找到了住处，大家称它为叶公馆。

以后，我和宋时轮同志等也搬出北京饭店，住到了西皇城根附近的蒙福禄馆。我还从张家口搞了辆摩托车来，放在蒙福禄馆外面。我出门就骑摩托车，特务追不上，只好在后面干瞪眼。

四平保卫战侧记

按照《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国共双方应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可是，蒋介石悍然践踏协议，不断派遣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各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在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奋起还击。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蒋介石把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东北，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从二月中旬起，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盘山、辽中、辽阳、铁岭、抚顺等地；四

月上旬，又向我东北民主联军驻守的四平发动进攻。

军调部先后派出了三十二个停战小组，到全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去进行调停。其中到东北去的是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个停战小组。我方代表团决定派我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参加第二十八小组。我们先到沈阳。当时在沈阳成立了一个军调部临时分部，也称中心小组，我方组长为饶漱石，其他成员有李克农、许光达、李聚奎、王首道和我。饶漱石兼第二十七小组的我方代表，就在沈阳进行调停；许光达为第二十九小组的我方代表，去本溪；我们第二十八小组则去四平。至于其它地区停战小组的情况，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时，沈阳在苏军撤离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们安排我方人员住在一个大旅馆里，约有十来天不让我们出门。显然，他们是想方设法拖延和阻碍我们去执行军事调停任务。

经过交涉，我们好不容易离开沈阳，向四平进发。开始，乘的是火车，由于当时铁路不能全线通车，所以半道上又改乘汽车，先到铁岭。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部队就驻扎在铁岭和铁岭以北的开原一线。而七十一军恰好是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队主力。

陈明仁是湖南人，是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外甥，后来于一九四九年在长沙随程潜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那是后话。但是，一九四六年在铁岭的陈明仁，

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长，却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我们一到铁岭，陈明仁就把我们软禁起来。他在我们住处放了哨兵，不让我们离开。当时我带着电台和机要员（兼译电、发报）。但是陈明仁不许我们的电台工作。也就是说，他既不让我到四平前线去，也不让我和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联系。

于是，我找陈明仁，责问他为什软禁我们，阻碍停战小组去四平进行调停，为什么不让我们和北平军调部通讯。他装作无可奈何似地说：“唉，我也没有办法，这是‘高峰’的命令。”后来，我了解到，别的停战小组中的我方代表和工作人员，也都遭到同样的待遇。看来，这确实是蒋介石的统一部署。

二十八停战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叫刘建义，是个少将。他也是湖南人，爱好围棋，经常拉我和他下棋。也许因为是同乡，又是棋友，所以他和我谈得很投机，竟把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和四平我军英勇抗击敌军的情况都透露给我。

我从刘建义提供的情况中，从与陈明仁的谈话中，以及我方工作人员对周围的观察中，大体了解到：

在前一阶段的四平保卫战中，我军英勇作战，在四平外围和城郊连续歼灭敌军，给了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现在我军正在坚决保卫四平城区，不断打退有着飞机、大炮、坦克掩护的敌军进攻。而敌军正在增加兵力，除了原有的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外，又从其他地方调来军队，包围四平。看来

蒋介石是全力以赴，对四平这个战略要地志在必得。

我认为，四平的战略地位固然重要，但是对我军来说，四平保卫战的目的在于牵制、阻击敌军，迟滞其对东北北部的进犯；同时，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当这些目的实现后，在敌众我寡和四平被围的军事态势下，我军就不必再为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和敌人硬拚；而是可以抓住有利时机，主动撤出四平，以避免我军的较大伤亡。

按照上述想法，我拟了一个给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电报稿，其主要内容是：一、报告我们在铁岭被软禁的情况；二、转述刘建义透露的有关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三、建议四平我军，在完成了歼敌、阻击任务外，视机主动撤出四平，不和敌人硬拚。

电报怎么发出去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美国人的电台发报。因为，陈明仁不敢阻止我们和美国人接触，而美国人为了维护其“中立”、“调解”的假面具，也不能拒绝我们向北平军调部发报。于是，我叫机要员将电文译成密码，然后带着翻译到美国代表的驻地去。见了美国代表，我提出请他们将电报发往北平军调部转交中共代表团。美国代表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们绕过国民党的监视，和北平我方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后来得知，我方代表团收到了电报，并把有关内容转告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

过了十多天，国民党方面允许我们去四平。原来，当我

们被软禁时，我四平守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狠狠地打击了进犯的敌军，打了一场艰苦的但也是漂亮的保卫战。当任务完成后，我军主动撤出四平，向长春方向撤退。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却装作一个胜利者的样子进入四平。

在去四平的路上，我们经过梅河口地区。梅河口那个地方，是我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程世才同志率部在那里驻守。我到了梅河口附近的一个集镇，就把路上了解的敌情，以及哪些铁路段修通了，哪个地方搞了临时桥梁等情况，核对整理，然后起草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通过我们地方组织，一方面和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联系，上报中央；一方面电告梅河口程世才同志。

这时候，又出现一段插曲：国民党方面提出要到程世才那里去，还要带一个团跟着去，显然，他们是想去找茬。他们通过美国人来找我商量，我和程世才一联系，程说欢迎来。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我坐的吉普车在前面，司机是国民党派的。美国人开的吉普车跟在后面。再后面是国民党的代表和军队。遇到了一条河，河并不深，可是我的司机不敢开，说过不去。我就下车，找后面车上的美国人，鼓动他开过去。美国人说可以，在前面先开过了河，我的车也跟着开了过去。后面的国民党代表和军队也陆续过河。过河不远，就到了梅河口。只见程世才同志正骑着马，在村口等我们。

在程世才的司令部里，国民党代表向我们挑衅，责问我军为什么攻打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占领梅河口。我们同他展

开了舌战,揭露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逼得我们只好反击,我们举出充分的事实,驳得国民党代表张口结舌,说不上来。

程世才同志吩咐安排我们吃午饭,午睡休息,到天快黑了我们才走。等我们三方代表离开后,程世才就下令把留下的国民党一个团缴了械。接着,敌人大部队开过来,进攻梅河口,被我军打退。过了一年,程世才同志遇到我时说:“上次你们来得正好,把敌人阻了一家伙,使我们有调动兵力的时间。”

我们到四平后,由于我军已经撤离,所以没有什么“调停”的工作要做。我方人员除我外,还有张松涛参谋以及翻译、电台台长和机要员各一人(公务员和司机都是国民党派的特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同时,我们研究讨论了一下这次四平保卫战的成绩和意义。我在讨论发言中认为:

首先,我军以寡敌众,以劣势的装备对抗国民党军队的美式武器、先进装备而能消耗大量敌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最后能够从容地主动转移,这说明我军在四平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

第二,四平保卫战牵制了敌人,把敌军的精锐部队吸引到四平周围,阻延了敌军的北进,使我军得以从容部署东北战场其他地区的兵力。

第三,我军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撤离四平,不死守一个

城市，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这体现了我军战略上和战役战术上的灵活性。

除此而外，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和陈明仁辩论。

陈明仁也是醴陵人，他的老家离我的家乡相隔不到二十里路，所以他口口声声称我为同乡，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他在铁岭软禁了我们，但是表面上对我还算客气。一进四平，他还举办了个宴会欢迎我们停战小组。晚上，他还以聊天为由，非得拉着我和他睡在一个床上不可。我想，一起睡就一起睡，看你聊些什么。

那一夜根本没有睡觉，谈话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他吹捧国民党的生活好。他说：“你看我们的生活有多好，吃的是洋面，穿的是美国卡其。”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全用外国货光荣啊？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搞自己的爱吹外国的？”

第二，他吹嘘他们打了胜仗，吹嘘国民党的前途“光明”。他说：“两年以后，不到三年，我们一定消灭共产党。”我驳斥他说：“你们虽然背信弃义，向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到处碰得鼻青脸肿。就拿四平之战来说，我们在以寡敌众的情势下，给了你们以沉重的打击，然后主动撤离，这难道能说是你们打胜了吗？至于说到内战的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三年，国民党一定失败。”他说：“你敢跟我打赌吗？”我说：“行！”就这样，我和他打了赌。这个赌，究竟谁胜谁负？以后的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过了三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中南地区胜利进军时，陈明仁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十二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以后又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并被授予上将军衔。记得一九五〇年初我调到外交部，准备出国去当大使。出国之前，先请假回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看看。二月份，我回到醴陵，恰好陈明仁的部队就驻在醴陵。我专门去拜访了陈明仁。他一见到我就说：“四平的对赌，你赢了，我输了。”他又举行了一个宴会欢迎我。这次宴会和四平的不同，四平的对赌参加者除我们几人外，都是国民党军官；而醴陵的对赌参加者都是我军的团以上干部。在宴会上，陈明仁向大家讲了他和我在四平对赌的故事。

这个故事及对赌的胜负，反映了四平之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

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蒋介石自恃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大约一百六十万人）调运集中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开展大规模内战的布置已经就绪，所以就进一步扩大内战。在东北，继侵占四平之后，又侵占了长春；在华北、华东、华中各地，也大举向解放区进犯。八月十日，“三人小组”中的美国代表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这实际上是让蒋介石放手进攻解放区。

在这种情况下，停战小组当然无存在的必要，军调部也

自然解体。我就于九月初从东北回北平，一星期后，又离开北平，回晋察冀军区去。

我乘上开往八达岭的火车，告别了北平这个古老的城市。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前飞奔，我的脑海中也思潮起伏，心中交汇着各种不同的感情。记得年初从张家口来北平时，在飞机上也是心潮起伏。当时虽然知道蒋介石在搞两手，总还有着对和平的一线希望。现在这希望破灭了，尽管这是由蒋方造成的，但我作为军调部的工作人员，总怀着几分遗憾。不过，又一想，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假谈判、真备战的面目，让全国人民看清了谁真的要和平、谁搞假和平，谁反对内战、谁挑起战争，这也是我们在军调部工作的成绩。接着，我又考虑到，蒋介石已经撕破假面具，悍然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回到晋察冀，就要和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较量。我相信，在解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支持下，我们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在四平和陈明仁打的赌，我必胜无疑。……

正当我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展望中时，突然汽笛长鸣，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头朝车窗外望去，原来八达岭站到了。这时我的小警卫员叫了声：“看，我们的战士！”

我一看，果然，在车站附近，离蒋军的哨兵约一百米处，我军的哨兵正站得笔挺地严守在岗位上。

我下车后大步往前走。两个国民党士兵看了看我佩戴

的军调部臂章,就走过来把我的行李提到双方哨兵的中间地段。这时,我们的两名战士过来迎接。他们向我立正敬礼,然后微笑着提起我的行李往回走。我取下军调部臂章,快步跟着他们。走过我军哨位时,我抬头看了看明朗的蓝天,高兴地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

张家口,我们一定回来!

傍晚,我从八达岭乘汽车回到了张家口。

虽然已经暮色苍茫,街上的路灯也没有北平的亮,但是我看着张家口的市容觉得它比北平更美。也许是因为阔别了半年多,所以倍觉亲切;也许是由于这座历史悠久的塞上名城,具有一种淳朴的气息,投我所好;然而,更主要的,看来是因为:它是我晋察冀军民直接从日伪统治下解放的最大城市,现在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察冀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晋察冀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回到张家口,就象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回到了母亲身边,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回到军区司令部,放下行李,我就去见聂荣臻司令员。

“司令员,您好!”我走进了聂司令员办公室,一面敬礼,一面轻轻叫了一声。

聂司令员正埋头于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在批阅文件。

听得我的叫声，他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立刻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是你，耿飏同志！你回来啦！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回来的路上倒很顺利。”我回答。

“哦，”聂荣臻同志说：“听你的口气，在北平肯定不很顺利。”

“是啊。”接着，我把在北平军调部的斗争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聂司令员听完我的报告，沉思了一会，然后安详地说：“现在，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在华中，蒋军已经向我中原解放区进行围攻，因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挑起了全面内战。在华北，蒋介石对我们张家口垂涎已久。他企图夺取张家口，打通平绥路，把北平和绥远连结起来，又可以切断我们华北解放区和西北解放区以及东北解放区的联系；为此，蒋军把张家口作为战略目标，正在加紧调动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

听了聂司令员的这番话，我对当前的战略态势有了较深的认识。

聂司令员接着说：“前一时期，承德被敌军侵占，集宁一仗我们又没有打好，这样，就使张家口陷于东、西两面受敌的境地。不久以前，杨尚德同志从北平带回来一份重要情报，是蒋介石命孙连仲制定的进攻张家口作战计划。从这个作战计划来看，敌人正在准备从东、西两个方面包围和进攻

张家口，所以，我们要针对敌情来制订我们的作战计划，作出我们的作战部署。”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信任的眼光望着我说：“今后，军区有关作战方面的工作，还是由你来抓。”

我明白，这是聂司令员兼政委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的关于军区司令部的分工决定，是郑重而严肃的命令，不能推辞，因此回答：“好的，但是让我先熟悉一下情况。”

“那好！”聂司令员高兴地说：“你路上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休息。”

可是，重任在肩，我也无心休息。我立即到司令部去了解敌我情况。

敌人的兵力部署，正如聂司令员所分析的：按东、西两线组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东线的敌军由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以蒋介石嫡系李文兵团为主力，共有五个军及一个整编师，其中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军、第九十四军、第九十二军及整编第六十二师沿平绥路摆开，矛头直指怀来、张家口，第十三军则准备自承德出古北口，从北面配合进攻。西线的敌军归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除了傅作义自己的部队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暂编骑兵第一旅和四个骑兵纵队外，还有阎锡山的暂编第三十八师，都集结于大同、集宁一线，虎视眈眈地盯着张家口。

我计算了一下，敌人东、西两线的兵力，总计为三十多

万人。

接着，我又计算了我军的兵力，不禁暗暗吃惊。

记得在去年抗战胜利时，我晋察冀军区共有八个纵队辖二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余万人（不包括地方部队）。但是现在，军区只有四个纵队，其中除了刚从晋冀鲁豫调来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下辖三个旅外，其他三个纵队，每个纵队只辖二个旅；这样，野战部队总共才九个旅，不到六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全军区也只有十来万人。

才一年时间，我军兵力如此锐减，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有二个纵队调往东北外，在我去北平军调部的八个月中，我们的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精简，大批营、连干部复员，全军区复员转业了共有十几万人。这样，就造成了兵力对比上敌众我寡的情况。再加上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整个军事态势，不利于我坚守张家口。

同时，我又了解了我军的装备、通讯情况以及敌军的火力、机动能力等情况。

不久，我带着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参加了聂司令员召集的高级指挥会议。这个会议在聂司令员的房间里举行，参加者为肖克同志、罗瑞卿同志和我。

会上，我们分析了战略形势和目前张家口面临的战役态势。会议认为，从战略上看，敌人对张家口这个战略要地志在必得，而我们的作战原则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拘泥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从战役上看，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又

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因此，不宜死守张家口。我们认为：应该在这个战役中尽力歼敌，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主动撤离张家口。

同时，我们也分析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其东线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其西线是傅作义部队，两者都想抢先占领张家口，既可拿个头功，又可扩大地盘。但是，蒋介石肯定不会让傅作义捷足先登。按照其历来做法，他定会命令孙连仲派李文兵团抢先发动进攻，以便先占领张家口。而傅作义虽然也想争夺张家口这个重要城市，但是由于他在不久前的绥远战役和大同战役中遭到我军的痛击，因此在行动上比较谨慎，不敢贸然冒进。

根据以上分析，会议决定：按照中央军委来电中“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以及关于分路逐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精神和毛主席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我们应把主力部队配置于东线，先集中打击和消灭东面的敌人。对西面的敌人，则以少数部队予以牵制和阻击。在经过激战，沉重打击了蒋军，消耗其有生力量后，我军再撤离张家口。

至于具体的兵力部署，会上决定：把军区主力部队第一纵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二纵队的第四、第五旅，第三纵队的第七旅，第四纵队的第十旅和独立第五旅，共八个旅的兵力配置于东面的怀来、延庆一线，加上大量民兵配合，形成防御正面。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和冀晋军区

政治委员王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的第八旅和独立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旅共六个旅的兵力，发起平汉路北段战役，从敌侧翼开辟战场，以配合怀来正面的作战，并保证我军主力在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撤离张家口后，能顺利地南下紫荆关和保定地区，转移到平汉路两侧打击敌人。同时，命令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向热西进击，箝制敌人第十三军，另以一部破坏北宁路、平承路的交通，阻滞敌人行动，在西线，则由张宗逊同志率领晋绥军区的三个旅阻击傅作义部队。

会上还决定组成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该指挥机构由肖克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我任参谋长，潘自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会后，我们便分头进行传达、动员、组织等各项工作。

为了配合部队作战，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联合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动员起来，“保卫张家口，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这一号召象嘹亮的军号响彻晋察冀边区的上空，全边区的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一个支前热潮。群众运输队把粮食、蔬菜和其他物资迅速送到前方。

东线防御部署确定后，我立即带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杨尚德同志等三人，于九月二十日前往怀来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勘察地形和落实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乘吉普车沿着公路向东行驶。当到达沙城附近时，

已是中午，大家的肚子都发出“咕咕”的警报，于是，我们便停下车来，想找些水和食物。杨尚德眼快，他用手一指说：“参谋长，那边有个果园！”我一看，果然不远处有大片的果树，那成熟的香果、鸭梨和奶子葡萄正散发出诱人的甜香！我们便朝果园走去。我走进公路南侧的一个窝棚，却不见果园的主人，只有一件上衣挂在棚壁的木钉上。我便退出来，对大家说：“不要犯纪律啊，找一找老乡吧！”于是，大家分头在园内果树间找了一会，还是找不到主人。怎么办呢？看着大家又饥又渴的样子，我只好同意大家破个例，先摘些葡萄和梨吃起来，边吃边等主人回来。可是，吃完后还是不见主人的踪影。我就掏出几元钱，叫杨尚德写了个便条，把钱和便条一起放在窝棚内那件上衣口袋里。然后，我们又继续驱车东进。

到达怀来前线后，我勘察了地形，了解了前沿阵地的情况，把野司前线指挥所设在怀来西南的下八营。

九月二十二日，肖克司令员和罗瑞卿政委也到达怀来前线。我便同他们一起去前沿阵地视察。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五旅旅长肖文玖带着我们来到前沿阵地。我们看见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不少人光着膀子，汗流浹背，有些战士手上磨起了血泡，还在抢着挥锹抡镐。

我看着一排已经筑好的工事，笑着说：“这是现代的长城！”

这时，肖文玖同志一个箭步跳上一个碉堡，在上面用力跳了几下，对我们说：“瞧，都是用枕木、铁轨构筑的，抗住一般的炮弹不成问题！”他那轻快、矫健的动作和充满信心的语调感染了周围的战士们，他们干得更欢了。

看了前沿工事，我们又到战士们的住地去检查连队的伙食。乘着罗政委在向战士询问伙食情况，我向陪同我们的团的干部问道：“弹药准备得怎么样？要充足些！”

“参谋长，”他们回答：“我们不但把前沿的弹药配备足了，团部也准备了不少。”

几个战士在旁边风趣地插话：“够敌人吃的啦！”

我说：“弹药充足就有了打胜仗的保证，但要注意节约使用，通讯联络也要保持畅通。”

罗政委这时也过来说道：“其他各解放区都在不断地打胜仗，这次就看你们的啦！”

“请首长们放心，”在场的干部、战士都高声答道：“坚决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

接着，我们来到五旅司令部，听取了旅长、政委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选好有利地形，派出侦察警戒分队，迫敌过早展开，要注意讲究战术，以减少我军伤亡，消灭更多的敌人。

就在我军加紧东线防御准备的同时，蒋介石几次手令其北平行辕和第十一、十二战区部署向张家口进攻，并限期“收复”。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也奉蒋介石之命，特地从南京来到北平督战。

九月二十九日，敌人在东线开始进攻，敌第十六军及第五十三军所属一三〇师共四个师，分为两个梯队，沿平绥线向怀来进攻。敌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经黄花城西出延庆，侧击怀来。正面进攻的敌第一梯队九十四师和二十二师，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我军阵地疯狂冲击，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来。但是，我军凭借着坚强的战斗意志，一直沉着应战，顽强地抗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敌军在付出了大量伤亡的代价后，才进占了岔道、南园、东花园等地。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十分关注这一战局的发展。九月三十日，我党驻南京的代表团致函蒋介石发表声明，严正谴责国民党的这一军事挑衅行动。声明指出：“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并以同样的备忘录一份送致马歇尔。

对于我党这一义正词严的劝告，蓄意侵占张家口的蒋介石竟置若罔闻。敌军不仅没有停止军事进攻，反而变本加厉，于十月二日夜，又将其第二梯队一〇九师投入战斗。三日凌晨四时，敌九十四师和一〇九师分别沿铁路北、南两侧，向我怀来东面的火烧营和南北七里桥等阵地展开了猛烈进攻。敌人出动了一百多架次飞机和许多坦克把成千上万发炸弹、炮弹倾泻在我军前沿阵地上。仅对火烧营我军阵地，就打了七千多发炮弹。顿时，几十华里长的战线上硝烟

弥漫，尘土飞扬。轰炸、炮击过后，敌人集中兵力，向火烧营阵地发起冲击，坚守该阵地的我军第十四团二营的战士们，英勇抗击，他们以猛烈的火力迎击敌人，用集束手榴弹和汽油瓶炸毁敌人的坦克，然后勇猛地插进敌群和敌人拼刺刀。经过一天激战，到黄昏时，敌人仍然被阻于我军阵地前。

与此同时，敌一一六师在延庆方向的进攻，也被我军阻抑。

在我军坚决、顽强的阻击下，敌人损失很大，原先耀武扬威、神气活现的敌军，已经士气低落，士兵都疲惫不堪。我军抓住这个时机发起反击。三日晚，我反击部队在朦胧的月光下，以神速的动作突然接近敌一〇九师的三二五团阵地前沿，迅猛扑向敌人。敌人不提防受此突袭，顷刻被打得鬼哭狼嚎，东奔西逃。经过四个小时战斗，敌三二五团以及三二七团的一个营，被全部歼灭。我军缴获了敌人的三辆坦克。我军这一反击，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

敌人从正面进攻怀来碰得头破血流，这可急坏了陈诚、孙连仲等敌军头目。十月四日，陈诚带着国民党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从北平来到南口，重新调整了进攻计划，企图从侧面迂回怀来。

敌人把其战役预备队第九十四军的四十三师和一二一师配置于怀来东南约五十里的马刨泉、横岭以东，企图迂回我军侧后。我们察觉到了敌人的这一阴谋。为了彻底粉碎

敌人企图，野司当即决定集中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第四旅、第三纵队的第七旅和第四纵队第十旅的一个团，统由杨得志、苏振华同志指挥，在马刨泉地区设下埋伏准备歼灭该敌。

当时国民党的头目们自以为这一仗必定能够取胜，所以中央社大肆吹嘘：“各方面皆表示相信，一切战事至十月十日即将停止，届时政府自铁路线上肃清共军之战可告完成。”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呢？

十月七日，敌军进到马刨泉以东约六十里处。八日下午六时，敌四十三师的先头部队一二七团及三个山炮连进入马刨泉。我军立即切断其退路，将该敌严密地包围住。接着，进攻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居高临下向敌群猛烈射击，从四面八方敌人发起冲锋。这个曾在缅甸受过美军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共一千六百余人，被我全部歼灭。

但是，敌人仍不死心。九日，敌一二一师经镇边城，四十三师的两个团经横岭城分路推进，企图迂回怀来。十日，我军第二旅之一部，在南石岭阻击敌四十三师，打死打伤敌军六百余名。我军第三旅、第四旅、第十旅和第二旅的主力，也在镇边城东南联合阻击敌一二一师，消灭敌军一千余人。

就这样，经过历时三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迂回我怀来的企图，以死伤三千余人的代价而宣告失败。事实无情地打了国民党中央社以一记响亮的耳光！

从九月底到十月十日的十多天激战中，我军在平绥路东段共毙、伤、俘敌一万余人，一直把敌人阻挡在怀来以东、以南地区。当我们把成批的俘虏后送，在张家口下车途经市区时，老百姓都站在道旁拍手欢呼，祝贺我军取得自卫战的巨大胜利。

与平绥路大捷同时，我军在平汉路北段也取得了胜利。我军于九月二十九日向该路段举行自卫出击，经过五天的连续作战，收复了望都、定兴、徐水、容城四座县城，控制了二百五十余里铁路，攻占了该路段的所有车站，歼灭敌军八千三百余人。延安《解放日报》特地为此发表了社论《平汉线之捷》，赞扬这一胜利给予各地自卫战线的军民、特别是平绥线上自卫作战的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这时，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嫡系部队屡战失利，已经无力发起新的进攻，于是他眼珠一转，想出了一条诡计：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命令傅作义立即从西线向张家口发动进攻。

傅作义窥探到我张家口西北方向兵力空虚，就调集其主力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共约三万余人，于十月八日从商都向东南、从集宁向东经南壕堑（尚义）袭占我张北，然后疯狂地向张家口全力进逼。十日，敌军突破狼窝沟一线我军阵地。这样，我军在张家口以北就无险可守。鉴于我军在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中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

务，因此军区领导决定按照九月初高级指挥会议上决定的并得到中央同意的计划，主动撤离张家口。

十日晚至十一日晨，我党政军机关秩序井然地撤出了张家口这个塞上名城。十二日，平绥路东段我军也主动撤出阵地，转到察南地区。

张家口失陷后，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其实，敌人占领张家口，是背上了一个包袱；而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后，可以收拢原先四面防御的兵力，集中力量广泛开展机动作战，从而进一步掌握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主动权。

我们离开张家口是暂时的。在撤离时，我们所有的指战员心中都藏着一个信念：张家口，我们一定回来！

转战平汉路

虽然我军是在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后主动撤离张家的，但是，我们有不少指战员对此想不通，认为不应该放弃这个大城市。有的同志说：“我们经过浴血战斗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的城市，现在又叫国民党占领，真憋气！”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抗战八年，总是在山沟、农村、树林里转，好不容易有了个大城市，却又放弃了，太可惜！为了不让这种情绪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一九四六年十月下旬，晋察冀中央局在

涑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上学习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运动战粉碎敌人进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等指示。聂荣臻同志结合学习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就张家口的战守和放弃问题，和我军未来的作战原则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克服了悲观、埋怨情绪，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从而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当时，敌人在占领张家口后，骄横之态不可一世。蒋介石下令集中十一战区和十二战区的庞大兵力，气势汹汹地准备扑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敌人的企图是：深入我晋察冀腹地，侵占我根据地，分割我解放区，包围并消灭我军主力，以便与其他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相呼应，实现其“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的梦想。为达到其上述目的，敌人首先把攻击目标针对我易涑地区（易县——涑源）。敌第五十三军和九十四军部署在平汉路上和涑水地区，一方面维护交通，保护其军事供给线，一方面准备向西攻占易县，然后出紫荆关，会同察南的敌军一道进攻涑源。

为了打击和粉碎敌人的这一狂妄计划，我野战军于十一月初和十一月中旬，连续进行了两次战斗，在易县、涑水间的二十里铺、门墩山一线，迎击了准备进攻易县的敌军，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军三千八百余人。

在这两次战斗中，我军打得十分英勇。特别是在十一月

中旬的战斗中,第三纵队第八旅的第二十三团第一营,在朱彪营长率领下,坚守刘家沟阵地,顽强抗击敌军两个团的围攻。他们从十七日清晨至傍晚,一直和数倍于我的敌人激战了十三个小时,共打死打伤七百余名敌军。由于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因而被授予“钢铁第一营”的光荣称号。

这两次战斗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打乱了敌军的计划,挫伤了敌人的锐气,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进攻的野心。于是,我军得以利用这个战斗的间隙,在易县、满城、完县的山区边沿地带进行休整和补充。

前一段时间,我因车祸受伤,在涞源后方医院治疗。当我伤愈回到司令部时,正赶上休整期间掀起的练兵热潮。各个部队都开展了五大军事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的训练。干部们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并学习了运动战的作战方法。通过学习和训练,整个部队的战术思想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与此同时,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和编制进行了调整和增扩。第一纵队(满城战役后调回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将冀中军区的独八旅,改编为第二纵队第六旅,察哈尔军区十一旅,改编为第三纵队第九旅,冀晋军区的独二旅,改编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这样,第二、三、四纵队均由原来的两个旅编制,增扩为三个旅。同时,军区将新参军的三、四万群众补充给了野战军,所以各

纵队的兵力得到了增强。

根据当时的战斗环境和条件，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决定精简领导机关，把工作重点放在前线。为此，于十二月三日报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将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合并于军区机关，前线的作战指挥，由军区按照具体情况临时组织前进指挥所实施。十二月十六日，敌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向满城进犯。敌人大概是害怕重蹈易、涞（易县、涞水）战役的覆辙，因此这次的行动显得异常拘谨，不敢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了兵分三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术。敌五十三军一三〇师的两个团为北路，一一六师的两个团为南路，敌保安第二总队刘化南部的两个团为中路，同时从漕河、保定一线出发向西逼进，企图在满城东面的一亩泉会合，然后攻占满城。十九日，敌一三〇师的先头部队三八八团已进占前、后大留村，后面的三八九团则占领了杨庄和东南韩村；一一六师已进占南、北奇村；中路的第二总队则进至周营、道口一线。我军决定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具体兵力部署是：以三纵队主力迎击并歼灭北路之敌的先头部队三八八团，并以一部箝制敌三八九团；以四纵队主力迎歼中路之敌，并以一部监视南路的敌一一六师；尔后集中第三、四纵队主力，合歼南路之敌。二纵队留一个团在易、涞地区箝制敌九十四军，其主力则南进至满城以北为战役预备队。另外，命令冀中军区的独七旅迅速进至铁路东侧的容城附近，自东向西出击固城、保定的敌军，相机夺取徐水，切断平汉

线,以防止敌九十四军南援。二十日傍晚,我军各部队全部到达预定的集结地域,接着就向敌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到二十一日上午,已基本歼灭中路的敌军两个团,少数残敌向南路敌军一一六师驻地逃窜。一一六师把这些逃兵误认为我军向其进攻,慌忙开枪射击,在这场自相厮杀中,敌军又死伤了一百余人。二十一日上午,肖克同志和我一起从军区指挥部出发,骑马来到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坡上,距前沿阵地约二、三里,从这里观察前沿的战斗,看得十分清楚。当时我军已把北路之敌三八八团严严实实地包围在后大留村。我们决定到傍晚向该敌发起总攻。敌三八八团是五十三军的王牌团,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驻缅甸的远征军,全部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他们在占领后大留后,构筑了地堡等防御设施,因此,给我军的进攻增加了困难。但是,我三纵以八旅的二十四团、七旅的十九团、二十团等三个团的兵力,把敌军的这个王牌团包围得水泄不通。英勇的指战员们决心要歼灭这个强敌。二十一日白天,被围的敌人一次一次地向我发起反击,企图突围逃跑,但都被我军击退。傍晚,我军对后大留之敌的总攻开始了。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起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射击声、呼啸声和爆炸声,夹杂着我军战士冲锋的呐喊声和敌军的惊呼声和哀叫声。午夜,枪炮声渐渐稀疏,又过了一会,前边打来电话报告:战斗已经胜利结束,敌三八八团全部被歼。

遭到我阻击部队沉重打击的敌一一六师和一三〇师的

三八九团，得知三八八团被歼，不敢恋战，仓惶逃回保定。驻扎在涞水一带的敌九十四军也未敢南援。于是，敌人对满城的进犯，便以失败告终。

满城战役后，军区机关于十二月底进驻完县的南腰山村。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我们严密监视敌情，寻找战机。当时，从保定南面的望都，经定县、新乐，直到石家庄北面的正定，约二百五十里的铁路线上只有敌保安第五总队侯如墉部六个团驻守，即使加上这些县的“自卫队”，力量仍很薄弱。于是，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战机，歼灭这部分敌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四纵和独一旅的指战员们，在风雪中向保定南面的敌军据点发动进攻，从而开始了保南战役。这天正是旧历除夕，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军会在除夕出击，军官们正在花天酒地地过年呢！因此，我军一进攻，敌人就乱了阵脚，没费多大周折，王京和望都就被我军一鼓作气地攻克了。望都守敌一个团又一个营向东逃到于家庄地区，被我军歼灭。

当天，肖克、罗瑞卿同志和我一起乘吉普车到望都周围察看地形、了解情况。根据了解的敌情，我们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应该乘胜扩大战果，继续挥师南下攻占定县，控制从保定到石家庄间的全部铁路线。

接着，我们驱车向望都城內开去。不料，途中吉普车出了故障，开不动了。随行的作战科长杨尚德同志和附近的老

乡商量，借了一间房子，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他自己去找部队。过不多久，杨尚德同志回来了，一手提着半袋面粉，一手抱着两棵白菜和一块猪肉。他说：这些食物是向十旅的后卫营要的。

我建议分一下工：肖克、罗瑞卿和杨尚德三位同志做饭，我帮助司机修车，警卫员放哨。大家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分头动手。等我帮司机同志修好车，饭也做好了：白菜炖肉，猪油烙饼。这样，我们就饱餐了一顿别有风味的年夜饭。

吃过饭已是深夜，我们告别老乡，继续驱车来到望都城內。我们了解了城內的情况，探望了伤员，直到清晨，才离开望都回军区驻地。途中路经完县县城时，只见大街上挂着“欢庆望都解放，喜迎新春佳节！”的大幅标语，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都沉浸在新年和胜利的双重喜庆之中。

回到军区，我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对下一步行动的意见，向聂司令员作了汇报。他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命令第四纵队主力立即分路秘密南下至定县、新乐之间，歼灭敌侯如墉部，攻下定县县城，控制平汉线的保（定）、石（家庄）路段，以切断敌人运输线，并利于我军今后机动作战。接着，军区把这一行动计划以电报报告了中央军委。

不久，毛主席回电，就打歼灭战问题作了指示：

一、以小部兵力箝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箝制方面。

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

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如何打歼灭战，讲得十分具体，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部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他希望我们检查过去的作战经验，争取打几个大歼灭战，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鞭策。

四纵主力在定县和新乐间的寨西店、十家疃地区，歼灭了由新乐北援定县的敌军一个团和两个营，并乘胜追击，解放了新乐县城。这样，定县城内的敌军已完全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

敌人为解定县之围，急调五十三军经保定南援。针对敌人这一企图，我们立即命令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停止休整，分别进至保定南面的方顺桥、尹固、阳城地区，准备打击南援之敌，以保障四纵的作战行动。看到我军已有打援准备，敌五十三军终于未敢出动。

二十八日，我第四纵队向定县县城发起总攻。城内守敌有第五总队的一个团、县保安警备队和曲阳、唐县、定县、安国等地的“还乡团”，共约三千余人。我军发起总攻后，分数路突破敌防，攻入城内。敌人一看大势已去，便兵无斗志，慌忙出西门向北夺路而逃，被我第四纵队歼灭其一部于城郊；另一部两千余人继续向北逃窜，逃到望都东面的阳城地区，

被我第二纵队全部歼灭。这样，我军解放了被汉奸侯如墉长期占据的定县县城。

在保南战役中，我军攻克了望都、新乐、定县三座县城，歼、俘敌共八千二百余人，控制了二百多里铁路，切断了保定和石家庄敌军的联系及其补给线，并使我冀晋和冀中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

敌人在保南失败后，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想翻本，便把罪恶的目光转向保北。他们乘我军主力南下之机，于二月六日蠢然进犯易县。为了诱敌深入，便于围歼，我军主动撤离易县，向西南方向退却。敌九十四军进入易县西南的塘湖，五十三军则进到姚村策应。由于敌人两个军猥集一起，因此我们原定在塘湖地区歼敌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为了开拓新的战机，我第二纵队（欠第四旅）和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迅即向固城、漕河、徐水一线出击，以便调动敌五十三军回援，从而孤立敌九十四军。果然，十六日凌晨，敌五十三军回援徐水，九十四军主力同时退到姚村和附近村庄。于是，我们便决心歼灭姚村及其周围的敌军。

十六日二十三时，我军各部队进入战斗，经过三个小时激战，歼敌两个营，敌军主力两个师的五个团全部龟缩到姚村顽抗。

十七日拂晓，我们重新调整了部署，准备在黄昏时集中主力围歼敌人。但是，由于有的部队战场观察不确实，把敌军向姚村收缩误认为是向铁路沿线撤退，因而擅自撤围，向

铁路方向发起了追击,致使预定的进攻无法实施。同时,由于我们的决心下得太迟,各部队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部署,所以这个围歼计划未能实现。

十八日凌晨,我们获悉敌二十二师和独立九十五旅已向姚村增援;并将于拂晓后派飞机来轰炸,以掩护九十四军东撤。我立即将这敌情向聂司令员汇报,他找了肖克、罗瑞卿同志一起分析、研究,我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恋战,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凌晨四时,聂司令员果断地下令撤退。

我向部队传达了拂晓前撤出战斗的命令,又去组织司令部机关准备转移。东方出现鱼肚白时,我回到聂司令员的住处,催促他赶快离开。他还不肯走。我说:“敌人的飞机可能马上就来轰炸,您的住处目标太大,必须尽快离开。”在我一再催促下,聂司令员从容不迫地站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风趣地说:“敌人的飞机来赶咱们啦,好吧,咱们走吧!”

我们来到村口上了马,走出不远,敌机就出现在南腰山村上空,接着便投下几颗炸弹。在轰隆声中,聂司令员回头向村里望了望,对我说:“耿飏,你很机警,你看,敌机果真炸中了我们住的房子!”

我望着那被炸处的滚滚烟尘,心中暗想:“好险哪!幸亏早走了一步。”

安国夜谈兵

军区所在地从冀西迁到了冀中的安国。

安国古称祁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情纯朴。自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冀中军区部队解放了安国以后，这里的老百姓一直衷心拥护党的领导，热情支持我们的部队。军区机关一到安国，当地政府和群众就为我们安排好了住房，农会、妇救会还动员妇女为战士们拆洗衣被，赶做鞋子。我们机关的同志们也主动为老乡挑水、扫院子，还帮助群众送肥、春耕。军区文工团为群众演出了《血泪仇》《白毛女》等文艺节目，一、二十里外的老乡都赶来看戏，他们高兴地说：“俺们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戏文，这回可开了眼啦……”

安国的夜晚，十分宁静。军区领导所住的舍二村更是静谧得出奇，只有屋外哨兵的轻轻走动声，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一个战斗的集体、革命的军营。

月光透过树枝和窗框，照在床前。我躺在床上，虽然身子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是翻腾着中央军委对我们的批评意见。

因为，我们来到安国后不久，就接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电报针对我们前一阶段作战的情况作出批评和指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

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该学习和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十分重要，对我们的批评严肃而中肯，切中我们前一阶段作战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从去年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晋察冀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英勇作战，共歼灭了八万余敌军，取得了自卫战争的初步胜利，但是，和其他战场上的兄弟部队相比，我们的战绩有较大差距，主要是歼灭敌军还不够多，没有打出对敌我双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胜仗。对此，我作为分工负责作战的军区副参谋长，深感自己没有做好工作，所以心潮起伏，转侧难眠。

为什么仗打得不理想？经过反复思考，我找出了四条原因：

首先，由于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和平谈判的形势，我军区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较多地缩减部队，精简、复员了大批营以下干部和战斗骨干，使野战部队由原来的二十六个旅缩减成九个旅，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并且，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当然，易涞战役后野战军补充了三、四万新兵，但是还远远没有恢复原来的兵力。

第二，前一阶段我们一直打被动仗，撤出张家口以后，

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在平汉路北段的一连串战役中，除保南战役外，都是敌人主动进攻。而保南战役，也是在敌人进犯我根据地的态势下，我军被逼采取的反击行动。

第三，没有完全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易涞战役中，虽然我军打得很英勇，毙、伤、俘三千八百多敌军，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但是没有成建制地消灭敌军。满城战役中我们虽然歼灭了敌军三个团，但是敌军的另外三个团却逃回保定。保南战役中，歼灭的敌军也都是团、营级部队。而对姚村之敌九十四军的围歼计划，却又未能实现。总之，在平汉路沿线的一系列战役中，我们尚未歼灭过敌人的整军或整师。

第四，未能大踏步进退，机动作战。由于部队兵员不足，以及出于保卫根据地的愿望，我们总想在易涞山区的边缘打几个胜仗，因而一直在平汉线北段的狭小地区和敌人周旋，而没有能够甩开敌军主力，大踏步进退，以机动作战来打击敌人。

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从而扭转我区作战中的被动局面呢？

对于这个问题，聂司令员和军区其他负责同志已经有考虑。军区领导在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指示后，于二月二十三日复电军委，除检查了前个时期仗打得不理想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汇报了拟以两个纵队向北进迫平津、尔后转向青(县)沧(县)的打算。

我认为，军区领导所作的这种“打出去、争取主动”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参谋部能不能把这种战略决策演化为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

想到这里，我再也躺不住了，立刻披衣下床，点上蜡烛，坐在靠近窗户的木桌边，摊开军用地图……

北平是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蒋介石北平行辕所在地，平津地区是敌军的战略基地，所以敌人在这里驻有重兵。我军进迫平津，可以威胁华北敌军心脏，打击其嚣张气焰，因而是一着妙棋。但是，由于敌人在平津驻有重兵，以我军目前的兵力，尚不能在这个地区大量围歼敌人，更不能攻城夺关。因此，在向北进迫平津的同时，我们最好能够从另一个方向选择一个合适的军事目标。我在地图上审视再三，目光终于落在南面的石家庄。

石家庄位于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东麓，是平汉、正太（正定至太原）、石德（石家庄至德州）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扼华北地区东西、南北交通的咽喉，地势十分重要。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急令胡宗南把其嫡系部队第三军从大后方赶到石家庄，抢先控制这个平汉路上的战略要地，把它变成联结北面的保定绥署和西面的太原绥署的枢纽，并把它作为进攻我冀中、冀南、冀晋、太行等解放区的基地。所以，我军如果以石家庄为军事目标，不仅可以创造围歼大量敌人的良好战机，而且可以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切断敌人南北、东西的战略联系，并拔除安在我各个解放区中间的这颗

钉子，从而沉重地打击敌人，而大大地振奋我们的士气、民心。

想到这里，我高兴得从木凳上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对，下一步目标石家庄，我得把这个意见马上报告聂司令员。”可是，一看表，现在已是深夜，不便去惊醒聂老总；而且再一想，聂司令员高瞻远瞩，“打石家庄”肯定已在他的考虑之中，我如果要去报告，不能只说“打石家庄”的重要性，而应该讲出其可行性，最好能够提出作战方案。“对，我何不立刻拟出作战方案，然后再去报告呢！”

于是，我又坐在地图前，久久凝思。

虽然说石家庄比不上平津，可是它毕竟是华北重镇，城内除了驻有敌第三军和保安部队外，远近郊区还有敌人的地方部队，一打起来保定和正太线上的敌人一定会驰援，东面津浦路上的敌军也可能沿石德铁路西援，所以，这根“骨头”并不容易啃，必须设计出一个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

我一面重温着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打主动仗、“大踏步进退”进行运动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等有关指示，一面思索着各种方法。忽然，我脑中闪过了幼时在家乡和同伴捉螃蟹的情景：

我的同伴赤着脚站在河滩上，用一只手去捉螃蟹，不料给螃蟹的大螯夹住了手指，痛得嗷嗷叫；于是，他改变方法，先用左手按住螃蟹的背，再用右手把它的两只大螯掰了下

来,这样就不怕再夹手了;他很得意,就把左手松开,不料螃蟹迈开八条长腿,很快地横行着逃到水里去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在抓第二只螃蟹时,把大螯和长腿全都掰掉,将它掷在河边,然后再去抓第三只。

童年抓螃蟹的故事给了我启发。我觉得,石家庄之敌好比螃蟹,要进攻它就得像掰蟹脚那样先扫清其外围,切断其外援,把它变成一座孤城,然后再全力围攻。

当然,对于石家庄外围和附近之敌,也要一个一个地打。根据“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原则,我认为应该先打正太路的敌人。因为正太路守敌大部分是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较差,而且兵力配置分散,沿铁路线形成一字长蛇阵,没有纵深,比较容易打。而正定周围和正太路两侧都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对我军作战有利。歼灭正太路守敌后,接着再进攻津浦路和保定的敌人。这样,不仅掰掉了“蟹脚”,扫清了石家庄外围,而且切断了它和太原、北平、天津的联系;而对我军来说,则可以和太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增强了围攻石家庄的力量。

基于上述想法,我就埋首在方桌上,草拟起作战方案来。红绿箭头在素图上逐渐标出……。忽然听得远处鸡鸣,不一会附近的公鸡也都合唱起来,抬头向窗外一看,东方已经发白。这时素图已经标完,但是文字说明尚未开始。

我吹灭蜡烛,走到屋外,打了一回拳,活动活动身子。然后回到屋里,继续伏在桌上写文字说明。不知什么时候,警

卫员站在我的身后问道：“首长，您怎么没有吃早饭啊？”我一看表，呀，不知不觉已是九点多了！就随口说道：“忘了，和午饭合着吃罢！”

我一面写文字说明，一面把已经标好的地图上的箭头、注记等，又作了些修改；等整个作战方案全部写好，一看表，已经下午一点半了。糟糕，午饭又忘记吃了！这时，肚子忽然咕咕叫起来。我正想站起来到厨房去要些饭吃，却发现桌子角上正放着饭菜。

嘿，准是警卫员见我没有去吃饭，就送上门来了。他见我专心致志地在写，不敢打扰，就放在桌子角上，以为我已经看见；不料我视而不见，倒使饭菜都凉了。不过，我的肠胃很好，不怕吃凉饭。于是，狼吞虎咽地把饭菜全都纳入了辘辘饥肠。

吃完饭，我靠在床上打了个盹，然后又坐到桌子前继续写第二个作战方案。因为，虽然先打外围、后攻石家庄这个总的想法在我脑中已经确定，但是，打外围和附近之敌的各个战役，哪个先打、哪个后打，每个战役要动用多少兵力，哪些部队参战，何时发起进攻，等等，都须要反复推敲，经过研究、比较，才能最后决定；所以要多制订几个作战方案，以供军区领导选择。

第三天深夜，正当我在写第三个作战方案时，忽然房门“吱”地响了。我回头一看，只见聂司令员披着大衣走进屋来。我赶忙站起来问道：“司令员，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有

睡呀？”

聂老总笑着说：“你不是也没有睡嘛！我见你的屋子亮着灯，过来看看。”原来，聂司令员先到我对门赵尔陆同志的房间里谈了一会，他问赵尔陆同志：“这几天怎么不看见耿飏。”赵告诉他：耿飏几天来老在屋里对着地图琢磨。于是，聂老总就过来了。接着，他又问道：“这几天你总呆在屋里，在干什么？”

我说：“我正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聂司令员高兴地说：“好哇！这次中央局会议的内容之一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正在考虑。那么，你先谈谈你的想法。”

我就把自己的全部想法，原原本本地向司令员作了汇报。

听我说完，聂司令员笑着点点头说：“你的这些意见很好。这是个大的战略行动。我们的作战步骤，应该从整个战局着眼，通盘筹划。”他略微停顿了一会，然后继续说：目前，平、津、保地区是敌人主力集结的地方，所以我们暂时不向这个方向出击。而西面的正太路和东面的津浦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正太路上的敌军，分属两个指挥系统，铁路东段在河北境内的属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指挥，铁路西段在山西境内的属闫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指挥。他们互不统辖，这就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我们先打外围之敌，进攻小城市，然后进攻石家庄，这个想法是符合毛主席的作战

原则的，可能会打一个较大的胜仗。经过这几个战役后再解放石家庄，就可以切断敌人南北的联系，从而孤立平、津，为我军尔后进攻平、津，解放整个华北创造条件。

听了聂司令员的这些话，我心中不禁赞叹：他以战略眼光、从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想得比我深远！

接着，聂司令员走到桌前，仔细地看了桌上的作战方案，关切地问：“什么时候能够搞好？”

我说：“第三个方案明天就可以搞完。为了集思广益，我准备把方案交给作战处，让参谋们先行讨论，提出意见，进行修改、补充，然后上报，请你审核。”

“那好，”聂司令说：“到时召集一个旅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讨论、研究，看哪个方案好。”

三月二十三日，军区召开了各纵队旅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聂司令员首先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我区的形势，传达了晋察冀中央局会议的主要精神，然后对大家说：我们前一阶段虽然打得很英勇，取得了胜利，但是总的来说，是打被动仗，和敌人在铁路边顶牛，而没有做到打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要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大踏步进退，打几个主动仗、翻身仗；要很好地分析研究敌我情况，避免急躁，防止顶牛，力争主动。接着，他把想法大致介绍了一些，要我把我的方案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把三个作战方案的标图都挂起来，一一作了介绍、说

明；还口述了第四个方案，这是一个腹案，来不及标在图上。我讲完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记得大多数同志赞成第二个方案，并对此作了补充。这个方案经修改后上报中央军委。当然，以后具体进行每个战役时，还要拟制战役计划上报。

我们开会的那天，正是我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的第四天。消息传来，大家对敌军胡宗南部侵占革命圣地，无不义愤填膺。因此，便以“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干部会议全体干部”的名义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电报说：“蒋军侵占我民主圣地延安，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我们决心百倍奋勉，继续贯彻你们的路线和指示，巩固团结，提高战斗力，用歼灭敌人的胜利来捍卫你们……。”

会议开了一整天，除军事问题外，还研究了部队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最后，军区各位领导同志就即将开始的石家庄外围和正太线战役有关事项作了指示，各纵队的同志当即受领了任务，划分了侦察地段，然后纷纷返回部队去进行准备。

接着，军区组织了指挥所，准备前往平山县指挥作战。同时，向冀晋、冀中军区布置了各项支前工作。全区军民都紧张而热烈地行动起来了。

正太线上捷报频传

中央局会议和军区干部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干部和战士纷纷主动请战，普遍提出要在战斗中杀敌立功，各级政治部门抓紧进行战前动员，提出了“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处处立功”的响亮口号。

高涨的士气，为取得正太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战役不仅是为了以后进攻石家庄创造条件，而且也是对目前我军在陕甘宁边区作战的有力配合，因而它不仅关系到我晋察冀军区整个作战方案的能否实现，而且也关系到保卫党中央和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意义重大，不容忽视，只许打胜、全歼敌人，不许让敌军跑掉。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士气高涨的基础上，制定周密的具体战役计划。

于是，在聂司令员和其他军区领导同志的指导下，参谋部门根据军区干部会议决定的作战方案，制定了正太战役实施计划，计划预定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以第二、第三、第四三个纵队全力进攻并歼灭石家庄外围（包括正太线东端的正定）之敌；尔后以主力向西攻歼获鹿、井陘、阳泉、平定、寿阳等地守敌，控制正太铁路，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援兵。

为了充分作好战前准备工作，各纵队分别组织了旅、团

等各级副指挥员及参谋人员按照划分的地段进行侦察；各部队还抓紧时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

四月三日和四日，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一部分地方部队，分别从安国、定县、行唐等地隐蔽南下，向战役集结地域开进。同时，大批民工和大量弹药、物资也由冀中、冀晋地区向战地集中。

四月六日，军区领导率领前指机关从安国来到了平山县城西南的封城村。这时正值清明时节，平山县西部山区呈现一片明媚的春光；可是我们谁也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景色，一到封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役指挥工作。

四月八日，各纵队全部到达石家庄外围地区。次日凌晨一时，我军的炮火划破夜空，打响了石家庄外围的战斗。

在石家庄外围，驻守着敌第三军第七师的十九团，第三十二师的九十五团、九十六团及敌保安第五总队和保安团、还乡团共万余人。这些敌人凭借着日伪时期构筑的数百个碉堡负隅顽抗。

英勇的我军指战员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攻这些据点的守敌。

杨得志、李志民同志率领第二纵队，杨成武同志率领第三纵队，迅猛进攻滹沱河北的敌人各据点。守敌大部被歼，只有十九团的一部分溃兵逃入了正定县城。我军立即包围了正定城，控制了县城南面的滹沱河铁路桥，切断了敌军向石家庄逃窜的退路。

正定城距石家庄约三十里，隔着滹沱河彼此相望，是石家庄北面的屏障。为了使战役顺利发展，必须迅速攻下正定城，一来拔掉这颗钉子，二来可以诱使石家庄敌军出援，以便歼灭援敌。十一日，第二、第三纵队从四面合击正定守敌，仅用半个小时就突破了城墙。接着，我军迅速向纵深进击，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把残敌压缩到大佛寺、天主教堂和正定中学一带。十二日清晨，我军发起总攻，到八时许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保安第五总队、第七师十九团残部及保安团等共六千余人，俘获敌第七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

与此同时，陈正湘、胡耀邦同志指挥第四纵队主力，在冀中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和冀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迅速攻克了石家庄东面和南面的多处敌人据点。接着，于十一日攻克了位于石家庄东南约五十里的栾城，俘敌八百余人。四纵的十二旅则攻克了石家庄西北面的一些敌据点，破坏了从石家庄至获鹿间的铁路线。

第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前指统计了各纵队报来的战果：经过约八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敌军一万五千余人，攻克正定、栾城两座县城和石家庄外围据点九十多处，控制了平汉线上石家庄至新乐间的铁路约一百里，胜利完成了战役计划的前期作战任务。

我军在石家庄外围的作战，把敌人搞得蒙头转向。石家庄守敌以为我军的攻击锋芒是指向石垣，因而其第三军主力龟缩在市区，频频向北平、保定呼援。孙连仲急忙派遣第

四十三师、第一二一师、第二十二师、整编第六十二师、整编独九十五旅等敌军，向大清河北我冀中根据地的胜芳镇大肆进犯，企图吸引我军主力北移回援，以解石家庄之围。敌军在攻占胜芳后，又增派第五十三军向我方顺桥、望都地区进犯，企图袭击我军侧背。同时，孙连仲还把第二十师的第六十六团空运到石家庄，以安定陷入恐慌的守敌。

我们洞悉敌人的阴谋，决定不为其进犯所影响，依旧实施原定计划。我们以冀中军区部队拖住大清河北的敌军，以冀晋军区部队阻击从保定南下的敌五十三军，而我野战军主力则在胜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按照战役计划迅速转入第二阶段作战。

聂司令员于四月二十日将上述想法以电报报告了中央军委。二十二日毛主席回电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正在晋察冀视察的朱德总司令，对于我们的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也表示赞许，他说：“你们的这些想法，合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晋察冀来看，正太战役为尔后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条件；从全局来看，正太战役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从东面打击了胡宗南。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肯定了我们的作战方针，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为了便于指挥第二阶段的作战，我们前指从封城进驻到南望楼村。

四月十五日夜，我军攻克了石家庄西面的获鹿县城，守敌一千三百多人全部被歼。接着，三纵的第七旅和第八旅似两支利箭，迅速向西射向敌人的防御纵深。经过十四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微水、井陘，占领了整个井陘矿区。

井陘矿区是华北的重要矿区之一，一九四〇年我八路军进行打击日伪军的“百团大战”时，曾在矿工的配合下解放过这个矿区。所以，当地群众和我军有着深厚的鱼水之情。这次亲人重逢，矿工和群众不等炮火停息，就纷纷把慰问品送到战士手中。他们还协助我们恢复矿区的秩序，保护好矿区的机器和物资。战斗结束后仅仅四个小时，五千余名矿工就以矿山主人的身份兴高采烈地恢复了生产。在矿区和井陘县城的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庆祝解放、欢迎我军的标语。有一首街头诗这样写道：“绵河水长又长，八路军进了井陘矿，穷人把身翻，工人得解放，救命恩人是共产党！”这首激情洋溢的诗，真切地体现了广大矿工获得解放后的喜悦心情，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深厚感情。

四月二十二日晚，我二纵的第四旅和第五旅从北面直插敌人纵深，对盂县、阳泉之间的燕龛、白泉镇、荫营等地守敌发动猛攻，到二十三日傍晚，已将这一地区的四十多个敌

人据点悉数攻占，从而把一支“利剑”直指正太路中段的重镇阳泉。

与此同时，我四纵从石家庄南面地区北进至井陘、微水一带，担任战役预备队。而三纵主力则自井陘西进，向娘子关守敌发起攻击。

娘子关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这里山势高峻，地形险要，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把它视为扼东面门户的要隘。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堡垒群，派一个团在此把守。自以为这“东方要塞”固若金汤的阎锡山曾吹嘘说：“凭娘子关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堡垒，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过。”可是，他的预言迅速变成了肥皂泡。

当我七旅攻占娘子关前沿要点南峪等地后，惊慌的敌人立即退守绵山。二十五日我军歼灭绵山守敌，占领娘子关。八旅乘胜攻克娘子关以西的敌人据点多处。九旅则包围了阳泉南面的平定县城。这样，我军就从北、东、南三面威逼阳泉。

阳泉有个煤矿，它和附近的黄丹沟铁矿一道，是山西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原料和燃料产地。所以，对阎锡山来说，阳泉既是军事要冲，又是经济命脉所在，决不能失守。为此，他将其精锐部队第三十三军的七十一师（欠一个团）和暂编第四十六师（欠一个团）急急忙忙从太原调到阳泉。这样，加上阳泉原来的敌第十总队以及由日军（日寇投降后被阎锡山收编的）组成的保安第五大队，敌军

总兵力约有一万一千余人，由阎锡山的得力助手赵承绶任总指挥。同时，敌人在阳泉西面六十多里的寿阳，也派驻了暂编第四十九师、第七十一师的一个团以及第八总队的两个团、第九总队的的一个团，共约一万二千余人，与阳泉敌军相呼应。

根据敌情，我们作了如下部署：一，决定使用战役预备队，命令四纵主力自井陘地区迅速西进，绕过阳泉，占领芹泉、测石等地，切断阳泉与寿阳的联系，并从背后进攻阳泉。二，以三纵和二纵的第四旅从正面进攻阳泉。三，命令二纵主力经盂县向寿阳西北的宗艾地区实行战役迂回，并切断寿阳至榆次的铁路，阻敌逃窜。四，命令四纵的第十二旅留守获鹿、井陘地区，以防备石家庄敌军西援。五，命令冀晋军区独一旅向太原北面约一百五十里的定襄县城发起进攻，同时，我以一部分兵力佯攻太原，以牵制太原守敌。

各纵队按照上述部署分别出击。三纵于二十七日占领平定县城后，从南、东和东北三面包围了阳泉，二纵的第四旅在阳泉西北协同三纵封闭了合围口，四纵主力则在攻占芹泉、测石等地后从西面向阳泉之敌进击。二纵主力在攻克盂县县城后，又相继攻克了解愁、宗艾等敌据点，并打下了寿阳西南的上湖车站，从而对寿阳之敌形成威胁。

五月一日，我军向阳泉的敌人全线紧逼。这时，阎锡山被我进攻定襄和对太原的佯攻所迷惑，误以为我军“攻省城征候甚显”，命令赵承绶“速将阳泉部队集中寿阳”。赵承绶

令由日军组成的保安第五大队留守阳泉狮脑山,其余敌军全部撤向寿阳。当敌军撤到测石驿地区时,被我军包围。我军奋勇歼敌,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到四日,阳泉守敌除约有一千多人逃到榆次外,其余被全部歼灭,敌第十总队少将司令荆谊被我军生擒。留守阳泉狮脑山的敌保安第五大队大队长藤田信雄等五百多名日军向我军投降。寿阳的敌人一见大势已去,便弃城落荒而逃。于是,我军相继解放了阳泉和寿阳。

接着,二纵主力沿铁路继续西进,攻克了芦家庄、段廷等车站,前锋直逼榆次。这样,我军控制了榆次以东的全部铁路线,正太战役随之胜利结束。

在这次历时一个月的正太战役中,我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歼灭敌人的正规军第七十一师大部、暂编第四十六师、地方部队第十总队和一个日军保安大队,加上保安队、还乡团等,总数约三万五千多人,其中被我俘获的为二万五千多人。我军解放了正定、栾城、井陘、平定、盂县、阳泉、寿阳、定襄等城市,控制了正太路上三百多里铁路线和平汉路上约一百里铁路线,使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并切断了敌人东西、南北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石家庄这个敌人的战略要点陷于孤立。这样,这次战役就全部实现了预期目的,使我区战局摆脱原先的被动局面而开始转入主动。

东歼青沧顽敌

正太战役后，我们将刚解放的正太路上各城市交给地方部队守卫，野战军各纵队则分别北进到平山、灵寿、行唐等地区休整。前指机关也北迁到行唐县的上碑镇。休整中，我们一方面组织各纵队进行战役总结，开展群众性的“五评”（评功过、评指挥、评伤亡、评消耗、评纪律）活动，以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进行下一个战役。

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正太战役胜利结束后，下一步就要进攻东面津浦线上的敌人。

这时，我东北野战军向沈阳以北的敌军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蒋介石震惊之余，急令北平第十一战区派兵援助东北。为此，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区要“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为了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拖住平、津之敌，使其不能增援东北，我们对津浦线之敌的进攻，就显得更加迫切。因此，军区领导决定立即发起青沧战役，进攻津浦铁路上青县至沧县一线的敌人。

青沧一带地势低洼，河流较多，所以，我们命令各部队利用驻地附近的河流进行渡河攻坚演习。同时，为了摸清青沧地区的敌情和地形，还命令各纵队的团以上副指挥员分头前去侦察。

军区司令部则由我前往前方现场了解敌情。五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带着司令部的作战、侦察参谋和电台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卡车，从上碑镇向青沧地区进发。

卡车沿着行唐——新乐——定县——博野——肃宁间坎坷的公路，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东，吃力地行驶着。经过两天的颠簸，傍晚时到达了河间县的黑马张庄——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卡车还没停下，坐在驾驶室的我，看见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同志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致意。等车子一站定，他就笑嘻嘻地走上前来对我说：“接到军区司令部的电话后，我一直在等待你们到来。这段路程按理一天就可以到，怎么走了两天？”

我一边同他握手，一边回答：“这段路不太好走，时间都耽搁在路上了。”

他说：“你们一路颠簸，很辛苦，肚子也一定饿了，擦把脸就吃饭，吃了饭就休息。”

我对孙毅同志很熟悉。长征以前，我在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任团长时，他是红一军团军事教育科长，从那时起我们就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长征中，我调任红一师参谋长，他则在红一军团任副参谋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聂荣臻同志到晋察冀开创敌后根据地，在晋察冀的烽火中已经渡过了将近十个年头，他作战经验丰富，对这里的地形和敌情都很熟悉，因此我就抓住他，把他作为进行侦察、调查和请教的

第一个对象。

吃晚饭时我对孙毅同志说：“吃完饭请你谈谈这里的情况。”

他摇摇头说：“今晚先不谈，你们路上太劳累了，先好好休息，明天咱们再谈。”

第二天，我把组织青沧战役的作战意图向他作了介绍。他对于军区领导决定主动出击青沧之敌十分赞成，连说：“好极了！好极了！”接着，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青沧地区的地形和敌情。他说：“这一带的敌人都是老牌伪军，老百姓称他们为‘铁杆汉奸’、‘地头蛇’。日寇投降后，这些伪军被国民党收编，他们就更加猖狂地与我军为敌，更加残酷地迫害群众。其兵力主要配置在青县南北和沧县周围：青县北面，从静海至唐官屯一线，由敌保安第二总队的一千六百余人守备；南面，从青县至兴济一线，由敌保安第八总队和青县保安警备队守备，兵力为二千二百余人；在沧县及其周围各据点，则驻扎着敌保安第六总队和沧县、盐山、南皮、交河、南县、景县的保安警备队共七千二百余人。

我又向孙毅同志询问了敌人的装备和工事构筑情况，然后和他一起研究了冀中部队配合野战部队作战和后勤保障工作等问题。

次日清晨，我们乘上汽车往未来的战场去进行实地侦察。孙毅同志派出小部队走在前面，还派了便衣侦察员跟随我行动。汽车驶过子牙河西岸的大城后，便接近了敌占区。

于是，我们把汽车藏在一个村子内，换上便衣，头上戴着当地老百姓喜欢戴的尖顶草帽，改骑自行车沿乡间小路向东来到了运河西岸。

运河像一条闪光的带子，静静地躺在绿色的平原上，河水在缓缓地流淌。河对面就是敌人的据点唐官屯。我们分散坐在河边的柳荫下，取出钓杆假装钓鱼，眼睛却紧张地观察着对岸的敌情。

运河东岸，敌人岗哨林立，荷枪实弹的哨兵不停地沿着河岸来回走动；看来，敌人已有戒备。在视力所及的浅近纵深内，可以见到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碉堡。我目测了一下河面宽度，约有百把米宽。

我们顺着河堤，又到别的河段隔岸侦察，然后再到附近村子里的我方情报站作调查。情报站的同志告诉我们：运河较深，难于徒涉，好在河幅不宽，水流不急，架桥不太困难。（后来我们了解到，有些河段较浅，还是可以徒涉的。）他们还对我们诉说了这些老牌伪军残害群众的罪行，并告诉我们：敌人为了防止我军进攻，曾几次在多处河段挖开运河大堤，放水淹没附近村庄，使广袤的原野变成一片汪洋，给人民造成灾害。

侦察、调查了一整天，到傍晚时，我们才骑着自行车回到大城。在大城、河间地区，我们停留了几天，继续向当地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并布置了部队开进路线上和未来作战地区后勤供应的准备工作。

回到军区司令部,我叫参谋人员把这次侦察、调查中了解的情况,连同各纵队的侦察报告和冀中军区报来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然后向聂司令员作了汇报。

考虑到敌人兵力分散并沿铁路成一线配置这个敌情特点,军区领导决定对敌同时发起全线进攻。具体部署为:第二纵队在渤海军区部队配合下,进攻沧县及其周围各点之敌;第三纵队负责进攻青县、唐官屯一带守敌并准备阻击从天津南下的援敌;第四纵队以一部配合第三纵队阻击援敌,并防止沧县的敌人向北逃窜,其主力则进攻兴济、姚官屯等地守敌。冀中军区部队则配合野战部队作战。

出击命令下达后,野战部队分别从平山、灵寿、行唐、曲阳等地区出发,向东越过平汉路,渡过子牙河,然后一部分部队向南绕道而行,在沧县以南渡过运河,到达津浦路以东的待机地域。另一部分部队则集结在运河以西的待机地域。

六月十二日夜十二时,进攻开始。在南线,二纵的三个旅和渤海军区的二个团,分多路猛扑沧县。经过激战,我军先后攻占了沧县南面的捷地车站和捷地镇、沧县车站和南关以及西门外的军桥,大军直逼沧县城下。

沧县的城墙虽然不高,但是城墙上面和下面都构筑有许多防御工事,加以护城河有的河段和低洼沼泽地连在一起,竟有一里左右的宽度,这样就增加了攻城的难度。我军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准备,于十四日下午七时开始攻城。英勇的指战员冒着城上打下来的弹雨,把山炮推进到离城墙

只有二百米的地方，“轰、轰”连发两弹，就把城墙的西南角轰开了一个缺口。这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一场大雨倾盆而下。那雷声、雨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似乎把城墙也要震坍了。

第六旅的突击队冒着雷雨和弹雨，越过护城河，从缺口处登上城墙，接着，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接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并继续向纵深发展。六旅的另一支突击队则以炸药炸开西门，攻入城内。与此同时，第四旅、第五旅和渤海军区部队分别从东面和北面突破敌人城防，冲到城里。经过激烈巷战，我军全歼城内守敌，俘获沧县敌军指挥官、河北第三专署少将保安司令王维华。

硝烟尚未散尽，我就带着司令部参谋人员经车站从东门进入沧县城内。只见泥泞的街道上，一队队俘虏被押送而过。他们那垂头丧气的模样，和我们战士那虽然疲惫、却充满胜利骄傲的神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北线，我第三纵队的第八旅在浅水河段徒涉渡过运河，先后攻克了唐官屯、陈官屯、马厂等地，控制了北硷河铁桥，并依托北硷河构筑工事，防备天津援敌。三纵九旅则对位于运河西岸的青县发起攻击。由于敌人决堤放水，青县县城被大水包围，守敌企图以此来阻挡我军进攻。但是，九旅健儿冒雨涉水，突入县城歼灭大部守敌；少数敌人跳城南逃，也被俘获了。

在中线，我第四纵队各旅相继攻克李窑、姚官屯、徐官

屯、高官屯、兴济车站和兴济镇等地，全歼守敌。

配合青沧战役，我冀中军区部队还解放了处在平、津、保(定)三角地带中心的永清县城，歼灭守敌一千五百余人。察哈尔军区部队和渤海军区部队也分别攻克了平汉线西侧的高碑店、松林店两个敌据点和天津南面的大里八口据点。

综计战果，三天中我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歼敌一万三千余人，解放了沧县、青县和永清三座县城，控制了津浦线上陈官屯车站至捷地车站间的铁路约一百六十里，使我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这样一来，敌人原计划增援东北的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只得留守天津，不敢出关作战；企图南援青、沧的第十六军、第九十二军一部及整编第六十二师等敌人，也徘徊在天津、静海之间，未敢南下。

保北战场再次扬威

青沧战役后，军区领导决定趁热打铁，命令野战部队在休整三天后，迅速隐蔽西进，出敌不意地向保定以北地区的敌人进击。

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击保北。经过上次的保北之战，我们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当务之急是弄清现在的敌情。于是，我和司令部参谋人员利用部队休整时间抓紧摸清保北地区守敌的番号、兵力及其配置情况。

当时，平津保地区敌军主力集中于津浦线上的天津至

静海一带，保北的敌人兵力空虚，平汉路上从徐水至定兴之间，只有一个师（第九十四军的第一二一师）和一个团（属第十六军一〇九师的第三二五团）把守；另外，在铁路西侧的涞水、易县地区也驻有敌军一个师。

我们以三个纵队对付这些敌军，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我军在这个地区作战，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铁路东西两面都背靠着广阔的解放区，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后盾，我们就可以机动灵活地创造歼灭敌人的战机。因此，我们除了决定全歼平汉路上的漕河、徐水、固城、北河店及铁路东侧的容城等地守敌外，还准备歼灭可能自平津和保定来援的一部分敌军。

信号弹划破夜空，保北战役在六月二十五日晚开始。

主攻徐水的第二纵队第四旅和第五旅，以迅猛的动作直扑城垣，先后攻占了南关、北关和车站；同时，第六旅扫除了徐水至田村铺之间的敌人点堡。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半，我对徐水县城发起总攻。驻守徐水的敌第三二五团，以前在怀来与我军作战时，曾被歼大部，后来虽然进行重建、扩充，并装备了优良的武器，但因曾经遭我歼灭性打击，故而士气低落。该团进驻徐水后，在城墙上下和城内街道上修筑了许多工事，各火力点之间可以互相支援，敌人妄想以此来提高士气，并抵挡我军的进攻。但是，我第五旅的突击部队在发起冲击后仅十分钟，就把红旗插上了城头；接着迅速冲进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第四旅的部队也相继突破城垣，向城

内纵深发展。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第三二五团全部被歼，我军再次解放了徐水。

负责进攻徐水、定兴之间敌人各据点的第三纵队，进展神速。第七旅攻克了北河店和火车站，扫除了固城至北河店间三十里铁路线两侧的敌人碉堡，炸毁了铁路桥，做好了阻击北面援敌的准备。第八旅及第九旅的一部，在扫除了田村铺至固城间的敌堡后，在二纵队六旅的配合下，经过激战，攻克了敌人设防坚固的固城镇和固城车站，全歼守敌第三六二团（敌第一二一师的主力团）及第三六三团的一个营，俘虏敌上校团长刘剑秋等官兵一千三百余人。

与此同时，第九旅主力向容城守敌及其西南的大楼底据点发起进攻。大楼底是敌人用以屏障容城的要点，守敌河北保安第七总队王凤岗部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由于我军存在轻敌思想，事先没有对敌人的工事情况进行周密侦察，不了解大楼底的地下暗堡，因此连续进攻三次都未能成功。这时敌人援兵已到，我军就撤出了战斗。后来在大清河北战役中，我军第二次攻打大楼底，终于拔掉了这颗“钉子”；到那时，我们才了解到：王凤岗这个曾为日寇鹰犬的“铁壳汉奸”（这是当地群众对他的蔑称），不仅在大楼底村周围修建了稠密的明碉，而且还挖空心思构筑了一系列地堡、暗碉。他还在村外挖了一道深、宽均两丈余的外壕，壕内栽满了尖木桩，埋设了地雷，修建了暗火力点，并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鹿砦等障碍物。特别是敌人的侧射、斜射和倒射

火力，给我军造成很大伤亡。这个情况给了我们以极大的教训。所以，我们专门组织各级指挥员实地参观，以汲取教训，改进侦察和作战方法。

我第四纵队也在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相继攻占了保定北面的二十里堡、荆塘铺、刘祥店、漕河、台头、徐河桥、米家堤、尚庄、孙村等敌人据点，控制了漕河至徐水间的铁路，歼灭了敌保安第二师和第三师各一部。

在我军围攻固城时，敌人慌忙把原拟南援青、沧的第十六军和原拟增援东北的第四十三师从天津地区调回平汉路，部署在良乡、窦店一线；并调集第一二一师和第五师从定兴南下，企图解除固城之围。

为了歼灭南援之敌，我们命令刚刚结束徐水战斗的第二纵队主力火速北上，进至定兴以西、涞水以南地区，会同第三纵队一部，与援敌激战于北河店以南地区。敌人见我军一部向其侧后迂回，担心被我围歼，同时见固城已被我军攻克，于是便慌忙退缩到北河店与定兴之间，不敢再行南进。

在保北战场的南面，保定的敌人也龟缩在城中，不敢北援。七月四日至六日，我们命令第四纵队奇袭保西地区，连克满城县和完县的一些敌据点，歼灭守敌一千余人。但是，保定的敌军仍然未敢出援。

总计在这次保北战役中，我军歼灭敌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及还乡团等共八千二百余人，斩断了平汉路北段，给北平、保定的敌人造成了直接威胁。

清 风 店 大 捷

保北战役后,我野战部队集中到安国、定县地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在此期间,成立了新的野战军领导机构,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和杨成武同志分别担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我为参谋长,潘自立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属的各纵队领导人也作了调整:把陈正湘同志从四纵调到二纵任司令员,二纵政委仍为李志民同志;把胡耀邦同志从四纵调到三纵任政委,郑维山同志任三纵司令员;曾思玉和王昭同志分别任四纵司令员和政委。同时,野战军第一次组成了一个炮兵旅,由高存信同志为旅长,下辖三个炮团。这大大加强了我军的火力。

整训和整编进一步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九月初整训结束,军区领导便决定乘正太、青沧、保北三个战役胜利的余威和士气高涨的有利时机,继续寻机歼灭敌人。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主动向驻守大清河北的敌军发起进攻。

鉴于当时敌军有四、五个师的兵力猥集于大清河北,因此我们决定用佯攻别地的办法调开敌人。我们命令第三纵队先向保定、漕河间的铁路线出击,接着往北进攻涞水。果然,敌军被我调动,西进至定兴、高碑店(新城)一带,准备解救涞水之围。在大清河北,敌人只留下一个师及两个保安总

队驻守雄县、容城、霸县地区。于是，我军集中二纵、四纵、独七旅和第十军分区的部队，猛攻守敌。经过数日激战，共歼灭敌军五千多人。但是，对雄县的管岗和板家窝两点的进攻，由于事先对敌情侦察不够周密，对敌人兵力估计不足，因此未能及时攻克。十二日，敌军大部队回援大清河北，我军就结束战斗，回到大清河南休整。

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肯定了我们进攻大清河北之敌的积极主动性，并指示我们在休整后，应根据具体情况抓紧部署下一个战役。

当时，我们夺取石家庄的条件还不成熟，向平绥线或其他方向出击也不具备条件，因此，再在保北寻求战机比较有利。恰好在九月中旬，因东北我军对敌发起强大攻势，蒋介石命令驻在华北的敌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和十三军，各抽调一个师出关增援。于是，我们决定利用华北敌人兵力不足的时机，向保北守敌再次出击。

我们对作战方案反复进行研究，并征求了下面部队的意见，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以第二纵队配属独七旅围攻保定北面约六十里的徐水，让敌人产生我军要全力攻克徐水、切断保定与北平间铁路联系的错觉，从而吸引敌军来援；将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部署在徐水以北的铁路两侧地区，准备打援。

十月十一日晚开始，我军一方面进攻铁路沿线敌人据点，扫除了徐水至北河店各点的守敌，以开辟打援战场；一

方面猛攻徐水县城。果然，敌人见徐水危急，于十四日从北面急调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一个战车团，南进至徐水以北约三十里的固城，另调驻在大清河北的十六军两个师进至徐水东北约四十里的容城和杨村，然后向西南方向齐头并进，企图拊击我围城部队的背后，以解徐水之围。

我打援部队立即按计划阻击敌人援兵。但是，由于敌援军五个师的重兵猥集在一起，因此我军分割围歼敌军的计划未能实现。经过几天战斗，虽然杀伤了许多敌人，但是没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敌我之间形成了胶着对峙的状态。

为了打破这种对峙局面，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我们决心调整部署，把在铁路东侧的第四纵队向铁路西面转移，和原在路西的第三纵队一起，背靠山区，侧击敌人西翼，诱敌分兵西进，然后歼灭分散之敌于运动中。

十七日下午五时许，四纵开始向路西转移。我们野战军领导机关，也从容城附近的驻地东马庄出发向西北方向行进。当时，罗瑞卿政委正在阜平开边区土地会议，政治部主任潘自立同志带着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已先出发；所以野战军前委五人中，只有杨得志司令员、杨成武政委和我三人并辔而行。作战参谋和警卫员们，骑马紧跟在后。

我骑在马背上边走边想：不知敌人会不会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分兵西进？如果他们不听从我们的“调遣”，还是五个师结集在一起，那应该采取什么新的办法来诱敌分散呢？

走着想着，不知不觉已走出二十来里远。向西望去，一轮斜日即将坠入地平线，秋天的晚风轻轻拂面，使我感到丝丝沁人的凉爽。忽然，后面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一名骑兵通讯员急驰而来，送来了野司电台（当时暂留在东马庄）刚收到的军区电报。

这是一封敌情通报，它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情况：驻在石家庄的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领其军部和第七师以及原先空运石家庄的第六十六团（属第十六军二十二师），从石家庄出动北犯，十六日已渡过滹沱河，预计十七日将可进至新乐地区，而后将继续北进。

看到电报后，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嗨，罗历戎终于出洞了！”本来，我们在安国所拟作战方案，其箭头最终指向石家庄；经过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虽然掰掉了蟹脚，但是由于石家庄驻有敌人重兵，因此完成作战方案最终目标的条件尚未成熟。我们一直想引蛇出洞，可是罗历戎始终躲在城内不出来。这一回不知怎么竟然敢于离开老窝、长途跋涉地北犯？当时我们不知道：罗历戎这次出洞，并非自愿，而是迫于其上峰严令，不得不然。原来，正当我军和敌军形成胶着对峙状态时，飞到北平的蒋介石对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认为我军被其五个师所吸住，已陷于被动境地；并认为我军主力在保北，保南必定空虚。于是，他要孙连仲急令罗历戎亲率第三军主力，火速通过保南地区，到保定与刘化南部会合，然后对保北战场的我军进行南北夹击。所以，后

来当我们知道了罗历戎出洞的原委后，就常常幽默地说：清风店大捷，活捉罗历戎，这是蒋介石亲手送给我们的一份厚礼！

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二个念头是：“看来要马上改变作战计划。”不言而喻，罗历戎这次率军北犯，矛头是对着保北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行事，那末很可能真的会腹背受敌。只有按照毛主席“机动、灵活”的作战原则，根据突如其来的敌情变化，抓住新的战机，出敌不意地选择新的作战方向，才能粉碎敌人的意图，取得歼灭敌军的胜利。

我的这个想法，和杨司令员、杨政委的想法不约而同。当我们看完电报交换意见时，一致认为：部队应该停止西移，立即掉头向南，歼灭罗历戎部于运动之中。

打歼灭战，这是长期凝聚在我们心中的愿望，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正是这个共同的想法和愿望，使我们三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定下了决心。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选择最理想的战场——围歼罗历戎部的最佳地域。

作战参谋余震同志迅速拿出军用地图，铺在路旁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杨司令员、杨政委和我马上围在地图前，仔细地查看敌军行进的路线。

我说：“我们既不能让罗历戎到达保定，也不能让他到达方顺桥。必须把围歼战场选择在方顺桥以南，甚至望都以

南。”

“对！”杨得志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如果让他接近保定，驻在保定的敌刘化南部就会接应他。”

杨成武同志眼睛盯着地图说：“至少要把罗历戎部阻击在保定以南五十里处，围歼才有把握。否则，我们围歼罗部时，屁股后面就会受到威胁。”

我指着望都以南约三十里的清风店地区说：“我看在这里打比较理想。”

由于我长期担任参谋长，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选择战场或制订作战计划时，总要先计算一下敌我行军的距离和速度。现在，我在地图上量了一下，清风店北距保定和南距新乐各为九十里，正好处于目前罗历戎部和刘化南部所在位置的中间。如果把战场往北移至望都和方顺桥之间，那就离保定近，我伏击部队就有后顾之忧。如果把战场往南移至定县以南，则离新乐太近，罗历戎率部经过该地时，现在保北战场的我军主力必然不能及时赶到，这样就将导致伏击落空。而清风店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为二百余里（直线距离为一百八十多里），但是距离最南面的我野战部队约一百五十里，按照我军的行军速度，加一把劲，可以争取在十九日拂晓前先于罗历戎赶到这个地区，及时布设伏击圈，包围和消灭敌人。因此，从南北距离来衡量，清风店是理想的战场。另外，从地形上看，虽然总的来说这一带是平原地区，但是清风店的地形略有起伏，且其南面有条唐河，等罗

历戎一过河，我军就控制渡口，将敌军包围于较低处，这样就有利于全歼敌人。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所以我建议选择清风店为围歼罗历戎部的战场。

“不过，”我又补充说：“必须要保证我军主力先于敌军到达清风店，否则……”

“我看这个问题不大。”杨得志同志很有把握地说：“敌军的行军速度本来就慢，加上从新乐到清风店一带都是解放区，一至天黑，敌人就不敢行军；而我军却可以日夜兼程地赶路。我们再布置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进行骚扰活动，就能迟滞敌人的行进。”

杨成武同志接着说：“只要我们向各纵队、各旅的同志们讲清楚改变作战计划、南下歼敌的原因，让全体指战员知道‘时间就是胜利’的道理，那末，我们的‘铁脚板’就一定会赶在敌人前面。”

尽管这样，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三人还是仔细地计算了敌我双方的行军速度，甚至把我军行军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计算得很具体，以求做到万无一失。

接着，我们又对兵力配置和行军路线进行具体研究，并迅速作出了决定：一，第四纵队从铁路东侧向南，经大因镇、范家桥，绕过保定，于十九日拂晓前到达望都东面的阳城地区。二，第二纵队第六旅和第三纵队第九旅，从铁路西侧南进，经保定以西的满城、大固店，进至方顺桥和望都之间。三，二纵四旅从固城一线南进到保定以南、清风店以东的温

仁地区。四，二纵的五旅、三纵的七旅和八旅，以及独七旅，在二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和三纵司令员郑维山的统一指挥下，留在徐水地区，阻击北面的敌人。五，独八旅、冀中军区和冀晋军区的部队和民兵，对罗历戎部前堵后截，旁敲侧击，进行袭扰活动，以迟滞敌人前进，并防止敌人后退。

就这样，南下清风店、歼灭罗历戎的作战计划在路边拍板确定。我一看表，从接到军区电报，到做出最后决定，一共才花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在许多次作战中定下决心、作出决定最快的一次。

也许有人会问：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你们三人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作出了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作出军事决策，当然应该慎重，而不应草率，但是，是否“草率”，不应只从作出决定所用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我们是对战局形势进行了慎重考虑，对南下歼灭罗历戎的可行性作了周密计算后才定下决心、作出决定的，因此并不“草率”。至于决策过程的时间短，那是因为：一则形势所逼，不得不然；二则我们三人一条心，容易取得一致。《孙子兵法》谈到决策时，强调要避免“狐疑不决”、“主将不一”、“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也就是说，古代军事家孙子认为，决策者意见一致，反应机敏，判断正确，作出决定果断、迅捷，这些是取胜之道；否则就会招致失败。我们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敌情突变、时不我待的紧急情况

下,如果不迅速决策,就会贻误战机。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本来像这样对作战计划进行重大改变,照理应该报请军区批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等待军区批准后再行动,也要丧失战机。于是,我们只好一面向军区报告,一面立刻向各部队传达刚才作出的决定。

我起草了一个简短的报告,经杨司令员和杨政委传阅后,命通信员急送东马庄野司电台向军区拍发。同时,我叫作战参谋余震根据刚才的决定,起草作战命令。余震的笔头很快,只用一刻钟就写好了。我们看过后,命令马上组织传达。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采取了各种方式来传达命令。对野司直属机关各部门领导同志,就在路边开会传达;对野战部队中离此不远的纵队和旅,派通信员飞马前往进行口头传达;对离得较远的纵队和旅,则用指挥部携带的无线电台(留在东马庄的是大功率电台,随军携带的是八瓦小电台)或有线电话进行传达;对冀中军区也用电话传达,再由军区领导转告各军分区和各县游击队。

我们司令部由第三科管通讯联络,但是这时三科科长到前面部队去了,就临时决定由余震代理科长职务,率领一个通讯班架设电话线。当时在紧急情况下,往往利用现成的电话线通话,把我们的电话线往现成的电话线上一搭,就呼叫开了。所以,有时呼叫上了民间的商人,有时竟呼叫上了

敌人。当然，要确证呼通了我们的部队，才进行传达。

传达完毕，我们便拔寨而起，马不停蹄地向东南奔驰。为什么要向东南方向前进呢？这是由于要绕开保定的缘故。

杨司令员、杨政委和我三人的马跑得快，急驰到半夜，往后一看，只有三名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其他的同志已经不见踪影，想必是落后了一大截。于是，我们三人稍微控制了一下速度。十八日拂晓前，我们到达保定东面的一个村庄附近，便停下来，决定在这里开设临时指挥所，了解各部队行军情况，进行指挥。

隔了一会，余震同志也赶到了。他走路有些瘸，一面解释着原因：“我的马没有马鞍，把我的大腿都磨破了。”一面又赶紧补充说：“不过没有关系，不妨碍执行任务。”说完，立刻去招呼随后赶来的通讯班架设电话线。

直属机关的同志们还没有赶上来。我就叫我的警卫员胡大方和杨政委的警卫员一起到外面警戒。其余四人也作了分工：杨司令员和他的警卫员负责做饭，杨政委负责遛马，我负责和各部队进行电话联系。

我同时用几个电话机呼叫。了解到各纵队、各旅都按命令连夜向指定地点进发。广大指战员的情绪高涨，都想早点赶到战场，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一面打电话，一面肚子饿得咕咕叫。这也难怪，我们还是十七日中午在离开东马庄前吃了顿饭，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再加上赶了一夜的路，确实饿得前胸贴着

后背了。幸好杨司令员的饭已经做好，大家二话没说，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虽然这顿饭由于没有辣椒而缺少湖南味道，但是在饥饿时吃着觉得还是很香的。

吃完饭，直属机关的同志们也陆续赶到了。一问，他们都吃过饭了。原来，他们是边赶路、边吃干粮。

这时，杨政委正在审阅政治部宣传部连夜赶写出来的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紧急作战动员令。杨司令员和我继续同各方面进行电话联系。

冀中军区孙毅司令员，独八旅徐德超旅长和保南解放区各县的负责同志，向我们反映了罗历戎的行踪：

这位敌第三军罗军长和他的副军长杨光钰率领一万四千余人马，随带二百多辆大车，载着辎重和军官家属，还有一个供娱乐消遣的魔术团，一路上拖泥带水地牛步化前行；加上沿途遭我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阻击，所以前进很慢，十七日晚上才到达新乐。因为害怕解放区军民袭击，不敢夜行军，所以他们就在新乐宿营。

也就是说，当我军连夜急行军南进百把里路时，罗历戎正在新乐睡大觉。这就使我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松口气可以，但不能松把劲。我们还要加把劲继续急行军，尽快尽早地到达预定地域。

打完电话，警卫员过来要我们睡觉。我们三人都摇头说：“现在哪能顾得上睡觉，要争分夺秒继续赶路。”“野司指挥部也要前进到温仁地区。”说完，我们就指挥参谋人员收

拾地图、电话机子等，整装上路。

天蒙蒙亮时，我们走上了从保定通向温仁的大路。只见沿铁路东侧前进的我军各部队，有的正沿着大路跑步向南行进，有的则穿过大路向西南的阳城方向急进。野战军政治部和各纵队、各旅的宣传干部，正在分头宣读前委的作战动员令：“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追！”“发挥三猛战斗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吃饭、没喝水！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能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高度发挥作战机动性，哪里有敌人就上那里，哪里有枪声就上那里，哪里敌人没消灭就上那里！”“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坚决、彻底、干脆、全部歼灭敌人！活捉敌人军长罗历戎！活捉敌人师长、团长！创造晋察冀空前大胜利！”“开展打胜仗比赛！开展缴枪捉俘虏比赛！为人民立大功！”“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特殊作用！”

当时天气很冷，但是战士们跑得个个满头大汗。我们下马对他们说：“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一面说“首长辛苦”，一面头也不回地继续快步前进。政治部的干部们高声为大家鼓劲：“同志们，加油！”“提早赶到清风店，消灭敌人第三军！”战士们精神抖擞地回答：“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活捉罗历戎，打个大胜仗！”

由于保定以南都是解放区，当地的老乡纷纷到路上欢迎解放军。大娘、大嫂们提着装满食物的篮子，热情地往战士手中塞鸡蛋、馒头、红枣、红薯、烙饼……孩子们一手提着壶，一手拿着碗，追着劝解放军叔叔喝茶。“叔叔，喝一碗吧！热的。”几个被冬晨的寒风吹得脸蛋红红的小女孩，缠着战士们央求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紧跟着一个干部一个劲地问：“我跟你们去打老蒋，行不？我扛得动枪！”“我也要去！”“我也扛得动！”另几个男孩也七嘴八舌地抢着嚷嚷。我不禁心想：孩子们都知道“打老蒋”，可见民心的向背。

除了老乡们自发的欢迎慰问外，解放区各级政府还组织了各项支前工作。他们在部队经过道路的两旁，每隔百十米就放置一口大水缸。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粥或小米稀饭。旁边的老大爷、老大娘和村干部们在不断招呼：“光啃干的不行，来一碗热粥吧！”沿途我们还看到，附近的村庄里，村干部们和老乡们，正在准备用于支前的大车和担架。

走着，走着，曾经和我进行过电话联系的吴树声同志（冀中区党委和冀中行署支前指挥部负责人）忽然出现在路旁。我们立刻下马和他相见。他告诉我们：在一夜之间，冀中已经组成了一支有着九万八千多名民工和民兵、一万多副担架、三千四百多辆大车、九千六百多头牲口的支前队伍。他转达了林铁同志（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委）的话：两千万冀中人民全力支持解放军打胜仗消灭敌人，前线需要什么，保证供给什么。吴树声同志还笑着说：“冀中人

民为我们自己的部队准备了红枣和鸡蛋，为敌人准备了地雷和子弹。”

多么好的人民！正是冀中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的支持和鼓励，正是我们人民子弟兵和劳动人民之间这种军民鱼水情，为清风店大捷提供了坚实的可靠的保证。

与此同时，冀晋区党委书记兼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同志，奉聂荣臻司令员之命，正率领冀晋军区的一个独立团和上千民兵，星夜兼程向清风店地区急进，准备在我军大部队到达之前，配合冀中军区部队阻击罗历戎部。当然，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

尽管指战员的情绪高涨，但是日夜兼程地急行军，确实太累了，所以，渐渐地行军速度慢下来了。这时，政治部门迅速提出了“能不能歼灭敌人，行军是关键！”“完成行军任务，就完成了整个任务的一半！”等响亮的口号来鼓励大家。宣传队敲起锣鼓、唱起快板：

蒋介石，靠老美；
我们胜利靠双腿！
同志们，快快行，
能走才算是英雄。
坚决消灭第三军，
活捉军长罗历戎！

于是，战士们精神抖擞地加快脚步继续前进。

十八日午夜，沿铁路两侧南下的我军各部队，都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野战军指挥部隐蔽在温仁附近的树林里。这里距清风店约五十里，便于在战斗打响后移前指挥。

这时，罗历戎率领其大队人马刚刚到达定县，第二天，即十九日上午，敌军从定县出发，渡过唐河，于下午到达清风店地区。

罗历戎满以为我军主力远在保北战场，保南地区只是游击队和民兵袭扰，不料，刚到清风店，就遭到我主力部队的迎击。这一出乎意料的突变，使罗历戎慌了手脚，只得将其全部人马收缩在清风店及其附近的高家佐、北支合、大瓦房、小瓦房、于各营、胡房、南合营、东南合村、西南合村、东同房、西同房等二十多个村庄内，仓促进行防御。

我们立即指挥各部队对转入防御的敌人实施迂回包围。四纵的十二旅主力两个团绕到南面，控制了唐河渡口，一直尾随敌军的独八旅和三个民兵团则在唐河南岸布防。野战军的其余五个旅和十二旅的一个团以及冀晋军区的独立团等，则分别迫近敌军所在的村庄，将罗历戎部团团围住。

罗历戎一面顽抗，一面频频向北平和保定发电呼救。据后来了解，当罗历戎第一次向上级求援时，还遭到了孙连仲的训斥。孙连仲认为我军主力远在二百多里外的保北战场，怎么会插翅飞到清风店呢？所以他责怪罗历戎错把地方部

队和游击队当成了主力，大惊小怪，谎报军情。

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留在保北的部队，这时一面摆开架势，准备阻击可能南下的援敌；一面还在围攻徐水的守敌。

等到孙连仲弄明白罗历戎部的确被我军主力所围困时，罗历戎的日子已经越发难过了。

二十日凌晨，我军相继攻克了清风店、于各营、大小瓦房、胡房等村庄。敌军龟缩到以西南合为中心的几个村庄里。罗历戎决心在这里构筑工事，固守待援。在他看来，我军主力既然来到了南线，那末北面必然空虚，因而孙连仲派出的援兵可以毫无阻挡地迅速赶来。

孙连仲的确派出了援兵。敌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亲率五个师南下，但在徐水一线遭到我阻击部队的拦截。于是，一场激战，在保北战场展开。敌军用密集炮火进行轰击，以密集队形连续冲锋，企图突破我军阵地。孙连仲还亲自飞到徐水上空督战。但是，我阻击部队在“扭住敌人，顽强战斗，为人民立功！”“挡住敌人，保证保南决战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英勇战斗，不仅顽强地抗住了敌军的进攻，而且连连举行反击，消灭了大量敌人，从而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使南援之敌始终被阻滞在保定以北。

援兵迟迟不来，罗历戎感到情况不妙。然而他自恃其第三军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精兵，装备精良，故而横下一条心继续顽抗，他自己率领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师部和两个团，固守在西南合村，把其余兵力配置在周围的南合营、高

家佐、东西同房、东南合等村庄，组成梅花形的防御体系。由于敌军兵力火力集中，各点可以互相支援，其军部又处在防御体系的中心，有外围各点为其屏障，因而我军还难于一举将其歼灭。

这时，我们野战军指挥部已前移到敌军阵地附近的一个高坡上。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脑子里又想起了幼时捉螃蟹掰蟹脚的情景。我想：要是像掰蟹脚那样，先将敌人防御体系的外围各点逐个攻占，最后剩下西南合村的敌人，就不难歼灭。不谋而合，杨司令员和杨政委也有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决定采取分割敌人、各个歼灭的战术。

二十一日凌晨，第十旅并指挥第十一旅的一个团，向南合营守敌发起进攻。南合营有敌军一个团把守，是敌外围诸点中兵力最强的一个。我军先用炮火摧毁敌军前沿工事，然后从东、西、北三面攻入村内。敌人试图向南逃跑，但在村南口遭到我军堵截。残敌一部拼命从西南角突围出去，逃到一片坟地和土坎附近。只要越过这个土坎，就可以和西南合出来接应的敌人相汇合。忽然，逃敌耳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原来，我们预先估计到敌人可能从这个方向突围，所以在这里埋伏了两个加强排，利用土坎做好了工事和伪装，还集中了六挺机枪。于是，这些逃敌都乖乖地做了俘虏。这样，经过四十分钟激战，全歼南合营守敌，俘虏敌团长以下一千一百多人。

同时，我第九旅攻克了高家佐，第十一旅攻克了东、西

同房。驻守东南合的敌人一看形势不妙，仓惶退到西南合。这样一来，敌人的外围各点被我军全部扫除。

接着，我第四旅和第六旅合力向西南合之敌猛攻。经过一天激战，我军于二十一日傍晚在西南合村东北角的敌人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六旅的十六团和四旅的十二团并肩战斗，击退了敌军多次反扑，巩固了这个约二百米长的突破口。

战斗中，十多架敌机向我军阵地低空扫射轰炸，我十旅参谋长钟天法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各部队指战员怀着为战友报仇的心情，端起步枪、机枪对空射击，一架敌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另一架敌机被击伤后慌忙逃去。其余的敌机也不再敢肆无忌惮地低空扫射，而是仓皇拔高，钻进了云层。

挤在只有四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中的万余敌军，眼见难逃覆灭的命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为了稳定军心，罗历戎使出了一个骗术，在村中张贴了一份《通报》：

军长谕：

奉总司令(指李文)电：南下大军已于本日晚用汽车输送到望都，我当前之危，至迟明日可解，望我各级官兵振奋士气，坚守阵地。

与此相呼应，国民党中央社也谎称从保定南下的“国军已进抵保定西南六十华里之方顺桥车站。”

可是，骗术和谎言都挽救不了其失败的命运。

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四十分，红绿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开始了对西南合敌人的总攻。除四旅、六旅外，九旅、十旅、十一旅和十二旅的三十五团，也都投入了战斗。排炮发出的无数条火舌，将敌人的工事炸塌、摧毁、烧成一片火海。敌师部和军部被我相继攻克。失去了指挥的敌军，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有的被歼，有的被俘，剩下的也都不得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经过将近八个小时激战，到十一时三十分，战斗结束。

当我军清查俘虏时，却找不到罗历戎。原来他换上士兵服装，混在俘虏群里。但是，后来他被我独八旅旅长徐德操同志认了出来。因为徐德操同志以前作为军调部石家庄停战小组的我方代表，曾和罗历戎打过交道。

七天之后，即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定县北祝村的野战军指挥部，聂荣臻司令员和军区、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一起接见了罗历戎等敌第三军高级军官，对他们进行了教育。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歼灭敌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全部以及第十六军的第六十六团全部，俘虏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七师师长李用章以下官兵一万一千四百余人，加上击毙之敌以及保北阻击战中歼灭的敌人，共计歼敌一万八千余人，从而取得了清风店歼灭战的巨大胜利。

清风店大捷是毛主席关于打主动仗、打运动战和歼灭战的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我们在军

区聂司令员领导下,用“运动”来引诱、分散敌人,以创造歼敌条件。一旦条件形成,就机动灵活,及时捕捉战机。由于战机稍纵即逝,因此无论在决策上和行动上都尽量争取时间,并发扬不怕疲劳、星夜兼程、高速行军的革命精神,做到“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同时,军民结合,进攻部队和阻击部队互相配合,也是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

解 放 石 家 庄

清风店大捷,使我们进行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条件完全成熟。

在经过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后,石家庄外围及其附近地区的敌军已被扫除,它和敌保定绥署和太原绥署以及平津之间的铁路联系已被切断,因而它已成为我联成一片的冀中、冀南、冀晋、太行、山东等广大解放区中的一个孤岛;但是,在清风店战役以前,由于石家庄有敌第三军驻守,所以进攻该城的条件尚未成熟。现在,在清风店战役中歼灭了敌第三军军部及其主力第七师和第六十六团,石家庄守敌的力量大为削弱,这样就使得我们实现安国所订作战方案中预定目标——解放石家庄——的条件完全成熟。

十月二十二日中午,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聂荣臻司令员就来到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提出了要乘胜进攻石家庄的构想,并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和正在晋察冀的朱德、刘少奇

同志发电请示。二十三日，朱德、刘少奇同志联名复电，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毛主席复电指示：“目前如北敌（指保定以北的敌人——耿注）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场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即石家庄，又称石垣——耿注），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根据中央、毛主席和军区、聂司令员的指示精神，二十五日野战军前委召开了旅以上干部扩大会议，研究石家庄战役计划，区分作战任务，并布置各部队做好战役准备工作。

朱总司令从中央工委驻地赶来参加会议，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并作具体指示。

会议前，野战军司令部已对有关石家庄敌情的材料进行了分析、综合和研究。这些材料，有的是在春天石家外围作战时获得的，有的是近期侦察所得，有的是通过审讯清风店战俘而得，有的是向附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而收集的，有的是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特别是在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一份“绝密”级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为我们提供了重要情况。这份《要图》，是罗历戎亲自携带，准备到北平面呈上级的。朱总司令看了《要图》后对我们野司的同志说：“这份图很重要，敌人的工事构筑、防御体系、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都详细标在上面，对我

们制定石家庄战役计划、定下正确的决心很有用。”为了充分作好战役准备工作，我们还把《要图》复制了几十份，发给各纵队，以便于各部队更好地了解敌情。

从这些材料来看，石家庄虽然没有城墙，却是个坚固设防的城市。守敌的防御体系主要由三道防线所组成：

第一道防线是外市沟。这道设在市区外围的壕沟，宽有七米、深达八米，周长约六十里；壕沟外沿设有布雷区和铁丝网；沟内筑有一千零五个大、小、高、低的碉堡暗堡，还设有电网；壕沟后面筑有一条供铁甲车行驶的环形铁路。敌人将外市沟前面的树木全部砍伐，使其工事前呈现一片毫无掩蔽的开阔地，企图使我部队难于接近外市沟。

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这道围绕市区的壕沟，宽度和深度各为五米，周长约四十里。壕沟外沿设有电网、挂雷和其他障碍物，沟底安装了削尖的木桩，壕沟内沿则由稠密的大、小碉堡组成坚固阵地。

第三道即最后一道防线是市区核心工事。敌人在市中心的火车站、正太饭店、大石桥和附近高大建筑物上都修筑了坚固工事，作为其防御体系的核心。

在三道防线之间各有地道和交通壕相连。此外，在市郊各个村庄和市区各条街道都修筑了伏地堡等工事。总计在全市有六千多个碉堡。敌人吹嘘这三道防线“胜过马奇诺防线”，说什么光凭这些碉堡和深沟，即使没有援军，也“可以坚守三年”。

由于敌第三军军部及其主力第七师被歼，因此现在驻守石家庄的敌军正规部队只有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军直属炮兵营、坦克连等一万余人。加上敌人从保定空运来增援的一个独立团以及原在石家庄的敌保安第九团、第十团、正太战役时从附近各县逃到石家庄的保警队、还乡团等杂牌武装，总计守敌兵力为两万四千余人。他们的最高指挥官为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

刘英将他的第三十二师部署在市内，负责防守第二、第三道防线；而将独立团、保安团、保警队、还乡团等统统部署在第一道防线和郊区据点，由“东进”“北进”“南进”三个前沿指挥部负责指挥。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旅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分析了敌情特点。朱总司令指出：石家庄战役和以前的战役不同，以前打游击战、打运动战，打了就跑，或者搞伏击，凭勇敢打败敌人；现在石家庄是坚固设防城市，我们打的是攻城战、攻坚战，单靠猛打猛冲不行，必须钻研和掌握攻坚的技术，以勇敢加技术来战胜敌人。他的这个“勇敢加技术”的指示，成为石家庄战役指导思想的基础。

建国后，我曾看到一个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影，当我军攻城时，银幕上万炮轰鸣，声势浩大。其实，当时我们虽有一个炮兵旅，但远射程大炮很少，面对着总长度为一百里的敌人第一、第二道防线上众多的碉堡，这些大炮远远不够，只能把炮集中使用在重要地段。同时，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和工厂、建筑，对市区也不能密集炮轰。因此，我们就要依靠炸药包、手榴弹来炸毁敌人的碉堡，依靠抵近作战来消灭敌人。

但是，我们的部队怎样才能安全冲过敌人防线前面的开阔地，使炸药包、手榴弹发生作用，实施抵近作战呢？这里就有着朱总司令所说的“技术”问题。

要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还得发扬我军实行“军事民主”、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发动广大指战员来讨论、研究。我们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和野司的参谋们，都深入各部队参加讨论。朱老总和聂老总也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最后，集中群众的智慧，我们确定了如下的战役步骤和战术技术措施：首先攻占四郊敌人据点，然后依托村庄改造地形，构筑“蛇”形堑壕、“鸡爪”形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工事，以沟对沟，以壕对壕，将沟壕挖到敌人防线前面，以利于爆破和抵近作战；在突破敌人外市沟和内市沟后，便展开巷战，以迅猛动作直插市区核心工事，歼灭敌人指挥部。

接着，我们便在部队中广泛开展攻坚战的演练活动。演练的内容：一是隐蔽、快速地挖沟，要把沟壕挖到离敌人防线二十来米处而不被敌方发觉；二是快速接敌（接近敌人），从我方沟壕内向敌人甩出手榴弹，然后快速地翻出沟壕，冲向敌人防线，在进入敌方第一、第二道市沟后，则用云梯翻上沟内沿，继续冲击；三是爆破技术，要学会爆破敌人的碉堡、深沟、环形铁路和筑在楼房内的工事，以及炸毁铁甲车

和坦克、破坏电网等技术。

演练中，指战员们制作了沙盘、模型，或在驻地附近寻找类似战场的地形、地物，进行作战演习。

冀中军区、冀晋军区的部队也参加了演练。

解放区人民组成了十万支前大军，把二十万斤攻坚器材、六万斤炸药、各种枪弹、炮弹和其它物资，从四面八方运到前线，为我们取得石家庄攻坚战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与此同时，我们将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敌军官兵九百六十余人，经过教育后分批释放，让他们回到石家庄去影响守敌的士气。野战军政治部在地方部队、游击队和石家庄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把大量宣传品送入城内，以动摇敌人军心。

野战军前委还发布了政治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入城纪律，注意保护石家庄的工厂、商店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十一月五日晚，我军各部队分别按照预定路线，在夜幕掩护下渡过滹沱河，向石家庄逼进。

我和杨得志、罗瑞卿等同志，乘坐一辆吉普车，于午夜到达石家庄东南约三十里处的南高营。我们在这里设立了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并立即和各部队联系。按照战役计划，这次参加攻打石家庄的部队有：野战军的三纵和四纵，冀中军区的独七旅和独八旅，冀晋军区的独一旅和独二旅。第二纵队和独九旅则留在定县地区准备阻击北面的援敌。从各

部队电话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参加攻打石家庄的部队已分别到达指定地域,并以隐蔽的动作迅速包围了石家庄外围的各个敌军据点。

六日黎明,我军向敌外围据点发起进攻。经过数个小时激烈战斗,第三纵队攻占了石家庄西南郊的留营、大谈村、小谈村、大车行、王村、西三教、塔谈村等敌据点;第四纵队扫除了东北郊的柳林铺、柳辛庄、小沿村、南翟营、北翟营、北宋、白伏口等敌据点,并包围了东北郊制高点云盘山;冀中军区部队歼灭了盘踞在东南郊东岗头、东三教等村庄中的敌军;冀晋军区部队打下了西北郊的大安舍、小安舍、大河、孟河、城东桥等敌据点,进而是于七日晨占领大郭村飞机场,切断了石家庄守敌对外联络的空中通道;同时,冀晋第四军分区部队攻占了由敌保安团防守的获鹿县城。

东北郊制高点云盘山,是敌人苦心经营的重要据点。山上筑有三层地堡,山脚下挖有内、外两道壕沟,各宽六米,深十米。壕沟之间设有两道电网。地堡和内外壕间有交通沟互相连接,并有地道通向市内。敌人派警卫队的一个加强连在山上防守,配以轻重机枪、六〇炮等武器,用密集的火力点组成交叉火网。这个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云盘山”,既是一个独立的防御阵地,又与相距一里多地的外市沟互相呼应,从而成为石家庄外围的一个支撑点。

六日下午,我军对云盘山之敌发动进攻,未能攻克。攻击部队的领导同志对云盘山设防情况作了进一步研究,制

定了新的进攻方案。八日晨再次进攻，在集中炮火压制敌人火力的同时，通过地面爆破和挖坑道爆破，将两道敌壕炸成斜坡，于是，我们英勇的战士迅猛冲上山头，占领了云盘山制高点。守敌大部被歼，少数残敌钻入地道向外市沟逃去。

接着，我军依托云盘山炮击发电厂，断绝电源，使敌人设置于外市沟和内市沟的电网全部失效。

在肃清了外围的敌据点后，我们便准备进攻敌第一道防线外市沟。

从六日夜间起，我军各部队和民兵、民工就投入了改造地形的土工作业。进攻部队负责构筑进攻阵地以及阵地间的交通壕，战役预备队和民兵、民工负责构筑后方通往前沿阵地的交通壕。

我带着参谋们分别到前面部队中去检查作业是否合乎要求。我们要求交通壕应挖成“蛇”形，便于隐蔽行动；发射阵地应筑成“鸡爪”形，便于发扬火力。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作业的进度。连日来气温骤降，寒风刺骨，还下着小雨，但是战士们的劲头很足，作业进度很快。到八日早晨，交通壕和进攻阵地已伸展到距离外市沟一百公尺以内，有些坑道则已挖到外市沟的外沿。

八日下午四时，我各部队向外市沟守敌发起进攻。

从西面进攻的三纵七旅，用坑道爆破炸塌了外市沟沟沿，首先突破了敌第一道防线，进而攻占了西焦村、酒精公司、广播电台、农业实验所等点。三纵八旅也在西南角突破

外市沟后，占领了振头锁、西里村诸点。

从东北角进攻的四纵十旅，在云盘山以西突破外市沟，攻占了义堂村、花园村、八家庄诸点。四纵十二旅在北宋以南突破外市沟，占领范谈村，摧毁了敌“东进”指挥部防线。

与此同时，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角，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角相继突破外市沟，摧毁了敌“南进”“北进”指挥部防线。

到八日晚，我军已全线突破敌第一道防线，占领了内、外市沟之间的大部分敌据点。对于元村、彭村、范村、北焦等少数未被攻克的敌据点，只派少量部队加以包围，大部队则继续改造地形，向内市沟逼进。

这时，野战军指挥部里也异常忙碌。司令员，政委和我正在研究如何乘胜进击，突破敌第二道防线的问题。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十分关心战事进展情况，相继来电话询问。当他们得知已突破敌第一道防线后，异常高兴，勉励我们再接再厉扩大战果，一鼓作气摧毁敌人全部防线，全歼守敌。

第一道防线被我军迅速突破，使敌军产生了恐慌。为了安定军心，稳住阵脚，敌人一方面由石家庄市长尹文堂出面发表“谈话”，吹嘘什么“本市工事巩固，戒备森严，来犯共军必遭我陆空聚歼”；一方面刘英亲自向北平、保定求援。可是，援敌连清风店都到不了，又怎么能够来到石家庄呢！

急疯了的敌人，为了阻止我军进攻内市沟，使用了全部大炮，在十一架敌机的配合下，向我军阵地和土工作业现场进行疯狂轰击，我军各部队一面用轻重武器组织对空射击，

一面加紧挖沟，他们提出了“人到哪里，工事筑到哪里！”“多挖一锹土，少流一滴血！”等口号，在敌人炮火下展开了土工作业竞赛。

十日下午四时，我军对敌第二道防线的进攻全面展开。各部队集中炮火于预定的主要突破口，并用轻重机枪封锁敌人碉堡的枪眼，压制敌人火力，以掩护突击部队实施爆破。从西面进攻的三纵八旅二十三团，用坑道爆破炸塌内市沟的外沿，冲入内市沟后又进行连续爆破，将沟内和内沿的各种障碍全部摧毁，从而首先突破第二道防线。四纵十旅二十九团也在东面突破了内市沟，接着，其他各部队相继突破敌人阵地，冲进市区展开巷战。

在石家庄战役的巷战中，指战员们又创造了新的战术。由于敌人在市区街巷筑有地堡等工事，给我军前进造成了障碍；为了减少伤亡，指战员们创造了在街道两旁的房屋中破开墙壁、逐屋逐院越墙前进的办法，来开辟进军的道路。通过破墙连院的“道路”冲过街区后，留下一部分兵力消灭街巷中的守敌，主力部队则以班、排为战斗单位，继续向纵深发展，迅速朝市中心冲击，对核心工事守敌实施迂回包围。

在进攻中，我们有些部队利用俘虏开展对敌喊话，使得不少敌军放下了武器。四纵三十一团二营的一个排，由俘虏带路，化装成敌军后插到敌九十四团二营营部，当他们命令敌人缴枪时，敌营长还以为是自己人开玩笑，结果胡里胡涂

当了俘虏。

经过一昼夜巷战，到十一日晚，大部分市区守敌已被肃清，残存于内、外市沟间的据点，除范村外，也已全部被我军占领。但是，敌师长刘英还率领其三十二师师部和九十五团残部，躲在核心工事内继续顽抗。

核心工事是敌人最后也是最“坚固”的防线。敌人除了利用大石桥、正太饭店等建筑为主体，在楼上楼下、楼内楼外遍筑明堡暗碉、深沟高垒外，还在街道两旁所有楼房的阳台上、窗户内都堆满沙袋，作为射击工事，从而组成层层迭迭的交叉火网。同时，刘英还把铁甲车、坦克集中到火车站附近，以加强其火力。

但是，再坚固的防线，也挡不住我们英勇的战士。

十二日晨，我军加紧进攻敌核心工事，杨得志司令员到第四纵队指挥所进行指挥，罗政委和我则在野战军指挥所和各进攻部队联系。

进攻火车站守敌的各部队，一连击毁了三辆敌坦克和铁甲车。四纵十一旅三十三团二营四连的指导员康德才和战士杨大海跳上被炸得动弹不了的坦克，打开坦克盖，扬起手榴弹，命令敌炮手掉转炮口向他们自己的碉堡开炮。敌炮手不敢违抗，被迫向正太饭店的敌人连发三十余炮。经过激烈争夺，十一旅的勇士们攻占了火车站和正太饭店。

接着，三纵、四纵和冀晋军区部队，向刘英盘踞的敌指挥中心大石桥发起会攻。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爆炸声和敌

军的哀叫声中，四纵十旅三十团的英雄们首先冲进敌三十二师师部，俘虏了钻到床底下的师长刘英。在我十旅政委傅崇碧的严令下，刘英不得不命令还在负隅顽抗的残敌缴械投降。于是，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核心工事守敌全部向我军投降。内、外市沟间仅存的敌据点范村也被我军占领。至此，历经六昼夜的石家庄攻坚战胜利结束，华北平原上的重镇石家庄宣告解放。

战斗刚停止，我便驱车进入了硝烟弥漫的市中心。只见街道上到处狼藉着损坏的敌军枪炮和汽车；英武神勇的我军战士，正从弹痕累累的敌人工事中和炸塌了的敌人碉堡中，押出一批批垂头丧气、疲惫不堪的俘虏；而这时几架敌机正在空中盘旋，散发着蒋记国防部“告石门军民”的传单，要求“竭力合作，誓死为保卫石门而战。”我们的战士对着这些铁鸟高喊：“滚回去吧！”“石家庄已经回到人民的手中！”

我们把解放石家庄的喜讯报告了聂司令员和朱总司令。十三日，聂荣臻同志转来朱德同志的电报，嘉奖我军“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石家庄解放后，我们再次对部队进行了入城纪律教育，要求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中央工作委员会和朱德同志关于保护工厂、防止破坏、尽快恢复生产、做好城市工作的指示。

解放石家庄后五天，我冀中军区独七旅和独八旅，太行军区第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开始向石家庄以南约七十里

的元氏城守敌发起进攻。这个城有着高十二米、厚五米的石头城墙，敌保安第五团团、惯匪、汉奸魏永和，率领四千名由土匪、流氓、特务组成的保安团在这里把守。进攻部队在我野战军炮兵旅一个野炮营和华东野战军榴炮营的炮火支援下，迅速攻占元氏城郊四关。接着，便向城墙方向挖坑道。狡猾的敌人用对挖坑道和放水（城壕内的水）冲决等手段，妄图破坏我军的坑道作业。但是，我进攻部队经过十三个昼夜的苦干，终于挖了二十四条通到城墙下的坑道。十二月三日下午三时，总攻开始。元氏南门和西门城下的六条坑道内数万斤炸药同时爆炸，坚固的石头城墙被炸出几个大缺口。我军突击队迅猛地从缺口冲进城，在激烈的巷战中击毙匪首魏永和，全歼守敌。这样，就拔除了我冀中、冀南解放区内的最后一个敌据点。

在石家庄攻坚战和解放元氏城的战斗中，我军全歼守敌两万八千余人。因此，石家庄战役也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要准确、充分地估价其意义，必须把石家庄攻坚战和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诸战役联系起来看。因为，正是这一连串战役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连续取得胜利，体现了安国会议以来，晋察冀部队在军区正确领导下，有效地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应该“完全主动作战”、“大踏步进退”、“打歼灭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思

想,体现了晋察冀战局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打顶牛仗、消耗战转为取得歼灭战和攻坚战的胜利。经过这几次战役,西面的太行解放区、冀晋解放区、东面的山东解放区、南面的冀南解放区和中间的冀中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而敌人东西、南北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从而为我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来到晋察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石家庄攻坚战本身来说,也有着战役上和战术上的创新意义。石家庄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军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攻占的大城市,正如朱总司令电报上所说,这次战役“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同时,这次战役也是我军首次大规模的攻坚战(以前的攻城战只是对县城的攻坚战)。在战役准备阶段和战斗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创造了很多新的、行之有效的攻坚战术和技术,为我军以后进行攻城战、攻坚战,提供了经验。对于这一点,朱总司令特别重视。他在石家庄解放后不久就写了一首洋溢着胜利喜悦和革命激情的诗篇: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诗中所说的“攻坚战术开新面”，正是我们实践朱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的号召所取得的成绩。十二月初，朱德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亲临指导并主持了野战军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和会下的谈话中，朱总司令对石家庄攻坚战中我军的作战措施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集中兵力火力、坑道作业、改造地形、隐蔽接敌、连续爆破、突破一点，以及将火力压制、爆破和突击三者相结合等一整套攻坚战术。这对于我军以后的作战，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解放石家庄，标志着在安国所确定的一系列战役的完成；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新的战斗正在召唤我们，我们要进一步鼓起斗志，去迎接更大的胜利。

第七章

鏖战长城下 建立新中国

兵出紫荆关

历史的车轮走进一九四八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包括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等），增加到将近二百五十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余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正规部队只有一百六十余万人。敌人“全面防御”已经彻底破产，被迫改用“重点防御”，企图以现有的兵力和工事为战略点线，以精锐部队为核心，收拢兵力，猬集一团，进行垂死挣扎。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组织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一伟大的战略决战首先从东北战场打起。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开始，经过五十天激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敌四十七万，解放了东北全境。

当时，我晋察冀解放区已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以董必武同志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薄一波同志为政委，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同志为副司令员的华北军区。华北军区下辖第一、二、三三个兵团，冀中、太行、冀南、冀鲁豫、晋中、北岳、太岳等七个二级军区。我们原晋察冀野战军改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扩编为第二、第三兵团）。

辽沈战役期间，我们华北军区部队沿太原、绥远、平绥一带布防，其目的是防止东北敌军向华北靠拢，并阻止华北敌军向东北增援，从而把敌人的东北和华北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华北敌军的最高指挥员是傅作义。因为，自石家庄战役后，蒋介石把孙连仲作为替罪羊，撤了他的职，而将华北战场全部交给傅作义指挥，以便利用傅作义的力量来支撑华北的危局。

这时，毛泽东同志已从阜平的城南庄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他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司令部，确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指挥着伟大的战略决战。周恩来同志曾经形象地形容这个大决战的指挥部：“我们这个司令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不发武器，不发弹药，就是天天发电报，指挥着世界上少有的大决战，叫前线天天打胜仗。”

华北敌军在我军的牵制、打击、围堵下，无法向东北增

援,为了对蒋介石作出交代,表示一下“不负重托”,傅作义曾把其机械化部队和骑兵调集至保定一带,企图偷袭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打掉我指挥中枢。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当毛主席初来晋察冀,住在阜平城南庄的时候,傅作义就曾在暗藏特务的配合下,派出敌机轰炸城南庄,一枚炸弹命中了毛主席的驻地。幸亏在聂荣臻同志等保护下,毛主席安然无恙。现在傅作义又派部队从保定南进至方顺桥,企图一面进攻石家庄,一面向我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逼进。

当时,我华北一兵团正在围攻太原,三兵团在绥远包围包头,只有在平张线(北平至张家口)的我们二兵团距离较近。聂司令员便命令我们南下拦截敌军,保卫党中央。接到命令后,我们二兵团所属各部队,除四纵一部分留在平张线上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外,其余各部星夜急驰,由宣化赶到完县、曲阳、新乐一带,将来犯之敌击退。为了使全军的统帅部有更可靠的安全保证,我们自九月至十月底,就一直驻守在这一带。

西柏坡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庄,滹沱河穿流而过,清一色的瓦房整齐有序,村头高大的树上,挂着一口大钟。毛主席就是在这里,指挥着著名的三大战役。

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告捷,东北我军开始入关作战。

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揭开序幕。

我们多少有些着急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东北打完了,华东又包了“饺子”,那末,我们华北是不是该动手了?华北

有六十多万敌军,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有的同志估计:蒋介石又要拿华北敌军增援华东了,我们的任务,很可能要去南线阻击傅部,以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

十一月四日,罗瑞卿同志来到司令部,一进门就说:“告诉你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去了。”

我正守着一个巨大的沙盘,和参谋们分析敌我态势。沙盘上标着,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在西起归绥、东至塘沽长达六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有固守平津的架势。现在他突然去了南京,显然对下一步的动作至关重要。

我说:“是不是要将傅部南调以支援华东敌军,加强其长江防线?”

罗瑞卿同志说:“难说。蒋介石现在是举棋不定。他既想让傅作义固守华北,又想给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添点兵力。固守华北,可以迟滞我东北、华北大军南下,调往南京一线,则北进可增援刘峙,驻守长江可保证南京防务。”

我说:“傅作义不一定听他的。绥远是傅作义的老家,他的辎重家当都在绥远。因此,从傅作义的立场来看,如果向西收拢,还有自成局面的可能;如果南下,即使站稳脚跟,也仍旧要受制于蒋介石;而冒险南窜,不说别的,光是想通过我们这一大片解放区,就够他折腾一阵子的。”

罗瑞卿同志一边在我们的沙盘上划了一道无形的路

线，一边说：“他可以从海上走嘛。”

站在旁边的参谋余震同志插上一句：“有情报说，敌人的‘剿总’司令部，有从北平移往天津的迹象。”

“他们是想保住港口嘛，”罗瑞卿同志分析说：“不过，要是我指挥他们，就不这么蠢，这么多部队，搞海上运输，塘沽港口又临近封冻期，谈何容易。”

我听着他们的议论，凝视着沙盘，心想：看来，傅作义部队不论是向西逃窜，还是从海路南下，从战略上看，对我们都不利。至于北平敌军是固守，还是西逃，还是南窜，倒也难说。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傅作义部向西比较方便，因为平绥间的铁路、公路还比较畅通，加上我们第二兵团从平张线撤到南线，在北平至张家口之间，有了一片“真空”地带……

余震见我沉思不语，便诙谐地说：“参谋长，有何高见？”我和司令部的参谋们，在工作中、生活上都亲密无间，所以彼此说话并无拘束。

我说：“我还没考虑成熟，不过，我总认为，想法子把他们留在平津最合适。”

余震的看法大概与我不谋而合，急着说：“哎呀，那还不快向聂司令员建议一下！”见我们不语，他又补充一句：“傅作义部队本来就是我们的‘碗’里的‘肉’嘛。”

我和罗瑞卿同志都笑了。我说：“你的想法有道理。不过，中央怕早有打算了。”

果然，西柏坡精干的“小司令部”里，正在研究华北战场

的兵力部署。

十一月十七日，我与杨得志、潘自力同志到神石庄参加八纵干部会议。这是八纵组建以来的头一次会议，也是迎接华北大决战的誓师大会。会上，我们把东北野战军将要入关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消息告诉大家，同志们无比兴奋，表示一定要打个象辽沈战役一样的漂亮仗。

十一月十八日，我们收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有关平津战役的第一封电报：

杨、罗、耿所部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李、李阻止敌人逃跑。

该电文中的“杨、罗、耿所部”即我们华北第二兵团。“杨、李、李”即由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同志指挥的第三兵团。

二十四日午夜，我们又收到了毛主席发给第三兵团并转告我们的电报。命令第三兵团撤围归绥，秘密东进，以奇兵突袭的方式进至张家口、宣化一带，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同时，中央又命令第一兵团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以集中兵力进行平津战役。

我们华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就这样进入了平津战役的洪流里。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又给我们发来电令：

着杨罗耿率二兵团于今二十六日由曲阳出

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至涿县、涑水以西地区待命。……七纵受杨罗耿指挥，应由保定北进逼近敌人活动。

二十七日，上述命令正在执行中，毛主席又来电命令我们：

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

紫荆关是冀中平原西面太行山区的一个关隘。“关”的本身只是一段残败的长城。这一带千山万壑，作战地图上满是曲曲弯弯的等高线。从这里往北出动，不易暴露作战企图。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的一个个电令分析，二兵团隐蔽待命，东北我军秘密入关，无疑，这是两支即将突然投入战斗的奇兵。

十一月三十日夜，我们按时完成集结。从不断收到的电报中，我们了解到：三兵团一纵占领了沙岭子，切断了张家口与宣化敌军的联系；二纵攻占柴沟堡、左卫；六纵攻入万全城、郭磊庄。我们还得知：将投入这次战役的我军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两个兵团的十二个纵队，一个铁道纵队及特种兵；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的七个纵队及一个炮兵旅；连同冀热察、内蒙、冀东、北岳、冀中、冀南军区的部队和晋绥军区

一个纵队，共计一百余万人。为了统一指挥作战，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组成平津前线委员会，总揽全局。华北地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战斗。

毛主席要我们在紫荆关隐蔽待命，这是因为北平敌人的动向尚未明朗。如果敌人为了从海路南下而向东逃跑，我们第二兵团就要到天津、唐山一线去截击敌人，或者切断敌人平津之间的通道；如果敌人向西逃跑，我们就要到张家口一带去阻击西逃之敌。

同时，毛主席命令第三兵团进攻张家口，吸引北平敌人西援，从而抓住敌人，使其不能东逃。

十二月一日，我们得悉，三兵团对张家口的突然进攻，果然按预定计划调动了敌人。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王牌”第三十五军、驻怀来的第一〇四军，分乘火车、汽车向西增援。

我立即意识到，该我们这支奇兵出动了。

罗瑞卿同志对我和杨得志同志说：“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打仗有什么特点？”

杨得志同志看着我们，幽默地说：“听说他有好多的‘点子’，不过在我们这里，这些‘点子’起不了什么作用。”

郭景云是敌三十五军军长，绰号郭大麻子。在傅作义的麾下诸将中，他应当名列榜首。三十五军前面的几任军长是傅作义、董其武、鲁英麟。董、鲁两人都是傅的山西同乡，而郭景云是陕西人。在乡里关系特别受到重视的军阀部队里，把“王牌”军的大印交给一个外乡人，足见傅作义对郭景云

的器重。

我把眼光落在张家口的位置上。自从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们从那里撤出，两年来，战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现在，就要在这里解决华北敌军主力，夺回塞上名城，不管他什么王牌军、杂牌军，休想阻挡我们的脚步。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喊着：张家口，我们又回来了！

十二月二日，我二兵团全军上下都知道了敌三十五军已经被“调了出来”的消息，干部战士普遍发出了“跟三十五军算老帐”的呼声。正在这时，秘密入关的我东北大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东北的密云一带。而毛主席又命令张家口的第三兵团“围而不打”，把由北平向西增援的敌三十五军牢牢拴在了战车上。那几日电报频传，军情如梭，敌我双方都一步步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行事。当然，我方是自觉地执行命令，而敌方则是不自觉地被我们牵着鼻子走。罗瑞卿同志一边看我标图，一边对杨得志同志说：“毛主席调出北平的敌人，把敌军分割开，以便我们各个吃掉，这一着很英明。”我说：“这回可抓住傅作义的命根子了，傅作义心疼，说不定会亲自出马来救。”杨得志同志意味深长地说：“这篇‘文章’嘛，大得很来！”

也是在十二月二日，军委以“4A”级电报，命令我第二兵团：兵出紫荆关，直逼平绥线！

八百里路风和雪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部署，平津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将敌军的一字长蛇阵截成数段；第二，先解决两头，即依次歼灭西面的张绥（张家口、归绥）之敌和东面的津唐（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之敌；第三，最后解决北平之敌。有的同志把这个部署形象地叫作“腰斩长蛇，砍头断尾”战术。

然而，这条“长蛇”毕竟是由六十多万美式装备的敌军组成，长达千里。要切断并吃掉这样一条“长蛇”，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毛主席这样杰出的战略家，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个军事上的壮举。

毛泽东同志再一次表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把我军指挥得“神出鬼没”，把敌军调动得“神魂颠倒”。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使傅作义感到西线尚有可为而舍不得东逃；同时，毛主席指示淮海前线暂不总攻，又使蒋介石下不了命傅作义南逃的决心。这样，就使敌人的心理天平向“暂守平津”倾斜。而我军对张家口围而不打，又使傅作义不得不派出救兵，以保住西窜之路。所以，敌人派出其三十五军援救张家口，正是不自觉地“听从”了毛主席的调遣。

据说，郭景云在离开北平时，完全是一副即将“马到成

功”的样子，一连说了几句“去去就回来”，似乎他不过是去赶大集而已。他确实走得很快，但到达张家口后，能不能回到北平，就由不得他了。

十二月初，傅作义得到密云告急，知道我东北解放军已开始进关；又得知我第二兵团已从紫荆关出动，才感到情况不妙。于是，急忙飞往张家口，密令郭景云火速回北平保驾。

毛主席注意到了傅作义的举动，洞悉他此行的目的是丢卒保车，宁肯失掉张家口，也要使郭景云部退保北平。于是，在十二月四日一天内，给正在向北急进的我们第二兵团连续发来三封电报，一封比一封紧急，真是急如星火，军令如山。这些电报的措词，至今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估计暂三军尚在怀来及其以东地区。我杨罗耿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隔断暂三军与张(家口)、宣(化)敌之联系。(十二月四日凌晨二时电)

毛主席还指示：只要我们切断北平、怀来之敌和张家口、宣化之敌的联系，张、宣地区的敌军就不会西逃。

杨罗耿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先歼下花园之敌)。以有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

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四日午后四时电)

四日夜九时的来电中,毛主席特别强调:

杨罗耿务于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在电报的最后,毛主席还关心地询问:“杨罗耿明(五)日是否能到宣(化)怀(来)线?”而此时,我们第二兵团的绝大部分部队还在太行山区的崎岖山路上行军。这山路不光崎岖难行,而且曲曲弯弯,从地图上量只有十里的距离,走起来二十里也不止。

为了不让敌人跑掉,部队不顾一切地全速向北、向北……宣传鼓动员们扯破嗓子,用快板,用口号,用标语,拼命地喊着“抓住三十五军!”“堵住三十五军!”“追上三十五军!”“逮住三十五军!”走路,对我们二兵团来说,本是“小菜一碟”,但是,任务如此紧急,终究要靠时间。连日来每天行军为八、九十里,四日开始改为强行军,部队凌晨二时出发,全力向北开进。

太行山区重峦叠嶂,有时候几乎无路可寻。二十二旅通过虎头掌岭时,我用电台与他们联系,得知两个半小时才前

进了七里。我当即让参谋拟电，命他们坚决完成当日行程。二十二旅回电时用了一句“山高不如脚高”的话来表达决心，这是何等巨大的战斗热情啊！看了他们的决心，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用“铁脚板”出色地完成任务。果然，他们当日的行程竟达一百四十里！

入冬的太行山区，山风卷雪，寒气袭人。越是向北，山越险，风越硬，风卷雪粒打在脸上，针扎般地疼。部队全部一溜小跑。来不及做饭，战士们就一把一把地嚼着生小米。连、营、团、旅、纵队以至兵团指挥员，无不站在路边，大声地鼓动着“同志们！要跟紧，千万别掉队，掉队就赶不上抓三十五军了！”“快走呀！脚板子底下出胜利呀！”……那种坚定的信念、出奇的力量，使人永生难忘。在艰苦的行军中，官兵之间真诚的同志心、手足情，更是感人。有的同志把自己的备用鞋让给别人，自己却穿着磨了大洞的鞋子行军，让马骑、替扛枪、背病号……这一切都化成无形的力量，鼓舞着大军向北飞驰。

十二月五日晨七时毛主席又发来电报指示：

杨罗耿应迅速控制宣化、怀来(不含)段，完成东西阻击工事，防止张、宣敌向东及怀来、南口敌向西，并相机歼灭下花园、新保安诸点之敌……

经过一天急行军，到晚上八时，我们决定稍事休息后再

连夜开进。一宿营，我就给正在平绥线上拦截敌三十五军的冀热军区詹大南同志和十二旅王昭同志发电，让他们固守沙城、土木堡，阻击敌人，等候主力到达，并要他们立即查告下花园、怀来、康庄、新保安等处敌情，以便兵团指挥各部接敌。詹大南和王昭同志坚决执行了命令，在下花园一线节节抵抗，并组织民兵破坏了铁路、公路，使美械化的三十五军寸步难行。

凌晨，兵团部进至大洋河南岸。杨得志、罗瑞卿和我立即下马来河边。但见洋河在夜色中冷峻地横在面前，河上没有桥，河面上结了层冰，冰结得不厚，透过冰层，可以听到水流声。

我们正要下令组织渡河，这时参谋送来一封电报。

电报是毛主席打给第三兵团的，并转发我们第二兵团和平津前线其他领导人。电报说：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四个师（一〇一军之二七一师，一〇四军之二五〇师、二五八师，一〇五军之三一〇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家口是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则不但张家口集敌九

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尔后难以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四个师，再歼灭张家口五个步师三个骑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从电报上看，毛主席命令第三兵团坚决隔断张、宣之敌的联系，同时十分焦急地在等待我们第二兵团到达平绥线，加入战斗。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渡过洋河，和第三兵团并肩作战。

“报告参谋长，河水不深，只齐到胸部。”侦察员过来对我说。

杨得志司令员挥了挥手：“不要耽搁，赶快组织过河。”

罗瑞卿政委沉着有力地说：“过河的时间越短越好，多争取一分钟，就多一分主动。”

我叫过作战参谋询问，了解到附近没有桥，要临时架桥也来不及，就迅即命令：徒涉！

战士们立即跳进冰河。随着“嘎支嘎支”的响声，冰层被踩裂了。于是，后面的推前面的，前面的拽后面的，很快在冰

河上“犁”出一条条通路。一小时后，部队全部蹚过洋河，等最后一名战士上岸后，刚刚蹚开的水面又无声无息地冻上了。我听见一个团的政委在队列里喊着：“快跑呀！跑跑就暖和了！”这就是当时部队唯一的取暖办法。当时，许多战士的棉裤冻成了直挺挺的筒子，不能打弯。但是，战士们还是一股劲地往前跑。

天空飘起了雪花。又是一封电报传来了毛主席的命令：

杨罗耿全部到达下花园地区后，即以一个有力纵队开至宣化、张家口之间，与一纵在一起确实控制张宣间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并尽可能向张宣两方扩展，击破敌人一切打通张、宣的企图，使张宣两敌各个孤立以利尔后歼灭。……杨罗耿其余两纵位于宣化以东，隔断宣化、怀来两敌之联系。

不久，敌情起了变化。敌三十五军已经越过宣化，向下花园、新保安方向逃窜。于是，一封急电又送到我们手中。电报除了严厉批评兄弟部队“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外，特别明确地指示：

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

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电报中的严厉口气，反映了军情紧急，事关重大，也反映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想：我们一定要不负厚望，完成堵截、围歼敌人的任务！

这时参谋报告说：“据侦察，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直奔新保安了！”

“什么？”我急得额头上冒出了汗珠，立即向杨得志和罗瑞卿同志说：“情况紧急，从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三十里路程。”这句话引起一阵沉默，也许是大家都在想：三十华里对于郭景云部的十轮大卡车来说，简直不算什么。只要三十五军一过新保安，形势就将变得对我军不利。也就是说，三十五军可以向东逃，怀来的一〇四军亦可向西靠，要是他们一旦合在一起，再要歼灭他们就十分困难了。

隔了一会，罗瑞卿同志问道：“下花园和新保安之间的鸡鸣驿，离下花园多远？”

我回答：“约二十里。”接着，我又补充说：“鸡鸣驿附近有詹大南同志的三个团，可以挡一阵，但是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了四天了。”

杨得志同志以拳击掌：“给王昭发电报，让十二旅无论如何要堵住敌军。”

参谋立即拟电发往四纵十二旅。我立刻补充说：“同时发电给三纵、八纵和四纵的十旅、十一旅，要他们加快速度，

要拿出拼命的劲头来赶路。”

罗瑞卿同志严肃地说：“告诉全体指战员，如果让三十五军逃过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不好交代！”

“那我们就将铸成大错，影响整个战局！”杨得志同志补充说。

电报发出了，我的心也不由地飞向了新保安。十二旅能顶住吗？三纵、八纵和四纵十旅、十一旅，能否及时赶到？

王昭同志果然不负众望，来电告捷：我十二旅在新保安抓住了敌三十五军。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王昭同志不愧是一员骁将。这位出生于河北平山县、十五岁参加革命的八路军“平山团”创建人，智勇双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立下过不少战功。这次，他在收到兵团的命令后，立即率十二旅抢先赶到新保安。这时，敌三十五军的四百辆“大道吉”，还在詹大南同志给他们制造的重重阻碍中，艰难地喘息在鸡鸣驿。

看了十二旅的报告，我不禁大叫一声：“好一个王昭！”原来，他们利用双方混战，敌我间隔特别小的机会，冒充敌人赚开了新保安的西门，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把睡在梦里的守敌歼灭干净，从而控制了新保安。我们把这个胜利立即电报毛主席。

指挥部一片欢腾，“抓住了！”“堵住了！”的消息不胫而走，简直成了加快行军的动员令。我立即展开那张看烂了的

地图。在“新保安”三字上用红笔重重地打一个圈。接着，命令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去：

“四纵立即向东，占领新保安以西、以南地区！”

“三纵向西，占领新保安以东、以北地区！”

“八纵从正面向北展开，接替十二旅防务！”

鉴于各部队都在行军中，有的电台不一定开机，我又让作战部门派出骑兵，把这些部署送往各个部队。

随后，各个部队执行这一命令的报告纷纷传来：四纵首先到达指定位置，詹大南同志派出冀察分区参谋长柴树林同志，在下花园桥头为曾思玉司令员准备好了向导，引导主力进入阵地。八纵已经到达桑干河，正向宣化飞跑，兵团的骑兵追上他们，传达了扭头向东的命令，这时，他们已经看得见下花园的大烟筒了。三纵在郑维山和王宗槐同志率领下，从小五台山，顶风冒雪一口气插进新保安附近的沙城、宋家营一线，并以九旅和七旅进入阵地。

大洋河北的平绥路两侧，到处是马不停蹄、兼程前进的洪流，这一股洪流旋风般汇向弹丸之地新保安。

敌三十五军从张家口东撤后，一路上遭我地方部队袭扰和阻击。从鸡鸣驿出发东进后，又遭我十二旅顽强抗击。傅作义派飞机助战，也不能打开一条东逃的通道。后来，还是我们十二旅，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决定放开一条路，让出新保安，让敌军进城，以便稳住该敌。等敌人一进城，十二旅即在新保安以东的新保安车站构筑三层阵地，从而把敌

三十五军牢牢地围困在新保安。

接着，我二兵团各部队陆续到达新保安外围，完全切断了敌一〇四军（即暂三军）和敌三十五军的联系，实现了对敌“王牌军”三十五军的包围。

这时，毛主席一方面命令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包围怀来、南口一线的敌人，并控制康庄、青龙桥、八达岭等要点，准备阻击自北平西援的敌人；一方面又命令我们第二、三兵团：

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

对西面的敌人“围而不攻”，以便完成对东面之敌的包围，这是毛主席指挥艺术高明的又一个光辉体现。

我们立即向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发出命令：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已严责我们到达太迟，致使敌三十五军乘机向东突围，影响了整个作战计划；现在要我们切实包围敌三十五军于现地区，并隔绝其与怀来的联系。如果敌人跑掉，由我们二兵团负责。我们已对军委承担了责任。因此，我们也要求你们严格而切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玩忽职守或执行命令不坚决而导致放走敌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这份电报发出不久，突然接到报告：三纵郑维山司令员将八旅和七旅的两个团从新保安外围拉到城东南的沙城、碱滩一带，打敌一〇四军去了。

当时电话还未架通，这个情况令人费解，于是，兵团给三纵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要郑维山同志把部队撤回来，并要他对前面的行动负完全责任。

哪知，郑维山同志回电不但没有撤兵的意思，反而要求增援一个团。大意是：我在这里阻击西援之敌，情况严重，请四纵支援我。

自从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以来，我对郑维山同志就比较熟悉，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呼叫援兵的，看来他们的情况一定十分严重。于是，经过研究，我们命令四纵立即增援三纵。四纵参谋长唐子安亲率两个营赶去，不久，就传来他们击退西援三十五军的一〇四军先头部队二〇五师的消息，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也正是郑维山同志这一行动，使新保安之敌待援突围的希望破灭，只能困守在城里了。

兵团部住在离新保安约五里路的赵家山。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房子依山垒造，又窄又小。同志们开玩笑说，这样的穷山窝，等土改时连个中农都找不出来。在那样的房子里设立指挥所，别说挂地图，就连我们“杨罗耿”三人都转不过身子。怎么办呢？我和杨得志同志顾不得许多，就站在雪地里，由几个警卫员拉一床棉被在头顶上

挡雪，打着手电看地图。罗瑞卿同志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时大声喊着：“大碾盘，统统上大碾盘！”原来，他找到一个老乡碾谷子用的碾棚，棚中那碾盘足有两三张办公桌拼起来那么大。

征得老乡的同意，我们就动手建立“指挥所”。七手八脚，大碾坨子掀到地下当坐位，中间的碾轴上挂一盏汽灯，电台开机，电话架通，这间又破又烂的碾棚，立即成了新保安前线的神经中枢。

大碾坨又冻又硬，真是“屁股还没坐热”，电台已经在下达配置指示了。我们将原来的部署调整了一下：把四纵第十一、十二旅配置于新保安以东的八里沟、东八里、崔黄口、吴家堡一线，八纵第二十二、二十三旅占领新保安以西的金堂房、西八里一线，组成第一道包围圈；由三纵第七、八两旅、四纵第十旅、八纵第二十四旅，在碱滩、沙城和鸡鸣驿等地组成第二道包围圈。

下达完配置指示，我走出碾棚，深深地呼吸几口冷空气，只见大雪初霁，寒星点点，新保安外围的冻土带上，锹镐之声不绝于耳——部队已经在做工事了。

八百里路风和雪，“王牌军”终于被我们扭住了。

为“王牌军”掘墓

新保安是北平到张家口中间的一个小城堡。有两千多

户人家，很早就是通往塞北的驿站。明朝中叶，原名李家堡，本是“拉骆驼”商人休息打尖的地方。明万历年间在这里修筑城墙，改名新保定。清代康熙年间才又改称新保安。又有一说，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在此平安无事地住过一夜，于是她便赐了这个名字。新保安是个镇，但是清代把府衙建在这里。它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地势低下，城堡象在锅底上一样。平绥铁路、平张公路从城墙北边穿过，火车站在城的东北角上。这个面积仅为一平方公里的小城，却建有高十米、厚六、七米的城墙，城内以玉皇阁为中心，东西、南北大街贯通，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它不设北门的原因是为防止从北面来的侵略。城内的钟阁楼有大钟一口，听老乡说，钟声能够传到方圆六十里以外，可作报警之用。钟阁上刻有“锁钥重地”字样。这“锁钥”两字，表明新保安扼北平和张家口交通的要道，也像八达岭的“北门锁钥”一样，表明它是北平通向塞外的咽喉。据说，一六四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曾以此为据点，发起进攻北京的战役。城内还有清真寺、耶稣堂、河神庙，有七所学校，一个发电厂。可见，这是个颇具规模的城镇。

从敌三十五军被围那天起，干部战士中就响起一片“跟三十五军算老帐！”的吼声。这个跟我们周旋多年的老冤家，几次都从我们枪口下逃脱了。不久前的怀来战役，我们狠狠地揍了它一下，曾使他大伤元气，军长鲁英麟自杀。但它又依靠美国装备重新组建了起来，继续与人民为敌。这次，绝

不能再让他溜掉。

我们共有九个旅(相当于敌军的九个师);敌三十五军有两个师,再加上一些杂牌部队。所以,我们和敌人相比,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我们的部队士气高涨,各纵队都要求早日拿下新保安,歼灭敌人的“王牌军”。通往兵团部的电话线,几乎都被请战的呼声占满了。我们把广大指战员的求战要求,多次反映、上报中央军委,但是毛主席一面表扬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一面再次指示我们要“围而不打”。求战心切的干部战士干脆一拨一拨地找到兵团来,要任务,表决心,甚至赌气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胜利完成战斗任务,歼灭敌人。可以打包票,立军令状!”原来,他们误以为是兵团领导怕他们打不赢,所以不下令进攻。有些与我们熟悉的指挥员,干脆半真半假地“泡”在兵团指挥所,嚷着“给点吃的吧”,实际上是要求担任主攻。

说实话,就连我们兵团的领导们,也是急得手发痒,心发热。但是毛主席要我们对三十五军采取长久围困的部署,有其深远的战略含义。为了使广大指战员理解中央军委的这一英明决策,我们分头到各纵队去召开党委会,并组织政工人员下部队做解释工作,向全体指战员讲清对新保安“围而不打”能拴住傅作义,使他下不了令平津敌军从海路南逃的决心,从而有利于我军全歼华北之敌的重大意义。在这方面,罗瑞卿同志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说:“你们把精力放在攻击准备上,思想工作我负责。”部队很快

克服了急躁情绪,开始了扎扎实实的战役准备。记得当时的战地小报上登过一首诗,充分表达了指战员对“围而不打”的认识: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
已经放在锅里边;
解放军四面来烧火,
越烧越煮越绵软。
同志们,别着急,
山药蛋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
时间一到就攻击。

罗瑞卿同志看了这首诗后,笑着说:“说得对,不过这只是说了我们二兵团这口‘锅’,毛主席那口‘锅’里,可不光是‘山药蛋’,那里是既有‘海’(天津)、又有‘山’(燕山),还有北平的金銮殿哪。”

敌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命根子,毛主席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从而走活了整个平津战役的一盘棋,实现了把敌人抑留在华北全部歼灭的谋略。现在,三十五军被扣在了新保安,傅作义可真有点惶惶然了。因此,他决心尽全力救出三十五军,急令一〇四军和十六军西进,接应三十五军走出困境。

十二月八日，增援而来的二〇四军向土木堡进攻，遭我冀热察军区部队阻击。于是，他们当晚改道迂回至新保安东南的下湾子、宋家营和东西水泉地区，又遭我三纵和四纵痛击。九日，一〇四军出动十二架飞机，与我军反复争夺宋家营。至下午三点，好不容易才推进到马圈子，实在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便呼叫郭景云突围。

郭景云更是一分钟也不愿呆在新保安。所以，他进入新保安的当天，便开始了突围。这位一向自认为“所向无敌”的中将军长，死到临头仍然傲气十足。他曾对部下吹嘘说：“我们三十五军是吃钢咽铁长大的，守城是我们的看家本事。当年直奉联合阎锡山对冯玉祥作战时，我们守过天镇，北伐时候我们守过涿州，抗战中我们守过太原，‘剿匪’中我们守过归绥和包头。除了太原外，每次我们都打胜了。现在守个新保安，算得了什么！再说，新保安这地名对我们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现在来到新保安。长安、永安、保安是三个“安”，有了这“三安”，保证我们三十五军不出三天安全返回北平。”

牛皮可以随便吹，但是几次突围都没有得逞。于是他又把希望寄于傅作义的增援上。他认为：不要说三十五军，就是那四百辆“大道吉”汽车，傅作义也不能不管！

然而，几次突围败北，终究大大挫败了郭景云的锐气。因此，当敌一〇四军丢下漫山遍野的尸体，好不容易进入马圈子，向郭景云呼叫，让他突围的时候，这位“常胜将军”竟

不敢出城一步，一定要一〇四军进城接他。正在这两支部队你要我出城接应，我要你进城保护的时候，我东北野战军四纵在康庄将另一支增援的敌军——敌十六军一举歼灭，占领了康庄、盆道、青龙桥一线。这样，一〇四军也陷入重围。敌一〇四军一看大事不妙，“难弟”也顾不上“难兄”了，掉头东逃，被我东北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在镇边城一口吃掉。至此，平绥线完全被我切断，敌人西援无兵，东突无力，敌三十五军就此陷入绝境。

新保安成了孤岛，四周被人民解放军像铁圈箍桶一样围得严严实实。这时，傅作义只给了郭景云一封八个字的电报：轻装突围，撤回北平。当郭景云下令破坏装备、扔掉伤员、销毁文件、捣碎电台，准备离城时，傅作义又令他固守待援。于是，他只好驱赶士兵和百姓，抢修工事，做起了死守的打算。

到十二月十三日，我军在平绥线上已歼灭敌人两个军五个师。被围的敌人，除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在新保安外，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〇五军军部和七个师（旅）也被围困于张家口。西线的失利，迫使敌人将驻在天津、塘沽地区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两个师）和第六十二军的一七五师调至北平以西。

敌人的这一系列行动，完全实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围而不打”，防范“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的意图。新保安像个大包袱背在傅作义的身上，使他的指挥

思维完全混乱了。

而此时，我军的战役准备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华北解放区的群众，冒着严寒风雪，掀起了支前热潮。大车队、小车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担架队、拥军队，浩浩荡荡，络绎不绝。为了让支前的船只畅通无阻，万人上阵砸冰河。许多小孩子把过年的花炮钱买了食品、文具，装成慰问袋送到前线。华北人民做的军鞋，双双都是八百个针脚、一斤二两重，被战士们誉为“胜利鞋”。……华北人民对平津战役的贡献，在历史上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笔。

在新保安前线，我们兵团指挥部接到的请战书、要求当“尖刀”、“先锋”的决心书，堆满了那个大碾盘。我与杨得志同志天天到阵地上检查战役准备情况，组织部队构筑层层阵地，形成对三十五军的多层包围，并展开战前练兵。那年冬天好象特别冷，在冻得如同石头一般的土地上改造地形，十分困难。尽管大家想了不少“土办法”，比如用火先把地面烤热，烤化一层挖一层，从而使效率提高了许多；但柴草毕竟是有限的，主要还得“硬碰硬”，一镐下去只有拳头那么一个坑。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把地冻下去一米多厚，就这样，我们的战士一个小时也能挖二、三尺，用战士们的话说，这是在为“王牌军”掘坟墓，早日挖成，早日埋葬它们。几天的功夫，一条条能并肩走两个人的交通壕就形成了交通网，有的还从铁路下掏空，一直挖到城墙底下。由于指战员们吃住都在旷野里，所以生活条件特别艰苦，送上来的饭用棉被裹

了一层又一层，还是冻成了冰渣渣。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各级干部身先士卒，阵地上充满了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气氛。八天时间，挖成的交通壕达两万多米。

我们把攻打石家庄时朱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再次作为全兵团进行战役准备的指导思想，号召大家加紧战前练兵。各部队多层次地组织攻城演练。尤其是担任主攻的营团，精心为“尖刀连”挑选成员，磨“刀”加“钢”。在新保安周围三十多里的防线上，战前练兵热火朝天。装炸药用的棺材、大柜，登城用的云梯、缆绳，爆破用的炸药架、爆破筒，一堆一堆的准备完毕。担任爆破任务的爆破手们，不分昼夜一次次演习敌火下运动通过的动作，他们把棉裤都磨得露出了棉花，还是一遍遍地苦练。我们的战士，只要将任务交给他，他就会创造奇迹。为了使火力运用更适于攻城和便于指挥，我亲自组织各纵队集中所有的迫击炮、山炮、步炮，组成炮兵群，并且用夜间挑羊皮袄、白天故意暴露目标等办法，引诱敌人暴露火力，为未来掩护突击队的炮火射击提供可靠依据。

最后，我们召开作战会议，仔细地选择了突破口和战斗方案。

这时，根据敌工部门提供的情报来看，新保安城里的三十五军已是一片末日景象。郭景云几次突围不成，傅作义又命令他固守待援，使他越发变得暴躁与蛮横，宣称如一旦我军攻入城内，他将带头与营以上军官集体自焚。他的幕僚们

则昼夜收听广播，希望形势能有所变化。至于下层官兵，眼看小小的新保安兵多于民，吃粮、喝水都成了问题，经常为了争空投互相开枪火拼。由于空投场日渐缩小，傅作义派来的飞机时常把空投物资扔到我们的阵地上，城内守敌只好望空哀叫。他们怨声载道，有的干脆说：“死活快点，受不了这洋罪了。”为了加修工事，他们在城里又砍树，又扒房，把老百姓都赶出家门，在冰天雪地里搭棚栖身。他们还大肆抢劫，抢居民，抢商店，抢骡马，抢粮食，就连酒醋作坊的黑豆、糟渣，也抢个精光，甚至群众的切菜板也被抢去修了工事。老百姓恨不得立刻把这群匪兵赶走。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作为傅作义的“王牌”，敌三十五军毕竟比其他敌军要“高明”些，还是有着一定的统治手段。郭景云为了提高士气，一面呼叫傅作义空投慰劳品，一面出版什么《阵中日报》，张贴标语，派出“慰劳队”大量发放赏金，封官许愿，组织敢死队……在他们被围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突围的尝试，不时向我们打炮，派小股部队出城袭扰我们的土工作业和攻城准备。这说明，敌三十五军尽管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他们困兽犹斗，仍在垂死挣扎。

为了从精神上首先压倒敌人，我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我们的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捷报；阵地上的广播喇叭、喊话筒，不停地向城里广播我军俘虏政策和“告傅作义官兵书”；竖起“缴枪不杀，欢迎过来，立功者有奖”的大字标语牌；许多解放战士写了劝降信；兵团的敌工

部部长甄华同志，还向郭景云的一个师长写了敦促他们投降的信，利用同学关系，晓以大义，劝他们迷途知返。这些书信用枪榴弹、六〇炮、弓箭射进城内，或系在石头上掷进城去。敌军官兵思想受到震动，不断有人逃出城来向我军投降，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记得总攻前两三天的时候，我们把兵团指挥所移到离城只有一千来米的地方，杨得志同志望着风雪中的新保安城，对我和罗瑞卿同志说：“我看咱们也给郭景云送点‘礼物’吧！”

我问：“什么礼物？”

“以我们几个人的名义，直接给郭景云写一封《紧急劝降书》。”

罗瑞卿同志说：“好啊，这叫先礼后兵，文武夹攻嘛。”

于是，我们用迫击炮把这份《紧急劝降书》射进城去。《劝降书》是写给“郭景云军长暨三十五军全体官兵”的。我们在《劝降书》中向他们指出：

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芦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一〇四军、十六军在怀来、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一〇五军也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一〇四

军、十六军和一〇五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一〇四军、十六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包围得象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等处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等地方了。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

《劝降书》还为他们指明生路：

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学长春郑洞国、新七军的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

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消灭你们……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司令部谈判。

这封《劝降书》像一颗重磅炸弹重重地打在三十五军官兵的心弦上。

我们将敌情和战斗准备情况于十二月十四日报告中央军委。毛主席于十五日凌晨二时给我们复电指示：

杨罗耿十四日十四时电悉。加紧完成对三十五军的攻击准备甚好。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大约在二十日左右。

在我们包围新保安、积极进行歼敌准备的过程中，东北野战军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我兵团七纵队，分别由顺义、怀来、涿县地区出发，先后占领海淀、门头沟、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以第一、第六、第十纵队由蓟县进至宝坻附近和马头镇、郭县集、廊坊等地，隔断了北平、天津间的联系；以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由丰润等地沿北宁线急进至张贵庄机场、杨柳青、唐山、军粮城等地附近，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隔断了天

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这样,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止,毛主席指挥我军完成了对华北敌军的分割包围,将傅作义摆下的“长蛇阵”切成三段:在北平的一段中有敌华北“剿总”及两个兵团部、六个军部、二十二个师;在张家口地区的一段中有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七个师;在津塘地区的一段中,有一个兵团部、五个师。共六十余万敌军成了我军的囊中之物。敌人陷入了毛主席早就预料的“欲战无力,欲守无能,欲退无路”的局面。

十二月十九日,罗瑞卿同志告诉我:莫文骅同志率领东北野战军四纵要到西线来了。原来,中央军委考虑到三十五军被歼后,张家口之敌有可能向西突围,所以将正在康庄的东北野战军四纵拨归华北三兵团指挥,以加强对张家口的包围。同时,毛主席还于十九日电示我们:“在四纵到达张家口并部署完毕后,杨罗耿即发起攻击三十五军,准备五天左右解决战斗。”

莫文骅是我和罗瑞卿同志在“红大”的老同学。一九四五年他去东北工作,路过张家口,我们见了一面,至今已有几年不见了。现在,一听说他要路过新保安,我分外高兴,立即通知各部腾出最好的房子,让东北四纵的同志住。

莫文骅同志率部来到时,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非常激动。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互相抱着一蹦老高,你拍我一下,我捅你一拳,十分亲热。尽管战场上条件艰苦,兵团后勤部门还是想方设法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还喝了著名的宣化葡萄

酒。

大家边吃边谈，兴致极高。当谈到以兵团领导的名义给郭景云发出的《紧急劝降书》时，莫文骅同志哈哈大笑，连说：“好！这件‘礼物’送得妙！”

我说：“老莫！我们还想再给他们准备一份礼物，不过这礼物得向你借。”

莫文骅同志说：“老耿又出新点子了，难道要我进城做说客？”

我说：“不开玩笑，把你的炮兵团借给我们。”

罗瑞卿同志用手做了个抛物线的样子说：“两样‘礼物’，异曲同工。”

杨得志同志看着莫文骅同志，用他那特有的笑吟吟的样子点点头，表示我们商量过了。

我补充说：“打下新保安马上归还，不耽误你们打张家口。”

莫文骅同志略一思考，同意了。他让我们向中央军委请示一下，同时他们也请示了东北野战军总部。他们都回电表示同意。在解放新保安的战斗中，这个炮兵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我们向莫文骅同志借炮兵的当天，死寂了几天的新保安城里又开始骚动起来。傅作义又给郭景云来电：“你们要忍痛烧毁四百辆汽车，以便进行轻装突围。”然而毁车的大火还没点燃，傅作义的第二道电令又到了：留下两个连

队看汽车,其余人马步行突围。于是,郭景云重新调整,再为士兵打一通气,准备冲杀出城。但是他刚做好准备,傅作义又下令“固守”,并许愿空投一百五十吨弹药,增加他的防卫能力,于是,郭景云只好又驱赶士兵加固工事,重弹“死守”老调。

然而,就在他们“瞎折腾”的时候,新保安城外的大炮,已经悄悄地抬起了头——敌三十五军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平津西线斩“长蛇”

新保安之战,是平津战役“各个歼敌”的第一仗。兵团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参战,以四比一的绝对优势,砍出“腰斩长蛇”的第一刀,不打则已,一打必胜。

根据毛主席十九日的电示精神,我们兵团部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于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发起攻击。

漫长的十多个冬夜不难度过,主要是等待进攻的急切心情令人难熬,现在,进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二十一日清晨,我们在新开设的指挥所再一次观察战场。在这里,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新保安城楼上敌人的动向,敌兵都在翘首仰望天空,大概是盼望空投物资的飞机。而在我们的阵地上,却空无一人,夜来一场北风裹着清雪,把新保安周围涂抹成了一幅单调的水粉画:高的地方是光秃秃的黄土,低的地方是白皑皑的积雪,偶尔有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枯叶,

飘忽几下便落进低坡处。然而，只有我们才知道，在这似乎凝固了的地面下，正隐伏着十万大军。在离城根只有五十米的一圈交通壕里，无数双眼睛注视着城墙上的每一个射孔。这些交通壕一圈又一圈，在军用地图上布成一个密密的蜘蛛网。交通壕中担架可以对面通过，还可以通行手推车。每隔二十米就有一个地堡。不仅如此，在新保安周围还有长达五百里的电话网，从兵团指挥部里，可以摇通每一个连队的阵地。

作战时间以杨得志同志的手表为准，每隔两小时校对一次。四纵主攻城东南面，三纵和八纵（欠二十四旅）分别攻击南门、西门和西北面。第二十四旅作为兵团预备队，准备在敌人向东突围时进行阻击。在炮兵阵地上，解放区人民肩挑车运送来的炮弹（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堆积如山。上百吨炸药已运到前沿弹药所。各种突击队正在推选他们的掌旗手，号兵把他们的铜号擦得雪亮，使人感到那洪亮的号音，准能震坍城墙……看到这一切，罗瑞卿同志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慨地说：“从我们北出紫荆关，近一个月的时间，毛主席指挥我们，终于把这顿‘饭’做熟了。”

我守着十几部电话机，听着那一声声“三纵九旅运动完毕”、“三纵七旅城南待命”、“四纵十旅已到达城东位置”、“八纵独一旅完成准备”……的报告，心里分外踏实。是啊！我们用了十多天时间“四面烧火”煮三十五军这锅“山药

蛋”，果然火候到了。

午后二时，兵团下令各部：扫清外围，打开各自进攻正面上的通道！爬冰卧雪十二个昼夜的战士们早就憋足劲了，一阵秋风扫落叶式的铁旋风扫过去，郭景云设在城外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统统被炸药包送上了天。至午夜，我突击部队进入攻击出发位置，这时，就连那条通过城北的铁路，也已在突击队身后了，三十五军除了城墙之外，再也无险可守。敌军被压缩在城堡内，真正成了瓮中之鳖。

二十一日夜，我通宵在指挥所部署战斗，与参谋们一起，逐项对照作战计划检查各部落落实情况。晨六时，全兵团电讯进入静默。指挥所里鸦雀无声，只有那只压在地图上的马蹄表，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二十二日晨七时，我把电话要成“通播”状态，交给杨得志司令员，请他下达作战命令。他看看表，挽了一下袖子，开始打电话：

“曾思玉同志！”

“杨司令员，我在马家台指挥所。四纵一切准备就绪。”

“郑维山同志！”

“三纵等待命令！”

“邱蔚同志！”

“八纵待命出击。”

杨司令员从座位上站起来，马蹄表象突然加快了节奏似的，跳得人心无比激动……

七点十分，杨得志同志那十分浓厚的湖南话（也是我的家乡音）在电话上炸响：“总攻开始！”接着，他极其有力地“咔”的一声挂上了话机。

似乎杨得志同志挂上电话的地方是一只起爆器，顿时，许多门大炮的第一发炮弹同时飞出了炮膛。又几乎同时“轰”地撞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上。从兵团部飞起的三颗信号弹，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划出一道绿弧线，悠悠然地飘落在新保安上空。炮弹成群地准确地向城堡倾泻，腾起冲天烟柱。那城堡又在升起的烟云中逐渐向下陷落。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各種大、小炮击，好像给新保安下了一个小时的“铁雨”。城墙被一层一层地揭皮，掀顶，穿透，显出一个个“V”型的大口子。浓烟中，城东南面的我军各爆破队的红旗开始飞扬，连续爆破再一次炸起冲天烟柱，城墙变成了一堆断垣残壁。八时三十分，担任城东南面突破任务的四纵第十一旅第二十三团首先发起冲击，冲锋号响彻云天，战士们喊杀声震地。不久，他们就向兵团部报告攻击得手。我告诉他们要抓紧巩固阵地。恶战一个半小时后，那面举起又倒下、倒下又竖起的红旗，终于牢牢地飘扬在城头上。这时，城东门又腾起一股黑烟，这是十旅的“棺材炸药”大显威风，城门被炸通，部队蜂拥而入，杀声从城门洞里传出，发出低沉的回响。各纵队、旅、团的电话里，一片“向纵深猛插”“向友邻靠拢”的命令声。从望远镜里可以观察到，东面和南面各突破口附近，已经有担架在运伤员，有战士在押

俘虏了。

九时，城西和西北面的八纵队也开始了冲击。那里靠近三十五军军部，是敌人防守的重点，由敌主力一〇一师负责把守。郭景云在这里修了大量低层的暗堡，即把城墙下部掏空，构筑成暗火力点。由于我军事先对这些暗堡没有侦察清楚，因此，在这里的进攻并不顺利。二十二旅的六十四、六十六团和二十三旅的六十七、六十八团的进攻，先后受挫。八纵是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打大仗，这种情况把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荣誉感激发成了满腔怒火。战士们喊着“拼死也要把它攻下来！”“死也要死到城里去！”一次又一次猛扑上去。六十八团连续派出了三十多人的爆破队，都是刚一接近城堡，就遭暗火力点的袭击。下午二时，兵团再次为他们调整了炮火，投入了预备队，八纵的纵队和旅指挥员把衣服一甩，奋不顾身到火线上指挥作战。六十八团参谋长张振川亲自组织火力，再掩护，再爆破。副班长徐学顺一跃而起，拉响导火线，高举着“嗤嗤”冒火的炸药包扑向敌人。敌人被徐学顺这种英雄行为吓得扔下机枪就跑。徐学顺跑到城边，将即将爆炸的炸药包奋力投出，自己顺势滚进护城河。一声巨响，连同前面送上的二十多捆五十斤一个的炸药包，全部引爆，徐学顺被震昏过去，城墙彻底塌了下来。四十分钟后，二十三旅六十七、六十八团，二十二旅六十四、六十六团相继登上城垣，随即展开密集火力，压制敌人的反扑。三纵七旅和九旅也先后从南面和西面攻入城内。郭景云虽

然投入了特、工、通等直属营直接抵抗，但已无济于事。敌人被迫放弃城墙，溃退入城。我军穷追不舍。在巷战中，我军利用挖墙凿洞、逐房跳跃的办法，小群穿插，纵横迂回，很快就将敌人的防御体系打烂。支前的民兵也是个个像小老虎，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把弹药送到那里。零星溃兵遇上他们立即成为俘虏。华北人民在新保安战役中的作用，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救护所，支前的妇女们把食品嚼烂，口对口地喂那些重伤员。天寒地冻，民兵们都脱下自己的棉衣，穿在我们那些被战火撕成烂褛的战士身上，情景十分感人。下午五时整，三纵、四纵、八纵各进攻部队胜利会合，信号弹飞上天空。从此，敌“王牌军”三十五军在他们的军队序列里永远消失了。

下午六点，我们向毛主席发出新保安大捷的电报。毛主席复电：

二十二日十八时电悉，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休整十天，准备行动。

新保安之役，敌三十五军的一个军部、两个整师，全军覆没，郭景云在我军突破城垣后自杀身亡，副军长王雷震以

下官兵八千余人被我俘获。四百辆美式卡车、二十多辆被三十五军从张家口抢来的“丰田”、“吉斯”等民用小卧车,以及郭景云专用的那辆兰灰色“雪佛来”轿车,还有数不清的武器弹药,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郭景云的尸体得到了我军人道主义的安置,我们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埋在东门外火车站旁,插了墓碑标志。一九四九年一月,为了促进北平和平解放,我们将尸体起出(时值寒冬、尸体未腐)交给了傅作义的部下。

就在我们全歼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的第三天,从张家口又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华北第三兵团一举歼灭敌人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五个整师,计五万四千人,张家口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当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于二十四日深夜给我们华北第二、三兵团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
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看着电报,我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张家口啊,两年来你一直揪着我的心!回想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们撤离这座人民的城市,走过写着“大好河山”的大境门时,真是依依惜别;但是,我们立下誓言:“张家口,我们一定回来!”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大好河山”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张家口、新保安之敌的覆灭,使傅作义部队的主力丧失

殆尽。西线无战事。我们华北二兵团和三兵团在休整中，依照中央军委改编命令，开始使用新的番号，改称第十九兵团（原二兵团）和第二十兵团（原三兵团）。不久，一兵团亦改称第十八兵团。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我十九、二十两兵团奉命开赴北平郊区，与东北的十二、十三兵团协同严密包围了北平。平津前线指挥部给我们的命令是：十九兵团攻击西直门至德胜门段，二十兵团攻击东直门至德胜门段。两个兵团对攻入城后，会攻鼓楼；再与十二、十三兵团会攻天安门，解放全北平。

北平是我熟悉的地方。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严冬的日子，我作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走进了设在协和医院的那间谈判会议室里。那时我就曾有个想法：我们希望和平，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企图用武力打垮人民军队，因此，我们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如果现在再有那种谈判，那情况就和当时不一样了！

我们对进攻北平的工作开始了周密的布置。当时我们兵团部驻在北平西北郊黑山扈（现国防大学所在地）一带，我每天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外西北面观察地形和敌情。同时，派出侦察分队接敌侦察情况。有一次，我还带上几个侦察员和作战参谋，化了装到城边侦察。那灰色的城墙、耸立的城楼，使我想得很多。这里曾是元、明、清三朝古都，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又一度在此发号施令。那些帝王将相、官

僚军阀和他们的外国主子，在这里作威作福，而劳动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在这里兴起，但是又都在这里遭到残酷镇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夺回到人民手中，让一个新北平屹立在世界东方。

在研究作战问题的会议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解放北平，就我们这支英雄部队来讲，保证上级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但是一定要保护好那些文物古迹，那可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数千年中华灿烂文化的结晶呀！

我们深深感到，这将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虚伪的和平建议，提出了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十五日，在向天津守敌发出最后通牒，而敌人仍妄图顽抗时，我东北野战军发起攻击，全歼天津守敌十三万余人。十六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傅作出了和谈反应。十八日凌晨三时，军统特务在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何思源先生的家里制造了暗杀事件，何先生全家一死五伤。一月十九日，何思源带伤出城，与另外十名代表来到紫竹院我军驻地，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文明古都，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至此，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红旗插上太原城

伟大的平津战役以我们的全胜宣告结束，几乎同时，淮海战役也以蒋介石的失败告终。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我们浩浩荡荡开进北平，举行了轰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在那些日子里，北平城到处洋溢着动人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记得那阵比打仗还忙，工作纷至沓来，包括入城教育，军容、军纪整顿，参观访问，联欢、座谈、慰问……忙得不可开交。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同志和市委书记彭真同志还宴请过我们。地点在北京饭店。就是一九四六年我们在北平工作过的“军调部”代表团驻地。现在走进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情绪和当年大不一样，真是出气都觉得痛快。在宴会上，我们见到了前几天还是“老对手”的傅作义将军，大家握手如仪。我们赞扬傅先生深明大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胜利的锣鼓声中，我们没有被鲜花和赞扬所陶醉。全军上下都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元旦献词（即《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还有半壁河山没有解放，华北的太原还在敌人手中，我们不能怜悯那条“冻僵的蛇”，一定要实现毛主席庄严表达的“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推翻掉”的决心。

还在进入北平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就给我们发来电报：

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这将是华北战场的最后一战。

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徐向前同志就指挥华北第一兵团（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以后改称十八兵团）包围了太原。至十一月底，他们已陆续攻占了許多外围要点。为了策应平津战役，中央决定对太原实行“围而不打”，争取在一九四九年春天解决问题。

因此，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驻在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时，除了进行一些必要的进城工作外，我们兵团领导人主要是研究下一步如何打太原的问题。为了使我们对太原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军区联络部送来一份通报。这份通报介

绍了山西敌军头子阎锡山的一些情况。原来，阎锡山为了显示他死守太原的决心，又是打棺材，准备“抬椁死战”，又是备毒药，似乎要效法希特勒，实际上，这正暴露了他色厉内荏的本质。

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军。用战士们的话说，“老大哥把太原的饺子包好了，就等着我们上去会餐了。”这是多么高昂的士气啊！

但是，这时候有个问题：我们第二、三兵团都要溶编一个原驻北平的国民党整编军，这需要时间；而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尽早出发。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杨罗耿”于二月十四日致电军委请示：

按原规定华北二、三兵团均应于十九日或二十日出发，但两个兵团均各需溶编一个由北平出来的国民党整编军，现尚未到手。因此，时间似乎仓促一点，是否可稍为推迟，请军委规定即示，以便准备。

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

两兵团如等候溶编国民党军，则需时将甚久，攻取太原后又要休整。因此，不要等候溶编，应派出溶编部队之干部率领溶编部队跟进。两兵团则

于十九日按时出动，三月上旬到达太原附近，争取于三月中旬解决太原问题。

于是，我们按命令离北平出发，向石家庄集结。兵团部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由潘自立同志带领出发。杨得志、罗瑞卿和我，却分乘三辆吉普车，向天津方向开去。

为什么要去天津呢？是为了学习。我们要到平津战场的天津一段去看一看，掌握一些新的攻城经验。因为太原与石家庄不同，石家庄是“城下城”，而太原可是“城上城”呀。上路不久，我那辆车的后轮就不能驱动了，当时也没法修，是变速箱出了毛病，司机不敢开。没有法子，我只好自己开，用加力档驱动前轮。后来到石家庄时，我请兵团后勤部长赵云同志帮助修车，他看了看，干脆给我换了辆新的。

我们在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到驻在河间的冀中军区司令部，军区孙毅司令员和林铁政委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三天我们到达石家庄。休整期间，部队主要是进行一些政治教育，因为刚刚打了大胜仗，要防止部队的骄傲情绪。

三月份，我们从石家庄向太原开进，经井陘、阳泉、寿阳、榆次，到达太原附近。这一路我们十九兵团真是浩浩荡荡，红旗飘飘，战车隆隆，气势非凡。兵团新组建的炮兵团，也给我们增添了军威。

一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境内，沿途景象与河北就大不相同了。罗瑞卿同志说：“山西，听起来象‘山稀’，实际上是‘山

多’。”山西的村庄比河北的大，因为那里的人家大部分是做买卖的，富人多，房屋建筑质量也好。

一到太原前线我们就去看望徐向前同志。他当时身体不太好，但是仍在抱病指挥着太原战役。一见到我们，徐老总就风趣地说：“欢迎十九兵团来！咱们一同来打我这个老乡吧。”原来，徐向前同志是山西五台县人，阎锡山也是五台县的，所以称作“老乡”。

徐向前同志问我们：“你们有个炮兵团吗？”

我们向他汇报了我们那个炮兵团的情况。他高兴地说：“你们家底不薄嘛。攻太原这样的城市，光靠炸药包不行了，得有大炮、有坦克才行。”

我说：“过去倒是缴获过一些坦克，没人会摆弄，有些就炸毁了，这次一定要搞几辆。”

徐老总说：“你呀，还是老脾气，喜欢钻研机械。听说你开车把你们司令员、政委都弄到沟里去了，是不是？将来有了坦克，你开我坐，那玩艺可不会翻，即使翻了，打个滚爬起来照样走。”

他那风趣的讲话引得我们都笑了。

四月初，我们华北野战军“兄弟三个”（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汇集太原周围，加上第一野战军的第七军（即西北野战军七纵）、第四野战军的炮兵一师和晋中军区部队，共二十五、六万人。

尽管以徐向前同志为首的太原前线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

委指示，争取按照“北平方式”来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但是我们也深知阎锡山这个反共专家的顽固立场，因而把立足点放在“打”上。

四月五日至七日，总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部署总攻太原。这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返回西北去，途经太原前线，到会作了指示。接着，中央军委、毛主席命令彭德怀同志留在太原前线，和抱病坚持工作的徐向前同志一起指挥太原战役。彭总亲自带着我们几个分管作战的指挥员，在太原城周围跑了四天，了解敌情和指导攻城准备工作。

我们十九兵团得到晋中军区独立第四、五、六旅的加强。正在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阎锡山坐飞机跑到南京去了。我们有位参谋笑着说：“阎锡山这一跑，把棺材和毒药留给了他的部下。”

在南京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听了阎锡山的汇报后，迫于形势，曾表示愿意按“北平方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但阎锡山这个人很善于遥控指挥，他在几十年行伍生涯中，不乏这样的先例。现在，他在南京遥控太原，指挥其部下一面打出免战牌，一面又在城里大肆叫嚷“凭坚死守”。

关于太原问题的和谈破裂。四月十七日，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复电太原前线总前委，同意所报作战计划。电报里特别指出：“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这里所说的“不受任何约束”，意思是和平解

放太原已无可能，可以放手地打。

四月十八日我们进驻赵庄。十九日，我们兵团领导同志到总前委所在地即十八兵团司令部开会。会上，明确了战斗分界线和协同事项，同时，总前委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人事方面的命令：徐向前为总前委书记、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调任总前委副书记兼太原前线副政委，周士第为总前委副书记兼太原前线副司令，罗瑞卿同志还兼任十九兵团政委（太原战役后调李志民同志任十九兵团政委），司令员仍为杨得志，我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作战会议的精神，当天就传达到连排。我们按照作战意图，集中三天扫清太原外围，把那些阎锡山苦心经营的“乌龟壳”一个个打掉，使城墙以外不再存在障碍。

太原是山西首府，历史上叫并州，位于晋中盆地北部，西濒汾河，东面和北面都有山岭起伏，地形险要。阎锡山在这里盘踞了三十多年，是军阀割据时间最长的。市内有兵工厂、机械厂和钢铁厂等数十个重工业工厂，阎锡山依靠这些工厂制造枪炮，作为他镇压人民、维持其土皇帝宝座的本钱。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太原就修有永久性防御工事。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的名义，收编日寇战俘三千多人为“军事顾问”，增筑了数千个碉堡，对城防工事进一步修复加固，因而使太原成为坚固设防城市，在国民党中被称为“反共模范堡垒”。

蒋介石为保住这个反共堡垒，在我十八兵团围攻期间，

曾从西安空运第三十军军部、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师八十九团等共一万一千余人增援太原，加上阎锡山在太原城内郊外到处抓丁，强迫民众为他充当炮灰，逐渐恢复在前阶段作战中被我十八兵团打垮了的部队，并新编一些部队，从而拼凑了由十三个步兵师、三个总队、五个特种兵师以及一些保安团、民卫军组成的守城部队，总兵力约十万人。其中包括被阎锡山收编的日寇官兵一千多人。敌人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战时动员工作团”，专门从事抓丁、拉夫、掠夺、杀人。敌人还编有三百人的手枪营和有九辆轻型坦克的坦克营，负责保护总部。

太原的群众冒着危险将一封封请求赶快攻城的书信送到我们手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我们昼夜盼望心滴血，盼望盼得眼球落，不攻城是因为甚？毛圣人（群众对毛主席的尊称——编注）怕误伤了好人民。千万赶快打开太原城，我们死在阴曹也甘心。”这些信反映了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太原人民，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的迫切心情。

四月二十日，太原外围清扫战开始。

阎锡山将太原外围划分为北面、东北、东南、南面和西面五个防区，将其总兵力的约百分之八十部署在外围防区。

总前委将我攻城部队的任务区分为：十八兵团从东面进攻；十九兵团从南面、西面进攻，并负责攻下东南角的双塔寺；二十兵团及第七军从北面进攻。

当时各兵团所属纵队已改编成军，我们十九兵团下辖

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三个军。我们将六十四军和晋中军区部队部署在太原西面。进攻开始后，他们和从西北面进攻的第七军十九师一起，沿汾河西岸分两路向敌人猛攻，指战员勇猛作战，频告得手。六十四军健儿们在百多门火炮的掩护下，连续攻占南屯、南上庄、新庄、沙沟等点，在敌人的西面防区打开了缺口。接着，又攻占了敌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小王庄和敌西面防区指挥部所在地大王村，击毙敌西面防区总指挥、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

到二十日晚九时，西面外围的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将守敌第六十一军军部、六十九师、七十二师、工兵师和“坚贞师”全部歼灭。只有敌八十三师因在我发起进攻之前就逃入太原城内，侥幸多活了几天。

在南面，我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分别和守敌六十六师、七十三师交手，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垂死的敌人施放了毒气，但也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经过激战，敌六十六师全军覆没，七十三师损失惨重。我军在扫清了南面的敌外围据点后，下午五时，六十三军会同六十二军的一八六师包围了东南角上的双塔寺。

双塔寺“要塞”是敌东南防区总指挥部所在地，为太原东南面的屏障。敌人在该处阵地上筑有三层工事和数十个碉堡，周围还有天然沟和人工壕围绕，易守难攻。守敌为四十三军军部、一个暂编师，另外还有几个团。

二十二日晨，六十三军的一八七师和一八九师对双塔

寺守敌发起总攻。我们炮兵团的尊尊大炮，瞄准了敌人。我命令炮兵：狠狠打！但是只准打塔周围的工事、碉堡，把敌人的通讯设备、交通壕、火力点统统打烂，不准打那两个塔。我们的大炮“发言”了。那么多炮，打得那么准，摧毁了敌人的地面工事、高堡，而双塔寺内未落一颗炮弹。这样，这座有着许多碑刻的明代古刹双塔寺，就在密集的炮火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接着，进攻部队乘势冲击，突破外壕后，爆破突击手们以连续爆破摧毁了敌人的地堡群。我军占领了塔西南部的阵地后，接着进行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直捣敌人核心工事，全歼守敌，生擒敌东南防区总指挥、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

与此同时，第十八、二十兵团的勇士们也相继扫清了北面、东北和东面的敌外围据点。

扫清外围后，我军并没有歇息，而是加紧进行土工作业，挖之字形沟壕，一直挖到离城墙只有六、七十米的地方，为的是在攻城时，保证我们的炮弹一落完，突击队就可跃出壕沟，迅速占领突破口。

太原的城防，被敌人吹嘘为“百里防线，固若金汤。”但是，它的外围防线已被我军摧垮，百分之八十的守敌已被歼灭，遍布城外、特别是集中于南面、西南面的数千个碉堡已被摧毁，现在敌人只有依靠残部守卫四面被围的危城。为了给敌人一条生路，我军于二十二日向城内守敌发出最后通牒，令其立即投降。但是，至死不悟的敌人仍然负隅顽抗。于

是，我军一方面颁布缉拿守敌头目梁化之、孙楚、王靖国和日寇头目今村中将、岩田少将等战犯的命令，一方面准备攻城。

我们兵团部署第六十三军攻击城东南的首义门，第六十五军进攻城西南的大南门，第六十四军和晋中军区部队进攻城西面的水西门。

二十三日晚，兵团部接到前线司令部发来的攻击令。杨司令员和我研究后决定由罗贵波同志率领独立旅对西门的守敌作牵制性进攻，由六十三军首先主攻首义门。

我们指挥部已移到双塔寺。双塔寺距首义门不远。首义门上的守军是阎锡山的所谓决死队。他们仗着有自己的兵工厂，把枪弹、炮弹像水泻般地往下打，我军几次攻击，均未得手。我们计算了城墙高度，确定火焰喷射器可以喷射到城楼上，就下令把一九四五年在张家口缴获的四具日本的火焰喷射器抬来。

四具火焰喷射器很快前出到攻击位置，各尖刀队一个齐射，压住了城墙上的敌军火力，操作手奋勇向前，四条火龙飞上首义门。顷刻间，猖獗的敌人呼爹喊娘，死的死，逃的逃。接着，一八八师指战员迅速登上城墙，攻占了首义门。

这时，西面的我军也发起了进攻。六十四军的五七四团在水西门和旱西门之间奋勇登上城墙，然后打开水西门，使主力部队如怒潮般冲入城内。

在大南门，我们的大炮正在“啃烧饼”，数十门榴弹炮抵

近射击，炮口摇平，对着女墙打集火射击。那可真是一炮一个洞，一炮一层砖。一排排炮弹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地把城墙炸开、掀走，不到十分钟，城墙上硬是开出一个可进四路纵队的大口子。硝烟未散，六十五军的战士们已经呐喊着冲进去了。

各路指挥员纷纷报告得手，请示攻击方向，我们回答：六十四军沿街向东，接应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其余部队冲向市中心“绥靖公署”——阎锡山的老巢。

进攻“绥靖公署”的主力很快就攻到了位置。这时六十五军电话报告，在“绥靖公署”大门口发现九辆敌坦克，由于打开了巷战，这些坦克还没来得及用上，我军就冲到了跟前。坦克上的敌人弃车而逃，连发动机都没关闭。

我一听缴获了坦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就对着话筒高喊：“好极了，派一个排看住，我随后就到。”

二十四日晨，我军三个兵团的主力汇集太原市中心，包围了“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仅用不到半个小时就占领了太原守敌的指挥中心，击毙了代理阎锡山行政职务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活捉了敌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和十兵团司令王靖国。那个手枪营也全部被我们俘虏。

我立刻去找六十五军缴获的那九辆坦克。只见一个连队的指战员们正围着那些“游动堡垒”争论不休。见我到来，他们就报告说：

“副司令员，这些坦克不知为什么不响了。”

我登上一辆仔细观察，发现油料都烧完了。

根据随车文件，我知道这是九辆日本“豆”式坦克，战斗全重一吨半。我说：“没事，快从俘虏里找驾驶员，加上油就能开走。”

是役，仅我们十九兵团就俘虏敌军三万余人，缴获了三百多辆卡车、电台二十多部，连阎锡山“绥靖公署”那些漂亮的小卧车，也完好地缴获了。

二十四日晚，我们请了戏班子演戏庆功。战士们听不惯山西梆子，兴趣不大。罗瑞卿同志乐哈哈地说：“听不懂也听听嘛，胜利了，就得高兴一番。”

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十九兵团开到城外，城内完全由十八兵团负责。离城前，我们将三十辆小卧车交给前委和新成立的军管会。许多俘虏经过教育后要求加入我军，我们把其中一万人拨给了十八兵团。

我们把缴获的九辆坦克，组成了一个坦克营，下辖三个连，每连三辆坦克。

接着，我们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电中“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的指示，离开了华北战场，踏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

踏破贺兰山阙

以“三大战役”为转折点，解放战争进入我军向全国战场胜利大进军的阶段。美蒋反动派看到在军事斗争上已不可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步伐，慌忙使出政治手腕，妄图苟延残喘。蒋介石又是演出“引退”闹剧，又是施放“和平”烟幕，而暗地里，却继续调兵遣将，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我军前进，先“划江而治”，保持半壁江山，然后再伺机反扑。然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英明的党中央早已洞悉其奸，决定不让其阴谋得逞。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正当我们在太原前线激战的时候，我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九江，东至江苏江阴，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中心南京，接着，红旗又插到了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大军继续向华南发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划江而治”的美梦。于是，国民党只好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和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国民

党在这片辽阔地区所依靠的主要兵力有三股：一是胡宗南所部十七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二十万人，二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三是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青、宁三马共有十个军三十三个师（或旅），约十八万人。这样，西北战场敌人的总兵力为三十八万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解放了古都西安。胡宗南被迫将部队撤退到西安以西约二百里的扶风、眉县一带。他把主力五个军集结在渭河两岸，形成集团配置。

马步芳和马鸿逵的老巢虽在青海和宁夏，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为了拉拢他们，先后任命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因此这反动而残暴的二马就得意忘形，企图以螳臂来阻挡历史的车轮。他们先将部队驻扎在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地区，后来，当他们得知我华北两个兵团来到陕西后，慌忙又向西北退到麟游山区，一面与胡宗南部遥相呼应，一面也为其继续逃向甘肃、宁夏准备退路。

在我军方面，由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的到来，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约三十四万人。与敌人总兵力相比，我军少四万人。但是，敌人有相当部分兵力远在西宁、兰州、银川等地，即使现在陕西的敌人，兵力配置也较分散，除胡宗南五个军猬集一起外，两马害怕被我围歼，将其部队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同时，胡部与马

部之间,也有着很大的空隙。加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胡宗南与二马长期以来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即使二马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马步芳实力较强,又自恃有西北军政长官的官帽,终日以“西北王”自命,目中无人;马鸿逵是马步芳的长辈,现在屈居副职,当然很不甘心。因此,他们表面上联合作战,内心里各有打算。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利用敌人矛盾,集中兵力先攻一敌,从而把他们分而歼之。

但是,对胡、马这两坨三摊子敌人,到底先打哪个呢?

彭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决定:先打胡宗南,后打马家军。为什么要先打胡宗南呢?这是因为:第一,胡宗南部在陕北遭我连连打击,损兵折将,战斗力已减弱;而马家骑兵,战斗力较胡部为强。根据毛主席的作战原则,应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第二,胡部集中,便于围歼;马家兵配置分散,一遇风吹草动,骑兵逃跑得快,较难聚歼。第三,胡部龟缩于扶(风)眉(县)狭小地区,缺乏纵深,其南面秦岭地区兵力甚小,没有策应能力;其北面虽与麟游山区的马家军遥相呼应,但是中间有着较大空隙。这样,就便于我军利用地理条件进行穿插迂回,包围胡部。当然,在攻打胡宗南部时,必须防止二马的增援。所以,在主力攻胡的同时,应该拿出相当强的一部兵力对二马进行箝制。

以上就是以彭总为首的西北战场前委对于著名的扶眉战役的思考。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方案,并特别发电指示,让我们十九兵团担负“箝马”(箝制二马)的任务。电报还告诫

我们“严防两马回击”，“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精神，彭总部署第一、二、十八三个兵团进行扶眉战役，围歼扶眉地区的胡宗南部；第十九兵团箝制北面麟游山区的二马骑兵，掩护主力部队侧翼；卫戍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秦岭佯动，牵制秦岭地区的胡部。

当下达任务的时候，彭总有些歉意地对我们说：“你们十九兵团长途行军，赶来西北，很辛苦。本来应当给你们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别说休整，连准备的时间也很急促了。战机很重要。为了抓住战机，只好紧张些。好在主攻部队已有充分准备，只要你们按照毛主席电报中的指示去做，不要‘轻视两马’，‘严防两马回击’，特别要注意不让两马绕到背后进行突然袭击，那末，就可立于不败之地，而我们主力就可胜利完成围歼胡宗南部的任务。”

七月十日，我们十九兵团进至乾县、礼泉以北的高地，矛头直指麟游，并大造“打马”舆论，搞得两马风声鹤唳，随时准备拔脚向甘肃、宁夏逃跑，根本就顾不上来策应胡宗南。于是彭总从容指挥许光达同志率领的第二兵团、周士第同志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和王震同志率领的第一兵团，迅速包围胡宗南部于扶眉地区。

胡宗南被我军的突然进攻搞得目瞪口呆。他有三个“没有想到”：

第一，没有想到解放军华北两兵团入陕后，竟不经休整便投入了战斗。他原以为华北两兵团经过长途跋涉，至少要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

第二，没有想到解放军先向自己发动进攻。他原以为解放军一定先向马家军发动进攻，到时自己可以从侧面进攻解放军，既可不承受正面压力，又可立下与二马联合作战取胜的功劳。

第三，没有想到自己五个军的集团配置，竟被解放军轻而易举地包了“饺子”。他原以为自己这样配置，五个军互相呼应，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

正当胡宗南懊恼不止的时候，我主力部队经过两昼夜激战，取得了扶眉战役的巨大胜利，共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了八座县城。只有部分残敌向秦岭溃逃。

毛主席得到捷报，十分高兴，当即发电报嘉奖“打胡胜利极大”，并要我军“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

扶眉战役彻底打碎了胡、马之间的作战联盟。我军打胡时，二马怕自己被歼而未敢援胡，后来，胡宗南大叫要“追究责任”。而胡宗南的主力被歼，残部逃往秦岭，使二马陷于孤立，因而更加害怕，匆匆北撤至陇东，准备扼守甘肃和宁夏通往陕西的咽喉——平凉。因此，继扶眉战役这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之后，我们将乘胜追击，进行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我们将在平凉一线寻找战机，进行“打马”。

七月十九日，彭总召集一野各兵团、各军的干部，到虢

镇附近的一座大庙里开会，传达了毛主席《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会上决定以十八兵团两个军在宝鸡箝制胡宗南部队，以一兵团、二兵团、十九兵团以及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向西北方向追击二马，力争将其围歼于平凉地区。

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十九兵团由礼泉、乾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向平凉方向追击敌人。我们的坦克营和装甲车队在前面开道，轰隆轰隆地颇有声势。这些装备弥补了我们对付二马骑兵经验不足的问题，敌人的铁蹄、马刀在铁甲面前失去了威风，让我们的战车追得屁滚尿流。我们的战士风趣地称这些坦克、装甲车为“开路机”。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一兵团、二兵团也相继出动。他们在我们的左翼，取道陇县，准备插到平凉西面的泾源、安国一带，以包围平凉之敌，并阻击可能从兰州和固原开来的援敌。而第六十二军则为这次平凉战役的总预备队。这样，各路大军驰骋，烟尘滚滚，揭开了西北大追击的序幕。

早在出发之前，我们就认真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纪律教育，要求部队按照毛主席关于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一方面和马家匪军作战，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尤其是通过回族聚集区，特别要注意团结回族同胞。为了尊重回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通过回民区时，各部队都注意清洗炊具、不带一点油腥。每有清真寺，一律派上岗哨保护，不准部队人员进去。许多村庄的回族同胞因受二马欺骗和煽动，人都跑光了，家中门户紧闭。我们的部队指挥员和政

治工作人员就在门上贴上“不准开门”的纸条，签上指挥员的名字。这些行动，使当地群众很受感动。躲出去的老乡渐渐返回家园，纷纷向我军控诉二马的罪恶。他们说：“马家军说你们是汉人的军队，是来‘杀回灭教’的，说你们要把寺院烧光、东西抢光、男人杀绝、妇女带走……早知你们这样好，村里人也不会上山了。”

快到平凉时，有一位年老的阿訇带领几十个头戴白帽的回族老乡站在路旁，提出一定要见一见“大长官”。杨得志和李志民同志对我说：“老耿，你在这一带工作时间长，熟悉当地风情，你去接待一下吧！”

我洗净手、脸，来到那位阿訇面前，只见他们十分诚心地捧着一面锦旗。阿訇见到我，把右手搭在胸前，对我说：

“这锦旗上面的字表达了我们的心：‘一切赞颂，都归共产党，都归毛主席。’请你收下。”

我知道这是套用《古兰经》上“一切赞颂，都归安拉”的话，心中十分感动。

在我按回族礼节接旗的时候，兵团的随军记者抢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当这张照片登在报纸上的时候，那位记者还附上一篇新闻报道。解放军视回族老乡如兄弟的消息，比我们的脚步还快，迅速传遍了回族区。回族同胞宰羊担酒，吹起唢呐，沿途欢迎正义之师。当时正值盛夏，一堆堆甜瓜摆在路旁，回族群众就象华北的支前群众一样，硬往战士手里塞。如果战士不接下来，他们就会生气地说：“你这

孕娃，瞧不起我们是怎么的？”这样的情景，在别的地区或许不算什么，但发生在长期被二马匪帮盘踞的地区，被国民党的反动民族政策造成了严重民族隔阂的地区，真使人感动万分。

平凉一带地势高峻，海拔比西安高出一千多米，昼夜间温差很大。由于临近接敌，我的工作也多起来。大概是几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一直没有休息，加上夜间受凉，我突然病倒了。这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二马分道扬镳，一个撤向六盘山，一个逃往静宁，把平凉要塞让给我们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了解到：马步芳搞了个《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打算在平凉地区与我军决战。在这个《计划》中，他把宁马（即马鸿逵的宁夏部队）部署在正面战线，而把青马（即马步芳自己的青海部队）部署在远离正面战线的侧翼。老奸巨猾的马鸿逵，本来对马步芳就有戒心，现在一看这个《计划》，立即觉察到马步芳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实力，而把宁马推出来打头阵的用心：如果胜利了，青马可以坐享其成；一旦失利，被歼的是宁马，而青马就可以溜之大吉。气昏了的马鸿逵接到命令后，把马步芳大骂一通，然后一纸密令交给亲信部下——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要他“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宁马向六盘山撤退，青马也退到固关、静宁一带。这样，敌人的平凉决战计划便告吹了。

接着，在固关之战失利后，青马继续向兰州逃跑，宁马

则逃向银川，他们为了各保自己，再也顾不上“联合作战”了。根据敌情的变化，彭总作出了新的决定：十九兵团主力先会同二兵团挥戈向西，直下兰州，歼灭青马，然后再回戈对付宁马。一兵团直取青马的老窝西宁。十八兵团负责箝制胡宗南残部。

八月八日，我十九兵团除留下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监视宁马外，主力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发。由于我的病情加重，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让我回西安治病。我到西安治疗半个月，急忙出院想赶回兰州前线，可是，捷报传来，西北第二大城兰州已经解放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我的意料。

接着，彭总发布了解放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命令。

十九兵团按照彭总的命令，于九月九日从兰州整装出发，向宁夏进军。

我也于九月九日从西安出发，到固原和部队会合，然后向银川进军。

所谓宁马，包含着马鸿逵和马鸿宾两股势力。他们各有自己的军队：马鸿逵的军队叫宁夏兵团，由他的儿子马敦静为兵团司令，下辖四个军，即马光宗的第十一军、卢忠良的第一二八军、马全良的贺兰军、马敦厚的骑兵第十军。马鸿宾的军队主要是第八十一军，由他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整个宁夏的马家军共有七万多人，由马敦静任总指挥。

这是一支真正的“父子兵”、“家族军”。我曾对杨得志同

志说过：“马家军的番号倒是好掌握，唯有他们这些兄弟爷们的关系令人头疼”。他们下达作战命令不是用部队番号，而是“老大”、“老二”、“老三”地分配任务。这大概也是马家军的特色之一吧。

我们对马鸿逵、马鸿宾的情况及其关系，曾经作过一番调查：

马鸿逵同马步芳一样，也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他有着一段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围剿”我鄂豫皖红军时，马鸿逵曾充当刽子手。同年十月，他又袭击过正在转移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一九三五年秋我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他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对红军进行堵截和追击。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又是这个马鸿逵向蒋介石递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的主张。西安事变后，他通电声讨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表忠。抗战期间，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躲在银川，借口防共，不肯抗日，把蒋介石捧为“再生之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马鸿逵屡次派兵侵犯解放区。不久前，我军解放兰州后，马鸿逵还飞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要“坚守宁夏”，“决心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接着，他从国民党那里领了几百万银元的军饷后飞回银川，扩编军队，准备顽抗。他在原来三个军之外，又增编了一个贺兰军，企图在守不住银川时到贺兰山里打游击。

马鸿宾和马鸿逵有区别。在抗日战争期间，马鸿宾曾与

傅作义联手，共同在绥远西部抗击日寇。解放战争初期，他手下的一个团长被我军俘获，彭总释放了这个团长，并写上一封亲笔信叫他带给马鸿宾。马鸿宾见信后，将一匹良马奖给这个团长。

尽管马鸿宾和马鸿逵是堂兄弟，但由于马鸿逵实力强，且为人蛮横霸道，所以马鸿宾处处受其压制。因此，宁夏两马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存在着隔阂和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一方面进军，一方面做马鸿宾的工作，争取宁夏和平解放。

恰巧有位和宁夏上层人士交往甚密的爱国老中医郭南浦先生，主动向我们提出，愿意去说服宁夏当权者举行起义。经过彭总同意，我们就委托郭老先生去银川进行劝说工作。

这时，色厉内荏的马鸿逵，借口到重庆参加军事会议，带着小老婆乘飞机逃离银川，留下儿子马敦静负责宁夏军务。

宁夏守敌共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东起同心，西至甘肃境内的靖远和景泰，由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一个骑兵团守同心，一个骑兵旅守景泰，构成松散的弧形防线；

第二道防线由黄河北岸的中卫和南岸的中宁所组成，由第八十一军主力和贺兰军分别守卫；

第三道防线设在中宁至银川间的金积和灵武，由宁夏

兵团主力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分别守卫。

我军兵分三路：

第六十四军并指挥独一师、独二师为右路，从固原沿西(安)银(川)公路北进，一路斩关夺隘，于九月十二日攻占同心后，向宁夏重镇中宁逼进。

第六十三军之一部为左路，从兰州一带出发，在攻克景泰后，越过长城，沿黄河北岸东进，直扑宁夏另一重镇中卫。

第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主力为中路，从兰州和定西出发，攻克靖远后，向守敌第二道防线挺进。

时值夏末秋初，高原上的树木落叶纷纷，部队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十分疲劳。但兰州的胜利就象一把火，激动着战士的心。我们决心与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早日解放宁夏、解放大西北再立新功。大家说：“要尽快解放大西北，就仗我们的腿啦！”

十四日，中宁解放。马鸿宾及其儿子马惇靖，接受我方忠告，于十九日率领驻防中卫的第八十一军残部起义。我们请示彭总后，将该部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由马惇靖为军长，并派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同志为该军政委。

马鸿宾部起义，以及中宁、中卫两个重镇的解放，重重地打击了马敦静。守敌急忙下令炸开黄河大堤，妄图以洪水来阻挡我军前进。

然而，这也阻挡不了解放军的滚滚铁流。我几路大军连克金积、吴忠等敌人据点、要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

银川。

我们兵团部前进到灵武，我用望远镜隔着黄河，可以清楚地望见银川。此时，马敦静已乘飞机逃走。城里的守军无心顽抗，只顾收拾细软逃命。我对炮兵的同志说：

“轰他几炮，叫他们投降。”

我们打了三发炮弹，一发打在城外，一发落在城里一个广场中间，一发击中黄河码头。守敌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得不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

九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字生效。我们立即用电台报告了彭德怀同志。

之后，杨得志、李志民、潘自立等同志忙于成立宁夏军管会，我则率领六十四军一部分兵力，追歼残匪。这股残敌约有一个师的兵力，向乌达、磴口以北流窜，进入大沙漠中。我们用四十辆大汽车追击，但是，敌人不知去向。后来，曹祥仁同志在电台值班，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半夜把我叫去，经过研究，断定那便是这股逃窜之敌发出的信号，从而判明了敌人的位置。于是向这个位置追击，果然一箭中的，全歼这帮残匪。

我们在宁夏北边扫荡残敌时，乘机到贺兰山打黄羊，改善部队生活。在那里，我结识了百灵庙的一位蒙古族王爷。

打太原时，我从阎锡山的老巢里缴获一条日本狼狗，经过训练，成了我们的军犬。那时我的爱人赵兰香同志也在前线工作，有什么情况需要通知我时，便在狼狗脖子底下拴个

小条，它凭嗅觉便可很快找到我。在贺兰山，百灵庙的这位王爷爱上了这条狗，提出要拿别的东西与我交换。

蒙古族还保留着游牧习惯，狗是他们很宝贵而且必需的家畜。这位王爷需要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必须忍痛割爱，以显示我军的真诚与大度。所以，我便点头答应了。

他喜出望外，连连用汉语说：“好！好！”当时就拉我走出蒙古包，叫人备了两匹快马，领我向大草原跑去。我大惑不解，搞不清这位王爷搞的什么名堂。跑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树林边上，他下马测量了一番，命人挖开地面。很快，三部军用电台“出土”了。

王爷告诉我：在我军向宁夏进军时，国民党军统特务曾来到这里，煽动蒙古族上层人士组织反动武装，准备一旦宁夏兵败，即把贺兰山以北的地方当根据地。这些电台，正是他们为建立反动武装而带来的，企图以此直接与军统总部联络。由于我军进展神速，加上绥远傅作义的旧部已经和平改编，所以，特务的阴谋来不及实现。一个偶然的机，这位王爷发现了军统特务在逃跑前埋电台的地方。军统特务曾威胁他，如果说出去，就要杀他全家，王爷只好把这个秘密埋藏心底。在我军严格执行团结各民族的政策感召下，王爷终于把这些电台送到了我军手中，用以表示他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信任与尊敬，同时，也用以和我交换狼狗。

我再三感谢他，一面交给他狼狗，一面嘱咐他要相信共

产党、毛主席，相信人民的江山只要打了下来，就永远不会变颜色，他不必怕那些军统特务回来报复。当然，考虑到当时斗争还很复杂，此事我一直为他保密。

这些电台全是印有 U. S. A 的新产品，功率相当大。我们把电台安全运回银川，留给即将担任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潘自力同志。

我们把六十五军留在宁夏驻守，兵团部率六十三、六十四军班师西安。

就在我们解放宁夏的同时，我一、二兵团大军云集酒泉，准备向新疆挺进。新疆反动军政当局看到国民党气数已尽，无心抵抗。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与彭德怀同志取得了联系，决定起义。他逮捕了一批国民党蒋系特务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宣布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九月二十六日，原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也通电起义。九月二十八日，彭德怀同志和王震同志率领一兵团第二军，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取迪化（乌鲁木齐）。十月一日那天，我军进入迪化，从而宣告了大西北的全部解放。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在大西北的辽阔土地上，通过电波听到这个伟大的、庄严的、激动人心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第一声，来得多么漫长不易，又多么突然而迅速啊！中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革命斗争千回百折，终于换来一个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

无比兴奋的我，和全体指战员一道欢呼，欢呼我军踏破贺兰山阙，解放了宁夏；欢呼大西北全部回到人民怀抱；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从紫荆关出发，经新保安之战，到解放宁夏之役，我们一直转战在内外长城之间，鏖兵于长城脚下。每当我凝视那古老的万里长城时，不禁要生发出许多感慨。

感慨之一是：时光流驶，长城倾圮。那战国和秦汉时代的长城，固然已被数千年风雨消蚀得痕迹难寻；就是眼前那明代所建的长城，也已破旧得面目全非，许多地方只留下断垣残壁。

感慨之二是：时代不同，长城已不再是御敌的坚城。如果说，在古代，长城是抵御外族侵犯的屏障，那末，到近代和现代，长城早已失去了它御敌的作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寇从长城的许多关隘长驱直入，侵袭华北，更显示出长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光泽。

感慨之三是：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正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抗击日寇侵略的新

长城。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打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显示了自己无愧于是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新长城。将来，全国解放后，那古老的长城，作为文物当然还有着它的价值；但是，要讲到抵御外部侵略、保卫国家建设，就只能依靠新的长城——人民军队。

每当想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定下决心：我要永远做这新的伟大长城的一块砖石，永远不离开人民军队，现在要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以后还要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为保卫祖国建设而继续战斗。

但是，不久情况就起了变化。在西安刚过了新年，兵团部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调我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外交工作，虽然以前没有干过，但是我想，可以在干中学；我们指挥打仗的本领，不也是边干边学的么？尽管如此，但我依然愁眉不展，因为要离开部队，离开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战友、一起浴血战斗的广大指战员，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杨得志同志和李志民同志劝我：“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我想：对，我虽然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将永远和部队保持血肉联系，我永远是为人民的子弟兵，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在去北京报到之前，我向兵团请假，准备回家乡醴陵去看看。自从一九三〇年离开醴陵老家以来，一方面由于革命工作忙，另一方面由于醴陵处于反动统治下，所以我一直没有

回去过，至今已有二十年了。现在，我很想去看看解放后的家乡。杨得志同志受了我思乡之情的感染，表示也要利用部队休整的时机，和我一起回家乡探望。他也是醴陵人，所以我们就结伴而行。记得当时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起义将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将军，他是湘潭人。

我们从西安乘火车到汉口，先后拜访了驻军领导人罗荣桓、林彪、谭政，张才千同志安排我们住宿。陶峙岳和杨得志同志说，他们在汉口要多呆几天，于是我们便在汉口分手。我带着家属乘渡船到武昌，然后从武昌乘火车到醴陵。当时全国解放还不久，但是铁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

到了醴陵，遇到了一位熟人，就是一九四六年在四平扣留我并同我辩论、打赌的原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一九四九年他随程潜在长沙起义，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和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现在，他正率部驻扎在醴陵。他请我吃饭，并在宴席上坦率地承认：解放战争的进程，证明在四平的辩论和打赌，是我赢了，他输了。关于这点，在前面第六章中已作叙述，这里不再赘言。

在醴陵，我除了回严家冲和石门口探望乡亲外，还去寻访了当年在农会、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中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以及红军烈士的亲人。

我怀着深沉的思念和崇高的敬意，去探望了左权同志的老家。

左权同志的老家在醴陵县东冲埔黄茅岭，和我的老家

只相距二十里。他比我大四岁，早年怀着爱国救民的心志投笔从戎，先后在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曾参加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役。一九二五年二月，由陈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左权同志便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同年冬，他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党选送到苏联的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〇年六月学成归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参谋、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同志，作为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得力助手，率领八路军司令部和所属部队，东渡黄河，深入华北敌后，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发动广大军民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晋东南根据地指挥反“扫荡”战斗时，不幸壮烈牺牲于太行山区的辽县（今左权县），年仅三十七岁。朱德同志曾赋诗悼念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左权同志在革命的硝烟和抗日的烽火中度过了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的战斗生涯和英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作为我个人来说，对左权同志还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因为他是我的领导、师长和战友。自从一九三三年左权同志任红一军团参谋长起，我一

直在他领导下战斗。无论是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役中，还是在长征路上的历次战斗中，他那出色的指挥才能都使我十分钦佩。除了他那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襟怀坦白、不慕荣利、不怕困难、埋头苦干等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外；我还从他的军事理论和指挥实践中学到很多军事知识。他的军事论文如《论坚持华北抗战》、《战术问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和《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都是我学习军事指挥的好教材。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间隙，我向他借阅过克劳塞维茨、伏龙芝的军事著作，那是他自己翻译的手抄本。他还曾嘱咐我，在战斗中如有缴获的书籍，要送给他看。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除革命同志关系外，我们之间已有了师友之谊。现在，面对着烈士的故居，我不禁默诵着太行人民对他的歌颂：“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国家为民族费尽心血……左权将军牺牲为的咱老百姓。”

离别家乡亲友到了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告诉我：从部队把我调来，是要我参加正在筹备中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个代表团拟由张闻天同志任团长，我为军事代表。

接着，周总理问我：“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总理笑着说：“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军区吗？在北平军

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

我十分佩服周总理的记忆力，连许多年以前的这些小事，他都记得这么清楚。

于是，我便在周总理和张闻天同志领导下，投入了参加联合国的准备工作。

但是，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伟大的新中国当时竟被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于是，筹备工作停止，代表团解散。根据周总理的提名，我被任命为驻瑞典王国大使。

瑞典是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

当时，中央为创建和开展外交工作，除了把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调到外交部门外，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些兵团级的同志，任命为第一批驻外大使，其中有姬鹏飞、黄镇、曾涌泉、王幼平等同志。

在我们这些驻外大使离京赴任前，毛主席曾专门接见我们，就开展外交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任驻瑞典大使。不久，丹麦和芬兰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我又兼任驻丹麦和芬兰的公使（后来，丹、芬两国和我国的外交关系也升格为大使级）。以后，我又相继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我在担负外交工作时，仍然很关心我军的情况。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我想方设法收集和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情况，每当见到十九兵团和兄弟部队的消息，虽然相隔万里，却是息息相通，喜忧相共。同时，我又将这些资料配合外交工作，向国际友人介绍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来揭露国际反动派的歪曲宣传。

说到外交和军事的配合，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军队入侵我国，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当时，我正任外交部副部长。

中印边界问题本来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但是，由于印方拒绝我国政府多次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不断在中印边境制造流血事件，并于十月二十日悍然向我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因而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从我方而言，自卫反击是被迫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促使对方坐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边境问题。因此，这场自卫反击战就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和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周总理亲自指导处理这个事件。当时罗瑞卿同志任总参谋长，周总理经常把他找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罗总长向周总理建议，要我也参加研究，因为我既是副外长，又熟悉军事。周总理同意。于是，每天晚上，我和罗总长，还有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同志，都到周总理那里，一起商量、研究。在一个多月的工

作中，周总理那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以及严肃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那善于把外交折冲和军事指挥巧妙结合的斗争艺术，显示了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家。

这是我做外交工作后，第一次做军事工作。

一九七〇年末，经周总理提名，我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要我进驻广播事业管理局，掌握这个曾被姚文元控制的要害部门。后来，中央政治局分工我负责中央宣传口；同时，国务院分工我协助小平、先念同志处理外交事务。一九七八年秋，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不久，中央任命我为军委秘书长。后来，又任国防部长。这样，我又重新穿上军装，从事阔别已久的军事工作。

罗瑞卿同志也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他是四川南充县人，比我大三岁。一九二八年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一直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工作，是我军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我和罗瑞卿同志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相识了。那时他是红四军的政委，我在红三军九师任参谋长，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央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的作战会议。以后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我们都并肩战斗过。在军调部，我们也曾一道工作。特别是在晋察冀野战军和十九兵团，我们更是长期合作指

挥部队浴血奋战，一起出生入死，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工作中，我们不仅配合得很默契，合作得很融洽；而且，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作为一名政治委员，罗瑞卿同志善于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党务工作，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处理问题一贯坚持原则。他秉性刚直，对错误的人和事，从不徇私姑息，批评起来很严厉，但是从不记老帐，犯错误的同志改了就好，这是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人格表现。他才思敏捷，活力洋溢，擅长讲演宣传，还会写文章、演戏，是位出色的宣传家和政治鼓动家。太原战役后，他奉调到北京，出任第一任公安部长，后来，我也调到外交部。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仍然保持着战友间的亲密来往。在我出任驻外大使期间，每当回国述职，罗瑞卿同志总要和我交谈，彼此交流工作中的经验和情况。十年动乱中，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是，即使身陷冤狱，他仍然保持着对党和革命的无比忠诚，保持着他那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利用一切机会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处理军委工作，抓军队建设，作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文革”中受迫害时留下的腿疾折磨着他。经中央批准，他去国外治疗。出国前不久，他还到我家中和我交谈。不料，半个月后，我正在国外访问时，突然传来了罗瑞卿同志逝世的噩耗。当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真希望那条报

道他逝世的电讯是由于某种差错造成的，就像以前在战场上几次误传他“身亡”那样。然而，当我结束访问，匆匆飞回北京，面对党旗下覆盖着的他的遗体时，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严酷的事实。

因此，当我坐在中央军委秘书长办公室内、罗瑞卿同志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时，我们一道工作、共同战斗的历历往事，不禁一一浮现在眼前。

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我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于是，再次脱下军装，离开军事工作的岗位。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的心还是和人民的军队连结在一起。

一九八八年我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当我双手捧着这枚闪耀着光芒的勋章时，我的脑海里像过电影似地闪过了一幅幅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图画：龙冈大捷、白云山下的“飞将军”、越过天宝山防线……奔袭道州、强渡乌江、攻克天险娄山关……渡河东征、收复日伪军占领的张家口……正太战役、东歼青沧顽敌、清风店歼灭战、石家庄攻坚战……新保安歼灭战、太原战役……。无数头戴缀着红星和“八一”军徽的军帽的坚毅面孔，在我眼前浮现。是啊，这光荣不仅属于我，也属于千百万为人民革命战争流血、流汗、负伤、牺牲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游击队员、民兵……—

句话,属于所有人民的战士!

现在,我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我还要和千百万人民战士在一起,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而竭尽棉薄之力。

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封面
目录
正文